



红旗

一九七五年第七期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五年第七期 目 录

思 想 评 论

- 提倡调查研究.....池 恒 (3)
- 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齐 坚 (6)
- 做好思想工作.....梁 华 (10)
- 为青年出版更多更好的自学读物
——评《青年自学丛书》.....翟 青 (12)

加 强 党 的 建 设

-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柏 杉 (17)
-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向 晖 (20)
- 抓好农村党员的思想教育
.....安徽利辛县柳西大队党支部 (25)



做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战士 李增锡 (29)

学 习 理 论 反 修 防 修

正确认识我国的商品制度.....郑 凯 (32)

努力使主观符合客观

——我们是怎样逐步做好天气预报的?.....贵州水城气象站 (37)

小评论一组(三篇)..... (43)

学理论 促生产

——天津市电子仪器厂的调查报告..... (49)

法家路线和黄老思想

——读帛书《经法》.....康立 卫今 (53)

经 济 战 线

照毛主席的思想办农业.....葛 静 (63)

搞好钢铁生产的根本问题在路线.....章 迪 (68)

注意发展轻工业.....钟 成 (72)

为革命做好商品供应工作.....北京市西单菜市场党支部 (76)

☆ 七 月 一 日 出 版 ☆



毛主席语录

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哪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毛主席语录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思想评论

提倡调查研究

池 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在逐步深入。我们在坚持认真看书学习的同时，应当加强调查研究，以推动学习运动扎扎实实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继续发展。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一环。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既是深刻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必须促进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努力。忽视那一个方面都是不对的。我们不仅在看书学习上，同时也在实际运用上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算真正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深入地了解实际情况，并把在实践中得来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对于理论的理解就更深刻。学习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因此，我们的学习不能离开对于实际情况的研究和分析。在当前的学习运动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已经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指导、鼓舞和推动的作用。但是，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我们难道可以说已经都搞清楚了吗？还不能。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察和分析



了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需要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指明了反修防修、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战斗任务。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通过认真读书，联系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以逐步提高和加深认识，在斗争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我们应当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去分析客观事物，避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社会主义时期的事物也具有两重性，有它的历史特点。有的如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是既要允许存在又必须加以限制，有的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要在各个领域搞清楚这些问题，有赖于我们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指针，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详细占有材料，对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找出它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这样，解决问题也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为了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我们应当通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搞清楚它在各个领域的表现，及其来源和变化。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是在平等的口号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又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种情况，要到共产主义才能完全消除。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许多重要论述，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并对现状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使我们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恰当的做法。

随着学习运动的深入，许多实际问题已经并且还会提到我们的面前。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并找出解决的办法，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联系实际来学习理论，是把学习的要求提得更高了，而不是降低了。有的同志一遇到问题就拿不定主意，或者是草率从事，或者是等待观望，这说明自己在理论上还没有学好，同时也说明对这些问题还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是前提条件。毛主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当我们按照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



路线，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了解了它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它的内部、外部各方面的联系，并在实践过程中使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任何复杂的问题，都是不难逐步解决的。

进行调查研究，各级领导要亲自动手，“解剖麻雀”，抓好试点。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任何领导者，如果不善于取得典型的经验，必不能对**工作实行普遍的指导**。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有许多新的任务需要我们去完成，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实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原则，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在集中和坚持的过程中，又必须采取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做好试点工作，取得经验，用以指导全面。这是我们制定任何一项方针、政策所必需的，也是做好任何工作所必需的。

要不要搞调查研究，历来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一个路线问题。毛主席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在任何工作中都要进行调查研究，并极其深刻地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刘少奇、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大肆攻击调查研究“过时”、“不行”，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提高进行调查研究的自觉性，真正深入到实际中去了解和解决几个问题。这样做，有利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洗刷唯心精神，清除修正主义的影响，也有助于我们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我们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努力做到这一点。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号召，在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在认真看书学习的基础上，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搞好无产阶级专政的各方面的问题，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就一定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得更好，一定能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更加推向前进。



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

齐 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千百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形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它对于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的推动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伟大成果。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我国广大知识青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知识青年从城市到了农村，这是在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光辉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一步是伟大的，但更为伟大的还在后头。有的同志仅仅满足于知识青年从城市到了农村这一步，认为“动员”工作结束了，上山下乡工作也就结束了。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毛主席说：“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可能不碰到许多障碍物和困难。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严峻考验。因此，我们一定要满腔热情地支持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许多同志说得好：“知识青年走到那里，上山下乡的工作就要做到那里，就要支持到那里，关心到那里。”这种对上山下乡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值得赞扬，它反映了一个革命干部应有的本色。

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巩固工作也就交给农村了。这是把动员工作和巩固工作割裂开来的一种错误观点。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成果，是全党的大事，应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进行。农村的党组织和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要管，城市的党组织和在城市工作的同志们也应当管。近几年



来，一些城市组织机关干部到知识青年所在的农村地区，进行调查慰问，同当地农村的党组织和贫下中农一起做上山下乡的巩固工作。他们不只是到有知识青年的地方走一走，挨家挨户问一问，而且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一方面帮助知识青年解决目前碰到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又从长远着眼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一些省、市的工业、财贸、文教部门，把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成果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这是很值得提倡的。有的工业部门除了积极完成国家计划的支农产品任务以外，还清仓查库挖潜力，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有计划地在物资上支援农村，特别是支援下乡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区；还有的城市组织工人下乡帮助知识青年学习修造机器，培训技术力量；有的商业部门帮助下乡知识青年集中的地区发展多种经营，疏通产、供、销渠道；有的文化教育出版部门积极为下乡知识青年举办函授教学，出版青年自学丛书，开展农业科学实验等等。这些做法，深受下乡知识青年的欢迎。各条战线的同志们，让我们大家都来认真地想一想：在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成果、关心知识青年成长方面已经做了什么？还应该继续做些什么？

有的同志仅仅满足于把知识青年“迎”进村寨，锣鼓声一停，报上户口，安排出工，以为工作就结束了。这同上面说到的只抓“动员”，是一样错误的。如果把下乡知识青年当作“包袱”，认为这项工作是“额外负担”，这种态度就更不正确了。持这种消极态度的同志，往往同他们对知识青年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毛主席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在广大下乡知识青年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劲头十足地想大干一番，立志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本质的方面，是主流。但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特别是阶级敌人的拉拢腐蚀，下乡知识青年中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并对它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更应该认识到自己肩上所担负的做好上山下乡工作的重大责任。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还比较幼稚，但幼稚是会向成熟转化的。对每一个下乡知识青年，就应当象对待一株幼苗那样，精心照料、培育。事实上，那里的党组织高度重视了上山下乡工作，那里的知识青年进步就快，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就大，他们不仅不是所谓“包袱”，而且成为革命事业中很宝贵的力量。反之，那个地方上山下乡工作做得不好，知识青年的革命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往往反映了那里的社会主义阵地不那么巩固，那里的资本主义歪风邪气比较地猖獗。因此，农村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县和公社两级党委，要把做好上山下乡工作同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要从政治上、生产上和生活上全面关心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

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不仅要求对知识青年怀有满腔热情，而且要舍得花气力，花心血。有一位县委书记说得好：“知识青年把一生交给党安排，我们各级党组织要安排好知识青年的一生。”这就不仅要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和学习上的提高，还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组织安排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不仅要考虑他们的现在，还要为他们的未来着想。这里，说一个江西省定南县的例子。这个县处于赣南山区，原来的下乡知识青年分散插队，县委的同志们通过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了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的意见，认为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下乡知识青年的安排不适宜过于分散，还是相对集中一点好。他们通过试点，对下乡知识青年采取适当集中的办法，举办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场，并且由有关部门给以必要的物质支援。这些青年队、场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指导下，根据当地山多田少、山林资源丰富特点，既搞农业，又搞多种经营。有条件的还办了小型工厂，手工作坊，农忙务农，农闲做工。这种青年队、场，有不少好处：由于知识青年相对集中，有利于加强领导和统一组织学习；由于不同条件的青年战斗在一起，各自的特长得到了发挥，体弱的知识青年也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起到自己的作用；较多的青年集中建队、建场，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有食堂，又不种自留地，集体观念更强了。有的青年队、场，苦战一两年，粮食产量翻一番，副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为发展壮大公社、大队经济创造了条件，而且增加了知识青年的收入，减轻了社会和家庭的负担。有的还打算从集体的积累中拿出一部分钱造农民新村、办托儿所，为切实解决知识青年的生活问题创造有利条件。定南县的做法是较好的组织方式之一，这样做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此外，各地也还因地制宜创造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其它方式。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只要是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充分调动下乡知识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他们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在广阔天地里是完全可以做到大有作为的。

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的一项战略措施。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把上山下乡工作看作是“额外负担”，归根到底，是由于对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他们总觉得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已经是够繁忙的了，没有功夫去过问和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这种把上山下乡工作同农村各项工作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这些同志往往只看到面前的一桩桩具体事务，看不到农村的现代化、机械化是多么需要知识青年，看不到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正因为小看了上山下乡这件大事，才会错把这项工作看作是“额外”的。我们希望至今还不那么重视上山下乡工作的同志们，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在认识上来一个飞跃，在行动上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成果的巨大动力。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必将有效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铲除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目前，广大下乡知识青年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大大增强了扎根农村的自觉性。他们表示要象劲松一样，任凭风吹雨打，坚持乡村不动摇。他们说：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诱惑不了我们，林彪的“变相劳改”的谬论动摇不了我们。这就说明，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促进上山下乡方面将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因此，我们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最根本的是要组织下乡知识青年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断提高上山下乡的自觉性，鼓励他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勇敢挑战，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对阶级敌人破坏上山下乡的罪恶活动，必须给予坚决的打击。

千百万知识青年正在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光辉道路，迈开雄壮的步伐向前奋进。上山下乡的伟大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让我们都来支持这个伟大的创举吧！



做好思想工作

梁 华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对加强思想工作，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正在逐步提高，精神面貌正在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许多同志开始懂得，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小生产还会不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思想还在经常侵蚀我们革命队伍的肌体。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我们的党员、工人、干部，是保持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还是沾染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阶级敌人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来腐蚀和瓦解革命队伍，以达到他们改变我们党的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思想工作，不断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进行反修防修教育，深入地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广大干部、群众都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路线觉悟。如果放松思想工作，任凭资产阶级的东西去腐蚀人们，任凭错误的思想到处泛滥，就只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方便之门。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一次普遍的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党的思想工作的基本内容。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上搞清楚了，思想上明确了，行动也会坚定起来。如果我们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懂得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以及怎样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懂得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就会自觉地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逐步铲除产生资产阶级土壤的战斗。理论学得越深刻，思



想越明确，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批判和打击也就越有力。修正主义的影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等等现象，一旦被人们从本质上加以认识，懂得了产生这些东西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及其对革命的危害性，它们也就会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和反对。现在，经过短短几个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就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摆脱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新人新事到处涌现，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四处碰壁，它们的市场越来越小。正反两方面的事情，生动地向我们表明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巨大作用，表明了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抓好理论学习，切实加强思想教育，使亿万革命人民都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器，就将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就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

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要做好思想工作，使人们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掌握反修防修的理论武器。思想教育是一个细致的工作，在进行这种工作的时候，只能采取说服的态度，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我们队伍中有的同志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或者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总是有它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的。只有在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总结经验的过程中，真正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腐朽性，才能自觉地加以克服。有一些错误的思想倾向，虽然我们从来就反对，但至今仍然在有些领域、有些人身上不断产生，这些东西常常不是一次就能完全克服的。因此，要进行耐心细致和反复的教育，帮助有这些错误思想倾向的同志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在斗争实践中，逐渐地加以彻底克服。“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

进行思想工作，克服错误思想，需要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通过分析，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对问题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所要说明的问题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中肯的分析，也就不能对症下药，真正解决问题。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争取多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多懂得一点辩证法，使我们能够识别和善于战胜腐蚀人们思想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胜利。



为青年出版更多更好的自学读物

——评《青年自学丛书》

翟 青

为青年出版更多更好的自学读物，这是加强对青年的教育，把他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地出版部门已经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出版了一批富有教育意义的读物。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就是其中比较好的一部。这部自学丛书，目前已出版了二十二册，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学、党的基础知识、社会发展史、文学艺术、数学、物理、化学、气象、地理、军事、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

毛主席早就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青年由于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处在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因而他们求知的欲望强烈，对于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敏感，对革命道理也比较容易接受。但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教育青年一代，始终是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的那些青年读物，有相当一部分充塞着封资修的思想。有的大肆宣扬刘少奇的唯心主义“修养经”，有的强调什么知识性、趣味性，宣扬知识第一、技术第一，引诱青年脱离工农群众，走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青年读物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不可能为无产阶级服务。我们要为青年出版更多更好的自学读物，就是要按照党的基本路线，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点出发，引导广大青年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青年



《青年自学丛书》正是在这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根本的一条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千百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上山下乡，投身于农村三大革命运动，这是以实际行动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挑战。但是，要使广大青年从思想上真正理解上山下乡的意义，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还必须帮助他们学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青年自学丛书》在这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社会发展史》、《党的基础知识》等政治理论读物。这几本读物，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帮助青年树立永远扎根于工农的信心和决心，鼓励他们为缩小三大差别，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某些读物鼓吹的“理想”，只是要青年去当什么“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工程师”，而不要当工人农民。在这一点上，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是要使青年成为扎根工农群众之中的普通劳动者，一个却要使青年成为脱离工农群众的精神贵族。

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由于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不善于把旧中国和中国加以比较。《青年自学丛书》针对这样一个特点，着重从理论上帮助青年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比如，《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这个读物，上册是资本主义部分，下册是社会主义部分。资本主义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着重论述了资本主义是怎样从商品生产发展起来的，资本家是怎样通过占有剩余价值来剥削工人的，以及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要灭亡等等，帮助青年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社会主义部分则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问题，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就有助于青年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青年们懂得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在各个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懂得了共产主义事业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而是要靠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就能更自觉地在农



村三大革命运动中，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以至将来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青年自学丛书》除政治理论读物外，还有《军事基本知识》和自然科学读物。这些读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和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比如，《人体生理知识》一书，在讲到神经系统中条件反射的形成过程时，改变了过去旧大学教科书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的写法，联系了知识青年养鸭、养猪、驯鹿等实际事例来阐述，把抽象概念具体化，通俗地讲清了条件反射问题。又如《气象知识》一书，在讲气候变化的规律时，光是联系各地气候变化特点的气象谚语就有几百条，还列举了近百个生动的实际事例。即使象物理、数学这样一类读物，也改变了脱离工农业生产实际的倾向，注意联系农村中的实际情况。翻地是农村最常见的农活，《物理基础知识》一书，就通过对翻地时力的分析，引出力的概念和杠杆原理。象这样理论联系实际的例子，仅在“力和力的平衡”一章里就有十多处。这样联系农村生产斗争中的实际问题，符合人的认识规律，便于知识青年学习，容易理解，有利于把学到的知识直接运用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通过阐明农业生产中许多科学道理，可以使知识青年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而更加坚定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

一本好的青年读物，还应当联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揭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各种客观规律，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引导青年努力掌握客观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不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青年自学丛书》在这方面也作了可喜的尝试。如《人体生理知识》一书，在阐述人体生理的本质时，努力按照对立统一的观点来分析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细胞的新陈代谢，循环系统中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神经系统中的兴奋和抑制，消化系统中吸收和排泄等等，正是这些矛盾着的对立面，互相斗争，互相依存，互相联结，互相制约，构成了人体的生理活动。这样去分析问题，不仅可以帮助青年认识生命的本质，也有助于他们加深理解“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个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总是对立地存在着的。因此,《青年自学丛书》在注意宣传辩证法的同时,还注意批判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比如《医学卫生知识》一书,就批判了“不治之症论”、“外因决定论”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医学观点。《气象知识》一书批判了气象工作中“不可知论”、“天命观”等等。《物理基础知识》、《代数》、《几何》等也都结合有关内容,批判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要求把青年读物都写成哲学课本,或者只是用一些实际材料印证某个哲学道理,而是要把宣传唯物辩证法和讲述的具体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做,有助于青年们分清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启发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为三大革命运动作出更大的贡献。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要把青年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最根本的是要提高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在各项工作中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青年自学丛书》在这方面也作了比较突出的努力。以《气象知识》一书为例,书中许多地方讲了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生动事例。例如,“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一章中的“消冰雹”这一节,不仅讲了冰雹的成因、特性等气象知识,而且以实际材料进行了两种社会制度、两条路线、两种结果的对比。山西灵丘县被称作是个“雹窝子”。解放前,这里是:“一声雷响一阵雹”,“人无粮来畜无草”,天灾人祸把贫下中农逼得家破人亡。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的力量开展群众性的防雹斗争,连续十三年基本未受雹灾,粮食产量年年上升,真是两种制度两重天。书中还进一步指出,究竟是人定胜天还是听天由命,这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甘肃临潭县新城公社、岷县二郎公社等地区,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不搞群众性的人工防雹,每年有几千亩地受灾。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学大寨,鼓干劲,依靠群众防雹,雹灾面积大幅度下降,粮食连年丰收。贫下中农说:“二郎地区换天地,全靠毛泽东思想创奇迹。”接着,作者根据群众在防雹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讲了防雹消雹的知识,生动地说明了人定胜天的真理。这样的青年读物,不仅向青年传授了知识,而且



对青年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宣传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真理。

青年读物应当力求生动活泼，具体形象，以适应青年的阅读特点。《青年自学丛书》中有好几本读物在这方面是下了一定功夫的。比如，《简明中国地理》一书的开头，就针对青年的特点，生动地介绍了祖国的概貌。全书在具体叙述地理知识时，娓娓动听，十分亲切。读完这本读物，不管是跃马扬鞭在草原上的新牧民，还是巡逻在边防线上的新战士，不管是海滨的新渔民，还是战斗在乡村的新农民，都能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激发起热爱祖国、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思想感情。又如《气象知识》一书，还特意安排了两个气象工作者和两个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在火车上相遇的情节，引出气象工作在经济建设和军事上的重要意义，然后又根据他们之间的活动和联系，展开全书的内容，构思新颖，内容生动，引人入胜。

从《青年自学丛书》已经出版的情况来看，也还存在着一定的缺点。有的联系实际不够，存在着从概念出发的毛病；有的内容过于庞杂，重点不够突出；还有的在结构上比较呆板。即使是几本编写得比较好的读物，也还存在着有待改进的地方。希望编写者们不断地总结经验，在现有基础上精益求精。凡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好的几本书，都不是关在高楼深院里写出来的，而是作者在深入农村作调查的过程中，根据知识青年的实际需要，并在总结了贫下中农、知识青年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毛主席说：“**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因此，我们的编写人员要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去，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向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学习。只有这样，才能编写出“**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的青年读物来。

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已指出：“**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我国的广大青年肩负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任。青年一代的成长状况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为青年提供更多的无产阶级的精神食粮，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出更大的贡献。



加 强 党 的 建 设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

柏 杉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指明了党组织的显著特点是具有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战斗性。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使各级党组织更好地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作用。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肩负着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党正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这是比以往更艰巨、更复杂、更深刻的斗争。我们不仅要战胜已经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而且要通过长期的、细致的工作，教育和改造小生产者；不仅要彻底改变旧的所有制关系，而且要不断清除旧的传统观念；不仅要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方面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消除“旧社会的痕迹”，而且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右的或“左”的错误倾向。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有党的坚强领导，都需要各级党组织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作用。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各级党组织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整顿和健全了领导班子，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这就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发挥党的先锋队作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各级党组织进一步提高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激发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增强了党的战斗力。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继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坚强有力、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就是说，要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同那些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领导班子的路线端正了，才能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起中流砥柱、战斗堡垒的作用，才能发动和带领广大群众，克服一切困难，为完成党的任务而奋斗，为党的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大多数党组织的领导班子是坚强有力的。他们坚持抓路线，讲团结，顾大局，保持和发扬了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一种拚命精神，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他们的带领下，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革命和生产蒸蒸日上。少数党组织不能很好地发挥先锋队的作用，主要是领导班子软弱无力，路线不端正。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我们要联系党的建设的实际，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使少数处在后进状态的领导班子很快赶上来。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各级党组织担负着具体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广大群众为完成党的任务而奋斗的重大责任。不论是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工作的好坏，都对整体、对全局发生直接的影响。工作搞好了，革命和生产上去了，会对整个党的事业起促进的作用；相反地，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甚至起拖后腿的作用。作为一个党组织的领导班子的成员，要时刻想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的重大，想到自己工作的好坏对全局的影响，想到党的委托和人民的期望。想到这些，就不会怕这怕那，就会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就会在工作和斗争中有高度的积极性和极端负责的精神，在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动员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完成党的任务而努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



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对于一个党组织的领导班子中的各个成员来说，特别需要有这种越是困难越向前的革命精神。困难，歪风邪气，都是欺软怕硬的东西。我们越是怕，越是不敢斗争，困难就越大，歪风邪气就越嚣张。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解决“老大难”的问题，必须从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入手。只要领导班子端正路线，振作精神，放手发动和依靠群众，敢于同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和各种歪风邪气作斗争，认真负责地做好工作，困难和矛盾就不难解决，革命和生产很快就能上去。

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从组织上来讲，是因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且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每个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要自觉地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纪律，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反对在党内另搞一套、向党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以增强党的革命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

列宁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最重要的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武装党员。我们应该牢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还会在各个领域中反复地表现出来。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分不清路线是非，辨不清方向。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对全党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带根本性的思想建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党组织就能更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各级党组织要总结前一阶段学习的经验，采取措施，使理论学习深入和坚持下去，从思想上政治上领导广大群众朝气蓬勃地前进。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侵入到党内生活，是破坏党的团结、削弱党的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会促进我们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要认真发扬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对于我们各级党组织执行党的路线、抵制资产阶级侵蚀、永葆战斗青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各级党组织通过学习理论，提高路线觉悟，改进作风，必将进一步增强党的战斗力，更好地起带领群众前进的先锋队作用。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向 晖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建国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不断地加强了自己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广大党员经受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考验，党的各级组织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加强党的建设总是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紧密联系在一起。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任务，再一次提到全党同志面前，并且深刻分析了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基础，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必将进一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使党更好地担负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坚决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要在生产关系方面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加强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加快祖国建设的步伐。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革命



都更加复杂、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社会大革命，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是不能成功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正因为我们党担负着如此重大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就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由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部分党员中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努力保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性。通过教育，要使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真正懂得，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在各个领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各级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要能够带领群众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侵蚀，也只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自己，认真改造世界观，从思想上筑起一道反修防修的铜墙铁壁。

加强党的建设，首要的问题在于搞好各级党委本身的建设。各级党委是各该地区、部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的司令部。因此，它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去加强本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自己真正成为团结一致、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休想带领千百万群众去作战、去建设。毛主席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委，不是代表某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代表整个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意愿，依靠党委集体的力量，在自己所在的地区或部门实行对革命事业的领导。因此，党委的每个委员，都应当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



自觉地维护党委会的集体领导，都要从党的利益和大局出发，搞好党委会内部的革命团结，搞好老、中、青的结合。凡属重大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由集体作出决定。在党委会内部，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有不同意见要摆到桌面上来，通过充分的讨论求得一致。要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决不能把是否合乎自己小山头的口味作为判断是非和行动的标准。党委会一经形成决议，就要贯彻执行，不能因为个人意见不同，就自行其是，更不能会上赞同，会后反对。对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党委会的成员要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依靠集体力量去解决；对思想上的分歧和隔阂，要交心通气，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践证明，凡是那样做了的，那里的党委会就能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充分发挥自己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使本地区、本单位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反之，党委会内部集体领导不健全，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必然导致行动松松垮垮，指挥软弱无力，党的一元化领导成了空话，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的任务也就无法实现。

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纪律性，是毛主席多年以来的一贯教导，也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要依靠党的正确路线，而党的纪律是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根据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和党章的规定，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纪律，以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的最高原则。我们讲集中统一，就是要集中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一切行动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对于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一定要采取坚决执行的态度。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路线和政策，需要通过各级党委会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来贯彻执行。服从地方党委会的领导，执行地方党委会为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而作出的各项决定，同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是一致的。每一个党员或党的一级组织，只有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又



在组织上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模范地执行党的纪律，才算得坚持了无产阶级党性。资产阶级派性和无产阶级党性是根本对立的。每个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共同反对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才不愧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加强党的纪律，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讲民主，是指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们讲集中，是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其目的，是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加强党的战斗力，而不是削弱党的战斗力。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可以使广大党员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党的领导机关也可以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广大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实施正确的领导。从而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毛主席教导说：“**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心目中只有个人和小山头的利益，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都是破坏党的团结和党的纪律的销蚀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任凭这些东西来削弱党的纪律，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各级党的组织，一定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提高广大党员执行党的纪律的自觉性。

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最重要的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搞清楚。这就需要在认真看书学习的基础上，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总是把调查研究作为增强党性锻炼、培养党的优良作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我们要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



各条战线上都有许多事情有待于通过调查研究去搞清楚。如果不作调查研究，就会在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限制什么的问题上心中无数，就不能很好理解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路线和政策，就不能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头，领导群众前进。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从实践上把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搞清楚了，找出了规律性的东西，就能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问题也能划清思想界限和政策界限，既切实执行现阶段党的政策，又满腔热情地支持和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使共产主义因素不断增长。

调查研究需要各级党委会主要领导同志带头。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了解情况是掌握政策的基础。党委会领导同志亲自动手搞调查研究，做到了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牢牢地掌握各项工作的主动权。有的领导同志对亲自动手搞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强调“事情多，工作忙，下不去”。他们不懂得，自己工作忙乱被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恰恰在于亲自下去调查研究太少，了解实际情况不多，因而抓不住问题的关键，拿不出系统的解决办法，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因为下不去，工作就陷于忙乱被动，工作愈忙乱被动，又愈是下不去，成为一种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就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甚至滑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在尖锐地批评那些不搞调查研究的领导干部时说：“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应当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教导，发扬党的深入实际搞调查的优良作风，掌握第一手材料，学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分析问题，说明问题，更好地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

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已经胜利地走过了半个世纪多的战斗历程，正在继续阔步前进。让我们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指针，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共同目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抓好农村党员的思想教育

安徽利辛县柳西大队党支部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毛主席的指示，对于仍处在小生产不断影响下的农村党支部来说，对于我们这些出身农民或农民家庭的党员来说，教育尤其深刻。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中，我们党支部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学习和反复讨论，从理论上，同时也从我们自己的实践中懂得，不断克服小生产者的思想对党员的影响，是我们农村党支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回顾我们柳西大队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实践，党支部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曾经同党内外形形色色的小生产者的思想进行过一系列的斗争，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直到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之前，我们对小生产者思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认识还不深刻，行动也往往不够自觉。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发表，使我们对小生产者思想的认识，有了一个的提高。毛主席的指示，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尖锐而深刻地阐明了小生产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同时也指出它会腐蚀我们的党。这给全党特别是我们农村党组织和党员敲起了警钟。拿我们大队来说，尽管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并保存有某些私有制的残余；尽管全大队已经有不少农业机器，仍然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尽管国家要求人民公社实行计划种植，由于存在商品交换，仍然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这种现实状况，加上几千年来农村小生产者的传统思想影响，决定了一部分集体农民甚至是在农村党员身上，反映出小生产者的固有特点。我们党支部一百零八名党员，都是出身于农民或农民家庭。有的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完全入党，还拖着一条小生产者思想的尾巴。在有的党员身上，这种思想还表现得比较突出。如果不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出发，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党员，同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和行



为坚决斗争,就将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的战斗力,导致党员中间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决不是一件小事,而是直接关系到党员会不会变质,党会不会变修的大问题。事关重大,党支部非抓好不可。

从柳西大队党支部的情况看,我们觉得,需要着重抓以下四个方面的思想工作。

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教育党员,帮助他们克服小生产者目光短浅、半截子革命的思想。小生产者思想,是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在旧社会,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追求革命的思想,不可能具有象无产阶级那样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因此,有小生产者思想的党员,往往在革命的某个阶段,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表示赞成,并积极参加。但是,当革命继续向前推进,转到另一个阶段时,他们却容易动摇,产生停车退坡思想。有的党员在土改、合作化运动中是积极分子,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以及生活的日渐富裕,就产生“到站”思想,认为该享点福了,工作上凑合凑合算啦,对于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思想渐渐淡薄起来。

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和半截子革命思想,同共产党员的革命远大理想是根本不相容的。一个共产党员,从他入党的那一天起,就应当下定决心,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奋斗一辈子。不管是民主革命阶段,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管征途多么艰险,革命会遇到多大曲折,始终朝气蓬勃地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如果有“到站”思想,就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了教育党员树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克服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思想,我们组织党员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进行革命理想、革命前途的教育,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经常用拉革命车不松套的好党员的事例,教育大家。使大家懂得,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应该为全人类求解放奋斗终身,胸怀革命大目标,脚踏实地干革命,永远“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用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思想教育党员,克服在党员身上反映出来的小生产者的自私自利思想和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例如,有的党员计较个人利益,不大关心集体,而不认为这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为了教育党员同私有观念决裂,党支部对党员进行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斗争的教育,着重帮助他们认清“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树立无产阶级大公无私、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思想,克服资本主义倾向。党支部还经常组织党员进行新旧社会的回忆对比,使大家认识到,今天我们能过上幸福生活,最根本



的一条是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剥削制度，改变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作为党员，如果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被私字迷了心窍，追求个人发家致富，就有可能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懂得了这个道理，许多党员表示，一定要斗掉小生产者私有观念，逐步铲除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树立一心为公，一心为集体，为革命种田，为革命工作的思想。

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党支部还领导群众努力发展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彻底克服小生产者私有观念逐步创造物质条件。我们坚持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并努力把政治思想工作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从而促进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转化过程。这些年来，党支部坚决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领导党员和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天斗，和地斗，和阶级敌人斗，使柳西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粮食亩产只有百把斤的穷灾窝变成亩产超千斤的良田；过去一块块的小田并成了一方方的大田。架起高压线，建有排灌站，挖了排灌沟渠，沟渠路旁都栽满了树。现在大队有拖拉机、汽车、柴油机等大型农业机械一百五十台，大牲畜六百七十多头。队队有储备，家家有余粮，不少社员搬进了集体盖的新瓦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使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眼界开阔了，心胸宽广了，不仅从现实生活中亲自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从中看到了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景。现在，就是在群众中也很少有人想外出搞副业单干的。

用共产党员应该“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党员，克服利用党员称号或人民交给的职位搞特权的思想。列宁指出：“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这种小生产者思想反映在我们某些党员身上，就是借口工作多，担子重，很辛苦，要求得到特殊照顾。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特权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少数同志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少了，利用工作方便搞一点对自己有利的事，等等。这种思想苗头如果不克服，会使我们的党员、干部脱离群众，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正确的关系。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党支部通过上党课、回顾党的历史等方法，对党员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教育党员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使大家懂得：在战争年代，环境是那样艰苦，斗争是那样激烈，我们的党员、干部和战士，跟着毛主席跟着党，英勇奋斗，流血牺牲，那时候，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有那个革命者想要什么特权？搞过什么



特殊化？正是这种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保证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了，要是丢掉了这个传统，就可能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我们还严格要求党支部领导成员以身作则，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搞特殊化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党员。同时，经常开展小整风，请群众评论党员，使党员在群众监督下，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

用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思想教育党员，克服小生产者利用宗族观念搞宗派主义。千百年来，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而极力宣扬的宗族观念，在人们头脑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广大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进一步得到了解放，宗族观念逐渐地得到破除。但是，“**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我们有个生产队，队里有两个“门头”，每个“门头”底下都有一些人，动不动就闹无谓纠纷，妨害团结，影响生产。队里的少数党员，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处理问题，而是要为“门头”争高低。这种宗族观念和宗派情绪，对于加强党的团结统一非常有害，对于加强人民群众之间的革命团结也很不利。

党支部在深入批修中，对党员进行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革命团结的教育，组织党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开展革命大批判，反复地向大家讲清楚：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亲不亲要从阶级上分，什么“同姓一家人”、“同宗格外亲”，统统是骗人的鬼话，是地主资产阶级贩卖的“人性论”，其目的，是要麻痹我们的革命意志，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党的团结，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同时，对于煽动宗族观念、宗派情绪的阶级敌人，我们发动群众进行了批判，从而加强了党内外的革命团结。

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惯，同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截然对立，是必须加以改造和克服的。但是，我们体会，教育党员克服小生产者思想的影响，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而必须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要以正面教育为主，从理论上去提高他们，用事实去影响教育他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我们过去在这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还是很不够的。我们决心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引下，认真学习，努力把党支部的思想建设搞得更好一些，以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领导党员和广大群众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



做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战士 李增锡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四周年。作为正在要求入党的青年战士，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决心进一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争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我是贫农的儿子，是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一九七一年当了人民解放军战士，入伍不久就加入了共青团。几年来，在部队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克服了文化低的困难；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苦练杀敌本领，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都有一定的提高，先后五次受到党支部奖励。通过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知识，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为人民闹翻身、求解放、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我渴望早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入伍第二年就写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自己要求加入党组织的迫切心情。

今年四月，连队党支部根据我的申请，经过党员讨论和群众评议，准备吸收我入党，并发给入党志愿书让我填写。接过入党志愿书，想到自己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心里真是激动极了。但是，用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来衡量，又觉得惭愧，感到自己目前还不够入党条件。我拿着入党志愿书掂了又掂，想了又想，是填写还是不填写？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没有填写入党志愿书，而是给党支部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和继续要求入党的申请书。我向党支部汇报说：“填写一张表格容易，但入党志愿书不是普通的表格，分量是很重的，它包含着党和阶级的期望。我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请党支部暂缓发展我入党，继续考查我，教育我。”党支部慎重研究了请求，认为我做得对，并勉励我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继续提高政治觉悟，争取真正从思想上入党。

我为什么这样做呢？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我反复从理论上思考了加强党的建设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我想：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一切阶级，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要完成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就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有无数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为党、为阶级、为革命而献身。这就对共产党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他们牢固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也就是说，要在思想上真正入党。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想得是不是正确呢？这使我回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我回家探亲时，乡亲和朋友们都来看我，并且关心地问我为啥还没入党。当时，我脸上一阵发烧，心里产生过一个念头：当了四年兵还没入党，实在不光彩，入不了党就只好提干部，将来复员只能回乡种田了。这种思想说明，自己入党动机不够纯正，还夹杂着个人主义的东西。我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反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党的十大通过的新党章，越学越深刻地感到，入党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名利地位，还是为了把毕生的力量投入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去，这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入党为公还是入党为私，则是检验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共产党员之所以光荣，就在于他能够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艰苦奋斗。如果入党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那就象列宁所批评的那种“**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是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格格不入的。不解决思想入党问题，即使组织上入了党，也不会全心全意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不能起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作用。这样的人加入了党组织，只能削弱党，不能加强党。把好思想入党这一关，是坚持党员标准的原则问题，也是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所必需的。在这个问题上，党的组织要把好关，要求入党的同志更要严于解剖自己，做到实事求是，襟怀坦白，毫不隐瞒错误的东西。这才是对党对革命事业负责的态度。

过去，我还有一种模糊认识，觉得只要积极工作，干出了成绩，就能够入党。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认识到，够不够入党条件，不能只看做了多少工作，还要看思想基础怎样。一切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的同志，由于有巨大的革命动力，必然会朝气蓬勃，发挥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党组织



交给的任务，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带着私心要求入党的人，在一段时间内也可能表现积极，干出某些成绩，但由于入党动机不纯，他的热情是不会持久的。这种人，实际上是把干工作当成了换取党员称号的“等价物”，是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来对待严肃的入党问题。因此，我们衡量一个人够不够入党条件，不能只看一时一事的表现，而是要按照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从世界观上进行考查。拿我们连队的情况来说吧，绝大多数的党员同志，“入党前是骨干，入党后是模范”，样样工作走在前面，确实起到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作用。但也有个别同志，“入党前积极干，入党后松一半”，产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错误想法。个别同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很有必要从世界观上找原因，认真地想一想：入党是不是完全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有没有从思想上真正入党？

早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就尖锐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剥削阶级意识还有很深的影响。有的人把入党看成是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根源就在这里。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的建设始终是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把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就必须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蚀。

我出身在贫农家庭，从心眼里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总想着：入了党好好干，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但是，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还不能代替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共产主义觉悟。在我的头脑里，还有小生产者私有观念的烙印。要使自己的世界观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真正解决思想入党问题，关键在于坚持不懈地看书学习，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在实际斗争中认真改造世界观。我一定要学好用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用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严格要求自己，以实际行动填写入党志愿书，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把一生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学习理论 反修防修

正确认识我国的商品制度

郑 凯

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搞好反修防修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还会不会再产生资本主义？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使我们明确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制度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

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最早就是从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小商品生产者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互相交换。他们卷进市场以后，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因为在市场上，不管你自己生产这种产品花了多少时间，竞争的结果，商品只能按照它的价值，也就是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交换。这样，生产条件好的，花的劳动符合或者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能收回劳动耗费，还可能赚一点；生产条件差的，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收不回劳动耗费，亏了。同时，小生产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跟着市场价格涨落盲目进行的，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供求关系经常变化，价格时涨时落，更使他们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在竞争中，少数人富裕起来了，放债、雇工，变成



资本家；多数人则贫困破产，变成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在小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国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曾经是农民小生产的汪洋大海，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曾经出现过。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类所宣扬的“确保私有”、“四大自由”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趁热打铁”引导广大农民走上农业合作化的康庄大道，才避免了由小生产发展为资本主义的那条老路。

我国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个体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是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飞跃，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但是，只要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只要全民所有制经济还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对整个社会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实行商品制度。这种商品制度，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渠道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在这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经不象私有制条件下那样处于自由竞争和自由发展的状态，一般说来是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的，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重要的商品还实行计划收购。只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集体经济的商品生产，是能够为巩固工农联盟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目前农村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经济中那种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别、价格 and 价值的背离还存在，各个社队的生产条件、市场条件不同，经营作物的品种不同，他们花费同量劳动，通过交换所获得的收益并不一样。因此，各个社队之间实行等价交换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就是说，实际上还是不平等的。对于这种不平等，国家通过计划管理和税收政策，已经有所限制。但是，既然客观上存在这种差别，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有的小集体就容易只关心“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和国家计划发生矛盾。同时，小生产者旧的思想、心理和习惯，也不可能随着公有制的建立一下子消除。广大贫下中农是坚决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正在阶级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但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经常会腐蚀贫下中农中的某些人，一部分富裕农民发财观念很重，总想利用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进行投机活动。如果不注意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限制资产阶级法



权，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就会影响和侵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使一些社队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现在农村少数社队出现的不服从国家计划，搞所谓自由种植；不按国家规定把农副产品卖给国家，搞所谓自由贸易；重副轻农、副业单干，等等，都是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联系在一起的。对这种资本主义倾向如果不斗争，就会加深商品交换中的实际不平等，扩大社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差别。而那些打着“集体”招牌、从中牟取暴利的少数富裕农民，就会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目前，在农村中还保留有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补充；还有集市贸易。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是个体经济的残余，农村集市贸易主要是在私人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对此，国家虽然有了若干政策规定，限制资本主义倾向，但是，由于在这里价值规律对生产还有某些调节作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有着更广泛的活动地盘。如不加以限制，就会扩大这部分个体经济同集体经济的矛盾，甚至出现弃农经商等资本主义倾向，使资本主义泛滥，瓦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刘少奇、林彪一类主张“四大自由”，鼓吹“三自一包”，目的正是要通过无限扩大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培植资产阶级分子，以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在现阶段，也仍然保留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一部分要同集体所有制的产品进行商品交换；供给职工的那部分生活资料，要经过市场采取商品的形式进行分配；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生产资料主要由国家物资部门统一调拨，但也需要计价。国营企业的生产、分配和流通处于国家计划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之下，在大多数单位，是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的。但是，由于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同样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本质，要求企业从满足整个社会需要出发，生产数量更多、品种更全、质量更好、劳动消耗更低的产品。但是，商品经济却要求它利用价值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要计算产值、成本和利润。企业既要考虑使用价值，又要考虑价值，这就是矛盾。如果企业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被商品经济的框框所局限，忘记了全民所有制的生产目的，就会出现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的资本主义倾向。例如，只生产或多生产那些产值大、利润高的产品，不生产或少生产那些产值小、利润低的产品；重产值、轻品种；重产



量、轻质量。严重的甚至把利润作为生产的唯一目的，完全陷入资本主义的泥坑。

利润挂帅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原则。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和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利润。社会主义经济也要利润，但是，它只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向、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增产节约的结果，绝不能搞利润挂帅。有人说：“赚钱归公不归私，所以姓‘社’不姓‘资’。”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一个企业如果以利润为中心，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就会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经营方向，冲击国家计划，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和市场供应，并且会造成各种漏洞，为某些人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营私舞弊等罪恶活动提供条件。实践证明，国营企业如果领导权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执行刘少奇、林彪那条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形式上虽然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会变成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企业。

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的存在，还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对这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就容易对资产阶级法权失去警惕，上修正主义路线的当。在这方面，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蜕变为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是很深刻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自上台以后，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竭力鼓吹金钱挂帅、物质刺激，宣扬卢布是“强有力的火车头”。在农村，他们扩大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使私人商品经济急剧膨胀；在国营企业中，他们推行所谓“经济刺激新体制”，鼓励企业追逐利润、自由竞争，规定企业可以出卖“多余”的设备、工具，出租“暂时不用”的厂房、仓库，自行“招收和解雇”职工；在商品流通方面，他们支持并发展城乡自由市场，规定对集体农庄市场的“价格不准采取任何限制和调整”，禁止“向交易者索取自产证”。今天的苏联，真是商品和货币的“自由世界”，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这种商品制度的发展，促成了集体农庄所有制的迅速瓦解，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名存实亡，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又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

我们对商品制度进行限制，资产阶级必然反限制。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还



将是长期的，激烈的。建国以来，我们党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反复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限制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一斗争不会因为经过几个回合而止息。我们必须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武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步骤，对商品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继续加以限制。

有人说：“既然商品制度还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那就马上取消好了。”不能同意这种看法。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制度有其客观基础，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只要还存在着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农民的产品就不能由国家统一调拨，城乡间的物资交流就只能通过商品交换这个渠道。对商品制度只能加以限制，不能很快取消。刘少奇、陈伯达一伙鼓吹立即取消商品生产，其极右实质是取消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商品生产，而让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复活。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块阵地，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战场，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定要占领的。

有人认为，对商品制度加以限制，就是要减少一点商品生产。这也是一种误解。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商品并不是太多，而是还很不够，还远不能满足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今后，还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向，根据党的政策，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组织好城乡商品交换和物资供应。要有更多的农业机械、化肥、日用工业品下乡，要有更多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供应城市。限制商品制度，是限制商品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限制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倾向，并不是要缩小商品的生产量，降低农村集体经济的商品率。

既要允许商品制度、货币交换长期存在，又要加以限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了在思想上和政策上分清界限，我们“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真正从思想上搞清楚限制商品制度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这样，才能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自觉地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抵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政治生活的侵袭和腐蚀，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有关限制商品制度的政策和规定；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原则，反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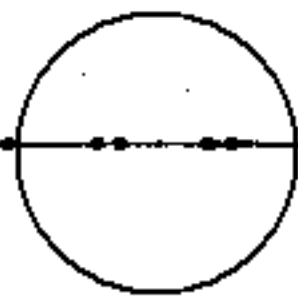


努力使主观符合客观

——我们是怎样逐步做好天气预报的？

贵州水城气象站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水城气象站的同志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做好天气预报工作的体会。十多年来，他们从工农兵的需要出发，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虚心学习和总结群众的看天经验，努力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克服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书本知识的错误倾向，不断探索本地区的气候特点。经过多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他们逐步掌握了水城地区特有的天气演变规律，从一九七二年三月开始，制作了“月的长期逐日天气预报”，现在准确的程度已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我们水城气象站是一九五六年建立的，现有六名气象员，是气象战线上的一个基层作战单位。十几年来，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指导气象工作，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掌握水城地区天气演变的客观规律，力争在本地区尽快取得“管天”的自由。一九五八年，我们冲破了县一级气象站只能搞一般的



气象观测，不能搞天气预报的“洋框框”，发布了“单站补充天气预报”①；一九六〇年，我们又发布了长期天气趋势预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一九七二年三月，我们又制作了“月的长期逐日天气预报”②，经过三年多的实践，现在准确的程度已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我们开始制作天气预报时，觉得很简单，以为按照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加上我们看看天气形势，就可以了。结果，预报有时碰准了，有时又错了，闹了不少笑话，工作非常被动。起初，我们埋怨自己学识浅、技术低，于是想从书本上找出路。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钻书本后，除增加了一些一般的气象知识外，预报仍然不准确。问题在哪里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这说明，要想准确地预报水城地区的天气变化情况，必须掌握住本地气候变化的规律，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而我们对水城地区特有的气候类型以及产生这种气候的地理条件、地形条件一无所知，就制作当地的天气预报，是不会不“碰钉子”的。问题找到以后，我们便采取领导带头、轮流下乡、人人参加、每年都去的形式，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并且虚心学习群众的看天经验。从一九五八年冬季起，我们就毅然走出观测场，跨出办公室，以水城三千九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为课堂，以水城各族劳动人民为老师，广泛地开展了对天气、气候情况的调查工作。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水城地区的地形十分复杂，最高的地方海拔二千八百多米，最低的七百米还不到。因此，气候差异很大，在整个地区内，有高寒、温和、温热三种气候类型；甚至在一个生产队，气候类型也不一样。十多年来，我们步行了三万余里，踏遍了水城的十二个区，走过了水城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公社和百分之七十的生产大队，获得了有关天气、气候等方面的第一手材料约三十万字，为我们研究水城地区天气演变规律打下了基础。

然而，仅仅有这三十万字的材料，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还只是一些零碎



的、表面的、感性的东西，还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为了使自己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我们将调查来的大量而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按照内容粗略地分成了自然概况、群众看天经验和农业气象三大类，然后一一分析，努力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客观实际情况。

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看天经验。对于群众的这些经验，认真分析，反复研究，是我们认识和掌握天气演变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群众的这些经验，内容极为丰富：有反映冷空气活动规律的，有根据前期冷暖、干湿预测未来天气的，也有用物象、天象预测天气的。例如，群众有一句看天谚语，叫“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起初，我们只知道如果八月十五这天“云遮月”，预报第二年正月十五下雪就比较准确。但是，为什么八月十五的云和正月十五的雪有关系呢？这种关系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气候变化规律呢？我们并不清楚。经过多次的分析研究，我们才发现，中秋的云和正月十五的雪，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都是冷空气活动的一种表现，冷空气的活动是造成“云遮月”和“雪打灯”的根本原因。那么，从八月十五到正月十五这一百五十天左右的周期变化，是否反映了冷空气活动的一种规律呢？我们拿了七年的历史资料来查证，发现在一百四十六次冷空气的活动中，有百分之八十都在一百五十天左右，这就找出了水城地区的冷空气活动有一百五十天的规律性。于是，我们又将群众有关反映冷空气活动的谚语，如“冬管五，腊管六”、“春前雪一百二，春后雪九十天”、“清明不明，谷雨不淋”、“重阳无雨望十三，十三无雨一冬干”等等，联系起来综合分析，发现冷空气的活动，除一百五十天外，还有二百一十天、一百八十天、一百二十天、九十天和十五天这些规律性。象这样从感性认识上升来的理性认识，较之感性认识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自然，使我们对冷空气活动规律的认识，逐步有了提高。

经过不断地分析和研究，我们从大约三十万字的材料中提炼绘制了十三张水城地区的自然、气候区划图，其中包括地形、温度、雨量、霜期、冰雹、干旱、



农作物分布和病虫害等等，使我们对水城境内的地理环境和由于有三种不同气候类型而引起温度的高低、霜期的早晚、雨量的多少、干旱的轻重、冰雹的分布、主要农作物对气象条件的要求和病虫害发生、发展的一些规律，都一一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经过调查、分析、研究而得到的这些认识，是否正确呢？这还要到实践中去检验。一九七二年，我们制作了一个预报雨季的指标，这个指标是否能够正确地反映来年雨季的早晚呢？我们没有把握，还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经过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的运用，效果较好，证明我们的认识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是，实践也证明，我们的认识有的还不能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比如，我们曾认为，春夏季节只要出现“冷锋低槽型”^③的天气形势就有大雨。当气象台预报出现“冷锋低槽型”的天气形势时，我们就报有大雨，结果准确率很低。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调查，重新分析研究，使我们的主观能够符合客观。为此，我们作了“冷锋低槽型”天气资料的普查，又结合水城的特点进行分析，才了解到“冷锋低槽型”的天气形势，只有在我地空气中水汽含量丰富的条件下才会下大雨；造成我地下大雨的基本原因，是受高空低压槽影响的缘故，地面有没有“冷锋”过境，并不是主要的原因。这使我们对水城地区春夏季节下大雨的天气形势的认识，进一步接近了客观实际。就这样，经过不断地肯定我们对本地天气变化认识的正确部分，否定不正确的部分，使我们制作的当地天气预报的准确程度不断提高。

怎样看待书本知识，也是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天气演变规律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对于书本上的知识，一方面要看到它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应该尊重它，但它对于我们来说是间接的，要把它变成直接经验，也要通过实践；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许多书本上的知识有局限性，加之事物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有些东西已经不适用，有些甚至是根本不能反映事物客观规律的错误理论，决不能盲从、照搬。如有的书上说：“日平均气温在摄氏十一度以下



可能烂秧”，经过我们实际观测、查对历史资料和蹲点试验，证明水城地区并不是这样，而是日平均温度降低到九度以下并持续三天以上，才会发生烂秧。我们向党委提出了高寒山区可以把撒谷种时间从“谷雨”提前到“清明”的建议，使水稻的扬花灌浆躲过了我地夏末秋初经常发生的低温阴雨天气的危害，保证了收成。又如四季划分问题，有的书上说，“候平均温度”要在摄氏二十二度以上才算是夏天。按照这个说法对照水城的情况，有的年份只有几天，有的年份一天也没有。如果照搬书本，那么，水城就没有夏天了，不仅不能种水稻，而且大部分地区连包谷也不能种植，事实上，水城不仅种包谷，而且种水稻，有些还亩产千斤以上。这岂不是笑话？经过我们在水稻扬花灌浆期间的实际观测，发现日平均气温稳定在摄氏十八度以上，就能满足水稻扬花灌浆的需要，水稻就能成熟。于是我们就把日平均温度稳定在十八度定为我地划分夏季的标准，并根据气象资料定出我地从六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二十六日为夏季。这就为利用本地热量资源、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事实又一次说明，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书本知识，是十分有害的。它束缚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能对事物有正确的认识，阻碍着我们科学事业的发展。在科技领域中，克服崇拜洋教条、迷信书本知识的错误倾向，仍然是我们必须很好注意的问题。

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有了对天气、气候规律性的认识，就要能动地去指导气象工作，使气象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我们把抓农事季节上的关键时期、抓主要农业气象问题、抓重大天气预报作为为农业服务的重点。根据生产需要，我们经常主动到基层了解生产情况、农业气象条件和生产单位对气象条件的要求，及时向党委和有关部门提供各种天气预报和各种农业气象专题服务材料。为了适应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们在提供天气预报和气候资料的基础上，又主动开展了现场气象服务工作。如为了帮助供电部门战胜“冰老虎”，我们和工人同志一起，冒着严寒到八石山观测高压输电线的覆冰情况，提供了战胜“冰老虎”的有用数据。我们到基建工地，在



现场随时提供天气预报情况，保证了一百二十米高的烟囱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没有因为天气原因而受损失。我们到铁路部门协助工人同志测定和掌握铁路沿线的气压数据，提高了机车运转功能。我们到部队施工现场，增添了湿度变化的预报，防止了由于湿度原因而造成的“哑炮”。我们到煤矿为工人同志防止瓦斯事故提供数据。为了切实搞好气象服务工作，十多年来，我们不断健全气象服务制度，定期检查服务质量，经常征求使用部门的意见。建站以来，我们的服务面不断扩大，月的长期天气趋势预报材料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制作的近百份增加到目前的六百多份，季度的长期天气趋势预报材料达到一千四百多份。

我们从十多年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能逐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而随着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又加深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我们对水城地区天气演变规律的认识，仅仅是一个起点，我们决心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运用辩证唯物论不断探索和掌握天气演变的规律，使气象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注：

- ① 根据省、地气象台发布的大范围天气形势预报，结合当地天气演变的实况观测和群众看天经验，同时考虑当地的地理条件、地形条件和气候特点，进行补充订正，作出当地具体的天气预报，叫做“单站补充天气预报”。
- ② 在上个月发布下一个月的每一天的天气预报，叫做“月的长期逐日天气预报”。
- ③ 冷暖空气相遇的界面在气象学上称为“锋面”，当暖空气受冷空气冲击发生上升运动而形成的界面叫做“冷锋”。在同一高度上空气压力高低分布不匀，凡空气压力是三面高、一面低的地带叫做“低压槽”。地面出现“冷锋”配合高空出现“低压槽”的天气形势，称为“冷锋低槽型”。



小评论一组

(三篇)

论钱干活的思想要不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通用机械厂工人 李小四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广大工人激起了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家都在出大力，流大汗，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多做贡献。但是，在大好形势下，社会上一部分人中间却有一种“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的论调。这种论钱干活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应该加以批驳。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里，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各尽所能”，就是要求每个从事社会主义劳动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创造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尽可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的说法，把问题搞颠倒了，不是先讲“各尽所能”，搞好革命和生产，而是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没钱不干。钱，成了支配一切的东西。在这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见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态度不见了。这种钱字当头的干活态度，是同工人阶级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相违背的。

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们许多老工人都曾被迫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卖给资本家，替他们当牛作马，过着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在那种情况下，为了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采取拿多少钱干多少活，以至拿钱不干活，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是企业的主人。我们不论在那条战线的那个岗位上干活，都不再是为资本家卖力了，而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增砖添瓦，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革命和生产搞得越好，就对社会主义的贡献越大；抓革命、促生产的积



极性越高，就越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如果干多少活以拿多少钱为前提，这就不是把自己放在主人翁的地位上，而是把自己同国家和集体的关系变成你买我卖的商品交换关系。有这种思想的人，必然看不到个人利益同国家和集体利益之间的一致性，总是用雇佣思想来对待社会主义事业。毛主席曾经批判了革命队伍里那些有雇佣思想的同志，指出他们“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不是对革命负责**”。那些论钱干活的人，恰恰就是忘记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忘记了对革命要负责。干社会主义，本来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在这个伟大斗争中，我们只有千条万条理由为人民为革命多做贡献，而没有一星半点理由可以向党向国家讨价还价。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为了解放“天下穷苦人”，不惜个人的一切，洒鲜血，抛头颅，谁也没有想到过“拿多少钱”的问题。白求恩同志的光辉事迹，我们大家都熟悉。在那些资产阶级庸人们看来，白求恩凭着自己的高明医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赚很多钱。可是，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抗日战争。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力量鼓舞着他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一个人有了这种精神就很高尚，很纯粹，有道德，他们的脑子里经常想到的总是革命，革命，再革命，而决不会在钱眼里钻来钻去，搞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共产主义战士杜洪亮就说得好：“心里有革命两个字，眼里就有干不完的活。”整天考虑“拿多少钱”的人，是不可能全心全意干革命的。列宁指出：“**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我们干社会主义，就要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提倡自愿的、无定额的、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同那种“**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旧观念实行彻底决裂。

有的人也许说：多拿钱多干活，可以调动积极性。用钱来调动积极性，这是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正是用“干劲是从物质刺激中来的”、“不加点钱，生产积极性就不高”之类的鬼话进行煽动和挑拨，妄图把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引到邪路上去，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受骗。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最重要的要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靠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今年以来，我们车间对工人没有多加一分钱，工人的工资还是那么多，但



生产月月超额完成任务，到五月二十三日，已提前完成上半年生产计划。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教育之后，又认真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生产也就搞上去了。

摆在我们工人阶级面前的斗争任务是极其重大的。我们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尽力用自己的心血和双手铺设那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能挑千斤担，决不挑九百九十九斤半。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为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搞协作非得靠“人情”吗？

上海无线电十三厂工人理论小组



我们厂是生产整机的，零部件要依靠元件厂协作供应。因此，我们厂的某些人经常摇头叹气，认为自己凡事得求人，见人矮三分，不向协作单位先送上点“人情”就办不了事。

协作非得靠“人情”不行吗？不。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各个工厂之间尽管存在着分工的不同，但都属于社会主义企业，都在为着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共同奋斗。拿我们整机厂和元件厂的关系来说，“一根杠棒前后肩”，谁离开谁都不行。在协作中必须坚持发扬“龙江风格”，这个特点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规定的。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精神空前发扬，在工厂之间、行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协作中，出现了许多“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把方便让给别人，用困难促进自己”的生动事例。那种认为不送“人情”就搞不好协作的讲法，过低地估计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缺乏信心和认识的表现。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还存在着商品和货币交换，各单位需要制订一定产值指标并进行经济核算，这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作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因此也往往容易受资产阶级经营作风的侵蚀，在企业内部反映为不顾国家的全局利益而只顾自己本单位、本部门的局部利益的本位主义。为了满足本单位不合理的要求就放弃革命原则，正道不走走歪道，甚至去干那些慷国家之慨的事情，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失。过去我们厂有的干部，把协作关系看成是单纯的合同关系，认为“合同一订，样样放心”。至于协作厂的工人群众在执行合同时究竟会碰到那些困难，根本不闻不问。当本厂的生产大幅度上升时，也没有能主动向协作厂通气，等到元件供应不上时，才火烧眉毛地去向协作厂“告急”，结果双方当然会发生矛盾。有的同志碰到这类问题的时候，不是一味埋怨、指责对方，就是归之于本厂没有能够做到“人情先行”，这完全是把问题搞颠倒了。

一搞协作，就非得讲“人情”不行，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侵入社会主义协作关系内部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互相竞争、大鱼吃小鱼的关系。它们之间也搞协作，但那种协作只能靠请客送礼、拉拉扯扯等极其虚伪的庸俗作风来加以维持。这种作风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是一种剧毒的腐蚀剂，如果不加抵制和反对，势必会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事实上，凡是那些“人情”不到就不搞协作或者是“有利协作、无利不干”的单位，在企业内部也必然是互相推委，互相扯皮，歪风邪气盛行，社会主义的正气不能抬头。这些地方，往往成为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并使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受到侵蚀。在“以物易物”、“有来有往”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损公肥己、化公为私的行为。林彪一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就竭力宣扬什么“人情大于王法”，我们对此必须提高警惕，决不可上当受骗。

要搞好协作关系，最根本的一条是协作双方都要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双方都从大局出发，从革命的原则出发，经过协商，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最近，我们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越来越认清了协作中歪风邪气的危害性。不久前，我们厂成批生产一种新型的电子计算机时，遇上了协作厂部分元件供应不上的矛盾。但当我们把情况摊给协作厂的干部和群众后，他们毫不迟疑地说：“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你们生产多少整机，我们按质、按量、按时供应多少！”这种风格是何等的高尚！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协作非得靠‘人情’”的论调，可以休矣！



从一根红头绳谈起

淮南市李郢孜百货商店党支部

我们商店是在城乡交错的李郢孜煤矿区的唯一的国营百货商店。一九七〇年，工人群众曾经质询我们：“你们这个零售商店为啥不卖红头绳，让投机倒把的人就在你们门口抬高物价，从中取利？”这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调查，原来是有些搞投机活动的商贩从我们店里把毛线、尼龙绳成斤地买去，再拆开来，以高价零售给群众。这就当然要引起群众对我们商店的不满。

根据群众的意见，我们曾经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有的同志对零售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总是不那么重视。他们认为，把毛线拆开来卖红头绳，既麻烦又不赚钱，劳而无功，对完成销售、利润计划关系不大，真好比是“年三十晚上打兔子——有它过年，没它也过年”。

最近，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重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同志们说，可不能小看红头绳之类的小商品，这里头也有大文章。大家对经营小商品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服务态度也有新的转变。

为啥说小商品里也有大文章呢？

小商品和千家万户有着密切的联系。居家过日子那个离得开针头线脑、顶针、扣子、发夹、松紧带等小商品呢？有些商品需要一次成斤论两地买回去，用上一阵子。但有的东西就需要那么一点点，比如单身矿工的衣裤掉个扣子、破个口子，只要买根针，用几条线就够了，多买了一时也用不上。要使群众既有用的又不要积压，既用得称心又不要多花钱，降低商品零售起点是个好办法。现在我们这里毛线可以论尺卖，一分钱可以买一根针三条线，五分钱可以买一包糖精，还办起了一批零售商品的代销点，群众夸我们的商店是“贴心店”。可见小商品虽小，但它涉及面广，需求量大，关系到千家万户，小中有大，只要经营得好，就会起到“巧理千家事，温暖万人心”的作用。

如果国营商店不愿意零售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嫌麻烦，怕费事，那就会



给投机倒把分子、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小生产者钻空子。你怕麻烦他不怕麻烦，你不愿干他来干。他们从国营商店里成批地把小商品套购出去，再拆开来高价零卖给群众，用人民的商品去剥削人民。这种人脑袋特别尖，见缝就钻。你国营商店里一时缺了啥，他就卖啥，你啥商品不零售，他就零卖啥。我们不干他们干，虽然都是做买卖，这可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干是为了赚钱发财，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不干，就等于是把小商品这个阵地让给了资本主义，在客观上帮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所以说，国营商店卖不卖红头绳之类的小商品，实际上是个有没有群众观点的问题，同时，还关系到是打击还是助长投机倒把活动、是铲除还是增添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土壤的大问题。

零售红头绳之类的小商品，对于我们完成商品的销售、利润计划确实是关系不大。但是，社会主义企业首先不是为了赚钱，如果让利润挂了帅，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商店就有过这样的教训。那时商店的领导为了超额完成利润计划好分奖，就用奖金来刺激营业员多卖钱，谁卖钱多谁就多得奖金，根本不管人民的商品落在什么人手里。结果，投机倒把分子就从柜台上轻易地套购商品，牟取暴利，剥削群众。当时商店的销售、利润计划倒是超额完成了，可是，投机倒把分子也从中捞了一把，使我们国营商店在政治上蒙受很大损失。

要说有利无利，首先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看对谁有利。对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有利，我们即使暂时赔本也要做；对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有利，我们赚钱再多也不能干。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营商店可以不管利润计划的问题。国营商店也有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的任务，但绝不能借口完成利润计划去搞利润挂帅。我们通过努力扩大经营范围，增加花色品种，增设代销网点，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等办法，几年来不仅年年超额完成销售、利润计划，而且营业额逐年有大幅度增长。

人民的商店，既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后勤部门，又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前哨阵地。重视小商品的经营范围问题，归根到底，是为了方便群众，保障供给，主动地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我们站柜台，就是要在商品流通领域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作战，这是摆在我们营业员面前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任何时候都不可等闲视之。



学理论 促生产

——天津市电子仪器厂的调查报告

天津市电子仪器厂是生产超低频电子仪器和电子计算机的工厂。今年上半年，由于认真抓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生产形势越来越好。现在，已经提前一个月全面地超额完成了上半年国家计划，创造了建厂以来同期生产的最高纪录。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是推动我国生产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今年以来，这个厂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党委连续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理论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人占全厂职工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通过学习理论，联系本厂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他们和大庆工人对比，找出了差距。他们说：大庆工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靠“两论”起家，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觉性不高；大庆工人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增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敢于把我国石油落后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我们对电子工业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服务抓得不力；大庆工人能以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一的速度向前迈进，我们却满足于“步子不大年年走，贡献不大年年有”的中游状态。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距？根本原因是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缺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雄心壮志。通过学习理



论，党委“一班人”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一致表示：“为了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一定要努力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老工人们说：“我们工人阶级不仅管干，而且管线，为坚持继续革命，要努力攀登理论山。”青年工人们说：“我们要通过学习理论，弄懂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广大职工进一步认识到刘少奇、林彪所鼓吹的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谬论的危害性，使鞍钢宪法更加深入人心。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过程中，广大职工回顾了过去厂内搞物质刺激的教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奖金名目繁多，生产总是徘徊不前；前几年，厂里又以“劳动竞赛”为名发过奖金，生产也没有被“刺激”上去。大家清楚地认识到，物质刺激，并不能把生产真正“刺激”上去，反而会腐蚀工人的思想，破坏工人队伍的团结，后患无穷。刘少奇、林彪一伙拚命鼓吹它，实质上是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必须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决不能搞物质刺激。拿今年上半年来说，生产任务很繁重，没有搞什么物质刺激，生产却上来了，而且上得快。什么原因呢？根本原因是广大职工通过学习理论，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共产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发扬。在学习理论当中，这个厂的工人自动组织了突击队，提出要象大庆工人那样，上班时间抓紧干，脏活累活抢着干，急活重活突击干。这个厂的仪器车间有一项晶体管多路稳压电源生产任务，今年计划安排生产三百台，要求上半年完成一百七十八台。工人们主动提出：“不但任务保证完，还要往前赶。”经过连续奋战，结果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年的生产计划。一次，电子计算机车间听说外厂配套设备磁带机要到月底才能进厂，眼看当月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怎么办？工人们想方设法，使生产准备工作走在前头。磁带机进厂后从开箱、改装到联调完毕，过去最快也要十天，现在只用了三天多，争分夺秒，终于按期完成了当月生产计划。



通过学习理论，广大职工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要特别注意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指示，加强了厂内的社会主义协作。年初，装配车间广大职工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提出实现三条半自动生产线。厂党委决定让模具机修车间来承担装配车间技术改造所需的设备制造任务。任务下达后，模具机修车间的领导把头一摇说，这不是我们的本行工作，我们车间只管修理，不管设备制造，把这项任务给顶了回去。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模具机修车间的群众，联系这件事进行了热烈讨论，他们分析了自己车间在处理与兄弟车间关系时的错误态度：对于其它车间急需、本车间捞不到多少“好处”的活不愿干，向外推；而对既“露脸”又“得利”的活，则愿意干，抢着干。大家分析，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车间之间的关系，是企业内部人与人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关系，本来应当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但是，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还会侵入我们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在处理兄弟车间关系时，“有利就干，无利不干”，正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的一种表现，不能让它在我们企业中任意泛滥。大家还认识到，车间之间人们的关系，本质上是阶级关系，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增产的斗争中，我们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能搞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那一套。认识提高以后，这个车间的领导愉快地把原来顶了回去的任务又要了回来。他们星期天也不休息，把所有机床全部开动起来赶制设备，仅用了十二天时间，就和兄弟车间一起，造出了半自动丝网漏印机等一些较高水平的专用设备。设备制造进度之快，数量之多，是过去这个厂从来没有过的。

在这个车间的影响和带动下，不但机加工等后方车间积极主动支援各个装配车间，而且前方的装配车间也积极主动支援后方车间。一次，机加工车间突击制造自动化冲床时，在程序控制部分遇到了技术难题，电子计算机车间闻讯后，马上抽调了这个车间最强的技术力量，由车间领导带队去主动支援，共同解决了这



一技术难题。在全厂职工互相支援，大力协作下，这个厂上半年已实现技术革新三十项，自制设备十八台，生产效率成倍增长。

通过学习理论，广大职工意气风发，力争上游，改变了厂领导原来提出的计划，制订了一个先进的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计划。年初，这个厂的党委在讨论计划时，有的同志认为去年完成计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今年再增一点产，就可以了；后来有人又怕生产任务重，会影响学习，结果，拿出了一个小幅度增产的方案。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广大职工对这样的计划议论纷纷。工人们说，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才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厂领导却拿出这么个“小脚女人”的方案，我们通不过。有的工人指出，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也必然会有力地促进生产。把学习理论和促进生产对立起来，是形而上学，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决克服。这些议论，对党委震动很大。党委成员又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从思想上摆正了革命和生产的关係，坚持把学习运动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同时，又用学习运动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接着，他们深入发动全厂职工，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纲，制订增产新计划。经过四次修改，增产指标由原来打算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九点八、百分之十五，改为增产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并提出确保产品质量，增加新的品种，作为奋斗目标。工人们高兴地表示：“这个计划，才象是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样子。”

目前，这个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在深入。广大职工决心再接再厉，把上半年的成绩作为继续革命的起点，学理论，促生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第四机械工业部 调查组
天津市第二机械工业局



法家路线和 黄老思想

——读帛书《经法》

康 立 卫 今

一九七三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包括不少久已失传的先秦古书在内的珍贵帛书，约十二万多字。这批帛书，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哲学思想，研究儒法斗争史及古代军事、地理、天文、历法和医学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继银雀山竹简出土后取得的又一重大的新成果。

在这批帛书中，《老子》有两种写本。这两个本子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通行本相反，而与法家著作《韩非子》中《解老》篇相合。《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共一万一千多字（释文见《文物》一九七四年第十期）。特别是其中的《经法》，对于研究我国自战国至汉初法家思想的演变，以及探讨汉初统治阶级崇尚“黄老”之学的阶级实质，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一）

《经法》这部古佚书，由《道法》、《国次》、《君正》、《六分》、《四度》、《论》、《亡论》、《论约》、《名理》等九篇文章组成，共五千字。各篇之间内在的思想联系相当严密。第一篇《道法》带有总纲性，全面地论证了“道”和“法”的关系。《国次》是讲国君如何从事统一战争，并对战争中存在的两条不同路线作了比较。《君正》进一步阐述了统一战争必须建立在对内实行法治、奖励农战的基础上。《六分》和



《四度》说明了决定国家兴亡的界限和分寸，特别强调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论》与《亡论》则从正反两个方面探讨国家“存亡兴坏”的原因，并从哲学上作了解释。《论约》主张君主必须明了事物的起因和名实关系，认识事态变化的内在原因，才能“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策”。最后一篇《名理》，强调“审察名理”、“循名究理”，都要“以法断之”，“以法为符”，又回到“法治”问题，作为总结。

从以上内容来看，《经法》这部书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提倡农战，二是强调法治，三是主张统一。

《经法》中表现了十分明显的农战思想，积极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君正》篇指出：“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它把农业生产看作“人之本”，主张“毋夺民时”，做到“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尽民之力”，使“刑罚不犯”，“号令发必行”。这就是“守固战胜之道”。显然，这些主张是同商鞅在秦孝公时实行的耕战政策一脉相承的。

《经法》对于法治的作用和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它强调：“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道法》）“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君正》）“法”决定着国家的成败得失，是区分是非曲直的规矩准绳，“是非有分，以法断之”（《名理》）。一定的法令，是一定阶级的意志的反映。先秦法家所说的“法”，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他们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一直主张依靠“法治”来对奴隶主复辟派实行有效的专政。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儒家，则反对“法治”而主张“礼治”，企图维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代表中小奴隶主利益的道家也不赞成“法治”，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①。对待“法”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阶级在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根本对立。《经法》主张实行“法治”，这显然是法家的观点。

《经法》还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实现统一的愿望，并就这方面的阶级斗争经验进行了总结。它认为只有出现统一的政治局面，使“臣肃敬，不敢蔽其主”，“万民和辑而乐为其主上用”，才能“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六分》）。《经法》



充分肯定统一战争的正义性，认为“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四度》）。这和儒家代表孟轲之流鼓吹“善战者服上刑”^②正相对立，同道家鼓吹“小邦寡民”、“有甲兵无所陈之”^③也完全不同。《经法》反复强调：实行法治是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必要前提，只要做到“衣食足而刑罚必”，就“七年而可以征”。即坚持法治路线几年以后，才能“胜强敌”（《君正》），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完成统一的事业。可见，《经法》是秦统一六国前、各诸侯国还处于相持阶段的背景下写的，它适应了这一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发展统一事业的需要。

毛主席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任何一种思潮或学派，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法》探讨一国兴亡的原因，提倡农战，主张“法治”，着眼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表明它应该是属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范畴的。

这部书过去未见于著录，关于它的作者和具体著作年代尚待进一步考查，但从其思想内容初步分析来看，很可能是商鞅变法后的作品。《经法》主张“号令者，连为什伍”（《君正》）。这种制度，起源较早，在秦献公时，就“为户籍相伍”^④，到了商鞅变法时，已在秦国大力推行。《经法》进一步提出“连为什伍”，有可能是受了秦的影响。《经法》对“法”的内容的论述，不如前期法家说得具体，但对“法”的产生及其规律性从哲学上作了解释，这比前期法家又进了一步。而与荀况、韩非著作相比较，它对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认识还是较朦胧的。从思想风格看，它应当是介于前期法家和荀况、韩非之间的作品。

（二）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法》这部书中，道家法里的倾向比较明显。它基本上是法家的作品，但又夹杂了不少道家思想的色彩。《经法》的这种思想特点，是战国中后期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政治战线上路线斗争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发生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动，思想领域中出现了各种思潮和学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进入战国中期后，虽然封建的经济关系得到了发展，地主阶级夺取了政权，但是新兴地主阶级和被推翻的



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反复辟和复辟的斗争的日益尖锐，使阶级阵线日益分明，在各学派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分化。杰出的法家荀况就是儒家的叛逆者。同时，代表中小奴隶主的道家也出现了分化，其中有些人转变成了法家。道家学派主要流行于齐、楚地区。在齐国的稷下黄老学派中，除了老聃、环渊这一派外，宋钘、尹文是道家而兼名家，成了法家的同盟军；田骈、慎到则把道家的理论作了改造，成为法家。慎到曾“学黄老道德之术”^⑤，他认为“民一于君，断于法，国之大道也”^⑥，主张“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⑦。其实际内容，都是要实行“法治”。在楚国，有个鹖冠子，“初本黄老而末流迪于刑名”^⑧，也是从道家转变为法家的。

在激烈的社会大变动中，不仅在道家中有一部分人分化出来改变立场而成为法家，而且在法家中也有一部分人吸取了道家的思想资料。强调讲“术”的申不害，被称为“本于黄老而主刑名”^⑨。著名的《管子》这部书，主要是战国时齐国法家的作品，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曾在稷下讲学的荀况与道家学派也有关系，特别是他的天道观，明显地是受了宋钘、尹文的影响。至于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更“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⑩。他十分重视《老子》的研究，在《解老》、《喻老》中，吸取了《老子》中的一些辩证法因素并加以积极的改造，作为理论武器，为新兴的封建制辩护，尖锐地驳斥了儒家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和中庸之道。他认为“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⑪，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

摆在我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个颇为矛盾的现象：为什么唯心论的、代表奴隶主阶级的道家学派的一些思想资料，却可以被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利用？

这首先应从阶级斗争中分析问题。自春秋末期以来，由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奴隶主阶级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⑫的社会大变动过程中，许多中小奴隶主逐步“降在皂隶”^⑬。他们反对掌权的奴隶主贵族，不满现状，要求维持中小奴隶主那种落后倒退的“小邦寡民”的社会状态，成为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道家就是他们的思想代表。道家公开同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儒家相对抗，宣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也”^⑭，揭露了儒家鼓吹“仁义”的虚伪性。孔丘“宪章文武”^⑮，把文、武、周公作为偶像。道家则抬出了黄帝和老子，以对付孔丘。对那些“法先王”的复古迷来说，这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值得注意的是商鞅、申不害、韩非都盛赞黄帝，认为黄帝建立了“君臣上下之义”，“内行刀锯，外用甲兵”^⑯。法家对黄帝的肯定，并不是要象道家那样维持“小邦寡民”的局面，而是为了反对儒家的倒退路线，推行法家的革新路线。

法家对道家学派某些思想资料的利用和改造，反映了战国中期后，新兴地主阶级已不能满足于提出一些具体的政治主张和措施，而要求从哲学上对本阶级的斗争实践进行总结和概括，提供更完整的思想武器。正是在这种政治需要下，他们注意到当时与儒家相对立的而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道家学派中的某些思想资料。道家是用客观唯心论去反对和否定儒家的天命论的，但提出“道”这个概念，却给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以新的启发。

《经法》劈头第一句话就是“道生法”，认为“道”是死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决定和支配着万事万物的生死成败，也产生了“法”。它认为：“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道法》）。“法”，虽然是由“执道”的君主制订的，但不完全以君主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君主不能随便废除或触犯“法”，否则就违背了天地之“恒道”。当时，许多法家都开始讲“道”，而且往往“道法”并提。荀况也强调新兴地主阶级必须“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⑰。韩非在《主道》、《扬权》等篇中也常常把“道法”连用。他还指出：“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道法万全”^⑱。但是在法家那里，“道”的概念已赋予了唯物主义的内容。他们把“道”看作是宇宙万物发展的客观法则，把“法”看作是这种客观法则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体现。“道”在现实政治中就是“法”，“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⑲。这样，就为宣传和推行法家路线进一步找到了一种理论根据。

法家不但改造了“道”，还吸取了道家学说中的某些辩证法因素。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老子》，是一部兵书。它“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⑳，从战争的胜败引起的国家盛衰兴亡和阶级升沉浮降中总结了某些军事上的规律。它没有用较多的篇幅去研究军事战术，而是偏重于讲战略，把具体的用兵之道上



升到战略思想的高度，从哲学上作了概括。“柔弱胜刚强”，是《老子》提出的战略思想的基本观点（帛书《老子》甲本作“友弱胜强”，有团结弱小战胜强大的意思）。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这种思想包含着一定的辩证法因素。《经法》也很重视这种朴素的辩证法，认为“以刚为柔者活，以柔为刚者伐”（《名理》）。“文则明，武则强”（《四度》），“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论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矣”（《君正》）。这里所说的柔与刚、文与武的辩证关系，是讲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一般规律。同时，《经法》还特别强调指出：“四时有度，天地之理也。”（《论约》）它认为，既然自然界万物是“有度”的，那么，指挥打仗，处理内政外交等各种关系，也必须注意“度”，“度量已具，则治而制之矣”（《道法》）。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在道家那里，在客观唯心论的指导下，尽管也看到了社会的急剧变化，但抱的却是没落阶级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只感到在大变动面前无能为力，因而鼓吹消极无为，辩证法的因素被用来为没落的“小邦寡民”辩护。而在法家那里，对待社会大变革的态度是充满信心的，向前看的。《经法》说：“唯公无私，见知不惑，乃知奋起”（《名理》），精神状态是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它在谈到事物的相互转化时，提出要注意保持恰当的“度”，认为办事如果超过了限度，就会向不利于自己的相反的方面转化，“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四度》）。因而，它主张要“审知逆顺”（《四度》），“审观事之所始起”，具体地去“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论约》），促使事物向积极的方面转化。这个思想，对汉初巩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在阶级社会中，一种新的社会思潮的形成，总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总是反映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是它的源。同时，它又常常是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实践，对前人的某些思想资料加以利用和改造，这是它的流。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先秦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学派，正是根据本阶级的利益和需要，针对当时阶级斗争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建立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道家学说中的某些论断，只是作为一种思想资料，给了他们



某些启发，从而被他们利用过来，经过改造，给以新的解释，吸收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由于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都是剥削阶级，当法家改造道家的某些思想资料时，这种改造是不可能彻底的，从而把道家思想的某些糟粕也带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来。这个矛盾，对于作为地主阶级思想家的任何法家人士来说，都是无法解决的。

(三)

黄老学派虽形成于战国，但到了汉初才被封建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如果说，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斗争，主要是直接表现为儒法之间的斗争，那么，汉初的儒法斗争，则常常采取了黄老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对立的表现形式。这就是所谓“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②①}。汉代统治集团中，第一个讲黄老的是吕后时代的曹参。他代肖何为相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肖何约束”^{②②}，行法家路线，却打着黄老旗号。以后，崇尚黄老的又有接替曹参任相的陈平，及汉文帝的妻子窦太后。《经法》这部书和黄老学派的基本著作合抄在一起，保存在汉文帝时的墓葬里，可见当时是把它归入黄老思想这一类的，很可能就是汉初统治阶级中流行的一本基本教科书。

两千多年来，黄老学派除了一部五千字的《老子》外，没有什么著作传世。不同历史时期黄老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汉初吕后执政时期的曹参、陈平等人执行的明明是法家路线，为什么要打出黄老的旗号？在汉代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黄老思想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经法》等古佚书的出土，为我们研究这些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黄老之学在汉初渐渐流行，但它的高潮还是在刘邦取得政权近三十年后的文景时期。汉文帝刘恒“本好刑名之言”^{②③}。他主张法治，认为“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②④}。他执政后继续推行了法家路线，但也喜欢谈黄老之言。他的丞相陈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②⑤}。《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汉



初，特别是文景时期，黄老之学盛行，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的。这时候，以六国旧贵族为代表的大奴隶主残余势力，经过秦末农民起义风暴的扫荡和刘邦军队的连续打击，已经受到很大的削弱。广大农村中，奴隶制的旧生产关系和旧社会秩序已经迅速瓦解，封建制的自然经济已普遍建立起来。掌握着政权的新兴地主阶级，需要尽快地把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稳定下来。同时，由于经过秦二世、赵高、项羽一直到汉初异姓王的多次复辟活动，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才）什二三”^{②6}，西汉王朝也急需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封建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到文帝时，同姓诸侯王逐渐羽翼丰满，成为新的割据势力的代表，同工商奴隶主复辟势力勾结在一起，对封建中央政权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但当时封建中央政权的脚跟还没有完全站稳，经济实力也不够雄厚，还需要争取时间，把政权巩固下来，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文帝提倡黄老思想，高唱“无为而治”，实质是为了排除干扰，以退为进，更好地坚持和贯彻汉高祖以来的法家路线。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积极的步骤。明代著名法家李贽盛赞汉文帝“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稳实”^{②7}。这一点，剖析一下文帝时正在流行的《经法》的内容和特点，也可从旁得到有力的佐证。

汉初法家宣扬的“无为”，已不是先秦道家所鼓吹的那种“无为”。道家本来的“无为”，是讲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秩序无必要和不可能，主张倒退、复古。而法家讲的“无为”，内容恰好相反。韩非曾用法家的观点，对“无为”作过这样的解释：“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②8}，君臣上下都能按“法”行事，就可以做到“无为”。《经法》更明确指出：“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名理》）这里所说的“虚静”，就是要求不受干扰，一切以“法”为准绳。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十大经》：《观》、《兵容》），是这次出土的帛书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它的原意就是强调执“法”必须果断、坚决，不能优柔寡断，否则就会被那些非“法”的活动扰乱新的封建统治局面，就不能巩固地主阶级的中央政权。《经法》用不少篇幅论证了动与静、无为与有为的关系，认为“君臣当位谓之静，贤不肖当位谓之正”（《四度》），要求达到“动之静之，民无不听”（《君正》），这



是很符合希望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汉王朝胃口的。刘邦在建立了统一的汉王朝后，制订了一整套政治制度和各项政策，继续推行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惠帝时，曹参曾对他说：“高帝（刘邦）与肖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②⑨}这就清楚地表明：西汉前期“无为而治”的实质，就是要继续执行刘邦的法家路线，继续执行“既明”的“法令”，达到“遵而勿失”的目的。

在这个时期，“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③⑩}。窦太后“好黄老言”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有一场著名的黄生和辕固生之间的争论很可以说明问题。黄生号称道家，他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③⑪}这分明是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的法家言论。辕固生是儒生，他称汤武起兵是“受命”^{③⑫}，其实是为当时地方割据势力武装反抗中央政权制造舆论。可见，汉初反对“无为而治”、希望改变政治局面的，倒是儒家。难怪窦太后要大冒其火，借故把辕固生抛到豕圈里，让他去和野猪决斗。表面上的儒道之争，其实还是儒法斗争。一直到汉武帝，法家人物汲黯任东海太守，也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③⑬}。王夫之评论说：“曹参之余智耳。”^{③⑭}这可以说是“文景之治”的余波。汲黯下决心是果断的，对尊儒反法的批评是尖锐的，但办事也“学黄老之言”，这说明“断”和“静”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是统一的。汉初盛行一时的黄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了道家的本来面目，成为法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披上的一件外衣。直到汉武帝执政后，由于各方面客观条件的变化，虽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却不再披着黄老思想这件外衣了。

总之，黄老思想在汉初盛行一时，完全是由当时地主阶级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所决定的。它为汉武帝刘彻时的大发展局面打下了基础。但崇尚黄老之学，终究也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消极面。从秦始皇时代旗帜鲜明的法家思想，到西汉演变为道表法里的黄老思想，也说明地主阶级的革命性开始逐步消退。这时的地主阶级虽然仍坚持法家路线，但同商鞅、韩非、秦始皇那种生气勃勃的战斗姿态比起来，毕竟要相形见绌了。

对于地主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夺取政权，意味着它开始从革命走向保守。而无产阶级则不同，它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



夺取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只是走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继续革命的新的起点。我们是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决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有阶段之分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总是高一阵、低一阵，曲折地向前发展，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反修防修的斗争越是深入，无产阶级专政越是巩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基本政策越是为亿万人民所掌握，安定团结的局面就越是发展。即使在阶级斗争“低一阵”的时候，无产阶级也不是“清静无为”，不是保守，更不是倒退，而是在斗争中乘胜前进，是在巩固前一阶段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实现“更好的一跃”，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更加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我们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不是把历史和现实作形而上学的类比，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提高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更好地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这是我们研究儒法斗争的根本目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革命目的一定要达到，也一定能够达到。

注：

- | | |
|--------------------|-------------------|
| ①③⑭ 通行本《老子》及帛书《老子》 | ⑱ 《韩非子·饰邪》 |
| ② 《孟子·离娄上》 | ⑲ 《管子·法法》 |
| ④ 《史记·秦始皇本纪》 | ⑳ 《汉书·艺文志》 |
| ⑤ 《史记·孟轲荀卿列传》 | ㉒㉓ 《史记·曹相国世家》 |
| ⑥ 《艺文类聚》卷五十四 | ㉔㉕㉖ 《史记·儒林列传》 |
| ⑦ 《慎子·君臣》 | ㉗ 《史记·孝文本纪》 |
| ⑧ 《鹖冠子》序 | ㉘ 《史记·陈丞相世家》 |
| ⑨⑩⑪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 ㉙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
| ⑫ 《韩非子·解老》 | ㉚ 李贽：《藏书·世纪·孝文皇帝》 |
| ⑬ 《毛诗·小雅·十月之交》 | ㉛ 《韩非子·扬权》 |
| ⑮ 《左传·昭公三年》 | ㉜ 《汉书·外戚传》 |
| ⑯ 《礼记·中庸》 | ㉝ 《史记·汲郑列传》 |
| ⑰ 《商君书·画策》 | ㉞ 王夫之：《读通鉴论·武帝》 |
| ⑱ 《荀子·正名》 | |



经 济 战 线

照毛主席的思想办农业

葛 静

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如何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促进农业生产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应当经常研究、切实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农村工作的情况表明，那个地方的领导同志，能够坚持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决照毛主席的思想办农业，那个地方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高，战天斗地的劲头就大，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就生气勃勃，农业生产的步子就迈得快、迈得大。我们应当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也是我们建设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条基本经验。它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的意义。马克思曾经说过：“从事加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斯图亚特称之为‘自由人手’）的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也是办工业的重要条件。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办工业提供必需的粮食、副食品、原料和劳动力，才能为工业开辟更广阔的市场，积累更多的资金。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决定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农业的发展，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又促进重工业的发展。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相应发展，互相促进，就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

农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这种重要性，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是很清楚的。解



放以来的事实证明，那一年农业丰收了，我们那一年的日子就好过。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整个国家是这样，一个省、一个地区也是这样。把发展农业仅仅看成农业部门的工作，而不予重视，或者把它同其他经济工作等同看待，而平均使用力量，这都是不对的。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农业，要求我们把发展农业真正当作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作来抓。在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的时候，在安排人力、物力的时候，首先考虑到农业，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在安排其他各项经济工作的时候，考虑农业的需要和可能；在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同时，从各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经常注意克服这方面的错误思想，把属于地、县支配的机动财力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用于发展农业生产。这个地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支援农业。采取农业出题目，工业做文章的办法，积极发展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等五小工业为主的支农工业，使全区基本上实现了排灌、小麦脱粒、农副产品加工和运输、植保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七四年，全区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七百三十多斤，林、牧、副各业也都有较大的发展。今年的小麦全区平均亩产估计达到四百斤以上。农业丰收了，不仅增加了国家、集体和社员群众的收入和粮食储备，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而且还促进了工业、交通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毛主席说过：“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调动广大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这是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个重要措施。数万万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为革命种田，奋发图强创大业，艰苦奋斗夺丰收，在改天换地的同时，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旧习惯、旧思想，这正是从物质和精神方面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务必从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出发，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全局着想，“切实地改善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树雄心，立壮志，充分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努力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农村。

“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农业，就要



紧紧抓住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处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存在着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取消，这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这些东西，必然要腐蚀一些人的思想，使某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邪路，甚至蜕化变质，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在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而结束。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没有完成的部分，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完成，已经完成的部分，也还存在复辟倒退的可能，还需要继续前进。集体经济内部在作物种植、劳力支配、产品销售和分配等方面，仍然有一个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纲，才是抓住了发展农业的根本。离开了这个纲，不仅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农业，而且会滑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联系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发动群众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这是促进农业生产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广大群众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农业生产有了发展，集体经济更加壮大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更加巩固。我们还需要坚持下去，社会主义教育要经常进行，对资本主义倾向要反复批判。不敢发动群众批判资本主义倾向，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是一种中庸之道的思想在作怪，同共产党人、革命干部的称号是不相称的。我们共产党人，是搞阶级斗争的，是干社会主义的。因此，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深入到群众中去，加强调查研究，抓住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问题，按照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发动群众一个一个地予以解决，这才是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干部应取的态度。

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村社队按照“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在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情况下，根据需求和可能，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地发展集体副业、牧业和其他企业事业，以壮大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也是完全必要的。对资本主义倾向批得越深入，集体经济就越发展，集体经济越发展，资本主义倾向就越没有市场。这已



经被广大群众的实践所证明了。凡是对国家、集体和社员群众都有利的事业，又有条件可以兴办的，集体就应该组织力量积极兴办起来，并且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把它办好。

许多地方的经验表明，能不能有力地批判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的问题在于懂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没有路线斗争的觉悟。理论上搞不清，路线上就会出偏差，在实践斗争中就会迷失方向，走错道路。在这方面，河北赵县的同志就有这个体会。有一个时期，由于没有搞懂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路线上分不清是非，对一些社队自由种植的资本主义倾向，没有加以限制，结果粮食、棉花减了产。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经过看书学习，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发动干部、群众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端正了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九七四年全县五十一万亩粮食作物，亩产达到六百九十多斤，比一九七三年增产一百九十多斤，总产增加九千八百四十多万斤。他们的经验说明，要准确地把住社会主义方向盘，就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带头学好，尤其重要。这样才能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干部，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只要我们的干部能够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就有了识别方向、判断是非的准则。我们就不致把资本主义的东西误认为社会主义的东西，并能满腔热情地去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带领群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实践告诉我们，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力量源泉。贫下中农说得好：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力更生干出来的。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如何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怎样按照农业“八字宪法”改变自然条件？农田基本建设，先搞什么，后搞什么？农业机械化的步子怎么走？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规划，都要依靠群众的力量，一件一件地来办。许多生动的事实说明，只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抓住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矛盾，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实行长计划短安排，在一段时期内解决一个或者两个主要问题，这样循序渐进，日积月累，逐



年发展,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可以改变那里的面貌;从农田基本建设,到农业技术改造,都能打下良好的基础,促进农业生产在广度和深度上向前发展。

自力更生的力量在那里?在群众之中。搞农业,夺高产,自然条件和物资条件是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在太行山东麓,有一个获鹿县,那里原来常年缺水,对发展农业是个不利条件。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凿石开山,修渠引水?有人说,一缺资金、二缺物资、三缺技术,修渠引水太困难了,还是等上面来支援吧。可是,获鹿县的同志没有等,而是迎着困难上。他们主动地联合平山、元氏两个邻县,打起了修渠引水的人民战争。在保证完成当年生产任务的情况下,组织专业队,农闲多上,农忙少上,发动各行各业大力支援。资金,自己筹措。物资,就地取材。技术,靠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土专家。就这样,用三年多的时间凿穿了七条隧洞,修了十七座渡槽,建了两条倒虹吸管,架了四百二十二座涵闸和桥梁,修成了一条二百里长的“引岗渠”,途经二十多个山头,五十多条沟河,使四十四万三千多亩丘陵岗坡上的旱地得到了灌溉。一九七四年,全县粮食产量每亩平均在八百斤以上,一跃跨过了“长江”。这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伟大真理:“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还是伸手向上,依赖外援?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并不排斥外援,但是并不依赖它,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全体军民的力量,赢得了胜利。解放以后,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并建设起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这是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证。而刘少奇、林彪一类,却大肆贩卖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学”,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企图把我们重新拖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我们要继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的社会主义农业就能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搞好钢铁生产的根本问题在路线

章 迪

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指引下，我国工业战线的形势很好。钢铁工业战线上广大职工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一步加强了革命团结，提高了觉悟，革命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高涨。许多钢铁企业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了新的成绩。

钢铁工业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业。毛主席早就指出：发展工业要以钢为纲。“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钢铁工业发展了，才能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带动整个工业的高涨，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建国以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速度是比较快的。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钢铁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坚持“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钢铁生产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品种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说明增产的潜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应当认真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尽最大努力多搞一点钢铁。这是在当前形势下，加强战备，巩固国防的需要，也是发展国民经济，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更好地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

搞好钢铁生产，最根本的是靠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发展钢铁工业同发展其它各项革命事业一样，都必须紧紧抓住路线这个纲，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以“纲”带钢，钢铁生产才能得到多快好省的发展。二十多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历史，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解放初期，我国钢铁工业基本上是在一片



废墟上开始建设的。一九五八年，继取得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胜利之后，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人民奋发图强，掀起了规模壮阔的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钢铁生产出现了跃进。一九六〇年三月，毛主席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亲自批示了“鞍钢宪法”。毛主席的批示，照亮了我国工业发展的道路，鼓舞和武装了广大工人群众。但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在一段时间内，钢铁工业的发展也曾经受到挫折。经过文化大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受到深刻的批判，许多人觉悟了，钢铁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斗争的实践证明，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不是风平浪静的。它是和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排除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才能保证钢铁生产持续前进。

在工业企业包括钢铁企业中，坚持正确路线，必须紧紧抓住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个基本问题。在当前，特别要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切实做到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工人群众手里。几年来，钢铁工业中一些单位的实践也都表明，那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展得比较深入，能够比较自觉地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企业里的革命和生产，从各方面加强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那里就会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否则，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就有可能泛滥，工人队伍的革命团结受到影响，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生产建设就会徘徊不前。因此，我们要加速钢铁生产的发展，就有必要在当前的学习运动中，围绕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通过总结经验，在钢铁企业中认真地检查回顾一下：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是不是真正开展起来了，群众是不是充分发动起来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认真落实了，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不是有力地打击了？总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不是真正落实到基层了？这样，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具体分析，从而找出本单位执行路线和政策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就能够做到更好地以革命推动生产，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变成加速钢铁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要抓好路线，关键在于提高领导班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有的同志思想不对头，在研究和解决企业的工作和生产问题时，往往习惯着眼于外部条件和客观影响，而看不到外部条件掩盖着的内部工作中的问题。钢铁生产不是孤立的，一个企业也不是孤立的，它总是和各种外部条件密切联系着的。要搞好生产，一切外部条件中的问题，都需要认真地逐一加以解决，但这终究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只强调外部条件，而不去花力气着重研究分析和解决企业中执行路线上的问题，那是不正确的。有些单位原来生产比较落后，外部条件也有许多困难，但是，由于那里领导上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抓住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这个关键，认真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分析企业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从领导上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并且发动群众找差距，揭矛盾，促转化，增强了革命团结，无产阶级正气上升，生产就很快搞了上去。相反，也有的单位由于片面强调外部条件的影响，只是眼睛向外，即使是外部条件有了改善，他们那里的被动局面仍然得不到改变。

上述情况说明，正确认识 and 对待企业工作中内部问题和外部条件的关系，提高领导班子抓大事，抓路线的自觉性，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搞好钢铁生产。因此，我们要认真地抓好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努力把每个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建设成为有较高的路线觉悟的、团结一致的、坚强有力的战斗指挥部。这样的领导班子才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倾向，以及一切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良倾向，敢于进行斗争，并且善于联系群众，自觉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有了这样的领导班子，才能够不断地揭露前进中的矛盾，解决矛盾，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



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广大钢铁工人深刻了解自己肩负的光荣任务，迫切要求搞好钢铁生产，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能不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促进和加强群众之间的革命团结，充分调动群众中的一切积极因素，这也是在企业中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问题。群众运动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有革命群众本身的坚强团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为着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共同目标，大家团结在一起，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就可以创造条件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因此，在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要组织广大群众讲形势，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使每一个同志都充分认识到搞好钢铁生产的迫切性，认识到团结战斗的重要性。只要大家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局出发，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派性的危害和腐蚀作用，认识到资产阶级派性是不顾大局、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因此，需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罪行，不断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进行无产阶级党性教育，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党的政策，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头脑，促进革命团结的进一步加强。

毛主席指出：“**管理也是社教**”。我们要根据毛主席这一指示，搞好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反映着人和人的关系，和执行什么路线是紧密联系着的，对生产的影响很大，解决不好，还会为资本主义活动打开方便之门。有的同志对这方面的问题认识不足，没有从路线上分清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和“管、卡、压”的界限，主动去做好工作；或者不善于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去加强管理，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这都需要认真总结经验，逐步解决。同时，还应提倡各级领导继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注意扎扎实实地解决生产中的薄弱环节，特别是要抓好矿山、开坯和设备维修工作，为钢铁生产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搞好钢铁生产关系着全局，关系着加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全国人民寄予着极大的期望。钢铁战线上的广大职工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保持和发扬“**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就一定可以争取使我国钢铁工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注意发展轻工业

钟 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干部和群众发挥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农业连续十三年获得丰收的基础上，我国的轻工业发展得较快。轻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额，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间增长额的总和。与此同时，我国城乡购买力、特别是农村购买力也有了显著的增长，对轻工业产品无论是数量、质量、品种、花色，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外贸易的发展，也要求轻工业提供更多的货源。我们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的推动下，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使轻工业发展得更快一些。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证我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时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并且指出：“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大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实践证明，毛主席所制定的方针，反映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内在联系，是完全正确的。那种照抄外国，违背毛主席这一指示的观点和做法则是错误的。轻工业发展了，可以为农副产品特别是经济作物生产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壮大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可以使更多的农副产品被加工成为用途更广泛的消费品，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可以为重工业的建设积累大量资金，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理解了。

发展轻工业，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工业



和农业的关系，反映了工人和农民这两大阶级的关系。我国农产品绝大部分是集体经济生产的，还有少部分是个体生产的。集体经济和农民把一部分产品作为商品交给国家以后，货币就到了集体经济和农民手里，用于购买工业品，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于购买轻工业产品。农村是最广阔的市场。农业越发展，需要的工业品越多。但是，在那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有商品制度，有货币交换，就有资产阶级分子滋生的土壤。农村的商业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一定会去占领。进一步发展轻工业，把更多更好的轻工业品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渠道投入农村市场，与农民交换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城乡物资交流，而且可以巩固和扩大商业方面的社会主义阵地，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看待发展轻工业的问题。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方针，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有的同志认为轻工业生产“可挤可让”，这种思想倾向是错误的。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搞好轻工业生产，最根本的是要抓好革命，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实践证明，那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开展得好，革命搞得好，那里工农业生产就上得快，那里的经济形势就朝气蓬勃。许多轻工业企业，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干部和群众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一步增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大干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局面；通过理论学习，进一步认清林彪妄图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分裂工人阶级的罪行，增强了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自觉性，促进了安定团结；通过理论学习，批判了刘少奇、林彪所推行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得到发扬，生产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总之，路线正确，革命搞得好，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什么困难也能克服，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



杂的。当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仍然是经济工作中的严重问题。轻工业是搞商品生产的，在生产方向、业务经营、计划安排等方面都有一个方向、道路的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搞利润挂帅，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好。我们有的企业，现在还有片面追求产值、利润、吨位，不顾品种、质量的错误思想；只愿意生产“有名有利”的产品，不愿意生产同工农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锅、碗、缸、盆之类产品的错误倾向。这些都是违背社会主义方向的。搞得不好，就会给资本主义活动以可乘之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甚至会使一些企业蜕化变质。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抓好政治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端正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发展轻工业，必须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除了那些受原料资源和工业技术水平限制，需要由国家统一调配、互通有无的产品外，一般的轻工业产品，要尽量做到因地制宜，逐步地提高省、区的自给水平。办工业，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才能多快好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合理利用地方资源，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地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但是，提高轻工业产品的自给水平，不应当同地区间进行合理的原料和商品的统一调拨对立起来。发挥地方办轻工业的积极性，既要努力提高本地区的产品自给程度，又要考虑如何发挥本地区的特长，为全局多作贡献。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发展生产，必须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些地区从本地原材料资源、自然条件和技术基础等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以办中**小型企业**为主，重点发展某些轻工行业。例如，一些适宜种植甘蔗、甜菜的省、区，根据全局的需要，积极发展糖料生产；一些拥有森林资源和适宜种植芦苇的省、区，积极增产纸浆和纸张，发展造纸工业；一些重工业发达的省、市，积极发展以金属材料或化工产品为原料的日用机械、日用五金、日用化工等工业，这些地区不但为全局作出了贡献，也加快了本地区轻工业



的发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原来的工业基础薄弱，近几年来，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注意因地制宜发展轻工业，自力更生建立甘蔗、黄麻、果蔬等各种原料基地，发展食糖、麻袋、罐头食品等产品，轻工业生产增长幅度很大。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在农业、重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轻工业系统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十五左右。轻工业发展了，促进了重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好经验。

发展轻工业，要注意充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发挥原有企业、原有工业基地的作用，积极实行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进一步挖掘老厂潜力。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需要有计划地建设一些新企业，但不能一讲到发展生产，就想铺新摊子、上新项目。应该看到，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我国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把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利用起来，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技术革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老厂的技术改造，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水平，并可以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个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基地，建国二十五年来，通过广大工人、干部的积极努力，不断革新技术、改造设备，使老厂、老机器不断作出新贡献，一九七四年生产总值达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四倍半。这是多快好省发展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途径。

充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发展生产，要搞好社会主义协作。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组织工业协作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许多原来在一个企业、一个行业范围内难于解决的问题，通过提高工业的组织程度，会变得容易解决。江苏省常州市，纺织工业的摊子不大，可是他们组织得较好。围绕若干主要产品，把有关企业组织起来，开展“一条龙”协作，企业之间合理分工，适度地实行专业化。结果，整个行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大为提高，使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当前，轻工业部门的广大职工正和全国人民一道，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对于党的基本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的认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我们一定能够把轻工业生产搞得更好。



为革命做好商品供应工作

北京市西单菜市场党支部

我们西单菜市场是一个大型的副食商场，主要经营鸡、鸭、鱼、肉、蛋以及各种蔬菜等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它不仅担负着本地区一千多户居民和一百多个机关、工厂的供应任务，而且每天要接待成千上万来自全市和外地进京的流动顾客。

毛主席曾经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为了在这个总方针指引下做好商品供应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我们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热潮中，于今年“五一”节前夕，向各兄弟单位和广大顾客发出了坚决纠正资产阶级不正之风、努力做好商品计划供应工作的公开信。公开信发表后，得到了领导和广大群众以及兄弟单位的热情支持。全场职工也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大家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进一步改进服务工作。

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由于商品制度的存在，社会主义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主要是通过商业来实现的。我们零售商店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工作，把一些生活必需品，分配到群众手中，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使我们认识到，只要货币交换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活动就有它的市场。联系本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要做好商品供应工作，不仅要做到“服务态度和蔼，少出差错”，还必须批判资本主义倾向，逐步限制消费品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商品供应工作，绝不是单纯的一手钱、一手货的你买我卖，而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包含着执行政策的问题。党对商品供应的各项政策和规定，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制定的，既体现了党对群众生活的关心，又对一些资产阶级法权作了必要的限制。在我们的商品还不能完全满足群众需要的



情况下，为了保证人民的生活必需，缩小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不平等，党对消费品的分配采取了多种形式的供应办法。这些措施保证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并逐渐改善。商业工作做好了，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商业工作者要把执行党的政策和规定，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不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纠正不正之风。

商业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激烈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垃圾，还散发着臭气。“近水楼台先得月”、“干一行，吃一行”的旧思想常常影响着我们的职工。有些人总认为搞商业的，利用方便买点东西，算不了什么大问题。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使我们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决心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来办好社会主义商业。我们天天和商品打交道，每个人对某些商品都有一定的支配权。对于这种权力，是用来为广大工农兵服务，还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私利，这是为谁服务的原则问题。权力是党和群众交给我们的，我们只能用它来千方百计地为人民服务。如果不讲原则，不按政策办事，把一些受群众欢迎而又短缺的商品，不投放市场，内部分掉或送人情，就会使真正急需的人买不到，而使另外一些人多买多占，造成人为的市场紧张，破坏计划供应。这样，必然会给广大群众在生活上带来很大不便，影响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种腐朽的旧观念也影响我们执行政策、做好计划供应工作。这种论调无非是说，与人方便，是为了自己方便。按照这种逻辑，在商品供应上就会造成谁对我们有利，就把商品卖给谁。否则，就不卖或少卖，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生意经”。如果用这种思想搞协作，就会使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破坏社会主义的互相帮助、团结协作关系。搞社会主义协作，必须从全局利益出发，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如果离开党的原则，违背党的政策，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协作。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我们经营的商品，是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需要，决不能违背群众的利益，谋小集团的私利，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我们商场在运输、技术革新等方面，都需要得到一些兄弟单位的帮助，为了建立和维持这种协作关系，有的人认为有求于人，就得给人家一点方便。因此，对这些单位不按计划供应，超量跨点，实行特殊“照顾”，都曾经发生过。这不仅违反了党的政策，也造成了很坏的



影响。这种不正之风如不纠正,就会影响我们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

对于纠正这些不正之风,有些人视为“老大难”,认为运动来了刹一刹,运动过后照样来;也有人担心对协作单位一点不照顾,以后办事就难了。其实,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原则,认真做好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那些旧的习惯势力和旧的思想作风,总是可以逐步打掉的。为了做好这些工作,我们将公开信用广播、黑板报、座谈会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发动群众互相帮助和监督。同时,我们还召开了有关机关和工厂的座谈会,检查了我们工作中的问题,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研究了今后改进供应工作的措施。我们的这些做法,得到广大群众和协作单位的热情支持。一些与我们有协作关系的采购员向我们表示:“坚决支持公开信,今后有困难尽力协助。”个别找上门来要求照顾的,经过说服也转变了态度。事实告诉我们,坚持党的政策,抵制资产阶级不正之风,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共同要求。只要我们商业工作者本身,特别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就能在批判资产阶级不正之风的斗争中作出成效。

执行好党的政策,做好商品合理分配和供应工作,还必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党和政府为了尽可能合理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对商品采取了多种多样的供应办法。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复杂多样的,不可能对所有的具体问题都作出统一的规定。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要,还需要我们根据不同情况,在计划供应的基础上,具体安排,妥善解决。我们克服“坐店经商,坐等候客”的旧经营作风,深入广大居民和机关、工厂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召开座谈会的办法,向群众和有关单位宣传党的政策,讲明货源、货量情况和供应办法,征求他们的意见。对某些商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作些适当调整。例如,有的单位只愿用碱,不愿用苏打,有的单位则相反,我们就帮助他们相互调剂,满足了双方的需要。对于广大居民户,我们将群众比较喜欢而又不够充足的商品,采取定期送货上门,既方便群众,又满足了普遍的需要。通过家访,对一些有特殊需要的用户,也尽可能地帮助解决。有一位老大娘因病需要无盐酱油,售货员知道后就专门从酱油厂买来送到她家里。老大娘感动得流着热泪说:“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菜市场的同志,你们真把商业工作做到家了。”

自公开信发出以来,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仅仅是个开始。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认真做好商品合理分配和供应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红旗

一九七五年第八期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五年第八期 目 录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搞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

——纪念《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二十周年……………齐 彦（3）

学一点政治经济学……………吴 畅（9）

评林彪的卖国哲学……………梁 效（12）

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青 岩（18）

总结学习经验 推动学习深入

理论联系实际 推动学习深入……………池 恒（22）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北京平谷县许家务大队党支部（25）

运用理论调查研究农村现状

……………中国共产党周口地委第一书记 江振华（29）

分工虽不同 都是主人翁…上海第五钢铁厂第一车间理论小组（33）



正确处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昆仑机械厂委员会 (35)

为建设农村贡献我们的力量

.....湖南新邵县复员军人 刘克清 李解忠 李典庆
李维友 李国坚 肖坤书 (38)

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前进

.....柯 史 (41)

密切官兵关系的有效措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会 (49)

自觉地经常地向人民群众学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洛阳”舰党支部 (52)

发扬革命精神 做好革命工作

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靳志柏 (56)

破除外因论 自觉拒腐蚀.....江景宏 (59)

领导要敢于负责.....袁 青 (62)

科 学 史 研 究

实践是农业科学发展的源泉.....金 枫 (65)

杂文：苏修鼓吹“三不”主义的目的何在？

.....秦景池 (76)

☆八月一日出版☆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主席语录

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搞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

——纪念《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二十周年

齐 彦

毛主席在二十年前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是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篇重要文献，它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系统地解决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今天，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重新学习这一伟大著作，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报告中所阐明的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光辉思想，对于我们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把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是非常重要的。

二十年前，我国广大农村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是继土地改革之后，广大农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进行的又一次极为深刻的革命。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要求彻底摆脱私有制的束缚，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迫切愿望。毛主席高度赞扬和支持了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对于农民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并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积极热情地领导合作化运动，“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



民共同富裕起来”。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指引下，广大农村迅速出现了大海怒涛般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在全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对这场生产关系的伟大变革，一切阶级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极端仇恨和恐惧。开始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刘少奇就极力鼓吹“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发展富农经济，并且把贫下中农积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革命实践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接着，一九五五年，当着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时，他又抛出了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叫嚣要赶快“下马”，大批解散已经组织起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即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深刻指出的：“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主席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农村，这两个阶级的斗争，是围绕着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展开的。土地改革以后，面对着农村中存在的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这种基本情况，是领导农民继续前进，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听任资本主义发展，走向两极分化，使农民重新坠入困苦的境地，这是关系到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以及我们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无产阶级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刘少奇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妄图把广大农民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在农村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农民表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积极性，战胜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取得了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广大农村又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国



民经济的发展。它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亿万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但是，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否就此结束了呢？当然不是。从农业合作化到现在，毛主席总是谆谆教导我们，不要因为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而忘记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忘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主席还指出：“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事实证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复辟，他们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破坏活动。在农村，也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条件和土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就代表了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愿望。因此，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了，但农村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这个斗争，又是围绕着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是削弱和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问题进行的。

在集体经济内部，无论是生产方针、经营管理还是收益分配上，都有一个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比如，在经营路线上，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还是重副轻农，弃农经商；在作物种植上，是服从国家计划的指导，还是搞自由种植；在产品销售上，是执行国家规定的政策，还是热衷于搞自由贸易；在收益分配上，是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还是片面强调个人利益，不留积累，搞分光吃净，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社、队都能够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有的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单纯追求经济收入，作物自由种植，扩大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有的不按国家规定销售农副产品，甚至违反政策，通过自由贸易的渠道去卖高价；有的搞高工分、高补贴，扩大报酬差别。这些做法不仅腐蚀干部社员的思想，而且也往往为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开方便之门。上述情况说明，集体经济内部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势力往往会从内部来干扰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不



能认为个体经济已经变成集体经济，小生产已经变成集体生产，就一定可以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了；相反，在集体经济内部还经常存在着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同时也不能认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正在逐步发展壮大，就可以放松警惕。搞得不好，偏离党的路线和政策，集体经济仍然会蜕化变质。

集体经济内部这些方面的斗争，是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分不开的。在农村，虽然已经建立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但是，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存在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的农副产品仍属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行路线不正确，政策不对头，不认真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发展资本主义倾向，甚至有倒退复辟的可能。有的社、队由于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在分配方面，不是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而是实行“物质刺激”、“工分挂帅”；在交换方面，不是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的规定和指导，而是单纯追求收入的多少；在所有制方面，不是首先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而是任意扩大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集体经济的削弱。有的人就可能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通过合法的及大量非法的途径，捞取货币，并把货币转化为资本，投机倒把，放债剥削，发展下去，就会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当然，如果离开今天农村的具体情况，想立即取消自留地，取消全部资产阶级法权，那也是办不到的、错误的。因此，对资产阶级法权是恰当地限制还是不断地扩大，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指导，对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且要认真调查研究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生产关系诸方面的发展变化，不断地从总结经验中，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人民公社各级领导班子内部反映出来，实质上是执行什么路线，领导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的问题。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就能认



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引导农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就得到巩固和发展。如果领导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端正，就会把农民引向邪路，就要破坏集体经济。农村中某些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地方，往往是同那里的领导班子缺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没有认真抓好两条道路的斗争分不开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一小撮阶级敌人对集体经济的进攻，不断变换手法，有的是利用某些基层干部欣赏资产阶级法权的弱点，进行腐蚀拉拢；有的则是通过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篡夺领导权，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复辟资本主义。如果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或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把持了领导权，那就要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大搞资本主义活动，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有名无实，蜕变为“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

因此，我们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要抓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抓好对社、队干部的教育。应当肯定，我们的社、队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部分同志身上，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小生产的某些心理和习惯。如不警惕，是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腐蚀侵袭，沾染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对这些同志，主要是通过组织他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总结实践经验，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从路线上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社、队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就能更好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保证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引用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进一步指明了，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改造小生产者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个体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时候，对农民还必须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广大贫下中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对头，他们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集体经济，在党的教育下，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是工人阶



级可靠的同盟军。但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小生产的某些固有特点，还会受到资本主义的侵蚀。至于一部分富裕农民，在党的教育下，虽然也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但他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总想利用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进行投机活动。这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在农民身上的反映。各级党组织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教育农民，不断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逐步清除小生产者的思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进行这种工作时，我们既要看到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又要看到农村中社会主义的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既要充分认识改造小农经济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又要充分相信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对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一定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持正面教育，在斗争中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引导他们自觉地同小生产的习惯和影响彻底决裂。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一系列如何正确对待农民中各个阶层的无产阶级政策，我们今天仍然必须坚持。只要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农村的各项工作就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发生了偏向，也较易发觉和纠正。

二十年前，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无比正确。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进行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使贫穷落后的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广大农村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基本完成到彻底完成，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任务还很艰巨，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还不高，这些都需要我们继续进行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我们要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搞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学一点政治经济学

吴 畅

为了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群众，正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紧密结合实际，学一点政治经济学。这个学习很有意义。不少地方还同专题调查相结合，学得生动活泼。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不仅政治思想方面还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条件，而且在经济方面仍然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这主要是指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等。对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都是属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问题，要弄清这些问题，不能不学一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把这些问题弄懂了，就可以更好地领会和掌握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更深入地理解“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都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运动规律中得出来的科学结论。列宁说：“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从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新事物中总会有旧的残余。因此，我国现在还必须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

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跨过了几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虽



然在不同的所有制下它们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但是，商品、货币的基本属性和特点总是差不多的。例如，商品具有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小生产会发生分化，不断产生出资本主义，等等。按劳分配的情况不同一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行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但是，由于它“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从这一点看，也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就需要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有些同志说，我们整天跟商品打交道却不懂商品制度，整天跟钞票打交道却不懂货币交换，整天跟工资打交道却不懂按劳分配，看不清这些东西正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根源，真是太危险了。这是很深刻的体会。

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规律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跟旧社会相比，“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当我们研究我国现有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的时候，仅仅认识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是不够的，还必须懂得社会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特殊规律，看到它们所反映的是跟旧社会不同的生产关系。就是说，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要以这些原理为武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它的规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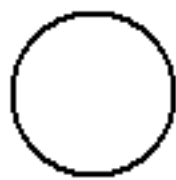
除了认真学习马、列的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述以外，我们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毛主席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国际和国内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作了系统的阐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所作的全面分析，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提出的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的重要论断，不仅对修正主义理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改变了我们头脑中长期存在的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片面的、



形而上学的观念，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我们认真学习和弄懂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理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对某些资产阶级法权既要承认它的不可避免性，又需要加以限制。从而也就可以深入理解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分配和交换领域的具体表现，以及它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的具体规律性。并且“确切地研究这种现象的范围，找出国家对它进行监督 and 控制的适当（不是压制，确切些说，不是禁止）方法”，即应当从哪些方面和哪些环节去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多年以来，毛主席关于学习政治经济学、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作过许多重要论述，我们也应当结合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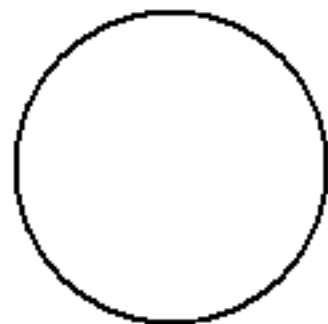
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修正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披了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必须有鲜明的目的，必须有的放矢。在当前，主要是为了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是为了同修正主义作战。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中，总是从理论上歪曲马克思主义。苏修叛徒集团也千方百计地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学一点政治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从思想上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有利于识破修正主义的反革命实质，并同它作坚决的斗争，夺取胜利。从一些单位的学习经验来看，凡是紧密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紧密结合实际，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学习的效果都比较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正从课堂上和书斋里解放出来，日益变为广大工农兵手里的尖锐武器。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不仅愿意学，而且学得很好。他们说：“政治经济学讲的是我们切身的事情，过去说不好学，现在一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结合实际来学习，就比较容易懂了。”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上弄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就一定会转化为反修防修、加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评林彪的卖国哲学

梁 效



我们中华民族热爱独立自由，富有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光荣传统。千百年来，爱国主义同卖国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祖国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始终没有停止过。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却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政权性质的根本变化，这种斗争同社会主义时期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紧密相联，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建国以来，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对内搞复辟、对外搞卖国的。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面教员。这个地地道道的孔孟之徒把孟轲的“小国师大国”的谬论，奉为投降卖国的理论根据。

是不耻受命，还是起来革命

“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孟子·离娄上》）小国、弱国事奉和服从大国、强国，应该象弟子听命于先师那样，俯首帖耳，不以为耻。这完全是投降有理的反动谬论。事隔两千多年，林彪又老调重弹，把孟轲这一句话收在他们拼凑的“四书集句”中，张贴在办公室里作为座右铭，赞赏备至。

林彪心目中的“大国”就是美苏两霸，首先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他把超级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说成是“先师”和“弟子”的关系，极力掩盖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本质，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卖国贼嘴脸。

列宁指出：应该“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多少回山河破碎，多少次丧权辱国，多少



户家破人亡！我国人民从近百年的切身历史经验中，深刻认识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大国对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师”，而是把他们推入火海深渊的罪魁祸首，是他们最凶恶的敌人！

今天，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美苏两霸都极力用不同方式想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置于他们各自的控制之下。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就装出一副“良师益友”的面孔，到处招摇撞骗，推行其霸权主义政策。什么“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呀，什么“军事、经济援助”呀，又是派人，又是借钱，“经验”、“理论”一应俱全。可是，谁要请它来为“师”，那就是引熊外婆进门，灾祸临头，苦不堪言。请它当“老师”么？它就要当老子，骑在你脖子上作威作福。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径，激起了第三世界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林彪鼓吹“小国师大国”，反对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妄图把我国变为苏修的殖民地，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无耻叛卖！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帝国主义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却的地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野心勃勃，明争暗夺，乘机进行扩张。具有丰富反帝斗争经验的各国人民一定会识破超级大国的阴谋诡计，警惕和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使他们的侵略扩张政策不能得逞。

对于侵略成性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不耻受命还是起来革命，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我们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一样，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命”，剥削之“命”，是从来不受的！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继承和发扬了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民族解放斗争，赶跑了帝国主义，迎来了解放胜利的春天。解放初，当美帝把侵略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我们和英雄的朝鲜人民一起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六十年代初，苏修叛徒集团发动突然袭击，反华反共，撤专家，毁合同，搞颠覆，施加种种压力，妄图逼我“就范”。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加紧反华。“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我们狠狠顶了那个俄国教师爷，坚决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打退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挑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仅掌握了原子武器，还把高奏《东方红》乐曲的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万里长空，大



灭了核霸王的威风，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这就是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大国强加之“命”的最好回答！

林彪居然厚颜无耻地指责中国人民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是“耻受命”，而却把他自己投降卖国当成是最大的光荣。按照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苏修这样的超级大国只能“师”，不能“顶”，只能“受命”，不能“抗命”，如若不然，就是违背了“小国师大国”的孔孟之道。这完全是投降派的逻辑、卖国贼的哲学！

驳“卖国安宁”论

“能以小事大国乃宽”，这是林彪亲笔写下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小国只要事奉大国，弱国只要屈从强国，就可以得到安宁。

好一个“卖国安宁”论！

这个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存在的世界能够安宁吗？不能。列宁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帝国主义总是要对外进行侵略的，总是要剥削和奴役愈来愈多的国家的，哪里能让他们“安宁”？今天，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狭路相逢，在全世界展开激烈的争夺。他们争夺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动乱。他们有时也进行一些暂时的勾结和妥协，但这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他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战争。美苏争霸是今天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当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日益深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它对外乞讨，对内赖债，处于无法解脱的困境。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帝国主义总是要力求转嫁危机，从战争中寻找出路的，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正在走希特勒的老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则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现在，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是帝国主义互相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

以小事大、以弱事强是根本得不到安宁的。中国历史上那些投降派称臣纳贡、奉献子女玉帛，何尝得到过什么安宁！近代史上，从李鸿章、袁世凯到蒋介石



石，一个个崇洋媚外的卖国能手，在丧权辱国的“卖身契”上签字画押，割地赔款，可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一再蹂躏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哪里有什么安宁！

再看看苏修的那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吧，那便是对这种安宁论的绝妙写照。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等种种枷锁，把它的所谓“兄弟国家”禁锢在“大家庭”的铁丝网里，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以老子党和宗主国自居，在别人的国土上派驻重兵，侵犯主权，干涉内政，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这就是它带来的“安宁”！它实行高度垄断，推行所谓“国际分工”，把一些国家变成它的畜牧场和果菜园，把另一些国家变成它的加工工厂和原料基地，肆意掠夺“大家庭”各国人民，这就是它带来的“安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它可以为所欲为，而别人稍不如它的意，那就祸从天降，它不惜动用重兵，镇压爱国人民的抵抗，整个国家就被占领。无数事实证明，以小事大，以弱事强，得到的不是什么安宁，而是民族的屈辱、国家的沦亡、人民的苦难。

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只能靠各国人民的斗争，而不能靠向帝国主义乞求。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超级大国，而是属于人民。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辉煌胜利，为小国、弱国人民打败帝国主义大国的侵略，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只有从地球上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世界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幸福和解放。

拿“原子”是假，卖国是真

“原子拿到再硬”。没有原子弹就只能事奉核霸王，这是林彪“小国师大国”投降卖国路线的又一个根据。

在超级大国对我实行核垄断、核讹诈的情况下，是打破核垄断，还是屈服于核压力，充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两条路线的对立。早在一九六三年，林彪一伙就匍匐在苏修这个核霸王膝下，恶毒攻击我党的反修斗争是“羽未丰想飞”，假惺惺地说什么“原子拿到再硬”。似乎没有核武器，就应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根



本原则，跟着苏修的指挥棒转；就应该出卖国家主权，屈从核霸王的奴役和控制。这是建立在唯武器论基础上的卖国理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在帝国主义手中，只不过是吓人的纸老虎。我们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没有核武器，决不屈服于超级大国；我们有了核武器，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其实，“原子拿到再硬”，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请看，当我们不仅有了原子弹，而且有了氢弹，林彪又怎么样呢？一九七一年，在那个《“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他恬不知耻地乞求苏修的“核保护伞”，供认不讳地要把苏修作为他们一伙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靠山。可见，林彪这伙卖国贼想的根本不是什么拿“原子”，而是如何搞复辟、找后台、卖国求荣。林彪的阴谋一旦得逞，我国就会沦为苏修的殖民地。那时的林家王朝在社会帝国主义脚下，只能是一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半分钟也离不开主子的输血打气，又哪里能“飞”得起来、“硬”得起来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连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拥有独立经济都不允许，根本不会让他们独立掌握原子武器。即使象当年李鸿章依靠帝国主义办“洋务”、造“洋枪”那样，依靠社会帝国主义的残羹剩饭，爆炸一个洋里洋气的核装置，也是照旧离不开洋大人的核保护伞的。

林彪的“小国师大国”、“以小事大国乃宽”、“原子拿到再硬”等民族投降主义谬论，都贯串了一条黑线：畏敌如虎，害怕帝国主义。这同他在国内阶级斗争中，从散布“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论调，到东北战场上对抗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害怕与敌人决战的阶级投降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林彪的卖国主义，集中表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特征。正象毛主席当年批判蒋介石一群卖国贼一样，“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

叛国投敌，引狼入室，这是历代反动派的故伎，也是儒家卖国路线的重要内容。历史上那些反动的政治势力，推行儒家路线，搞复辟倒退，他们尽管拥有权力和财富，但是却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他们在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垂死挣扎，他们在垂死挣扎的时候往往要借助侵略势力。但是，他们表演得越充分，就越是迅速、彻底地遭到人民唾弃。林彪也没有违背这个规律。



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批修整风运动不断深入，林彪一伙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迅速败露。他们预感到末日来临，在叛逃前，林彪口授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重耳在外则安，申生在内而危”。晋文公重耳是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人物，林彪这个反革命小丑自比重耳，当然是可笑的。但是，这却充分暴露了他贼心不死，梦想卷土重来的反革命凶相。他妄图投奔苏修，依靠社会帝国主义的刺刀和坦克，把中国人民淹没在血泊之中，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折戟沉沙，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批判卖国主义，埋葬洋奴哲学

林彪“小国师大国”的理论破产了，苏修颠覆我国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但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远没有结束。批判刘少奇、林彪投降卖国、崇洋媚外的修正主义路线，扫除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垃圾，清除修正主义流毒的斗争，必须长期进行下去。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绝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屈辱。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仅能够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而且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各国人民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援。我们贯彻“洋为中用”的方针，主动地有分析地吸收对我国有益的东西，但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我们引进一些外国的比较先进的技术，是为了借鉴，为了更快地赶上，绝不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如果崇洋迷外，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一切依赖别人，就会丧失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近百年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决不应该忘记。

环顾当今世界，美苏两霸危机四伏、困难重重，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在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进一步清算林彪的卖国哲学，不仅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而且必将大大振奋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更好地履行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

青 岩

在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的指引下，广大群众和干部正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积极促进安定团结，开展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并以这种斗争为动力，抓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种革命形势，要求我们的党进一步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更好地带领广大群众和干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是领导一切的。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加强党的团结，对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五十四年的历史证明：只有不断加强党的团结，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曾经说过：“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里既讲了党的团结和群众团结的关系问题，也讲了党的团结和群众团结对于完成革命任务的重要性。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仍然感到很亲切。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的事业。要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必须依靠广大群众齐心协力地去战斗。“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怎样才能使群众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奋斗呢？首要的问题在于加强党的团结。要靠高度集中的统一的党去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广大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党的状况如何，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



各地实现安定团结的经验证明，只要党内真正团结起来了，就会促进群众的团结。党内在团结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群众中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我们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利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任务。

社会主义时期是由资本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时期。现在我们党领导群众所进行的一切工作，不论是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还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转变。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斗争是很激烈、很复杂的。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阻止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总是要通过拉拢、腐蚀等各种办法，分裂我们的党，在我们党内寻找和培植他们的代理人。他们还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的进攻。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旧的习惯势力，也在经常地浸染着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必须加强党的团结，“**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即带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只要党的团结加强了，就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克服资本主义倾向，有力地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如果党的团结涣散，就会给阶级敌人分裂我们的党造成可乘之机，势必削弱党的战斗力。

为了不断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必须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论联合政府》）这是当前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党组织应该把这项工作切实地抓起来。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统一的纪律必须坚决执行，以保证上下一致，全党一致。每个党员，每个党的干部，都要做团结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都应该谦虚谨慎，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主动做好团结的工作。特别是各级党委成员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谅解，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使“一班人”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应该看到，党委“一班人”的团结，是加强党的团结的关键。“**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各级党委要着重



自己的领导责任，讲路线，识大体，顾大局，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把一切无原则的纠纷，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清除干净，积极搞好团结，使“一班人”步调一致地为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奋斗。

要加强党的团结，必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的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但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党内并不是没有矛盾了。毛主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我们的党就是在解决矛盾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长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从而形成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尽管各级党组织内部存在着矛盾情形不同，但说到底无非是执行什么路线、坚持什么方向的问题，是不能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和按革命原则办事的问题。一部分党员中发生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包括资产阶级派性，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是影响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因素。我们对这些东西决不能姑息放纵，一定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要通过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有人怕影响党内团结，怕影响“一班人”的关系，怕影响上下级和同志之间的关系，对某些党员、干部发生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去抵制，不去斗争，不敢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是极其错误的。许多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但不会损害党的团结，而且会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党的团结。相反，如果听任错误思想和不正派作风自由泛滥，就会使党的组织涣散，纪律松懈，某些党员在生活上腐化起来，在政治上堕落下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顺利贯彻，那是不可能达到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毛主席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反对自由主义》）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当然，解决党内矛盾要有正确的方法。应该看到，党内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说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缺点和错误的人，就是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那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多数也能够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在党组



织的批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改正错误。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办事。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路线觉悟，认清错误的危害和根源，积极改正。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整顿党的作风》）

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这是加强党的团结的思想政治基础。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我们的纲领》）有了思想理论上的一致，才会有组织上的团结统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学习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如何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这样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共同的目标，真正能够达到思想上和行动上一致。如果理论上糊涂，对于实践中的问题说不清楚，看不透彻，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什么是共产主义原则，甚至在工作中把对的当成错的，把错的当成对的，这样，在党组织中，在党委“一班人”中，必然要产生分歧，**搞不好团结**。只要产生修正主义，就会出现分裂主义，这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条规律。要加强党的团结，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深入开展对于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肃清其余毒。这是长期的任务，必须坚持下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这就明确地给我们指出，加强党的团结，目的是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中，是不是充分发挥了党的战斗作用，这是考察党组织是不是真正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各级党的组织、全体党员和干部，要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共同的目标，团结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



总结学习经验 推动学习深入

理论联系实际 推动学习深入

池 恒

下面几篇文章，是各条战线上的同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体会。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如何运用革命理论，观察和分析实际问题，总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具体经验，也反映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在进一步深入。

我们的学习能不能不断深入，决定于我们是不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思想原则。凡是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认真看书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努力将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去，就能使学习逐步深入。相反，如果不认真看书学习，或者把理论学习停留在书本上，只是进行抽象的、一般的议论，就会觉得学习深入不下去。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运动，掌握它的发展规律，从而指导我们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反修防修斗争，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我们要充分认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重大意义，看到全国人民在“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过程中产生的巨大的社



会主义积极性，克服那种认为已经学得“差不多”的思想，树立长期努力学习的思想。从这几篇体会文章可以看出，认真按照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指示去做，用理论指导实际斗争，又在实际斗争中学习理论，就会使人们的精神面貌产生多么大的变化，革命工作得到多么有力的推动啊！

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可以使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正如列宁所说的：“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新事物中总是带有旧的残余。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正是在社会内部新东西和旧东西之间的斗争中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长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是要具体地、实际地去认识、揭露和分析这种社会的内在矛盾，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采取正确的措施，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的东西战胜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动社会前进。毛主席正是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的指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辩证发展的规律，为我们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法权作了原则规定。有的体会文章讲了他们是怎样看待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说明为什么既要承认它，又要限制它，那种企图一下子就全部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或者对它不加任何限制、任其扩大的想法，都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有的体会文章探讨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恰当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同执行党在现阶段的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包括同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的一致性。这样的学习，就比以前更深入了。我们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要对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有关无产阶级对



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包括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具体分析，以此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开展以来，广大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提高；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倾向、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更加自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促进安定团结，更加主动。在这方面有着大量的动人的事迹。我们要总结经验，要善于用干部、群众自己的切身体会引导学习不断深入。象几篇体会文章所反映的那样：我们的干部，掌权不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我们的工人同志提出“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的响亮口号，推动生产迅速发展；一大批复员军人到农村，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而贡献力量，等等，这都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带来的丰硕成果。最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团结战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成果。所有这一切，再一次证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对于能不能有效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土壤，有着重大的作用。革命的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毛主席在讲到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特别强调指出：“要使全国知道。”这就是说，全国人民如果都提高了认识，积极地参加反修防修的斗争，自觉地抵制资本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有了可靠的保证。因此，继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仍然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需要进一步抓紧抓好。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北京平谷县许家务大队党支部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党支部和全大队贫下中农一道，运用革命理论，对我们大队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体会到，要使集体经济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最根本的就是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积极的态度和辩证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

我们有的同志曾认为，生产水平低，集体家底薄，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限制不了；生产发展了，集体家底厚了，它就自然受到限制。我们大队十几年来来的经验说明，能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不在于生产水平高低，也不在于集体家底厚薄，而在于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们大队年年有几十名强壮劳力外出烧窑看火，抓现钱；一部分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较严重的人，也争着外出搞副业。结果是“抓了钱，荒了田，散了心，离了线”，生产搞不好，粮食亩产平均三百来斤。集体越来越穷，少数人却越来越富，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一九六八年，成立了新的党支部。论条件，还是那个薄家底。但不同的是，党支部带领广大社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纠正了以副伤农的错误倾向，集中人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路线端正了，资产阶级法权得到了限制，革命和生产出现了新局面。一九六九年粮食亩产过“长江”，一九七一年超千斤，去年又达一千二百六十斤；农、林、牧、副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公共积累和集体储备粮也有了大幅度增加。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经



验，使我们很受启发。不是“生产水平低，集体家底薄”就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相反，正是由于对资产阶级法权不进行限制，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使集体生产不发展，集体家底越来越薄。而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雄厚的物质基础，恰恰是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批判、克服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怎样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结合农村的情况来看，就是要认真执行党关于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我们党关于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反映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是适合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的，体现了对资产阶级法权既承认、又限制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如，对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党的政策是：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对家庭副业的产品，除一、二类物资外，其他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但又规定尽量使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或国营经济联系起来，并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这些政策规定，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一致的。不认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一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想马上取消它；或者一讲不可避免，又不对它加以“限制”，这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

总结我们大队的经验，是不是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关系很大。我们安排农业生产，一般都是在上级党委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的。但在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下，价值规律还在起作用，货币也在起作用，如不加以限制，就会滋长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坚持计划种植，反对自由种植；坚持把产品交售给国家，反对自由出售和变相私分。如我们大队曾有人主张减少粮食用地，扩大菜地，把菜拿去卖高价，或者分给社员，让社员跑自由市场。我们党支部反对了这种意见，坚决把党的政策“关”，限制了利用价值规律搞自由种植的资本主义倾向。当然，抓住了粮食这个纲，也不能忽视全面发展。前几年，我们粮食增长的幅度较快，但对全面发展注意不够，例如养猪事业就发展较慢，结果，一些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富裕户，就钻了



这个空子。他们专养母猪，下了小猪卖高价，光这一项就超过了他们从集体得到的收入。而有些社员却因为小猪贵，买不起，养不了。后来，我们加强了集体养猪场的工作，保证了对社员的仔猪供应，并对仔猪价格作了一些规定，限制了“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倾向，而且使全大队养猪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猪多了，肥料也多了，这就为粮食进一步增产创造了条件。这件事情深刻地告诉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要削弱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而是要更好地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几年来，由于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限制，不仅粮食上去了，而且其他方面也有很大发展。

在农村，还要很好注意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正确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过去曾有一段时间，我们片面地强调了劳动力的强弱、男女区别，因而，工分等级烦琐，级差很大，引起一些人争工分、争待遇，造成社员的实际收入差别很大。在学大寨运动中，我们改进了工分制度，劳力虽分等，但等级不多、级差不大，坚持男女同工同酬，对年老体弱和学生的工分作些适当照顾，对技术性较强的工种，虽有照顾，但不搞高工分、高补助、高提成。我们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启发社员自觉地劳动上。这样做，缩小了社员之间收入上的差别，使得劳力少而人口多的户尽可能逐年增加收入，这几年，全大队没有一户超支的。这有利于提高社员为革命种田的觉悟，树立大家共同富裕的思想。在分配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年扩大公共积累。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我们不能顾私不顾公，有钱都分掉，形成三级所有两级空。过去，我们有的生产队，尽想给社员多分钱。有的社员手里钱多了，就惦着盖房子；有些劳力少没有钱的户也要盖房子，就东找西借拉亏空，造成生活困难。个人盖房还要跟集体争劳力，争农时，争土地。这几年，我们增加了公共积累的成份，准备分期分批由集体盖社员住房。这样做，对干部和群众教育很大，大家都感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搞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解放二十多年来，农民虽然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但其固有的、小生产者的某些特点还有所表现。尤其是一些富裕农民，在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强烈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必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向广大社员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近年来，我们建立了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办起了农民政治夜校，组织社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引导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我们还建立了“评论会”制度，发动群众宣传好人好事，结合实际批判种种私有观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干部必须带头。如有的干部借口工作多、担子重，要求给点特殊照顾，有的干部不能以平等态度待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较少，等等，这些都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表现，都必须坚决反对。要不，就会脱离群众，破坏干群关系。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工作。首先是要干部不搞特殊化、不吃请、不受贿。严格要求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不能假公济私，借职权方便侵占社员的正当利益。第二是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反对做官当老爷。我们大队的干部不管多忙，都要挤时间参加劳动。党支部尽可能不占用生产时间开会，为干部参加劳动创造条件。第三是发动群众参加管理，经常开门整风，对干部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评和帮助。干部也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认识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直到最后消灭它，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需要我们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还只是初步的。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将会更尖锐、更复杂。我们党支部决心带领全大队社员群众，继续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联系实际，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奋斗。



运用理论调查研究农村现状

中国共产党周口地委第一书记 江振华

毛主席一贯提倡“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我们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组织地、县两级的主要领导同志带领几百名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指针，开展了对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现状的调查研究。

我们看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国农村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但是，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很激烈、很复杂的。对于老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捣乱和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但对农村阶级斗争的认识，仅仅看到这个方面还不够。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这是当前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虽然是做农村工作的，长年在农村跑，经常同农民打交道，而对小生产经常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却不清楚，因此，见到了一些现象也不能深刻地加以认识。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又到农村一调查，在这方面的感受深刻得多了。大量的事实表明，实现合作化以后，广大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不断提高。但是，在现阶段的农村中，私有制经济的残余还存在，农民还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某些固有的特点，特别是富裕农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是很严重的，的的确确，每日每时都在那里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



阶级。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做农村工作的同志，如果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它搞清楚，就抓不住农村工作的要领，就不能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经常不断地狠抓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里形成了浓厚的私有观念，尤其是富裕农民，他们过去礼拜赵公元帅最勤，向往个人发财致富。集体化了，但赵公元帅的灵魂不可能一下子在他们的头脑中消失。而这正是导致他们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的内在原因。因此，毛主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对广大农民的教育和改造。针对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觉地和大量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

通过调查，我们还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富裕农民把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变成现实，主要是靠扩大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来实现的。比如，有的违反政策规定，任意扩大自留地，搞副业单干；有的利用按劳分配中的不平等，追求高工分；更严重的是利用商品交换，集市贸易，弃农经商，搞投机倒把活动。他们中间的少数人不仅利用某些地方暂时物资供求不平衡和地区差价，倒卖农副产品，套购国家计划物资，高价出售，牟取暴利，而且有的还组织地下包工队，进行变相的雇工剥削。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就是这样产生的。

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在农村中的任何地方和社队都是可能的。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有的地方和社队能够泛滥起来，而在另一些地方和社队却受到批判和抵制，这决定于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毛主席说：“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毛主席这一指示也符合农村的情况。我们在调查中看到，农村的一些后进单位，资本主义所以能够泛滥，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以能够产生，就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



手里，资本主义活动没有受到打击；同时，如果领导班子不坚强，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得力，也会给资本主义以活动的机会。而在一些先进单位，资本主义所以得不到发展，这并不是因为那里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而是因为那里党的领导坚强有力，能够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经常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打击资本主义活动，使一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无机可乘。事实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单位走什么道路，性质变不变，关键在领导，根本在路线。这就提醒我们要十分重视解决农村基层单位的领导权问题。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我们还体会到，在农村搞调查研究的时候，要学会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切忌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否则，就不能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处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执行党的现行政策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志看不到两者的统一性，在思想上行动上时而发生摇摆。如果看不到资产阶级法权是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看不到必须对它加以限制的一面，而只看到还允许它存在的一面，就会导致它的扩大化，从而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反之，如果只看到必须对它加以限制的一面，而看不到还允许它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一面，想一下子把它全部取消，也不符合党的现行政策。对于农村的基层领导班子也要作全面分析，首先要看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教育，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极少数人的确可能或者已经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少数后进的社队来说，领导班子状况也不相同，即使是问题严重的单位，真正的坏人也是极少数。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就不能正确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解决农村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实际问题，达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改造小生产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宁指出：“对于这种人不能



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时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回顾我们长期在农村工作的经验，深刻体会到列宁的教导完全正确。改造小生产者，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需要经过很长的时期，操之过急不行。对于广大农民，我们只能坚持正面教育，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他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从政策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削弱滋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则必须予以坚决打击。我们一定要相信，只要经常不断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就能够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能够引导他们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几个月来，我们地委的领导同志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调查研究农村阶级斗争的现状，使我们对小生产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个重要问题的认识，搞得比以往清楚。对于自己原来那些似懂非懂的问题，也能说出一点道理来了；对于怎样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也开始有些体会了。这就启示我们，许多问题，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等等，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它搞清楚。当我们坐在机关里，根据一知半解，凭“想当然”，就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打不出什么好主意，就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引向深入。当我们转变作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大搞调查研究，就使我们学习的面貌为之一新。“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为了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努力改造世界观，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逐步做到认识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力求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不断把学习运动引向深入。



分工虽不同 都是主人翁

上海第五钢铁厂第一车间理论小组

不久以前，在我们车间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个炼钢小组安排一位四炼钢手去当六炼钢手，这位同志认为，六炼钢手干的是“下手”活，四炼钢手干六炼钢的活是“坍台”，不肯干。

当了四炼钢手为什么就不能再干六炼钢的活？为什么觉得当六炼钢手就是“坍台”呢？说起来大有缘故。

我们电炉炼钢，原来就有从一炼钢手到六炼钢手的各种区别。一炼钢是炉长，二炼钢是副炉长，三炼钢顶班，四炼钢管原材料，五炼钢管工具，六炼钢挂料斗、翻渣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明文规定：六级工才能当炉长，三级工才能上炉前。从六炼钢到一炼钢，根据技术考核，论资排辈，逐级提升。一级只能干一级的活，“下手”只能听“上手”的话。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清规戒律冲破了。但是，旧的影响依然存在，有些人还是用旧的等级观念来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分工：“一炼钢高人一等，六炼钢低人三分”、“组长说了算，组员跟着干，翻渣包的靠边站”。这种陈腐的等级观念，对人们不能不产生消极的影响。有些同志当了所谓“低级工”，便认为是“倒霉”、“坍台”，影响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有些同志当了“上手”，份内工作做完了，也不愿帮“下手”干活，怕“不光彩”。在其他行业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什么“七十二行，钳工为王”，“技术工种吃得开，食堂工人没出息”，等等。显然，四炼钢手不愿干六炼钢的活，联系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分析，实际上隐藏着的是由于旧的分工所产生的等级观念在作怪。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助长了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本位主义，影响到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完善，使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在旧社会，分工和等级往往是密切联系着的，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劳动人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解放以后，“所有制变更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对立，与此相联系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等级制度也同时遭到了否定，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社会



主义的相互关系并不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而自然形成。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存在着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等。因此，在“分工”这个问题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痕迹。

对于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凝固化不行，加以扩大更不行。但是，不要分工也不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是必不可少的。就拿我们炼钢来说，一个炉座总要有个头，要有人指挥，有人操作，有人当一炼钢手，有人当二炼钢手，有人管材料，有人管工具，有人翻渣包。没有这种分工，没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社会主义生产就无法进行。在整个社会上，也存在着各种工作岗位的差别，但不管什么工作都是革命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螺丝钉。因此，对由于旧的分工所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进行分析，既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不可避免的一面；既要承认它，又要限制它。在限制的措施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不断破除那种“工种分高低，职业论贵贱”的等级观念。这种等级观念破除得越彻底，人们相互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就越能得到限制。

破除等级观念，要大力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车间的工人说得好：“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在这个口号下，原来不愿再当六炼钢手的同志，认识到“革命工作千万种，种种都是为革命”，现在不仅安心六炼钢工作，而且还关心全组工作。炉长和副炉长，也主动去干六炼钢的活。过去炼钢都是组长说了算，现在实行生产民主，大家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这个小组已经成为一个团结战斗的先进集体。“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的口号，使人们冲破了分工的狭隘眼界。工人们破除了“分工如分家，隔行如隔山”的旧观念，树立“全局就是岗位”、“想全局、急全局、千方百计为全局”的新思想。不仅在一个小组之内，在组与组、班与班，这个工种与那个工种之间，也都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份内工作拼命干，份外工作抢着干。连配电工、行车工、化验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纷纷支援炉前工作，打“团体赛”，炼“风格钢”。过去调换一个炉壳，两个机修工人要操作三、四小时，现在炉前工人和机修工人积极配合，齐心协力打歼灭战，以八分半钟的速度创造了调换炉壳的新纪录，大大缩短了停工时间。由于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破除了等级观念，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完善，干部群众团结战斗，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新的气象。今年上半年，我们车间的钢产量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七，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正确处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昆仑机械厂委员会

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如何在处理人们之间特别是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经常注意研究解决的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自觉性，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有了些初步的体会。

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种阶级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由原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在劳动人民内部建立起了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内部、领导和群众之间就没有什么矛盾了。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看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小生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这些东西必然要反映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反映到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上来。因此，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必须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领导同志尤其要注意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调整好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由所有制决定的，但又反作用于所有制，在一定条件下还起决定作用。就拿我们厂来说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推行的“一长制”、“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专家治厂”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厂内搞得等级森严，干部同群众有许多不一样。广大群众当家做主的思想得不到发扬，影响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修正主义路线和等级观念受到了猛烈批判，领导同群众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领导和群众同学习、同劳动、同商量，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高涨，革命步步深入，生产持续上升。全厂连续五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年平均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三。今年上半年，已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一，比去年同期



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三。可见，搞好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是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直接联系着的，是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直接联系着的，有利于把广大群众团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我们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反复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战争年代，环境那样艰苦，革命队伍内部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是那样团结一致，水乳交融，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今天，有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反而疏远了，这是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被资产阶级法权迷住了眼睛，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贪图享受、要求特殊的思想也就多起来了。那种所谓“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的观点，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表现。有了这种思想，就觉得享受一点、特殊一点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应该计较什么功劳苦劳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职务高了，薪水多了，因而更加谦虚谨慎，更加注意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发扬革命传统，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这才是共产党人、革命干部应有的态度，这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理。近几年来，由于我们比较地注意在这方面教育干部，要求干部不论职位高低，不论功劳大小，不论老干部还是新干部，都要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及各项规定。凡是要求群众遵守的，干部必须带头遵守。几个主要负责干部，除年老病弱的同志外，上班下班都不坐小汽车，和群众一道，脚踏自行车，同走一条路，共叙知心话，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鼓励。

因为我们是领导干部，掌握一定的权力，这就会有人来给予我们一些特殊的照顾。在我们厂就曾发生过这种情况，一次，后勤部门把厂内照顾病号的白面，拿一部分来照顾厂内几个主要领导干部。面对这种事情怎么办？是心安理得，习以为常，还是严格要求，不要这种照顾？我们采取了后一种态度。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只能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不能把职权当成特权，用来为个人谋私利，徇私情，享受特殊照顾。我们应当分析一下，如果这种照顾是出自群众对领导的关心，就要说服群众去关心更多的同志。如果是有人想利用照顾领导来为他个人换取好处，更要坚决抵制，并予以批评教育。即使有些照顾从制度上讲是可以的，也不能把它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那样，就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我们的远大目标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办



到。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当干部的要带头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要多吃点苦，多操点心，多一点自我牺牲精神。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真正体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职工群众出于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经常对我们的领导工作提出一些批评建议。这正是领导和群众的新关系得到发展的生动体现。如何对待革命群众的这种批评建议，也有一个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问题。过去我们有的同志对上级的批评听得惯，对群众的批评听不惯，对表扬的话觉得顺耳，对批评的话感到刺耳，这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高人一等的地位。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群众是工厂的主人，有权对企业的领导实行革命监督。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使社会主义企业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更是同志的关系，群众对我们提出批评，正是对革命、对同志的关心。即使有些意见刺耳，但能帮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有一个时候，由于我们自恃高明，放不下架子，采取了压制群众批评的错误态度，结果一度偏离了正确路线，干群之间产生隔膜，挫伤了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我们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要求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树立群众观点，改进工作作风；对群众提出的不同意见，首先听完，进行分析，正确的接受，不正确的耐心解释；同时，还采取开门整风，坚持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等措施，向群众学习，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有事同群众商量，因而密切了干群关系。群众心情舒畅，有话当面讲。今年春节期间，有的车间采取多发加班费的办法，工人群众就及时提出了批评，帮助干部提高了路线觉悟，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只要我们领导同志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把群众放在自己的心目之中，从政治思想上帮助群众，从生活上关心群众，就能够进一步发展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同志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中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群众中的缺点、错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对职工的生活问题，如住宿问题、吃饭问题、文化生活问题、疾病问题、小孩入托和教育问题，以及家属来厂接待问题等等，一切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要时刻关心，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地妥善办好。由于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因而在全厂范围内正在出现干部关心群众，群众爱护干部，干群一条心，团结向前的生动活泼局面。



为建设农村贡献我们的力量

湖南新邵县复员军人 刘克清 李解忠 李典庆
李维友 李国坚 肖坤书

四个多月前，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我们根据革命的需要，从北京部队某部八连复员，回到了家乡湖南新邵县农村。离开部队之前，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认识到：复员战士回农村去，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很有意义。当时，我们和全连复员战士一道，写了《回到农村 继续革命》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今年第四期上，向党表示了扎根农村，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几个月来，我们满怀革命的豪情壮志，投入了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感到，回到农村干革命，这条路子走对了。

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壮大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缩小三大差别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毛主席、党中央提出了全党办农业的方针，号召各行各业要支援农业，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是我们革命战士应尽的职责。

我们回到家乡，放下背包参加劳动，贫下中农无不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们高兴地说：“你们回来给队里增加了生力军，往大办农业上添了力量。”这使我们很受鼓舞。虽然我们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汇进了农村战天斗地的革命洪流，也就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今年春天，我们家乡雨水过多，给生产带来了许多困难，一些秧田的田坎被冲垮了，大部分早稻秧苗回青缓慢。我们和贫下中农一道，苦干巧干，把冲垮了的田坎砌成石头的；同时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制成了



快速高效的有机化肥，促进早稻秧苗的迅速发育，为搞好生产打下了基础。

毛主席说：“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有的人用旧眼光来看待我们回农村的行动，说什么“太没有出息”。什么叫“有出息”，什么叫“没有出息”？无产阶级认为，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这是最有出息的革命行为；反之，贪图安逸享受，追求名利地位，把个人利益摆在革命利益之上，那是最没有出息的可鄙行为。我们坚决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回到农村干革命，这完全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怎么能说是“没有出息”呢！

把扎根农村干革命看成是“没有出息”，说穿了，就是把革命工作分成高低贵贱，轻视农民，鄙视体力劳动，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一种表现。革命工作有许多战线，不管哪一条战线，都是整个革命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什么高低之分，贵贱之别。当然，在现阶段，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相比较，农村和城市相比较，各方面条件都要差些。正因为这样，才更需要我们为改变农村面貌而努力。我们承认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条件，一步一步地去缩小它，消灭它，而不是强化它，扩大它。如果不是这样去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让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支配自己，重工轻农，向往城市，鄙弃农村，那么，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就不会日益缩小，而只会不断扩大。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只能是重新出现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严重对立，回到工业剥削农业、城市掠夺农村的资本主义老路上去。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我们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这些轻视农村的错误论调进行分析、批判之后，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自觉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前不久，有个工厂想吸收我们中的一个同志进厂当工人，这个同志觉得：做工人阶级的一员是光荣的，在农村干社会主义，同样是光荣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务农和做工，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是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而回到农村来的，我们决心要在农村战斗一辈子，要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



他的话表达了我们六个人的共同心愿。

几个月来，我们不仅在生产斗争中经受考验，更重要的是在阶级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社员的觉悟，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在部队期间，想的和做的都是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颠覆和破坏作斗争。回到农村以后，虽然手中的钢枪换上了锄头、扁担，但这只是战斗阵地的转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有个同志回乡不久，发现本生产队一个地主分子经常煽动社员闹工分，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干部，破坏生产。于是，他深入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向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作了汇报。在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他和贫下中农一道，向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这个地主分子的破坏阴谋，使受腐蚀的干部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还有一个同志，他的几个哥哥都是学手艺的，过去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经常不参加队里集体生产，外出搞副业单干。他回乡后，就在家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几个哥哥认清了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危害，使他们不再外出单干，全队副业也很快纳入了集体的轨道。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从部队复员时，所以能够坚决地回到农村，主要是因为通过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加深了理解，提高了我们的政治思想觉悟。今后，我们要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战斗中，进一步发挥冲锋陷阵的作用，继续革命不停步。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刻苦地、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四个多月来，我们一直坚持了看书学习，有时劳动很忙很累，但还是每天坚持一两个小时学习，并且注意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思考问题，用以指导实践。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使全国知道”**的指示，我们在自己认真学习的同时，还协助生产队办好政治夜校。我们决心**“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坚持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彻底破除旧的传统观念，为建设农村贡献我们的力量。



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 建军路线前进

柯 史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指明了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对于我军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无产阶级军队。四十八年来，我军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重重困难，打败国内外强大敌人，在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发挥坚强柱石的作用，就是因为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为了完成我军肩负的重大使命，我们需要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

无产阶级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毛主席建军路线的核心。党同军队的关系，只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绝对不容颠倒，颠倒了，军队就要变质。

毛主席在缔造我军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秋



收起义后，毛主席率领起义部队在三湾进行改编时，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实行了党代表制，以后在营以上各级建立了党的委员会，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古田会议上，毛主席批判了“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军事领导政治”等错误倾向，进一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是在建军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们，总是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张国焘向党争个人兵权，分裂红军，危害中央，妄图以枪指挥党。高岗鼓吹“军党论”，煽动军队反党，妄图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上。林彪宣扬“军队中心论”，妄图篡夺党的兵权。他叫嚷什么军队是“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他妄想只要军队掌握在他手里，“党、政、民都有办法对付”。从这“对付”二字，可以看出林彪的狼子野心，他就是要把军队置于党、政、民之上，以枪指挥党，以枪控制政权，以枪镇压人民，从而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以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些反面教材，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重要性。为了保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下，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党的路线的领导。“**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没有兵可以有兵，没有枪可以有枪；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再丢掉。毛主席对我军的领导，集中地体现了党的正确路线领导。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就要一切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集中体现，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们，为了推行其错误路线，总是排斥毛主席对我军的领导。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夺了毛主席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结果使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林彪反党集团妄图篡夺毛主席的统帅地位，狂妄地提出人民解放军要由林彪“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完全是痴心妄想。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林彪一伙在党内和军内是极端孤立的，他们要想“指挥”、“调动”解放军干坏事，没有那么容易。正象过去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都不能得逞一样，林彪也只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党委和基层党支部，体现着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制度。毛主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应当很好地结合起来。集体领导可以发挥集体的智慧，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分工负责可以发挥个人在集体领导下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完成党的各项具体任务。这两者是辩证的统一。彭德怀要搞“一长制”，林彪叫嚷“个人负责制这方面要加以突出”，都是要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破坏党委的集体领导。“**支部建在连上**”，是实现党对基层领导的组织保证。党支部的建设，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林彪鼓吹什么“要以四好为纲”来建设连队，削弱以至取消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妄图把连队建设引向邪路，必须深入进行批判。

毛主席教导我们：“**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自觉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要进一步发扬。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少数人沾染了资产阶级派性，不讲无产阶级党性，不顾大局，不讲团结，这就不利于贯彻党的路线，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军队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我们要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充分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认真加以克服。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军的灵魂，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

在我军初创时期，毛主席就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主席一贯重视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教育部队。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式整军，都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近几年毛主席又一再号召：“**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几十年来，我军能够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保持优良的军政素质，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从做好军事工作来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眼力不够，**



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我们要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既不过高或过低估计敌人，也不过高或过低估计自己，既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又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和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犯右的或“左”的错误。在实际斗争中，我们还经常碰到如精神与物质、人与武器、军事与政治、民主与集中、个人与集体等许多关系问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些问题，也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上搞清楚了，行动才会有正确的方向，才能自觉抵制各种错误倾向。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我军的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要保证我军永不变质。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我军是无产阶级军队，内部成分比较好。但是，我们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侵蚀，必然要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部队中来。商品制度、货币交换、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也会影响干部战士的思想。我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众多的国家，现在小生产的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还严重存在，也必然反映到部队中来。所有这些，都是产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产生修正主义的条件和土壤。为了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不断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

林彪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拚命反对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军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林彪一伙大量地狂热地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黑货，要我军读林彪的书，学林立果的报告，妄图以他们鼓吹的那套修正主义、孔孟之道取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从反面教育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



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否则，就不能识别林彪一类骗子，就分不清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就会受骗上当。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兵。“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是我军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标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出发点。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军广大干部战士努力学习毛主席提出的这一建军宗旨，不断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一直保持着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崇高品质，涌现出许多象张思德、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直保持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涌现出许多象董存瑞、黄继光那样敢于压倒敌人，而决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雄人物。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拒腐蚀、永不沾的优良作风，涌现出一些象“南京路上好八连”那样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的先进单位。这都充分体现了我军的宗旨，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林彪反党集团则大肆鼓吹名利思想和活命哲学，主张“保官、保产、保命”，用“导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来拉拢干部，培植死党，极力破坏我军的宗旨。现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早已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的流毒还存在。我们要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肃清其流毒，使广大干部战士自觉改造世界观，保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把反腐蚀斗争进行到底。

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它，还是扩大它，这是关系着能否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两条建军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使列宁创建的苏联红军变了质，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其重要的手段，就是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林彪反党集团，也是这样，他们妄图用高官、厚禄、特权、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来瓦解我军的战斗意志，改变我军的建军宗旨。这些惊心动魄的教训，必须引以为戒。

毛主席根据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作为反修防修的重要内容，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例如：取消军衔，降低薪金，干部下连当兵、代职，实行野营拉练等，这对保持我军无产阶级



性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号召我军除打仗以外，还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从事农副业生产”，“办一些中小工厂”，“从事群众工作”，“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五·七指示》概括了社会主义时期我军建设的全部内容，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也是坚持我军宗旨的重要保证。我们要进一步总结经验，继续沿着“五·七”道路走下去，使广大干部战士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自觉改造世界观，发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这三大任务，体现着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是我军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前进，就要更好地执行这三大任务。

我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毛主席告诫全军：“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当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剧烈争夺世界霸权，苏修到处扩张，新的世界战争总有一天要爆发。国内已被打倒的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一有机会，就要把他们的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办好民兵，随时准备歼灭胆敢入侵之敌，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为此，我军必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不断提高政治觉悟、组织指挥能力和战术技术水平。林彪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极力破坏我军的军政训练。他或以资产阶级的军事冲击无产阶级的政治，搞形式主义；或以资产阶级的政治冲击无产阶级的军事，搞取消主义。林彪的这些行径，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和部队指战员的一再抵制。近年来，我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继续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举办教导队，对初级干部实行传、帮、带。部队走出营房，实行长途野营训练。部队认真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军政训练取得了可喜成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在担负战斗队任务的同时，还担负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走到那里，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就做到那里；住在那里，开荒生产、助民劳动的任务就在那里执行。这样，既密切了军民关系，又锻炼了部队；既战胜了经济困难，又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现在条件虽然变了，但这个光荣传统决不能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作为一个工作队，坚决贯彻毛主席



的《五·七指示》，担负了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执行军事管制和军政训练的光荣任务，为人民立了新功，并使部队本身受到了新的锻炼和提高。林彪一贯反对我军执行三大任务。他除破坏战斗队的任务外，在战争时期，反对做群众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极力破坏三支两军。他反对部队参加助民劳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恶毒攻击“五·七”道路。林彪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把我军引向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邪路。我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抵制了林彪的破坏活动，坚持执行三大任务，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胜利。

团结是我们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增强我军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是毛主席建军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毛主席指出：人民解放军“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并强调指出：“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我军的内部团结，是建立在阶级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广大干部战士都是亲密战友和阶级兄弟，政治上一律平等，是一种新型的同志关系。这种革命团结，是无产阶级军队所独有的无价之宝。为了不断增强内部团结，我军坚持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坚持反对军阀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开展尊干爱兵运动；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自觉遵守革命纪律。正因为这样，在我军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干部战士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紧密团结，并肩战斗，体现了我军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团结战斗的集体。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军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那就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我们，而只能为我们所压倒。毛主席为我军确立了“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等建军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经常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军处处爱护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把我军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尽力支援军队。在战争年代里，军民同甘苦，共患难，军爱民，民拥军，同心协力，一致对敌。这种团结，使敌人



胆战心惊。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光荣传统。毛主席号召“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全国人民为了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条战线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我们要虚心向全国人民学习，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使我军永远保持无产阶级性质，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本色。

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使我军达到高度团结统一、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重要保证。毛主席指出：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要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方面，军队应该严格要求，作出榜样。

我军内部和外部的革命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力量源泉。一切革命同志，都应爱护这种团结。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团结，分裂我们的军队。林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妄图分裂我军，从反面教育我们必须加强革命团结。

四十八年来，我军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走过了光荣的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在我军深入人心，一直占主导地位。虽然“左”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多次的干扰和破坏，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任何野心家、阴谋家企图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改变我军的性质，都只能是枉费心机。但是，我们必须经常想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充分认识和估计到这一点，就会促使我们加强反修防修的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

目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在部队中深入开展。这次学习，从理论和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我们要认真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真总结我军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彻底肃清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在学习中，我们要紧密联系部队的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有效地解决现存的问题，把各项工作搞好。这必将大大促进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使我军更好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前进。



密切官兵关系的有效措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会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指示，组织了部分师、团领导干部到连队和基层单位当兵。我们体会到：这是在军队内部人们相互关系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措施。它对于发扬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保持我军的政治本色，加强部队的革命化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为我军处理好内部相互关系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原则。在工农红军中，“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这种军队内的民主主义，这种同志间的平等关系，是我军区别于雇佣军队的显著标志。后来，毛主席又把“官兵一致”的原则定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反复强调“官长必须爱护士兵”，开展“拥干爱兵”活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军继承和发扬了这些光荣传统。为了在部队内部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毛主席号召干部要下连当兵。广大干部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这个伟大号召，使部队建设出现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混进党内和军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却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反对毛主席制定的原则和措施。彭德怀推行“一长制”，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搬到革命队伍中来，妄图把人民军队变成他的一统天下。叛徒、卖国贼林彪，大肆贩卖“上智下愚”等黑货，反对官兵一致，反对军内民主，妄图分裂革命队伍，以实现他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我们要坚持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就必须处理好军队内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实行官兵一致的革命原则，不断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坚持干部下连当兵的制度，发扬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增强官兵团结，就是保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本质的一场斗争，是对资产阶级军事



路线的有力批判。

干部下连当兵，打破那种把社会分工绝对化的传统观念，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密切了干部和战士的关系。干部战士本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尽管分工不同，有的是指挥员，有的是战斗员，但在政治上是平等的。我们军队的领导干部多数是从战士来的，扛过枪，打过仗，对我军干部战士之间的亲密关系有较深刻的体会。但是，在和平的环境中，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有的同志慢慢脱离了群众，滋长了“官”气，同志战友的感情淡薄了。这次干部下去当兵，一开始有的战士觉得，班里来了个首长，一切行动都不方便，谈心说笑都很拘束，见面必称职务，叫声老张老李很不习惯。这正好说明干部战士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干部下去以后，跟战士同吃同住同操课，争着担任公差勤务；外出请假，归队报告，一切行动听指挥；战士生了病，给打病号饭；对战士的长处，虚心学习。这样，干部和战士增强了战友的感情。有的同志说：“当兵一个月，把当官的思想削了削。”我们师的一位副参谋长，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同志。解放后，他学习了飞行，走上了领导岗位，二十多年没有在连队过过战士生活。这次下连当兵，使他想起过去行军打仗时干部战士亲密无间的情景。他象重新入伍一样，穿起工作服，跟战士一起擦炮涂油，打扫厕所，脏活重活抢着干。过了一段时间，战士们对他称呼变了，感情也变了，跟他“不外道”了。他回机关以后，战士还来找他谈心。很多干部通过下连当兵，同战士建立了无产阶级感情。实践证明，干部下连当兵，有利于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发扬我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

干部到连队去过一过战士生活，看看战士们那种高昂的革命精神，有利于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一位副师长到偏远地区的靶场去当养场兵，那里劳动强度大，生活比较艰苦。他对照战士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乐于吃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联系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经历，看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自己的侵蚀，对过去讲排场、讲阔气、大手大脚批条子的作风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在下去当兵期间，认真学习战士吃苦耐劳的精神。场里种地瓜，他和战士一道挑水。战士们让他休息，他说：“挑担子我要不歇肩，劳动才能不忘本，汗水可以反修防修。”他回到机关以后，严格要求自己，注意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战士们高兴地说：“从干部身上看到了战争时期的那股革命劲头，只要保持这股劲头，就不会变修。”



干部下连当兵，也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过去有的同志坐在机关定方案，作计划，发文件，觉得头头是道。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亲自去干一干，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是脱离实际的。有时工作不落实，并不是下面不努力，而是领导上官僚主义造成的。一个团的参谋长，过去机务人员对飞行计划有意见，他听了也不重视。他到机务中队去当兵，发现制订计划考虑实际情况不够，造成很多矛盾。后来，在制订飞行计划时，他和参谋人员一起研究，注意从实际出发，做到合理安排。经过下连当兵的干部普遍体会到，领导干部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亲自去干一干，才能跟群众有共同语言，正确对待群众的意见，有效地改进领导作风。

领导干部下连后，基层干部和战士出于对领导的尊重和爱护，往往住房给好的，吃饭开小灶，干活派轻的，开会请你讲话，遇事向你请示。如果对这些安之若素，当兵也受不到锻炼。我们下去当兵的同志，都很注意端正态度，放下架子。劳动拣脏活累活干，公差勤务抢在头里，政治学习带头发言，遵守纪律一丝不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破除等级观念、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密切官兵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师政治部主任在修理厂当兵时，和那里的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大家都愿意和他谈心。不久前他又到修理厂去蹲点，抓党支部的建设，由于当兵期间和战士们结下了感情，大家都愿意向他反映情况，所以问题抓得准，解决得也比较好，在工作中取得了主动权。干部下连当兵，也有一个传、帮、带的任务。但是，最好的传、帮、带，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理论学习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艰苦奋斗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实际的模范行动，往往更能起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而缺乏向群众学习的态度，夸夸其谈，指手划脚，即使是下去当了“兵”，也不可能起到密切官兵关系、改造世界观的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在人们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灭。干部头脑中的等级观念，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也不是当一个月兵就可以扫除干净。干部经过当兵的锻炼，在克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方面会有一些进步，但是过一个时期，又可能有反复。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官兵关系，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我们要坚决实行下连当兵这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地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行斗争，发扬光荣传统，密切官兵关系，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不断前进。



自觉地经常地向人民群众学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洛阳”舰党支部

“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人民军队本质的生动体现。我军建立以来，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人民群众的哺育下，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我们舰能够在革命航程上不断前进，也是同经常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分不开的。

我们舰是毛主席视察过的光荣军舰。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在视察我们舰时，亲笔写下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光辉题词。二十多年来，它一直是鼓舞我们努力奋斗，加强部队建设的巨大动力。我们深深感到：要达到毛主席规定的目标，建立强大的海军，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课题，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什么时候注意向人民群众学习，什么时候部队建设就生气勃勃。因此，我们把它作为一项经常性的政治任务。

去年年初，我们看到报纸上介绍一些单位培养和建立工人理论队伍的先进经验，认识到这是人民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个创造，便立即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在舰上成立了业余理论学习小组。后来，我们又到上海第五钢铁厂等单位登门取经，使我们舰的理论队伍不断发展提高。我们业余理论小组的同志，学习工人阶级那种认真看书学习、深入批林批孔的革命精神，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写了一百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为干部战士上了三十多次理论辅导课，推动了全舰的看书学习，促进了革命大批判的深入。我们还从嘉定县新泾大队制订农业发展规划的经验中得到启发，根据我们舰的实际情况，制订了看书学习的规划，组织干部战士有计划地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掌握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理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还学习小靳庄的经验，在舰上组办和健全了文艺演唱组、图书室、书评组、体育组、赛诗会、故事会、政治夜校，用无产阶级思想进一步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这样经常注意向地方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部队的工作不断有所前进。

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是反修防修、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本色的重要一环。几年前，我们从海岛来到了大城市，环境变了，生活条件变了，但由于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干部战士仍然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我们舰有一个战士，刚入伍时，带来了贫下中农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一双袜子补了几次还穿着。后来，他的思想有些变化，觉得住在大城市，穿破袜子太土气，还是穿尼龙袜子好看。一次回家探亲，父母和村里的贫下中农给他敲了警钟，再三嘱咐说：“你在大城市，可不能学起资产阶级的‘洋气’，丢掉我们贫下中农的‘土气’啊！”这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回到舰上后，他积极看书学习，努力改造思想，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一双袜子已经补了十三个补丁还穿在脚上。他说：“补丁垫脚立场稳，香风臭气吹不倒。”我们从这个战士的身上得到很大启示，认识到：干部战士虽然都是来自劳动人民，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如果不坚持经常向人民群众学习，原有的许多好思想好作风也会丢掉，也会有变质的危险。因此，我们经常组织干部战士到人民群众中去“回炉”。参观阶级教育展览，请老贫农、老工人讲村史、家史、厂史和他们艰苦奋斗的事迹，不断地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人民群众的好思想、好品质，是我们拒腐防变的“抗菌素”，自觉地经常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有利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把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保持和发扬下去。

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过程，就是对部队进行生动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过程。我们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抓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工厂、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是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老工人、老贫农，是我们的好老师。我们经常请驻地工农群众给干部战士上课。同时，也走出去进行社会调查，了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状。今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一开始，我们就组织干部战士到上海蔬菜公司等单位进行调查，了解资产阶级法权在货币交换中



的表现。同志们说：社会这个大课堂，老师多，教材广，我们学到了在舰上学不到的东西。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在人民群众斗争的大课堂，广泛地接触群众，就能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政治路线觉悟，学得具体，教育深刻。

学人民，也是爱人民，为人民，实行军民一致，搞好军民团结的具体体现。不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注意教育干部战士和那里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急人民之所急，帮人民之所需，学人民之所长。干部战士经常助民劳动，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这样，人民群众就更加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们，教育我们，爱护我们，从而真正做到军民团结，亲如一家。

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要把向人民群众学习经常坚持下去，关键是要不断提高学习的自觉性。过去，我们舰有的同志认为，自己出身工农，有的刚走出工厂、农村，向不向人民群众学习关系不大。因此，往往只重视宣传群众，而忽视向人民群众学习。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多次发动干部战士批判林彪鼓吹的唯心史观和污蔑人民群众的反动谬论，使大家树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又联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军民关系问题上的表现，深入批判林彪把军队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破坏军民团结、破坏我军谦虚谨慎等优良作风的罪行。在平时的政治工作中，我们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和两个阶级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通过学习和批判，使大家认识到，军队是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还是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脱离群众，这是执行什么路线，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军队的问题。我们积极开展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活动，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保持无产阶级军队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切干部战士都应当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即使是离开工厂、农村不久的同志也不能例外。为了提高大家的自觉性，我们经常组织同志们座谈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收获。当有的同志向人民群众学习取得了明显成效时，就组织他们介绍学习的体会。我们还利用政治夜校、黑板报等形式，宣传这方面的好典型、好经验。通过这些活动，激发大家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热



情。

向人民群众学习和加强部队建设、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结合起来，才能经常坚持，取得实际的效果。上海造船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利用在船厂修舰的机会，请工人师傅讲工厂的革命和建设，对干部战士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大家以工人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榜样，积极投入修舰工作，和工人共同努力，使修舰任务提前完成。我们还组织大家学习大寨大队和昔阳县人民大于社会主义的英雄事迹，找差距，鼓干劲，推动部队的革命化建设，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

我们舰多数时间是在海上执行任务，接触人民群众的机会比较少。根据这个特点，除了建立学习点以及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等方法外，主要是抓住各种时机，利用各种方式，随时随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做学人民的“有心人”。我们经常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报纸上介绍的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这是天天送上门来的好教材。对参加工农兵讲师团的同志，我们要求他们虚心向工人、贫下中农讲师和革命师生学习。在海上执行护渔护航任务时，就利用帮助渔民抢修机器，为渔民治病，给渔民送淡水等机会，学习渔民群众为了多打鱼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战风斗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舰上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革命师生来参观，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学习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许多同志还利用外出工作、请假探家的机会，向人民群众学习。有的战士回家探亲时，除了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还调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事迹，了解学校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并到生产大队理论小组参加学习。回到部队后，把在农村调查了解的情况和学习的收获，向同志们作了介绍，使大家受到很大教育。

“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我们向人民群众学习，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党对我们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今后，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更加自觉更加经常地向人民群众学习，促进部队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



发扬革命精神 做好革命工作

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新 志 柏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里，许多同志都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今天，我们能不能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对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又是严峻的考验。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许多同志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廉洁奉公，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地进行工作，始终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这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本色。

但是，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少数同志革命意志衰退，不求进步，比如，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追求名利，贪图安逸；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等等。这些同志对于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很热心，而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却表现很少兴趣。我们希望这些同志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还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呢？如果过去为党为人民出过力，流过汗，那么，现在是继续革命还是坐享革命之福呢？这是摆在这些同志面前应该认真考虑的尖锐问题。

有些人的革命意志衰退，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它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深刻反映。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同志在农村坚持斗争，过着艰苦的大体上平均的供给制生活，大家一



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根本没有想到过拿薪水，更没有想到过要坐小汽车，住小洋房。那时，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为着推翻三大敌人的统治，解放全中国，随时准备拿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解放初期，我们仍然保持着这些优良传统，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干部中发生不好的事情就比较少。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工资制代替了供给制，干部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正确认识 and 对待这个问题，并不妨碍我们继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可是，有少数同志却丧失警惕，被商品和货币交换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他们考虑的不是如何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而是如何使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待遇越来越好，因而在他们身上滋长了官气、骄气、娇气、暮气、奢气，而革命的志气、朝气则一天一天地减少了。可见，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人们的腐蚀作用是很严重的。

有些人还把享受优厚的待遇看作是“心安理得”的事情。他们的“理”就在：我对革命有过功劳，人民应该偿我以高报酬。这正是把自己当作商品，搞等价交换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谁也没有考虑过要什么报酬。有些同志对革命有过一些功劳，或自认为有功劳而实际对革命的贡献未见得有多大，竟然伸手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这同革命先烈相比，怎么可以“心安理得”而不感到惭愧呢？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决不是为了追求多少资产阶级法权，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虽然在现阶段我们还不能全部做到这点，但要逐步去实现。如果把把我们这个最终要消灭的东西当作追求的东西，那就必然丢掉共产主义大目标，这还能算什么共产党员呢？

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看来，“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这才是应取的态度。有了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下，都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职务高了不会有官气，生活好了不会有娇气，年纪大了不会有暮气，工作变动了不会有怨气，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不可征服的。什么“身体不行”、“工作困难”，什么金钱美女的引诱，在他们面前就象敌人的堡垒那样，总是一个又一个地被攻克。我们要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就要同那种“一切为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斗争，做到一辈子做好事，一贯的有益于人民、有益于革命，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西汉文学家枚乘，写过一篇有名的骚体赋《七发》，它对我们医治革命意志衰退症是颇有启发的，可以一读。这篇文章写的是吴国的客人去问候楚太子的病，直言不讳地当面对太子说，其病源是腐朽的生活方式，腐朽的生活方式又源于腐朽的思想，出入都坐车子是造成身体瘫痪的原因，幽深清冷的宫室是寒热病的媒介，妖姬美女是斫伤生命的利斧，美味的酒肉是腐烂肠胃的毒药。医治此病，药石针灸无能为力，只有用“要言妙道”才能见效。这些话值得我们借鉴、深思。革命意志衰退症也是一种思想顽症，靠打针、吃药、住医院是不能根治的。患这种“病”的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记了。

我们的许多同志之所以旺盛的革命斗志不减，艰苦奋斗的本色不变，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刻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并且经常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不断地研究新事物，吸取新养分，从而保持了思想上的源泉。相反，那些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多是不读书，不看报，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思想上死水一潭，久而久之，也就变得生锈了。

群众斗争的风雨是砥砺革命意志的磨石，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反修防修的课堂。患革命意志衰退症的同志千万不能把自己关在“安乐窝”里，要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搞一点调查研究，看一看群众在做些什么，听一听群众在想些什么。这样，视野就会宽阔起来，革命精神就会振作起来。同时也要尽量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许多坏事都是从不参加劳动开始的。养尊处优，容易使人蜕化变质。鲁迅曾经深刻地批判那些脱离劳动、“超俗”、“隐逸”的寄生虫，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屨，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如果也以脱离劳动、脱离群众、不干工作为快，“优哉游哉”，那同地主资产阶级还有多少区别呢？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更值得骄傲的高潮还在后头。我们每一个立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要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振奋起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精神，继续革命，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破除外因论 自觉拒腐蚀

江景宏

干部和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进一步发扬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但是，在反腐败斗争中，还有的同志认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社会上仍然存在，自己沾染上也是难以避免的。这种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应当加以克服。

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真的是难以抵制吗？事实并不是这样。不少革命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万里征途不歇脚，革命斗志永不衰，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在商品、货币等花花绿绿的东西面前，心明眼亮，“糖弹”打不进，“香风”吹不倒，金钱不移革命志，艰苦奋斗不忘本。他们不仅做到“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还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打进攻战，立志缩小三大差别，以实际行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给我们做出了学习的榜样。

那种认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难以抵制的观点，否认了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只强调外部条件，忽视内部原因，忘记了一个革命者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和革命责任，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外因论。

毛主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人们思想、生活作风的发展变化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长期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消除，资产阶级还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来腐蚀革命队伍，这是必然的。但如



果以此作为自己搞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种理由，那就不对了。辩证唯物论认为，事物的发展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是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与此相反，形而上学的外因论，“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它没有从内部的矛盾性上去把握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也就不能正确了解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为什么受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侵蚀的只是一部分人，而大部分革命同志则可以抵制它。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并不是对一切都发生作用的。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得比较好，头脑里无产阶级的东西比较多，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就能自觉地识别和抵制。相反，放松了思想改造，世界观上存在着资产阶级的“王国”，当资产阶级的东西袭来的时候，就不能识别、抵制它，甚至还会欣赏、迎合它。这正是有的党员、干部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下打败仗的原因。这样的经验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完全有条件去战胜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存在，虽然还有它的土壤和条件，但是，它和一切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样，是走向衰亡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说是虚弱的。我们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千百万有觉悟的人民群众，具备着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优胜条件。不管经过怎样曲折的道路，无产阶级思想总是要逐步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也必然会逐步失去它的市场。我们共产党人肩负着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任务。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作斗争，并彻底战胜它，是改造客观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样的斗争中，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提高自己反腐蚀的能力。因此，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面前，不敢斗争是错误的，斗争而软弱无力，也不能战而胜之。我们还必须看到，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具有很大的顽固性。它如同病菌一样，你不清除它，它就侵害你。“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革命者应该发挥改造客观世界的自觉的主观能动性，反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断清除资本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作风。

当然，我们强调内因的作用，决不是忽视外因。只讲内因，不讲外因，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正因为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客观存在的，还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它对于人们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我们强调要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积极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在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长城，从而使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影响不那么容易通过内因发生作用。

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林彪，鼓吹什么“闭门修养”、“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表面上看来，他们好象重视内因，实际上是否认了事物变化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主张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他们反对革命的实践，反对在革命实践中去改造人们的思想。按照这样的认识路线去对待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根本不去和它作斗争，也不必通过这样的斗争增强自己抗腐蚀的能力。十分清楚，要是照这样去“闭门修养”，必然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所腐蚀，灵魂深处“爆发”的也只能是修正主义。刘少奇、林彪的反动谬论，完全是为他们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的。

辩证唯物论关于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理论使我们认识到：一个革命者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最根本的一条，是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拒腐蚀的自觉性。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我们观察社会、分析问题的思想武器。掌握好这个武器，积极地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识别和抵制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增强抗拒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侵蚀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看书学习，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清除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面前，做到拒腐蚀，永不沾，永葆革命青春。



领导要敢于负责

袁 青



毛主席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动员广大群众实现党的路线的斗争中，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如何，能不能以敢于负责的革命精神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对带领群众改变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面貌，关系极大。

领导对工作负责，首先要抓大事，抓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我们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保证。领导敢于负责，最重要的，就是要敢于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之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一个领导班子强不强，首先是看他们抓大事、抓路线的自觉性高不高。那里的领导班子坚强有力，领导干部能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那里的工作就搞得有声有色，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得到充分发挥，革命和生产就蓬勃发展。这是被事实反复证明了的一条基本经验。

敢于负责，就要正视矛盾，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过程中，不能不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和困难，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待困难的基本态度。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要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矛盾总是不难解决的，任何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但是，在具体工作上，我们必须重视矛盾，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一个地解决它。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工作不到，矛盾不会自己解决。胜利总



是用艰苦的工作和斗争换来的。如果只是在口头上说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实际上回避和掩盖矛盾，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去解决矛盾，就会使问题成堆，久拖不决，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

例如，有的地方的资产阶级派性问题，看起来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认真对待，其实并不难解决。无产阶级党性同资产阶级派性的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种反映。搞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安定团结，破坏革命和生产，是很不得人心的。只要我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认清资产阶级派性的实质和危害，深入发动群众，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造成一个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强大的革命声势，同资产阶级派性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多数人就会受到教育，很快地觉悟过来，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的人就孤立了，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兴风作浪的阶级敌人就彻底暴露了，革命和生产就向前发展了。消除资产阶级派性是这样，解决别的矛盾也是这样，关键在于要敢于正视矛盾，又善于分析和解决矛盾。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敢”字当头，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地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革命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

敢于负责，就要坚持党的原则，同违背党的原则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党的领导干部，更应该是这样。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始终贯穿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坚持党的原则，为社会主义把关，还是放弃党的原则，为资本主义开门，是各级领导干部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有的同志怕得罪人，不敢坚持党的原则，这是很错误的。“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事情总是这样，你要坚持党的原则，干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得



罪”那些违反党的原则、搞资本主义的人。要所有的人都拥护，没有那个事。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坚决进行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内部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人，领导坚持党的原则，进行适当的批评，是为了教育和帮助他，在他没有觉悟的时候，可能表示不满，但是，当他觉悟之后，就会同我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

坚持党的原则，是领导干部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带领群众前进的重要条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领导干部，就越是革命的权威。这样的干部，才能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带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如果缺乏革命的原则性和斗争性，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在矛盾面前，左顾右盼，畏首畏尾，喜欢当“好好先生”，甚至利用职权，好行小惠，拿原则做交易，结果势必失去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这样的干部，非但做不成什么事情，而且很容易被那些阿谀奉承、钻营利禄的人所包围，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那是很危险的。一个领导干部，敢不敢坚持党的原则，有没有革命斗争性，归根到底，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问题，是一个党性纯不纯的问题。

对于一个部门或单位的党组织来说，要很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把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核心。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委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抓路线，顾大局，讲团结，努力做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书记与委员之间，委员与委员之间，要经常地交流思想，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凡是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问题，都要在党委会进行认真讨论，充分发表意见，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这样，领导班子才能负起责任，挑起担子，真正成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指挥部，才能有效地解决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地向前发展。



科 学 史 研 究

实践是农业科学发展的源泉

金 枫

农业科学是从农业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人类对农业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实践活动，同时，其他的实践活动也有重要的作用，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研究农业科学发展的历史，不仅可以看到，人类怎样通过生产斗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而且可以看到，先进阶级的思想、先进的社会制度怎样推动了农业科学的发展，没落阶级的思想、腐朽的社会制度怎样成为农业科学发展的绊脚石。这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推动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迅速发展，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劳动人民是农业科学的创造者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的出现，使人类有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有了定居的条件，并为后来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那末，究竟是谁创造了农业和农业科学？是劳动人民创立的，还是上帝一手造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进行着斗争。

在远古时代，由于人们对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往往用神话加以说明。对于农业的创造发明，也是这样。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都



有神发明农业的传说。我国古代则有神农创造农业的神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这些神话的形式虽然是玄虚的，但其中包含着我们先祖同自然作斗争的客观内容。“神农尝草别谷”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原始人识别各种植物，把野生植物驯化为农作物的过程。神农这个形象，则是以夸大的形式体现着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农业的集体智慧和力量。

到了奴隶制时代，奴隶主为了愚弄群众，维护他们的统治，宣扬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诗经》中就有“诞降嘉种”（《大雅·生民》）的说法，把劳动人民培育出来的作物，说成是上天的恩赐。在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也说上帝创造了人和动植物。这些无稽之谈的共同特点，就是抹煞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伟大贡献，否定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对于这种神创论，我国古代的法家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汉代的唯物主义者王充指出，万千生物并不是天地创造的，“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论衡·自然》）万万千千手，只能属于劳动群众。农作物作为人工栽培的植物，正是劳动群众的万万千千手所创造的。后魏杰出的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记录了许多以人的姓名命名的谷物，如“魏爽黄”、“刘沙白”、“乐婢青”等等，也有力地否定了作物及其品种是上帝赐予的谬论。

当然，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还不可能科学地回答是上帝还是劳动人民创造了农业和农业科学的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根据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等所提供的丰富材料告诉我们，在很久以前，人类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到了新石器时代，学会栽培秣草和种植谷物，开始了农业生产劳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在把野生植物驯化为栽培作物的过程中，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们经过了长期的观察和试验，无数的失败与成功，积累了有关农作物生长规律的初步知识，并创造了简单的栽培技术，这就是农学的萌芽。

农业科学是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农业生产则是千百万劳动群众从事



的伟大斗争。离开了劳动群众的农业生产实践，农业科学根本不能产生，也不能发展。现在，我国农学的书籍留下来的不多，但就仅有的典籍来看，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农业科学上的创造也是很多的，至今还放射出光彩。他们不仅培育了黍、稷、粟、粱、菽、麦、稻等许多种类的粮食作物，而且适应不同的气候、土质等条件，在各类作物中又培育出很多具有不同特点的品种。据《齐民要术》记载，公元六世纪我国单是粟就有八十六个品种，它们分别具有耐旱、耐水、耐风、免雀、抗虫等特点。其他作物品种也从少到多发展起来。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稻有四万多个品种，小麦有两万多个品种。古代农书还记载了因时因地种植作物、深耕施肥、倒茬轮作、灌溉排水等一系列增产措施。如果不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初步认识了种子与作物的关系，作物与环境的关系，这些成就是根本谈不到的。

农业和农业科学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劳动人民是农业和农业科学的创造者，驳倒了上帝或者“天才”创造农业和农业科学的唯心主义的谬论。古罗马的加图、中国的贾思勰等人，在古代农学上之所以能够作出一定的贡献，并不是由于他们有超人的天才，而是因为他们总结了当时劳动群众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贾思勰曾经说过，他的《齐民要术》是在“采摭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齐民要术·序》）的条件下写成的。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农学家的理论无论多么精密，多么高深，都只能是“流”，它的“源”则是人民群众的农业生产实践。离开了群众的实践，他们的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靠不住的东西了。农学家要想对农业和农业科学有所贡献，就一定得接近群众，向群众学习，不断地从群众的实践经验中汲取营养。

在生产斗争中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围绕着人类能不能认识和改造自然的问题，农业科学中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听天由命，做自然的奴隶。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做自然的主人。前者属于唯心主义，后者属于唯物主义。它们之间的斗争，在我国古代，主要表现



为儒家天命论同法家反天命论的斗争。

在我国古代，腐朽反动势力的政治代表儒家，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竭力鼓吹天命论。孔老二及其门徒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董仲舒鼓吹“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进步势力的代表法家则坚持革新，坚持进步，竭力反对天命论。他们认为，天并不是什么上帝、神灵，而是物质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这种对天的唯物主义认识的基础上，荀况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他认为，只要按照规律行动，就能“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这是对儒家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儒家天命论同法家反天命论的斗争，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一部农业科学史，不但是劳动人民战胜大自然的历史，也是人定胜天思想战胜天命论思想的历史。

人类能不能认识农业生产的规律性呢？几千年来的农业生产实践做了肯定的回答。拿天时来说，儒家认为它是上天授予的、决定农作物生长衰亡的十分神秘的东西，人类无法认识它。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随着农业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种植庄稼因时制宜的重要，摸索到不同作物不同品种的播种适期。为了适时地安排各项农事活动，为农作物的生长争得有利的天时，人们通过长期对日地关系的观测，逐步制定了二十四节气。从把一年分为四季到分为二十四节气，人们对天时运行规律的认识显然是更精确更深刻了。不仅如此，人们在生产劳动中还逐步认识到，所谓天时，对农业来说，不过是一定的光照、气温、湿度等条件，在什么程度上控制了这些条件，也就在什么程度上控制了天时。早在汉代，我国劳动人民就根据这样的认识创造了温室栽培技术，成功地在冬季栽培出春夏生长的蔬菜。这是古代农业上的创举，是人们认识和控制天时的发端。

在土壤肥力问题上，法家荀况总结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经验，提出“多粪肥田”的主张，指出：“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荀子·富国》）只要能够“善治之”，土壤就会由瘠变肥，产量就会由低变高，甚至一年可以收两季庄稼。后来王充更明确地认识到，“深耕细耨，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论衡·率性》），这些观点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有力地批判了儒家



鼓吹的土地肥饶天赋论。

在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命论影响下，我国农学史上曾流传过唯风土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古代各地所宜种植的谷物种类是不能改变的，人们只能因循守旧，按以前定下来的作物区划种庄稼。然而，富于革新精神的劳动人民不断打破这种守旧复古的谬论。我国汉代已经从西域引进了苜蓿、葡萄，元代棉花从边疆引进内地，明清两代番薯从南方逐步引种到黄河以北。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培育出种类繁多、品种各异的农作物，把大地装点得色彩缤纷，绚丽多姿，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在农学领域中，十三世纪就有人批判唯风土论。明末尊法反儒的农学家徐光启指出：“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果若尽力树艺，殆无不可宜者”（《农政全书·农本》）。他还肯定了“人力之至，亦或可以回天”（《农政全书·树艺》）的说法，进一步把关于风土论的争论，提到天命论与反天命论斗争的高度。

劳动人民具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无穷力量。但是这种力量究竟发挥到什么程度，总是受着社会制度和政治路线的影响和制约。在我国古代，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建立，劳动人民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在法家路线的推动下，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出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畜耕的逐步普及，显著地提高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改变了农业生产的面貌，为战胜自然灾害、夺取农业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畦种法、代田法、区种法等先进栽培技术的出现，有机肥料的广泛使用和施肥技术的进步，形成了我国独有的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这一切，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在整个古代处于世界的前列。但是，封建制度的建立，毕竟只是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且它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的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真正做了大自然的主人。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只有在这时，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力量才充分发挥出来，才能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和规模改造自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广大劳动人民以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向大自然开战，重新安排祖国河山，正在谱写出一曲曲人定胜天的凯歌。解放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就，胜过了以往一切时代，每一项成就，都是人定胜天思想对反动的天命论的胜利。当然，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旧社会的痕迹、旧思想影响的存在，天命论还会有，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对农业的认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培育有生命的农作物。任何一种农作物本身都有许许多多属性、特质，都有它自己的生长发育规律，以及跟自然环境十分密切的、多种多样的联系。在农业生产中，人们面对的不仅有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运动，而且有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要认识农业生产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认识过程。

列宁在谈到认识的发展时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人类对农业生产规律认识的深化过程，也是按照螺旋的曲线发展的。在土壤和农作物的关系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认识的曲线。

古代的人们坚持一种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初步觉察到农作物既能消耗土壤的肥力，也能提高土壤的肥力，意识到土壤和农作物之间的物质交换，即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根据这种认识，曾经创造了粮食作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各种不同的粮食作物的轮作制度，以提高土壤肥力。但是，由于这种认识缺乏精密的自然科学的根据，到了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思想代替了。在十八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机械论自然观的影响下，对于植物与土壤的关系，西方曾流行过所谓“生活力”学说，认为植物的营养不是从外界摄取的，而是借着“生活的作用”自己制造出来的。继起的“腐殖质”学说，承认植物要从外界摄取营养，但认为这种营养只能是腐殖质——有机物。这两种观点都不承认土壤和植物相互转化的关系，既不承认土壤向植物供给矿物质养料，也不承认腐烂、分解了的植物会变为



无机物，变为土壤的一部分。

在这种凝固、僵死的观点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是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李比希。一八四〇年，李比希总结了农业化学的成果，提出矿物质是植物营养基础的新观点，在农学领域打破了有机界与无机界的形而上学界限，向辩证法前进了一大步。他认为，栽培作物消耗了土壤中的矿物质养分，因而必须施用无机肥料，把消耗的部分归还给土壤，才能保持土壤的肥力。李比希的理论有力地批判了“生活力”和“腐殖质”两种形而上学观点，提出了人类有意识地调节人与土壤之间物质交换的思想，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土地掠夺式经营的恶果，促进了用化学方法对土壤和植物的研究，推动了化肥的广泛施用以及农业和农业科学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肯定地评价了李比希的理论。

但是，李比希只看到土壤对农作物供给养料的作用，没有看到农作物对土壤形成、土壤肥力提高的作用。就是说，在土壤和农作物之间，他只看到单方面的转化，没有看到相互转化。辩证法认为，“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土壤与植物这一对矛盾也是处于相互斗争、相互转化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土壤学家威廉斯吸取了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总结了前代土壤学家的成果，正确地指出，生物是自然成土因素中的主导因素，植物群落和相伴微生物的不断更替，决定着土壤种类的更替和土壤肥力的发展。风化了的岩石只是土壤的母质。在没有植物的情况下，土壤母质中的矿物质养料，会在淋溶过程中流失。只有植物的根系才能“捉”住这些养料，把它变成自身的组成部分而保蓄起来。另外，一些相伴微生物还能把空气中的氮素吸收、固定于土壤母质之中。植物死亡分解之后，营养物质留在母质里。经过生物世世代代的累积，土壤母质中的养料不断增加，土壤肥力不断提高。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植物就没有土壤的肥力，没有土壤本身。威廉斯根据这个理论，阐明了农林牧之间的密切关系，把农业、林业、牧业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制定了恢复土壤肥力的草田轮作制，对于发展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农业作出了贡献。可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推行资本主义掠夺式的农业经营方式，把根据威廉斯的理论取得的一些成就，已经几乎搞光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



以后，在农村推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国营农场”、“集体农庄”虽然名称未变，实际上已经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变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新富农所有。这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特别贪婪，他们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二十多年来，对土地一直实行掠夺式的经营，一会儿盲目地大量开荒，一会儿废除草田轮作制，加上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造林护林的投资不足，造成土地肥力的严重破坏。据报道，仅哈萨克斯坦全部被开垦的土地每年因风沙受害面积就在二千万公顷以上，乌克兰农业用地约有三分之一因水蚀而变劣。结果，使粮食播种面积日益减少，产量下降。在勃列日涅夫当权以来的十年间（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就有六年减产，一个历史上粮食出口的国家竟不得不经常靠进口粮食过日子了。

马克思指出，土地“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人的生产劳动是成土的重要因素，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的因素越来越重要。由于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不断摸索土地由瘠变肥的规律，运用深耕、细锄、施肥、灌溉、轮作等措施促进土壤的熟化，注意用地和养地相结合，就总的趋势来说，几千年来我国土壤的肥力是不断提高的。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多年来大寨大队改土的实践证明，人们认识了土壤的运动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按照丰产的需要来改良土壤，可以实现土壤在自然状态下要千百年才能出现甚至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变革。

人类对农作物和土壤关系的认识，就是这样从朴素的辩证法观点，经过形而上学观点，进到科学的唯物辩证法观点。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是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

伟大领袖毛主席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对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进行科学分析，制定了农业“八字宪法”，深刻地揭示了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是使农作物增产的八个基本因素，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二十多年来，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和科学工作者，因地制宜地全面贯彻了农业“八字宪法”，实行农林牧结合，用地和养地结合，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精耕细作结合，使影响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得到合理的综合应用，创造了大面积的高产、稳产田，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量



的提高。

农业和农业科学的发展是无限的

农业和农业科学的发展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资产阶级反动社会学说在农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

资产阶级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永恒性，工人阶级饥饿贫困的合理性，一直在宣扬农业生产到顶，饥饿威胁人类的谬论。十八世纪末马尔萨斯鼓吹的“人口论”，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宣扬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以及当前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辩护士们所散布的亚非拉“人口爆炸”，“世界粮食危机”等等，都是这种反动观点的不同腔调。

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对这些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早在一八四四年就指出：“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毛主席也指出：“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土地的肥力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的。几千年来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改造自然，夺取农作物更高产量的历史。土壤的改造，各种肥料的施用，农田水利设施的进步，优良品种的培育，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提高，栽培技术的改进，新机器新能源的利用，等等，都推动着并将继续推动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现在，科学技术的现有成果远远没有充分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来，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是永无止境的。因此，上述推动农业发展的各个因素都有着无限的潜力和无限前途，永远不可能到顶。在这里，一切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炮制“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资产阶级御用学者们抛开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状况，抽象地谈论什么“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不可避免地做出荒谬结论。其实追加的劳动和资本总是伴有新机器、新技术的采用，意味着技术革新和生产力提高。因此，列宁指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完全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和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情况”。这种所谓“规律”，不过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破坏农业生产的种种罪恶而编造出来的谎言。

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内，它们的农业衰落，矛盾重重，其



根源并不在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而在于那个罪恶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农业的每一种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并且也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每一种在限定时间内增进土地丰度的进步，都同时是破坏这种丰度的持久源泉的进步。”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干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勾当，如掠夺地力，破坏自然资源，使作物品种过分单一化等等，给农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苏修头目赫鲁晓夫，在苏联中亚地区实行掠夺式的开垦荒地，造成了“黑色风暴”，也是一个广为流传的丑闻。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资本家往往要销毁大量粮食，让农田大面积地荒芜起来，使农业生产遭到更严重的破坏。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什么“人口过剩”，“粮食不足”，完全是一派胡言。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人口过剩，不是象英国牧师马尔萨斯宣扬的那样因为人口多了，食物少了，恰恰相反，粮食生产并不少，只是工人的购买力太低，消费的粮食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依然喋喋不休地胡说什么“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人口太多”。这是新殖民主义的谬论！地球上真是人口太多了吗？地球表面大约有土地二千多亿亩，可耕地约占陆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到六十，按百分之四十算，约九百亿亩，世界现有耕地约二百亿亩，不到可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实际上，世界的土地不是太少，而是远远没有充分利用。人满之患从何而来？其实，比较贫穷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密度有的远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非洲每平方公里平均只有十二人，而美国则有二十二二人。怎么能说这些地区是地少人多造成了贫困呢？

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粮食问题不是别的，恰恰是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长期侵略的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勤劳，土地肥沃，只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本来是可以丰衣足食的。可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帝国主义对亚非拉地区进行残酷的奴役和掠夺，强迫实行畸形的单一经济，进行不等价交换，使这些地区民族经济得不到发展，粮食不能自给，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继续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剩余”农产品，严重摧残了亚非拉国家的农业生产。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以后，超级大国仍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它们的经济命脉，采用新殖民主义的形式，继续剥削和掠夺，致使许



多发展中国家无法积累资金，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当前美帝大力推行、苏修拚命鼓吹的所谓“绿色革命”，就是在“解决第三世界的粮食问题”的幌子下，以“援助”为名，行侵略之实的一种新殖民主义策略。

粮食问题首先是社会政治问题，只有进行革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才能真正解决。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是一个真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反动统治以后，我们党领导亿万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在农村实现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就为大规模改造自然，为农业机械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大农业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广大农村蓬勃发展，全国亿万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治山治水，使农业生产出现连年丰收的大好形势。从黑龙江畔到五指山麓，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历来多灾缺粮的冀、鲁、豫三省，实现粮食自给有余，初步扭转了南粮北调。全国解放二十五年来，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二十五年前，当我国民主革命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曾经断言，中国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只有向他们乞讨才活得下去。他们的预言完全破产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同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重重的悲惨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没落下去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自己。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农业科学也有了飞跃的发展。一个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正在蓬勃兴起。贫下中农、技术人员和干部三结合的农业科技队伍日益壮大，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大量涌现。当前，广大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教育和锻炼，进一步掌握了唯物辩证法，更加解放了思想，增添了干劲，这必将使农业科学更加普及深入地向前发展。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曾经为世界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飞速发展着的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科学，要争取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 杂 文 ·

苏修鼓吹“三不”主义的目的何在？

秦 景 池

今天的苏联，是一个商品拜物教的世界。只要一打开苏修的书报杂志，触目尽是讴歌商品、货币的论著。一九七四年，莫斯科出版的某博士写的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其中的一本。

这部《政治经济学》，鼓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不会出现商品生产者的剥削，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不可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要而言之，可以谓之曰商品生产上的“三不”主义。这个“三不”主义的核心，就是企图通过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私有经济的遗迹，否认商品制度仍然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否认商品制度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为复辟了的苏联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

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贩卖的到底是什么货色。

一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

在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其他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但是，由于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有着少量的个体所有制的残余，商品制度就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它依然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列宁在分析当年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时候，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苏修叛徒集团为什么对于列宁这些科学论断视若无睹？为什么不敢于公开引用这些论断？既要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打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这是一切修正主义的特点。苏修叛徒集团在这里又一次作了充分表演。其所以如此，无非是妄图证明他们那个



冒牌的社会主义是“真的”，他们那里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虽然用心良苦，但稻草不仅没有捞着，反而徒然暴露了自己的叛徒嘴脸！

二曰：商品的等价交换不体现资产阶级法权，而是体现着所谓“经济平等”。

苏修御用文人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特点，“是商品等价关系成为商品生产者同志式合作关系的形式”，“通过等价交换达到经济平等”。商品等价交换中所体现的那种经济平等，难道不正是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吗？马克思不正是根据按劳分配中“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因而指出“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的吗？等价交换中的“价”，指的是商品的价值，它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而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必然会在商品生产者之间引起两极分化。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就是从这种分化中产生出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人们收入的差别。如果不加限制而任其扩大，就会造成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苏修叛徒集团把等价交换的平等权利当作“同志式合作关系”的体现，这正证明了资产阶级法权是他们的最高理想。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一小撮代表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叛徒，疯狂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苏联从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今天的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的公开收入就比一般工人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至于他们不公开的非法收入更是难以计数。苏修政治局委员的别墅，“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配备的家具是从芬兰进口的，有游泳池、网球场、体育设备和带有餐厅、电影院和特殊商品的俱乐部”。而广大苏联劳动人民则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材料，现在需要领取“经济困难家庭子女补助金”的人有二千五百万，即占全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实际人数当然远不止这些。残酷的剥削，悬殊的收入，早已引起了苏联劳动人民的不满。所谓“经济平等”和“同志式合作关系”，无非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苏修版，实质上不过是掩盖剥削关系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三曰：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已不能转化为资本，货币已不能成为剥削他



人劳动的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苏修叛徒集团的御用经济学家既讲不出什么道理，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只能乞灵于一本名叫《金色的牛犊》的苏联小说。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骗子手别恩杰尔在成为百万富翁以后，忽然领悟到：“在苏联，绝不能拿这些钱来作为资本。”苏修经济学家竟然把这位骗子手领悟的“道理”一本正经地写进了他们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之中，当作在苏联“货币已不能转化为资本”的论据。对于这种胡说八道，人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其实，这位别恩杰尔的百万家财是通过诈骗得来的，归根到底，也就是靠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夺得来的。象别恩杰尔这样的百万富翁，正是今天苏联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首的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的逼真写照。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的苏修《真理报》有一篇小品文，它透露出来的情况，就打了这本《政治经济学》一记耳光：土库曼有个总工程师苏尤诺夫，拥有自己的牧场，养了大量的骆驼和绵羊、奶牛，需要坐上包租的直升飞机巡视畜群，并且雇工替他放牧。苏修叛徒集团能够否认苏尤诺夫的万贯家财就是他的资本这个事实吗？这万贯家财难道不正是苏联工人、农民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吗？百万富翁本身，实质上是资本的人格化。苏修经济学家妄想用一个通过诈骗成为百万富翁的人的“领悟”来否定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真是天大的笑话。

列宁在讲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的时候明明白白地指出：“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苏联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党政大权以来，所有制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蜕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农庄里面实行着对广大工人、农民实际的雇佣劳动制度，这难道不正是货币已经转化为资本的铁证吗？

理论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苏修经济学家鼓吹“三不”主义，目的无非是为了欺骗苏联人民，掩饰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但是，尽管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死死地抱住社会主义招牌不放，苏联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早就蜕化变质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也早已蜕化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了。苏修经济学家声嘶力竭地叫嚷他们那里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只能暴露他们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辩护的嘴脸。事实毕竟是事实，黑的不能说成白的，越要粉饰就越显出其丑恶。



红旗

一九七五年 9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五年第九期 目 录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鲁迅论《水浒》..... (5)

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6)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方岩梁 (8)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评《水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3)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钟 谷 (18)

叛徒的颂歌.....山东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 赵安亭 (26)

思 想 评 论

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建设.....郭 育 (33)

进一步抓好农村卫生工作.....韦 革 (36)



共产党员要增强党的观念.....闵 雪 (39)

坚持精兵简政.....兰 文 (43)

学 习 理 论 反 修 防 修

掌握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燕 枫 (47)

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

——学习《国家与革命》第五章.....钟 实 (51)

总结经验 促进学习.....李 扬 (56)

工人阶级也要不断学习和改造.....洪 滨 (58)

深入学习理论必须端正学风

.....中国共产党盘锦地区委员会 (63)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翻身农奴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朱 锋 (67)

依靠群众赢得了高速度.....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筹建指挥部 (74)

努力把基本建设搞得更好.....姚 尚 (78)

在抗灾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

.....山东诸城县新河崖大队党支部 (83)

☆八月二十八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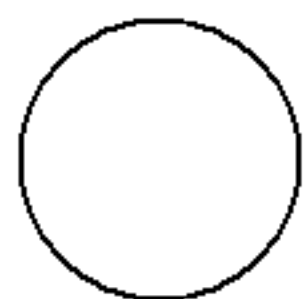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毛主席语录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毛主席语录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
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
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
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
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
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



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短评)

为了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这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之地而已。认清宋



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说,象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中的武训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

方 岩 梁

《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好作品，还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鲁迅早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后，就深刻地对《水浒》作了如下的评论：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段精辟的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揭穿了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的宋江这类投降派的真面目。《水浒》只反贪官，不反对皇帝，就连那个腐朽的宋徽宗，也被歌颂为“至圣至明”的天子，说他“求贤”，“爱民”，“博施济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奸臣”。一部《水浒》被冠之以“忠义”二字，忠于谁呢？当然只能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宋江直到临死前，还一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说宋江是投降派，“终于是奴才”，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非常杰出的领袖”，代表了整个农民阶级的意志、愿望，甚至连他的投降也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究竟是鲁迅正确，还是这些人的观点正确？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江这个人物“杰出”在什么地方。

我们判断一个人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并不仅仅看他的出身和职业，而是看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所实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



线。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对要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话：“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擢授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番话，是宋江的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擢授”农民起义军投降，把他们引进地主阶级的屠场；同时，他自己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体爬上去，借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他唠唠叨叨嘱咐武松去做的也就是这件事。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用他的投降主义的路线代替了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的世界观。“聚义”是要起义，要革命；而“忠义”则是要招安，要投降，这不明明白白地反映了两条路线的对立吗？

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都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聚义”那一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结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宋江是帝王将相和整个地主阶级的鹰犬。对于这样的鹰犬，《水浒》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义色色俱全。这种歌颂正好证明了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曾经追根溯源，指出从孔墨儒侠到《水浒》，直到清代的《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之类，前后一脉相承。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过，《七侠五义》这类小说中的侠客“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事实上，宋江同黄三太、黄天霸、展昭之流都是一路货，说得明白点，无非是皇帝或者所谓“清官”的奴才、走狗和保镖。



我们再把宋江与高俅比较一下，更可以发现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又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呢？有。高俅狗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了“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回归，宋江是由官暂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而高俅呢，一下子就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所谓“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怀才不遇”心理的绝妙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宋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士农乐业”，实际上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书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着“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悬心。结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及时雨”吗？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赞赏，原因正在于此。

金圣叹把《水浒传》砍去了二十多回，强调对宋江这样的“盗魁”，只能斩尽杀绝，决不容许招安。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谈金圣叹》的文章，批判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



就昏庸得可以。”金圣叹之“昏庸”，首先在于他不懂得起义的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别说一个“嵇叔夜”，一百个“嵇叔夜”也没用。金圣叹之“昏庸”还在于他没有看懂施耐庵、罗贯中写《水浒》的真正用意，他们正是站在金圣叹同一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才塑造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形象。他们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金圣叹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没有看破宋江这号人根本不是“盗魁”，而是地主阶级的忠实的代理人。鲁迅还生动地把《水浒》被砍的本子比喻为“断尾巴蜻蜓”。宋江投降，受招安，打方腊，这是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把这一半砍去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实了。金圣叹这一砍，由于砍掉了宋江的许多罪恶行径和丑恶表演，颇受许多为宋江唱赞歌的人们的欢迎。

“替天行道”的强盗同“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有严格区别的。鲁迅明确指出，前者是道道地地的投降派，而后者才是反剥削、反压迫、反奴役的起义农民。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事实上，即使在梁山起义军的内部，也是一分为二的。起义军多半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不少是地主阶级的破落户子弟，反动军队的士兵和军官。由于宋江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招降纳叛，拉进了大批宋王朝的高级将领，使这支起义军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起了变化。在一百零八将中间，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他们不愿意投降。吴用和阮氏三兄弟是最早跟着晁盖起来造反的。李逵更是梁山起义军中斗争最勇敢、最坚决的一个。他一听到乐和唱宋江做的那首《满江红》，就睁圆双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把桌子踢起，擗个粉碎。他根本不把大宋皇帝放在眼里，宋江不反，他要反。太尉陈宗善进山寨颁布朝廷招安的诏书，李逵不仅一把夺过诏书，扯得粉碎，还劈胸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直到小说最后，李逵一听说朝廷送来了药酒，就大叫：“反了罢！”所以宋江最不放心的就是这股“黑旋风”，一定要将他先搞死才肯闭上自己的双眼，用心实在恶毒极了。宋江同李逵们之间的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起义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为宋江辩护的人，还抬出了一个“义”字来当挡箭牌，好象宋江同所有的人都是义重如山，亲如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分什么阶级，什么路线，什



么投降派和革命派？鲁迅对于《水浒》中流传的这句口号，用一句话就戳穿了它的虚伪性：“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事实正是如此。别说在四海之内，就是在梁山泊之内，也决不是什么兄弟关系，而是阶级关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梁山起义军的内部来。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他对上是忠得很，对下又何尝把所有的人都当兄弟看待！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充分暴露了宋江的“义”的虚伪性。当招安的丑剧刚刚收场，起义军中一个军校激于义愤，杀了一个辱骂起义军的厢官。这下可吓坏了宋江，他马上要砍下军校的头，到朝廷请罪。可是还得照顾一下“义气”，于是宋江使出他惯用的猫哭老鼠的本领，“哭”了起来，叫那军校“痛饮一醉”，自己去上吊，然后再割下头来号令示众。头也砍了，“义”也尽了。对“义”的内容要作阶级分析。晁盖“聚义”，是要团结起来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而宋江讲“义”，是要用“义”来掩盖阶级的对立，调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让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宋江这种“义”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吗？李逵的悲剧正在于他吃了这种“义气”的亏，被这个“义气”蒙住了眼睛，只认“哥哥”，不认路线，识不破宋江的反动真面目，最后终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宋江这类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勾当的投降派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当他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刀光和血光之中，既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也看透了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鬼域嘴脸。“大军一到，便受招安”，马上为虎作伥，帮着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是一种；始终披着革命者的外衣，而对真正的革命者却大布围剿阵的又是一种。鲁迅写《流氓的变迁》一文，不正是要要求人民群众警惕宋江一类投降派吗？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鲁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剖《水浒》，并把现实的阶级斗争同历史的阶级斗争相对照，所以他对这部书才看得那样分明，分析得那样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我们应当认真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提高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识别能力，为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评《水浒》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水浒》虽然以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它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精心塑造并竭力美化梁山领袖宋江，来达到他鼓吹投降、反对革命的目的。宋江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而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究竟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是“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是推翻以宋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还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是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还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接受招安，充当奴才？在对待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充分暴露了投降派头子宋江的真面目和《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

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者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造反有罪。《水浒》中的宋江，跟一切反动派唱的正是同一个腔调。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等“聚义”起事，“智取生辰纲”，把封建统治者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夺回来，宋江却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这种革命行动是“犯了迷天之罪”；晁盖等人抗击封建王朝的武装镇压，打得官军落花流水，宋江又认为是干下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等人上了梁山，走上了与封建政权对抗的革命道路，宋江对他们“直如此大弄”，更是惊骇万分。总之，农民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在宋江的眼里都是无法无天，简直糟得很。

在宋江看来，造反上山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他外出避难，只有贵族柴进的门下，花荣的官军营寨，孔明的地主庄园，才是他心目中的安身之处，唯独不想去投奔晁盖。即使投案自首，刺配江州，也宁做阶下囚，



不上梁山泊。只是由于“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误题“反诗”，被判死刑，梁山好汉劫了法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万不得已，他才上山，“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其实，这只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晁盖在梁山上实行的正是一条反抗封建统治、发展农民革命的路线。他们“整点仓廩，修理寨栅，打造军器”，“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与封建统治者势不两立，随时“防备迎敌官军”。在晁盖的领导下，梁山的一些普通头领也具有反抗封建王朝、反对皇帝的革命思想。朱贵在梁山酒店里捉住戴宗，拆了九江知府送给太师蔡京的信。戴宗呵斥他：“把太师府书信擅开，拆毁了封皮，却该甚罪！”他蔑视地笑着说：“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便有利害，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

《水浒》的作者对晁盖的这条革命路线是仇视的。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他不仅把宋江送上梁山，而且有意让晁盖中箭身死。原来在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中，晁盖都在三十六人以内。而在《水浒》中，作者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无论三十六天罡，还是七十二地煞，都没有了晁盖的位置。《水浒》的作者说：“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十分清楚，晁盖蔑视皇权，对抗封建王朝，所以要他“归天及早”；宋江“尽忠报国”，能把梁山起义军引向投降，所以让他“把寨为头”。

宋江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尽管正厅上香花供奉起晁盖的牌位，上面大书“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但是，聚义厅已经改为忠义堂，全面篡改了晁盖的路线。从此，“替天行道”就正式成为宋江在梁山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口号。“替天行道”究竟是什么货色？早在宋江上山之初，作者就通过九天玄女的口告诫他：“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可见，“替天行道”就是承认封建皇权至高无上，替最高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取消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把农民起义纳入地主阶级的轨道。

路线变了，政权的性质也就变了。梁山上投降主义路线的头子宋江掌权，意味着农民阶级的革命政权变为替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权。宋江软硬兼施，用反革命的两手镇压革命派。他经常说什么“情分最重”，讲什么“死生相托”，这是他握在手里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无非是诱骗大家围着他的指挥棒转；谁要是不



把宋朝皇帝放在眼里，坚持把农民起义的事业进行到底，反对投降，他就凶相毕露。李逵反对招安，宋江立即要把他推出斩首，只是由于众人讲情，才寄下“项上一刀”，“再犯，必不轻恕”。然而，他对钦差大臣，朝廷命官，乃至前来“征剿”的反动将领，则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动辄“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宋江对谁亲，对谁恨，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实行什么阶级的专政，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这是九天玄女嘱咐宋江的两句“天言”。原意是说：遇见“忠臣”宿元景是喜上加喜，即使碰见“奸臣”高俅也不是什么凶险。宋江和高俅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地主阶级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表面看来，宋江也曾不断与北宋官军对阵交锋，他带兵攻打过高唐州、华阴县、大名府，抗击过高俅、童贯的多次“征剿”。但这只不过是反对以高俅为代表的一伙“奸邪”，根本不触动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如宋江一伙自己供认的那样：“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所以，仗打了一次又一次，而梁山泊的地盘却丝毫没有扩展。宋江一心想当奴才，哪里会去夺取宋室天下。

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梦寐以求的是投入封建统治者的怀抱，骑在人民头上，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为了达到这个卑鄙目的，他利用篡夺的权力，大造投降舆论。在一百零八人歃血为盟的誓言中，他说什么“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在菊花会上，他明目张胆地鼓吹“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还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肆贩卖“忠孝”、“仁义礼智信”和“天命观”等一整套反动思想，妄图用孔孟之道的绳索，束缚梁山起义军的思想，捆住他们的手脚。

宋江一面大造反革命舆论，一面千方百计招降纳叛。他甚至把极端仇视农民起义的富豪将吏拉上山来，扩大投降派的势力。卢俊义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这个大名府的富豪在经过梁山时，竟准备下一袋麻绳，狂妄地要单人独马捉尽梁山好汉。而且，在被俘之后，又坚决不肯“入伙”。就是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宋江却认为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贵人之相”，不仅拉他上山，而且请他坐了第二把交椅。从此，宋江找到了一个投敌叛变的得力助手。

为了投靠宋王朝，宋江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他不仅和所谓“忠臣”宿元景很早就拉上了关系，而且还向他视为奸邪的高俅卑躬屈膝，乞求招安。高俅被捉上梁山，宋江一见，慌忙扶上堂来，跪拜在地，并大摆了三天酒宴，馈赠了数千金礼



物，然后送出山寨，“专等招安消息”。宋江甚至亲自出马，溜进东京，与妓女李师师牵线，并派燕青走李师师的后门，企图讨到皇帝招安的“赦书”。

宋江叛卖革命的种种罪恶活动，引起了革命派的强烈不满和抵制。就在那一次菊花会上，宋江用《满江红》词鼓吹招安，立即遭到反对。李逵忿激地说：“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在宋王朝的几次招安活动中，阮小七目无天子换御酒，李逵撕毁诏书骂徽宗，吴用则指责宋江对招安太“执迷”了。这一切说明，梁山起义军的失败，完全是由于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而李逵、吴用、三阮等人是好的，他们是不愿投降的。然而，《水浒》的作者对于他们反招安的正义立场是不支持的，不仅对他们的每次反抗都要抬出宋江的“忠义”来压下去，而且还让这些反对投降的革命派最后都跟着宋江受招安、征方腊，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严重的歪曲。而对于宋江这个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则自始至终采取了歌颂和同情的态度，把他屈膝投降说成是“去邪归正”，接受招安是“终成正果”，甚至把接受招安的场面作为盛大节日来描绘。这就充分暴露了作者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

宋江叛卖成功，便去镇压方腊起义，恶毒地咒骂起义农民是“贼寇”，把他们“剖腹剜心”，残酷屠杀革命人民。这同他在梁山对待官军将士的态度是多么鲜明的对照！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从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叛卖活动，到直接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鹰犬，从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到赤裸裸地执行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路线，这个变化过程，正是投降派的共同规律。

长期以来，对《水浒》的大量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论点，就是所谓“农民的历史局限性”。认为农民起义只反贪官污吏，不反皇帝，只反个别地主，不反封建政权，接受招安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能看作“出卖革命”。这完全是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辩护的奇谈怪论。

中华民族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以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唐代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自



称“冲天大将军”；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这都表明他们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封建统治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说中国的农民起义不反皇帝，不反封建政权，这不仅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性，而且抹杀了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他们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斗争最后总不免陷于失败。尽管斗争失败了，但总是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绝不能把这种失败和投降混为一谈。是坚持斗争，还是一心投降，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坚持斗争，就是坚持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立场；而叛变投降，则适应地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水浒》中以宋江为头子的投降派，宣扬叛徒哲学，策动农民起义军向地主阶级投降。这种无耻的叛卖行径和“农民的历史局限性”有什么相干？斗争不屈而失败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有什么共同之处？抹杀这两者的区别，混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原则界限，是不折不扣的阶级调和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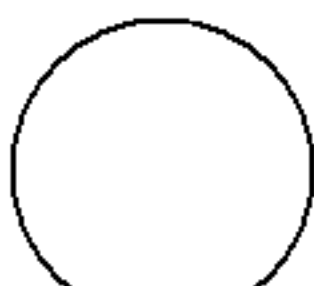
《水浒》研究中出现这种阶级调和论，不是偶然的，它和吹捧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美化封建奴才武训，歌颂农民革命的叛徒李秀成一样，都是政治思想战线上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刘少奇、林彪一类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总是利用封建文化、历史渣滓，鼓吹卖国主义、奴才思想、叛徒哲学，为他们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叛变革命制造舆论。

《水浒》是反面教材。宋江其人，不足为训。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地地道道的孔孟之徒，混进农民起义队伍，披着“仗义疏财”、“待人谦和”的种种伪装，骗取了梁山起义军的信任，干的是从堡垒内部攻破革命事业的罪恶勾当，起到了宋王朝的文官武将起不到的作用。从这个反面教员身上，可以认识什么是投降派。因此，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划清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界限，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

钟 谷



北宋末年，爆发了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有关这次起义的故事传说，广泛地流传了大约两个半世纪，到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才把它写成了长篇小说《水浒》。

《水浒》故事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渗入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适应着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政治需要，长篇小说成型的时候，宋江已经被作者塑造为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涂抹成一个满脑袋儒家思想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小说歌颂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宋江路线推行的结果，使梁山泊的农民武装变了质，被封建统治者用作鹰犬去镇压方腊起义，最后落了个“兔死狗烹”。这里面包藏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险恶阴谋，实际上是让各股农民起义军在自相残杀中旗倒人亡，而他们却坐收“渔人之利”，从而达到镇压农民起义的根本目的。所以，《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是通过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以瓦解农民起义的一部小说。

《水浒》描写了梁山泊农民起义事业的逐渐发展壮大和接受招安、走向失败的全部过程。分析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自始至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就发展壮大，路线错了，就把起义事业整个断送掉了。由于农民起义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斗争任务不同，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焦点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就《水浒》说，是两大阶段：大聚义以前，主要是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关门主义、招降纳叛的对立；大聚义以后，集中地表现为争取招安与抵制招安的斗争。

最初占据梁山的王伦是一个“落第腐儒”，他自私狭隘，嫉贤妒能，实行关门主义，阻碍着起义事业的发展。林冲火并王伦，夺了他的权，是开创革命基地的



必要措施，是正义的行动。

接着，晁盖做了梁山泊的领袖。他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坚持武装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起义队伍。晁盖一上山，立即组织起义军的力量，水陆配合，干净利落地消灭了“进剿”的官军，扎定了阵脚，稳住了局面。他和吴用、阮氏三兄弟等人亲密合作，屯粮、造船、造军器，操练人马，准备迎接更大规模的战斗。继而通过“白龙庙小聚义”、“三打祝家庄”、“三山聚义打青州”等多次战斗，狠狠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土豪地主，并把李逵、鲁智深、武松、李俊等起义英雄接应到梁山山寨。晁盖任人唯贤，论功排座，明确宣告山寨的胜利“皆托众弟兄的才能”，使得起义军团结兴旺，迅速壮大，为梁山起义事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晁盖原属地主阶级，但他背叛了本阶级，在起义英雄中颇有威望，“智取生辰纲”的集体斗争就是由他组织和领导的。案情被官府侦知以后，他放火烧了自己的庄院，率众拒捕，决心投奔梁山。晁盖是通过打击贪官污吏、反抗封建官府的斗争实践，从地主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而投身于农民起义的队伍之中的，他具有坚定的斗争精神，能够执行正确的农民起义路线。但《水浒》的作者竟然把晁盖排斥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并且让他中箭身亡，这完全是出于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政治意图而作的安排。

晁盖死后，宋江窃据了梁山泊的领导地位。他一上台，就把梁山泊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他修正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篡改农民起义军的性质的第一个明显信号。

在扩大梁山队伍的问题上，宋江接过了晁盖“招接四方入伙好汉”的旗帜，却塞进了他自己的黑货，大搞招降纳叛的活动。宋江的招降纳叛与王伦的关门主义走的是两个极端，但从路线上看，二者的根本性质是一致的，都是与农民起义的正确组织路线相对抗的。

宋江迫不及待地设下计谋，首先把卢俊义请上山。卢俊义本是大名府的一个大地主，专与农民起义军作对头，立志要使梁山泊“人人皆死，个个不留”，但却被宋江请到了山上。宋江说得很清楚，他就是要让卢俊义来带领梁山好汉“归顺朝廷”。他不但看中了卢俊义的所谓名声地位、武艺才干，甚至连卢俊义的身貌仪



表也被他认为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利条件。后来，宋江又多次对俘获的朝廷军官“亲解其缚”、“纳头便拜”，收罗了一大批降将。在劝说这些军官“入伙”时，宋江所使用的言辞是大同小异的，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宣布他准备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这些军官已经损兵折将，与其回到朝廷被问罪，倒不如权借梁山避难，日后再图升迁，于是，等待招安就成了他们“入伙”的基本条件。

上层人物麇集梁山，改变了起义军将领中阶级成份的比例，这是宋江为最后实行投降而在组织上所做的准备。宋江还把这些人物安插在重要的位置上，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其他人也多在“五虎将”、“八骠骑”之列。宋江已经篡改了晁盖的任人唯贤的原则，而把上山以前社会地位的高低作为排座次的主要依据。所以，一百零八将梁山聚义，表面看来似乎是起义军兴旺壮大的发展高峰，其实却是宋江进一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把起义事业引向失败的转折点。

离开了共同的阶级立场和正确路线，团结就势必成为一句空话。所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论“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兄弟称呼，不分贵贱”，“如念珠子，个个连牵”等等，都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正如鲁迅所说：“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阶级调和是搞不成的，用超阶级的“义气”思想维系着的表面团结是不能持久的。

大聚义之后，农民起义向何处去？是继续前进，推翻封建王朝呢？还是争取招安，向封建王朝投降？梁山泊面临着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严重问题，招安与反招安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用来对付农民起义的手段，除了残酷的武装镇压以外，还往往采取阴险的政治欺骗的办法。例如南宋时代，封建王朝由于自身的软弱，更多地采取所谓“抚”的一手，创设了“镇抚使”之类的官职，让接受招安者充任，使之镇压所辖地区的农民起义。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农民起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使得农民起义队伍中往往会出现招安与反招安两条对立的路线，这是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比起武装镇压来，招安政策对封建王朝更有利，因而，《水浒》大力歌颂宋江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完全是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革命需要。



小说的第七十一回，写了一个“菊花之会”，两条路线的代表人物之间展开了第一次尖锐的正面冲突。宋江召集全体将领，宣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望天王降诏，早招安”。主张正确路线的起义英雄纷纷表示反对。李逵愤怒地踢翻酒席，大骂起来：“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武松沉痛地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鲁智深则用直裰染皂不能洗白的比喻说明“招安不济事”，明确地表示，要招安，就散伙。菊花会上，李逵强烈地反对招安，几乎被宋江杀头，可见两条路线斗争尖锐、激烈的程度。宴会结束时，对宋江的招安主张，“众皆称谢不已”。交锋的结果，投降主义路线占了上风。

《水浒》里的农民起义路线的具体内容，可以用李逵不止一次地宣称过的口号来表述，那就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起义英雄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他们要推翻现有的王朝，打倒现有的皇帝。这条路线，充分体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体现了革命农民在与阶级敌人英勇斗争中的坚定性。

梁山泊里的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双方的营垒有个明显的分界：出身下层的和真正从封建阶级当中分化出来的起义英雄们是反对招安的；那些出身上层，对当朝皇帝忠心耿耿，权借梁山避难的人们，则跟随宋江走招安的道路。前一类英雄主要是受剥削、受压迫最深重的劳动人民，现实生活中的贫困与不平，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斗争，他们那种强烈的革命精神是极其可贵的。后一类人物就不然了，他们本身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与王朝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被迫上山，身在水泊，心怀朝廷；他们只能从切身遭遇和个人恩怨出发反对某些贪官，而他们的与某些贪官的矛盾斗争也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的矛盾斗争。

宋江依靠着起义队伍中的一大批上层出身的人物，利用了他在起义军中窃取到的地位和权力，特别是利用了起义英雄们由于受到“义气”的束缚而对他的信赖，强制地推行了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小说作者在大力宣扬这条反动路线的同时，对起义英雄们的抵制行动也作了一些描述，例如：李逵撕诏书，痛打陈太尉，阮小七偷换御酒，李俊、张横杀死俘获的敌将，都还算是比较突出的事例。



但是，作者不过是把这些内容摆在陪衬的地位，在乌云漫天的形势下，他们的抵制并未能扭转局面。

宋江在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争取招安的过程中，与封建朝廷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他要卖身投靠，也必然要把农民起义军的实力当作他进身的本钱。三败高俅，两赢童贯，从宋江的目的来看，是为了打个样儿给皇帝看看，显示显示力量，以便在接受招安的条件上跟朝廷讨价还价。结果并不象宋江想的那么美妙，诏书虽然换了几次，但只不过是“敕令”与“安抚”的语气上有所差别，封建朝廷没有让步，宋江却露尽了摇尾乞怜的丑态。

为了早日得到皇帝的一纸招安诏书，宋江用尽了心机，使尽了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场中那一套腐败的东西他都使出来了。我们十分厌恶地看到：他和高俅握手言欢，举杯共饮，低三下四地拜托人家乞求皇帝恩赐招安；他派人带上金银珠宝偷偷地去宿太尉家送贿赂，托人情；甚至他自己还亲身潜入皇帝的姘头、妓女李师师家里去探听门路。这一切都说明，随着投降主义路线的步步推行，宋江这个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丑恶嘴脸，暴露得越来越清楚。

宋江有一个暴露的过程，人们对他也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当诏书下来，接受招安已成定局，他向全体起义军宣布的时候，“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许多士兵都不跟着他走了。一百零八将，由于“义气”的维系，暂时还没有散伙。但是，往日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去征方腊的过程中，一百零八将“十停去七”，死亡大半，剩下来的起义英雄也逐渐从血泊中认清了宋江路线带给他们的悲剧。

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不但断送了梁山泊的农民起义事业，最后也断送了他自己。当他给封建统治者效过犬马之力以后，还是被御赐的毒酒杀害了。他临死还表白说：“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至死不忘投靠皇帝。至于立庙封神的尾声，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统治者赏赐给宋江这个忠实奴才的一点最后的精神安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布下新的钓饵，以免让宋江的可耻下场堵塞了其他人接受招安的道路。



从《水浒》所描写的农民起义事业的发展壮大和走向失败的全部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武装镇压，扑灭不了梁山泊的革命烈火，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瓦解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路线决定成败，路线决定一切，这是我们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得到的启示。

《水浒》的全部内容，贯穿着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受了招安。正如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所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因为不反皇帝，所以宋江路线支配下的反贪官，就必然是从维护和巩固现有封建王朝的反动政治目的出发的，是奴才帮助皇帝整顿朝纲的一种效忠行为。受招安是忠于皇帝，反贪官也是忠于皇帝。与宋江路线相对立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农民起义路线，它的核心恰好是要打倒现有的皇帝。李逵等起义英雄也反贪官，但与宋江的反贪官有着本质的区别。起义英雄们是把反贪官作为农民革命的斗争任务之一，作为推翻现有封建王朝的必要步骤之一来看待的，他们的设想是从江州打到东京，反了贪官就反皇帝，自下而上，步步推进。所以，在《水浒》里，反不反皇帝，是区别农民起义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分水岭，是鉴定英雄和奴才的试金石。

《水浒》大力宣扬的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观念，是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熏陶。他“于家大孝”，被称为“孝义黑三郎”；他又自称“呼保义”，以下级武官“保义郎”自居，表示了他对当朝皇帝的忠心。翻开《水浒》，宋江忠君孝亲的言行触目皆是。忠与孝，是宋江一生立身行事的根本指导思想。他理想的人生道路，他的所谓“凌云志”，也不外是“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为封建阶级建功立业，追求个人的升官发财而已。但是，在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宋江不但没有能够由刀笔小吏逐级升迁，反而在矛盾交错的现实生活中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波折，受到了贪官污吏的迫害，直到被梁山好汉从法场上解救出来，才不得已而上山的。宋江上梁山，并不是投身于农民革命，而是“暂占水泊，权时避难”，继续等待时机，报效



朝廷。他始终认为上梁山是“造恶甚多”，一直怀着诚惶诚恐而又焦灼急迫的心情等待皇帝“赦罪招安”。这便是宋江制定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水浒》大肆鼓吹的“替天行道”，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

宋江上梁山之后，《水浒》紧接着就安排了“九天玄女授天书”的荒诞情节，所宣“法旨”的核心内容就是“替天行道”。这里，作者拣起了儒家“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那一套，给宋江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涂饰了一层“天命论”的神秘色彩。“替天行道”的“天”，指的就是当朝天子宋徽宗；“道”，指的就是儒家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也就是孔孟之道。在《水浒》的作者看来，封建皇帝是“君权神授”的“真命天子”，封建统治之道是合理的、长存的；宋徽宗是当朝的“圣明天子”，只因受了奸臣的闭塞，故而其道不行，所以才需要宋江那样的“星主”出来“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也正是为了达到“替天行道”的目的。

宋江从“九天玄女”那里领来了“替天行道”的“法旨”，随即逐步地贯彻推行。晁盖一死，他就经常把这话挂在嘴边，到一百零八将大聚义的时候，也就是到了他大力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关键时刻，就在山顶上树起杏黄旗，把这四个大字的政治纲领亮了出来。“替天行道”这个口号在《水浒》中出现的时候，又往往和“全忠仗义”、“辅国安民”以及反对贪官污吏等等内容相提并论，用儒家那种虚伪的“爱民”谎言把它的实质加以装潢，所以它也就往往带有颇大的欺骗性。我们从反儒批孔的角度一分析，它的反动实质就看清楚了。宋江的“替天行道”与孔丘的“克己复礼”，一个是为了维系已经腐朽了的宋朝皇帝的封建统治，一个是为了维系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二者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反动货色。

《水浒》大肆鼓吹的“义气”，是宋江用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策略。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水浒》里所描写的弥漫于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义气”，是封建社会中的小生产者的一种道德观念。“义气”往往遮挡了起义农民的眼睛，使他们上当受骗。宋江正是利用了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义气”，搞“结义拜盟”，耍两面派，使大批起义军将领象被戴上了枷锁似的，不得不让他牵着鼻子走。



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惯用“乐善好施”之类的欺骗手段邀买人心。他是戴着“山东义士”的面具，顶着被吹捧起来的“及时雨”的大名声上了梁山的。上山以后，又用“仁慈宽厚”、“体恤弟兄”的笼络手段对待山寨将士，也曾经暂时骗取了起义群众的信任。当他的路线得以推行，受了招安，当上了封建朝廷的官儿以后，假面具也就摘下来了。“滴泪斩小卒”就是一幕绝妙的讽刺剧。宋江打起十足的官腔，滴着鳄鱼的眼泪，杀害了富有反抗斗争精神的起义军小校，为了表示他对朝廷的忠心，不惜拿起义军的生命当作牺牲。他一面冷酷地指斥小校“须是要连累我等”，一面虚伪地剖白自己，说什么“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前后一对照，宋江的两面派嘴脸暴露无遗，“义气”的欺骗性也暴露无遗了。

抓住《水浒》里的路线斗争，问题就容易认识清楚了。小说里的宋江被作者百般美化，大力歌颂，但他的狐狸尾巴毕竟是隐藏不住的，我们通过阶级分析，就能看清他的投降派嘴脸。《水浒》颂扬了一条反动的投降主义路线，肯定了一个丑恶的投降派人物，所以说，它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

〔作者附记〕一九七二年，我们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曾写了《〈水浒〉的思想和艺术》一文（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四部古典小说评论》一书中）。当时由于我们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所以没有认清《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面教材，对投降派宋江也作了错误的评价。后来，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开始认识到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一九七三年年底，我校收到山东省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赵安亭同志的来信，对上述文章提出了批评；同时还寄来《叛徒的颂歌》一文。校党委十分重视这封来信和这篇文章，要我们认真研究。去年春天，赵安亭同志应邀来我校做报告，促进了我们对《水浒》问题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以“钟谷”为笔名，写了《从〈水浒传〉的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一文（原载一九七四年第二期《南开大学学报》）。这篇文章，力图从路线上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进行分析和批判，但还做得很不够，这次转载时，换了题目，内容也作了一些修改。



叛徒的颂歌

山东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 赵安亭

八百多年前，宋江等三十六人领导了山东、河北一带地区的农民起义，进行了反对宋朝统治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真宋江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而被称为“天魁星”、“及时雨”的假宋江的故事，却在人们中间流传着。系统地宣扬、歌颂这个假宋江的，就是号称中国古典文学光辉巨著的《水浒》这部书。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下，《水浒》中描述的宋江，并不是农民革命战争的坚强领导者，而是农民革命阵营中的叛徒。《水浒》不是满腔热情地歌颂在风浪滚滚的阶级斗争中诞生的人民英雄及其领袖人物，而是歌颂了农民起义中的叛徒；不是揭示农民起义英雄的革命品质和斗争精神，而是歪曲、丑化农民起义英雄的革命形象。这部书对宋江的描写，是对农民革命阵营中的叛徒的一支颂歌，是一种破坏、瓦解农民起义队伍的腐蚀剂。

梁山泊中的阶级阵线和两条路线斗争

梁山泊一百零八将来自各个阶级和阶层，真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从其阶级成份上分析，主要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原来曾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官僚。

以李逵为代表的，包括三阮等一派，有农民、渔民、猎户、开店的、卖艺的、屠夫、奴仆等。他们身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在长期阶级斗争中养成了“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革命精神，坚决地参加起义队伍，反对投降。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特别是李逵，出身在一个给人家做长工的贫苦农民家庭，在他身上，表现出农民起义英雄光明正大、疾恶如



仇、英勇战斗、反抗到底的无所畏惧的英雄品质。这些人是梁山泊中基本的阶级队伍，是农民起义的真正英雄。

而善于玩弄权术的宋江，出身于州县闻名的“有钱帛使用”的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因“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做过封建官吏，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卫护士。当他杀死侍妾，刺配江州，路经梁山泊时，晁盖等人劝其入伙，他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决不肯造反。在浔阳楼误题反诗，被定成死罪，梁山英雄从法场上救出他后，不得已上了梁山，但他却“身在曹营心在汉”，说什么：“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宋江是不会反对他自己的阶级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在斗争中的表现，在几次战役中，每遇战况艰苦的时候，众兄弟拚死向前，而宋江却“撒了剑，拨回马先走”，“飞马慌忙便走”，活现出叛徒的一副“软骨头”相。

在梁山起义队伍中，还有的是长期统治人民的官吏，有的是名震一方、广有家财的大地主，有的是专门镇压人民起义的剑子手，还有的是家藏“丹书铁券”的王爷后裔。他们虽然参加了起义行列，但起义的动机与李逵等被压迫阶级是完全不同的。有因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吃了官司无处躲身，只好“暂占水泊，权时避难”的，有因进剿梁山泊而被俘虏，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将来“去邪归正”而临时投降的。他们归顺起义队伍的目的是：“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

梁山泊内部阶级阵线不同，必然出现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判断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首先应看他的政治主张和执行什么路线。

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彻底推翻宋家王朝。在李逵这些农民起义英雄们看来，反对贪官污吏，推翻宋朝皇帝，是起义军天经地义的目标。这是一条正确的、彻底的革命路线。

以宋江为头子的投降派，却提出了一条搞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宋江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根本不想背叛朝廷，他的理想是“唯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提出



“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只等朝廷招安”的路线。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路线。

这条投降路线，贯穿于宋江在梁山泊的整个行动中。在他坐了第一把交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这件事在书中所费笔墨甚少，但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意味着，宋江力图把原来是背叛朝廷的叛逆者们聚义的地方，变成大宋朝廷的忠臣良将们汇集的场所，把敢于背叛朝廷的“乱臣贼子”，变成朝廷的“忠臣”、“义士”，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纳入忠于朝廷、为反动统治阶级利用的轨道。这一行动为后来宋江率众投降，接受朝廷招安打下了基础。

宋江提出的政治口号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天道”是什么？汉朝奉行孔孟之道的反动儒生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是“天的儿子”，是代表“天”的，皇帝实行的“王道”就是“天道”。而“王道”就是按照儒家的理论，建立起地主阶级对农民长期统治的政治秩序，是反动统治阶级欺骗劳动人民的弥天大谎。鲁迅说得好：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宋江所说的“忠义”是什么？说穿了就是只准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任统治阶级宰割，而不准起来革命。宋江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就是他自己对“忠义”的表白。几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总是用“王道”、“忠义”来欺骗人民，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宋江替反动统治阶级说话，妄图用“替天行道”的口号欺骗梁山英雄，用“忠义双全”的精神枷锁把梁山英雄的手脚捆绑起来，为他搞投降制造理论根据。

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对待农民起义，总是采取反革命的两手策略，或者是赤裸裸的武力讨伐，血腥镇压；或者是名曰“招安”，诱其投降，以分化瓦解，逐步消灭。宋王朝也不例外。东京太师蔡京，“初意，亦欲苟且招安”。谏议大夫赵鼎上奏云：“不若降赦赦罪招安，诏取赴阙，命作良臣，以防边境之害。”宋江提出“只等招安”的投降路线，与宋王朝的策略不谋而合，完全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决不是偶然的，是其阶级本性决定的。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水浒》中的宋江不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而是一个混进起义军内部并篡夺了领导权的叛徒。



《水浒》为叛徒唱赞歌

如果《水浒》是一部描写农民革命战争的小说的话，它就应该满腔热情地歌颂以李逵为代表的真正的农民起义英雄，揭示农民起义英雄的革命品质和斗争精神，彻底地揭露、鞭挞宋江假起义、真投降的反动面目和本质。事实上却相反，《水浒》对以李逵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英雄极尽歪曲、丑化、谩骂之能事，而对于宋江一伙叛徒的描写，则用尽了歌功颂德的辞藻。

《水浒》是怎样歌颂宋江等人的呢？

一、为他们树旗挂匾，给他们封上一顶辉煌的头衔，什么“及时雨”、“玉麒麟”、“入云龙”、“百胜将”等。同“黑旋风”、“活阎罗”、“母大虫”等相反，这些名贵的称号，似乎表明这些人是人间的豪杰，是天生高人一等的，是受到群众爱戴和称颂的人物，以此掩盖叛徒的真面目。

二、吹嘘他们是出身富贵，不同平凡的正派人物。他们有的是名震一方的大地主，有的是将门之后，有的是家有“丹书铁券”的贵人，有的是智勇双全的大将军，还有能“呼风唤雨”的神仙。总之，吹嘘他们都是忠臣义士，孝子贤孙，是“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的英雄，是起义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顶梁柱，只有他们才能担当起领导起义军的重任。

三、对投降派的头子——宋江的描写，更吹捧美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首先，说宋江是出身于财主家庭的官人，“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是个文武双全的正人君子，早就具备了领导人民，管理国家，担任起义军领袖的才能。在上山前，他就“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又好“济人贫苦，赍人之急，扶人之困”，是受苦人民的“及时雨”。“满县人见说拿得宋江，谁不爱惜他”，似乎地主官吏宋江，受到了人民广泛的爱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岂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而热爱地主和封建官吏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宋江偌大一个家业的开销，和平时“仗义疏财”的银钱，都是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怎么可能得到人民的



拥护和爱戴呢！

其次，吹捧宋江是完全符合“孔孟之道”的忠臣、义士、孝子。书中说宋江“以忠义为主”，“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而宋江也口口声声地教训众兄弟要“忠义自守”，“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助于国”。他自己处处忠于王法，就连别人要打开他颈上的行枷他也不让，说什么“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足见宋江完全是一个忠心耿耿维护地主阶级法统的奴才。

“忠”是反动奴隶主代表人物孔子提出的，并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统治服务的。“忠君”和“造反”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观念。死抱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为臣尽忠，死而无怨”这种“忠君”思想的人，怎么能起来革命呢？宋江参加起义队伍不过是因为“官吏污滥”，“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将来仍要“尽忠报国”。请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宋江，能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吗？

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权总是和神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统治阶级要巩固政权，就必然求助于神权。《水浒》中的宋江，被描写成为天降人间的星宿，又有“九天玄女娘娘”的“天书”经常看习，所以成了神的代表，是有先见之明的人。梁山泊起义军所以能够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并不是起义英雄浴血奋战的结果，而是宋江的“天才”和“天书”指导的结果，是神的意志。信神信天的人不敢反对“天子”，这是必然的规律。《水浒》鼓吹神和“天书”的用意就是要吓唬起义的人们，没有“天书”和神的指示，是打不过官家的，“趁早投降吧”！

四、书中吹嘘宋江提出的“只等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是正确的，得到大家拥护，使四方豪杰归附。似乎梁山泊之所以兴旺发达，一百零八将之所以聚集起来，全靠执行这一路线得来的。但投降路线只能引导起义走向失败，而不会走向胜利，一百二十回本反映了这一结果。

综上所述，《水浒》这部书歌颂农民起义英雄及其正确路线是假，歌颂起义军内部的叛徒及其投降路线是真，说《水浒》对宋江的描写是一曲叛徒的颂歌，是丝毫不会冤枉它的。

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



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每一个阶级都要利用文艺塑造和歌颂本阶级理想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水浒》歌颂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义士、孝子，而不是歌颂农民起义英雄。《水浒》歌颂混进起义队伍中的“忠臣”宋江及其投降路线，其本意就是要把农民起义军纳入封建统治阶级的轨道，都象宋江那样做个“忠臣”，最后走上受招安的道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这一点，在一百二十回本中得到了证实。在宋江投降路线支配下的梁山将领们，升官的升官，许多人都达到封妻荫子，耀祖光宗的境地，即使被打死、被害死的也得到了追封。在《水浒》作者的笔下，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终于风平浪静了。《水浒》为哪个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不是很清楚吗？

《水浒》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



《水浒》是一部有毒的书。这部书确实达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艺术上的统一，无疑对反动统治阶级有利。因此它历来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重视，用以大量宣传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以期达到磨灭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记得旧时舞台上的宋江，总是站在舞台中央的，白脸、乌须，堂堂正正的汉子，从未听到有人说他是乱臣贼子。而真正造反的“山大王”，都是凶恶的大花脸，和宋江是不一样的。可见反动统治阶级喜欢宋江这样的“农民起义英雄”，也特别喜欢《水浒》这部书。如果我们今天说《水浒》是歌颂农民起义的，有革命性的作品，那实在是歪曲了《水浒》的本意，在九泉之下的施耐庵，定会骂我们不懂他的真意的。

元朝末年，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风起云涌。元朝统治阶级风雨飘摇，预感到末日的来临，采用残酷镇压和诱降招安的两手政策，疯狂地向农民起义反扑。在这种激烈的阶级大搏斗的形势下，《水浒》的作者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恶毒地咒骂农民起义，替反动统治阶级出谋画策，抛出了《水浒》这



株大毒草。它把人民所受的疾苦说成贪官污吏不执行“孔孟之道”的结果，说什么高俅等贪官，“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说什么皇帝“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它用高官厚禄，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为诱饵，欺骗农民起义英雄掉转枪头去替宋王朝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妄想转移农民起义的大方向，把农民起义引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受招安的邪路上去。但这样做却露了马脚，泄漏了反动统治阶级编写《水浒》的“天机”，引起革命人民对宋江式的叛徒的警惕。还是清代那个反动文人金圣叹狡滑，他腰斩《水浒》，改为七十一回本，以图达到欺骗人民、腐蚀革命的目的。

既然有毒就该废掉吗？不可。有些剧毒的东西恰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甚至腐烂不堪的东西也大有用处。如人畜粪尿，臭而且脏，若随地抛弃必将污染环境，但经过堆集发酵，却成了农民种地时不可缺少的农家肥。《水浒》唯其毒性很大，善为处之，真可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有用的肥料。

尤其是《水浒》中描绘的宋江，与当代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有某些共同的特点。细读一下《水浒》，认清宋江这个叛徒的面目，对于帮助我们提高识别真革命同假革命，识别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能力，进一步认清刘少奇、林彪一类投降主义的嘴脸，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水浒》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

值得提出的是：《水浒》七十一回本写得较隐晦，宋江的叛徒嘴脸也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正象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还未彻底暴露前一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起着从内部破坏革命的作用。而一百二十回本中，把宋江屈膝投降，叛变革命，反回头来帮助反动统治阶级屠杀农民起义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会擦亮人民的眼睛，引起革命人民的警惕。所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金圣叹腰斩《水浒》，改为七十一回本。如果我们今天也只用七十一回本，那正好称了金圣叹的心愿，他是会感激我们的。我们切不可上这个当，也应该出版一百二十回本，让革命群众看看宋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思想评论

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建设

郭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指引下，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体育活动进一步蓬勃发展，一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具有新的精神面貌的体育队伍，正在迅速成长。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提高，并通过体育活动进一步发展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必须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建设，把这支队伍带好。

无产阶级体育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它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我们现在的体育领域，不可避免地还存在旧体育的痕迹。在这个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资产阶级体育的传统观念，都在侵袭着我们的体育队伍。因此，任何把体育看作单纯的“娱乐”，把体育阵地看作“世外桃源”，因而放松体育队伍思想建设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错误的。

修正主义体育路线反对抓体育领域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主张技术挂帅，技术第一。刘少奇、林彪一伙说“打球就是革命”、“拼命练就是政治”，目的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政治对体育技术工作的统帅作用，使我们放弃体育队伍的思想建设，以便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广大青少年，把社会主义体育蜕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但其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技术第一”、锦标主义思想在体育队伍



中，在训练、竞赛等方面，还时有表现。要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建设，就必须继续批判这种错误思想。

在体育队伍中有“一招鲜，吃遍天”之类的说法。这无非是说技术有一手，名利到处有，有了体育技术就有了一切。这种思想，对体育队伍来说，是一种腐蚀剂。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运动员提高体育技术水平，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有了这种明确的目的，运动员就肯为革命而锻炼，肯吃大苦，耐大劳，从而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这对许多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都是有着亲身体会的。我国登山运动员，两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都是最好的证明。相反，受了“一招鲜，吃遍天”思想的影响，为个人的名利而练，平时总是患得患失，比赛时一脑袋私心杂念，是很难取得好成绩的。急于得到“一招鲜”，结果却练不出真本领，这种例子是不不少的。退一步说，这种人即使练出了本领，如果不克服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任其膨胀下去，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不能“吃遍天”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有“一招鲜，吃遍天”思想的人，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面前，终究是要吃败仗、跌交子的。我们的运动员是党和人民培养的，一定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为革命而掌握技术的思想，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运动员。

“技术第一”、锦标主义，不只在运动员、教练员身上有所表现，在某些体育干部中也有反映，而且常常是干部影响群众。例如，有的同志对在比赛时拿到名次的运动员就笑脸相迎，否则就冷眼相待。运动员刻苦锻炼，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是应当祝贺的。但最好的祝贺应该是帮助他们从思想上、技术上总结经验，鼓励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推广他们的经验，帮助其他运动员进步。运动员取得的成绩，获得的荣誉，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如果用不正确的办法加以不适当的“照顾”，甚至搞物质刺激，就会使他们滋长“技术第一”和骄傲自满的思想，扩大运动员之间的差别，影响体育队伍的团结，这同真正关心运动员岂不是南辕北辙吗？我们体育战线的各级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

对体育队伍下工厂、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需要继续提倡。技术水平的提高，不完全取决于训练时间的多少，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看人的思想觉悟高不高。实践证明，把转变运动员的思想放在首位，坚定不移地引导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合理地安排训练时间，技术水平是能够迅速



提高的。运动员都是青少年，他们缺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如果只把他们关在体育馆里和运动场上，长期脱离工农，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他们就会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同工农结合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不能把到基层表演几场，听听热烈的掌声，受到热情的招待，就当作同工农结合了。每年都要安排一定的时间，组织运动员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接受再教育，并辅导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我们一定要把运动队办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学校。

毛主席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我们批判“技术第一”，决不是不要技术。恰恰相反，批判的目的，正是要发挥无产阶级政治的威力，“抓革命，促生产”，用政治去统帅技术，为革命去掌握技术，尽快地把我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搞上去。那种由于批判“技术第一”而不敢抓训练、技术的倾向是错误的。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完全离开体育业务工作去做。广大运动员最经常的工作就是锻炼、训练和比赛。他们的思想情况，很多都在这些活动中表现出来。不敢抓技术训练，政治思想工作就不能搞得生动、活泼，收到实效。我们要认真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方针，鼓励和提倡为革命大练基本功，“对技术精益求精”。同样，批判锦标主义，也决不是不要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在比赛中，应当贯彻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发扬力争上游、勇猛顽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作风。实际上，“技术第一”和不抓技术，表现不同，本质一样。我们肃清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要结合每个单位的具体情况，抓住当时当地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倾向进行批判，不能千篇一律，否则就会影响到批判的效果。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对于加强体育队伍的建设，开展体育战线反修防修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我们要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密切联系体育战线的实际，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认真改造世界观。同时，继续搞好训练和竞赛的改革，从各方面进一步清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影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体育战线出现了许多新生事物，例如工农兵评论体育、评论竞赛，实行开门训练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些对于体育队伍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必须不断总结经验，长期坚持下去。我们要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际行动，来迎接即将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我们相信，通过这次全运会的召开，必将把体育领域的斗、批、改大大地推进一步，把我国体育运动的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



进一步抓好农村卫生工作

韦 革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为开展卫生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前程。十年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城市医务人员下农村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变。

但是，在农村卫生面貌发生了这一系列革命性变化以后，能不能说“可以放松一下”农村卫生革命了呢？不能。当前，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的推动下，进一步解决好几亿农民的防病治病问题，仍然是摆在卫生战线各级领导和广大医务工作者面前最重要的工作。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城市和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不同，是城乡差别的表现之一。这是长期以来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和弊病。消除这种痕迹和弊病，决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一伙推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置广大贫下中农的生老病死于不顾，妄图使医疗卫生方面的城乡差别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农村的卫生事业才出现了目前这种蓬勃发展的良好形势。但是，从逐步缩小医疗卫生方面的城乡差别的要求来看，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还只是迈出第一步，以后的任务还很多，很重。卫生工作要为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就必须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

不能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同做好城市卫生工作对立起来。城市里有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搞好城市的卫生工作，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向来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重视和关心的问题。城市卫生工作中有一些事，如克服资产阶级医疗作风，消除“三废”污染等，还必须花很大力气去抓。任何放松城市卫生工作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问题是，城市



的卫生工作，是否一定要通过削弱对农村的支援才能搞好呢？不是的。同农村比，城市搞好卫生工作的条件优越得多。只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进一步搞好斗、批、改，加强医务人员的思想改造，使他们牢固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歪风邪气，限制卫生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法权，城市卫生工作是在大力支援农村的同时搞得越来越好的。城乡卫生工作是互相影响的。有几亿人口的广大农村卫生工作上不去，城市卫生工作也必定受影响。反之，城市支援农村，农村卫生面貌迅速改观，又可以促进城市卫生工作的发展。有的同志说，“已经抓了几年农村，现在该抓抓城市了”。言外之意是，要搞好城市卫生工作，就只能放弃农村这个重点；要是重点在农村，城市卫生工作就只能放松不管。这种把搞好城市卫生工作和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截然对立起来的思想，实际上仍然是轻视农村卫生工作的表现，是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影响没有肃清的表现。

卫生工作的重点既然放在农村，那么这个重点如何抓法？近几年的经验证明，搞好农村卫生工作，决不只是简单地把人力、物力、财力投到农村的问题。城市的支援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发动农村广大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办医办药。当前的中心问题是要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制度和继续培养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虽然已经办了不少，但是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区，特别是有些牧区和边远地区，还有空白点。有的同志强调自己那里“情况特殊”，不能办合作医疗。这主要是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力量和人民群众办医办药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只要到农村走一走，看一看，认真做点调查研究，就会发现，那里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已经有了发展，同旧社会相比，贫下中农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办好合作医疗的基本条件是具备了的。所谓“特殊”，无非是同其它地区相比，经济条件目前还差一些。但是，经济条件差，卫生条件也差，缺医少药的状况更严重一些，说明那里举办合作医疗，有着更加“特殊”的需要。经验证明，只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大搞中草药，就是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社队，也完全能够办好合作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了，社员群众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就能更好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而较快地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如果只是坐等条件，那就是一种无所作为的懒汉思想了。

已经办起合作医疗、培养了赤脚医生的地方，还有个巩固提高的问题，有个究竟按照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題。一提到合作医疗的发展，有人总是习惯地想到城市大医院的样子。对赤脚医生，总是希望他们穿起白大褂，戴上白口罩，来个



“坐堂行医”。这其实并不是对他们的爱护。合作医疗是广大贫下中农依靠集体力量同疾病作斗争的伟大创举，它适应当前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需要。如果硬是不切实际地追求“大、洋、全”，就磨灭了它的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革命精神，这岂不就走上了邪路？赤脚医生是卫生队伍中的新生力量。他们又是农民，又是医生，打破了卫生领域过去那种当了医生就要脱离体力劳动的旧规矩，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束缚。它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原因之一正在于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要逐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个前进的方向。如果使他们脱离农业集体生产劳动，脱离群众，这岂不是促使新生事物向旧事物看齐？赤脚医生脱离了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就不再是赤脚医生了，慢慢就会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腐蚀，就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少数人服务，为个人谋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原则，决不能倒退。

赤脚医生到底能不能做到既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又给社员群众看病治病？可以做到的。许多情况下，在劳动的过程中就可以看病。因为社员群众是小病不下“火线”的，能够到生产第一线看病，正是赤脚医生深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另外，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有许多是同当地的劳动条件、生活环境有密切联系的。经常参加劳动，还能找出当地防治这些疾病的具体方法来。同样的病，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其治疗方法虽然大体相同，但也要因人而异。掌握这种差别，才能提高疗效。这只有在同社员群众长期的共同劳动中，了解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其它情况，才能做到。这样的防病治病的实践，是赤脚医生学习技术、提高技术的大课堂。广大赤脚医生只要在劳动中注意改造思想，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能够创造出许多正确处理劳动和看病关系的宝贵经验来。山西省昔阳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开展卫生革命，全县赤脚医生每年平均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二百五十天左右，防病治病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昔阳能够做到的，别的地方难道不能做到？

卫生领域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还将是长期的。在那里资产阶级影响很深，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还严重存在。我们卫生战线上的同志，要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就必须联系实际，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们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出发，弄清楚为什么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弄清楚卫生领域里哪些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如何支持它；哪些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如何战胜它。这样，我们才能坚持卫生革命的大方向，继续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



共产党员要增强党的观念

闵 雪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问题时说：“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我们全体共产党员，要按照毛主席这个指示自觉地检查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用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不断增强党的观念。

毛主席一贯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共产党员要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光辉著作里，毛主席曾经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观点、党的观念不强和党性不纯的表现，尖锐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领导全党开展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时，又明确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主席在这里所讲的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就是要求党员树立坚强的党的观念，不断增强无产阶级党性。长期以来，我们党遵循毛主席的建党思想，联系革命斗争实际，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与此相反，叛徒刘少奇、林彪则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建设，反对党的领导，散布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在党的组织和党员中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其目的，是妄图从党员头脑中根本取消党的观念，削弱以至瓦解党的组织，以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破坏党的建设的罪行，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促进了全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大团结，广大党员党的观念不断增强，各



级党组织战斗力日益提高。我们党正在朝气蓬勃地领导全国人民为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而奋勇前进。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实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头等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各条战线和各项事业中的领导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同时，必须教育广大党员增强党的观念，使全党同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统一思想，严格纪律，整齐步调，更好地带领广大群众去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增强党的观念，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增强执行党的路线的观念，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历史经验证明：党的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党中央在社会主义时期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作出的重要决定和指示，都是根据党的最终奋斗目标 and 一定阶段革命任务的需要，也是为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任务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我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而提出来的。按照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我们党就能始终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各项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就能胜利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就能不断巩固，党的建设也能不断加强。反之，如果离开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执行不坚决，甚至歪曲篡改，阳奉阴违，必然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危害，党的建设也会受到削弱和破坏。所以，看一个党员党的观念强还是不强，党性纯还是不纯，首先要看他对待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指示的态度如何。我们一定要严格遵照**“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在思想上把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增强党的观念统一起来。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指导，不断增强执行党的路线的自觉性，加强组织观念，遵守党的纪律，保证我们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心目中没有党的组织，行动上不服从党的纪律的人，不但不能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而且难免要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翻筋斗。

毛主席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



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实践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真正树立党和人民的利益、全局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是增强党的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作风侵蚀的根本途径。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和建党宗旨，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和最高愿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必须懂得：他不是自己个人利益的代表者，不是某一派别或小集团利益的代表者，而应是为党和人民利益献身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无论他在哪个工作岗位上担负什么职务，都是党派他去的，他只有完全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指示的义务，绝对没有离开党的指示自己另搞一套的权利。他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办事情，想问题，都必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使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几十年来，在党的教育下，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正是这样做了，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今天，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我们更需要这样去做。如果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为了迎合自己周围一部分群众的不正确思想和情绪，不顾党的全局利益，凡是符合个人利益和自己小团体利益的事情，就劲头十足去干，否则，就消极抵制，甚至公开反对，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小团体主义，表面上看来似乎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它在党内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是在必须克服之列的。列宁说过：“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参加无产阶级先锋队行列的每一个共产党员，决不应该把自己降到一般群众的水平，迁就一部分群众不正确的要求，而是要用党的思想和政策去统一群众的行动，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政策的水平，带领群众为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是否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否具有坚强的党的组织观念，这是衡量一个党员党的观念强不强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它在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我们每个党员务必懂得服从党的组织的重要性，自觉地把个人置于党组织之中，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离开了组织，不



管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大，在革命斗争中也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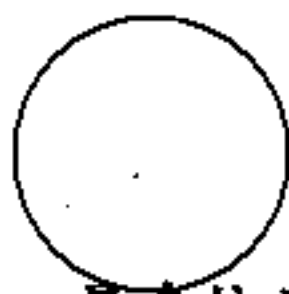
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是共产党员党的观念和党性强的表现。各地方、各部门党的组织以及党员个人，首先要从高度的党的观念和全局出发，服从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党员个人或党的下级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党组织和上级党委作出的、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定或指示。任何否定党组织领导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闹资产阶级派性，只能危害党的团结，削弱党的战斗力，必须坚决反对。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曾经深刻地批判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指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使广大党员充分认识它只会“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在组织上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包括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拿出办法；上级机关要了解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要慎重，一经决定，就须坚决执行；党的决议要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传达；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作出执行上级机关指示的决议等。我们要坚决地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几条办，以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保持党内上级与下级、个人与组织、同志与同志之间的正确关系，使党更加有战斗力。

增强党的观念、加强无产阶级党性的过程，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过程。因而，它就不可能是和平地自发地进行，只能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来实现。放松党内的思想斗争，放松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势必给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造成有利条件。在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要对党员认真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教育，进行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不断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包括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旧的传统和习惯，同一切削弱党的观念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每个共产党员，无论是入党时间较长的老党员，还是入党不久的新党员，都要自觉改造世界观，“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自己，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增强党的观念，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努力做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坚 持 精 兵 简 政

兰 文



精兵简政，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向全党提出：要“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又多次强调要精兵简政，改革国家机关，建立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许多部门、单位认真进行了精简，打破了重叠的机构，大批干部深入实际，加强基层领导，或者轮流到五·七干校进行锻炼，或者到群众中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对于领导机关和干部的革命化，对于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现在，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进一步做好精兵简政的工作。有些部门、单位，仍然不同程度存在机构庞大、人浮于事，领导班子人员过多，非生产开支过大等现象，机构显得有些臃肿。因此，我们要通过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执行精兵简政这一重要政策。

实行精兵简政，是反修防修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的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代表人民利益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我们的一切革命工作，都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进行的。同剥削阶级那种统治、压迫劳动人民的官僚机构相反，我们的机关应该是很精干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化、战斗化的。我们要以尽可能少的人办更多的事。这样，工作固然要紧张一些，艰苦一些，但是，紧张的工作可以使我们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艰苦的斗争能够冲刷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灰尘。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则是造成脱离群众，滋长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的一个重要条件。有少数领导班子之所以软弱松散，缺乏战斗力，少数同志之所以小病大养，无病呻吟，从根本上来说是个路线问题，世界观的问题，但同这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也是分不开的。

实行精兵简政，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要做极大的努力，要节省一切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开支，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同时要加强对基层单位的领导，充实生产第一线的力量。进一步搞好精兵简政，可以使我们的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各级领导机关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

实行精兵简政，有利于加强战备。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曾经科学地分析了精兵简政与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维持庞大的机构，一身臃肿，头重脚轻，不利于作战；实行精兵简政，“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指出：“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实行精兵简政，也有利于培养和锻炼干部。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环境中，许多干部浮在上面，很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沾染疲塌、拖拉、懒散的作风，不利于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精简之后，广大干部能够在实际斗争中更好地增长才干，锻炼成长。这对于造就一支强大的干部队伍大有好处。

把某些庞大臃肿的机构精简下来，使一部分干部充实基层，走上生产第一线，这是一场革命，一定会遇到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阻碍。要搞好精兵简政，必须破除各种思想障碍，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各种错误思想。

我们要批判所谓“人多好办事”的形而上学观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些部门确实需要增加一些人，这是应该的。就是这种情况，也要强调精简的原则，而不是人越多越好。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是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挥部，不是摆架子的。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当官做老



爷的。机关工作一定要讲质量，讲效率，讲多快好省，决不能不问需要与否，盲目地摆设许多人，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从事实上看，人多并不一定好办事。机关人多，往往人浮于事，不利于提高工作效能；部门多，分工过细，不利于集中统一；官僚主义、事务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烦琐哲学等不良作风也容易滋长起来。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搞得过大，结果意见不易统一，甚至互相扯皮，对一些事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样，事情不是好办了，而是难办了。还应该看到，人多了，机关本身增加了许多矛盾，领导容易陷入事务圈子，影响抓大事、抓路线，影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做好工作，最根本的是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用正确路线去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包括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了，人少也能多办事，把事情办好。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许多干部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争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复员转业的干部战士，主动要求不住城市去农村，不在内地到边疆。这都充分表现了革命者的无产阶级本色，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但是，也有的同志怕艰苦，对于到基层去、到生产第一线去存在畏难情绪。这就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一个革命者，应该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随时随地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需要。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东能西，能城能乡，越是困难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到基层去，到生产第一线去，是我们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通过参加实际斗争，可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可以调查了解许多新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取得革命斗争的新经验；可以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加速世界观的改造。基层单位，生产第一线，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革命的熔炉，一切革命同志，都应该满腔热情地到那里去，经受锻炼和考验。

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有为人们艰苦创业的志气，为祖国奋发图强的抱负。



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总是通过艰苦的斗争取得的。没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一片荒原上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就没有今天的大庆；没有广大贫下中农在荒山秃岭上进行的改天换地的战斗，就没有今天的大寨。为了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全国人民正在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让大庆之花、大寨之花开遍全国的各个角落。这是一个伟大的无比壮丽的事业。我们要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积极投入艰苦创业的斗争中去，为革命做出有益的贡献。

为了搞好精兵简政，需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论述，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林彪反党集团诬蔑干部下放是“变相失业”，反对干部深入基层，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并以“高官”、“厚禄”、“重权”为诱饵，拉拢腐蚀干部，妄图把我们的干部引向修正主义的邪路。林彪反党集团早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它的流毒还需要进一步肃清。我们要通过学习和批判，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充分认识精兵简政的重要性，排除干扰，克服阻力，坚定不移地走精兵简政的道路。

在精兵简政过程中，我们要认真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办事。要讲路线，讲团结，顾大局，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精兵简政，既要精干现有的领导班子，又要对干部进行妥善的分配和安置，使他们各得其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上继续前进。我们要把精兵简政同改进领导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振作革命精神，克服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提倡领导亲自动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切实搞好各级领导机关的革命化。这样，才能“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学习理论 反修防修

掌握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

燕 枫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指出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中，认真看书学习，掌握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按照客观事物本来的辩证法办事，我们就能取得主动权。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着矛盾。没有矛盾，就不成其为事物，当然更谈不上事物的发展了。我们观察任何事物，都要看到互相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研究它们是怎样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是怎样彼此进行着斗争，怎样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如果只看到一面，看不到另一面，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就会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错误。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对社会主义社会作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分析。毛主席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方面，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新事物中还有旧的残余。两种互相对立的因素



同时存在，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进行着斗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步骤地发展共产主义因素，而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把历史拉向后退，则拚命地维护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这种情况贯穿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列宁曾经指出：“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时期。所谓“没有资产阶级”，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分子已经不存在了，而是说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所谓“资产阶级国家”，也不是说它和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没有本质区别，而是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完全取消，在某些方面还允许其合法存在，还受到国家保护，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是它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根本不同之点，但是，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和痕迹，因而它们之间也并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在我们党内，也存在互相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即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发生过十次大的路线斗争，其中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有四次。我们党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都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一个一个地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在国内有他们的社会基础，在国际也都有一定的背景。总之，是由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所以在党内也就必然长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到了共产主义了，由于仍然存在着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有互相对立的两种因素，因此，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曾经说过：



“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

客观事物中互相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不是僵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无产阶级是朝气蓬勃的革命阶级，它在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将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这是主要的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资产阶级虽然日益走向衰亡，但也不甘心于失败，总是要一次又一次地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除了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以外，还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的痕迹，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他们千方百计地腐蚀我们的革命队伍，并在我们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寻找代理人，妄图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向前发展到共产主义，向后倒退到资本主义。早在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就向全党敲起警钟：如果忘记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不能说最后的胜利。现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在继续。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再一次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我们国家，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我们的社会向前进还是向后退，取决于一定的条件。“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这个条件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任何时候都坚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发展，就会前进。否则，路线错了，对资产阶级法权不加限制，甚至肆意扩大，听凭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倒退。我们坚信有可能防止和避免



苏联那样的复辟倒退，就是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所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任何事物中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和斗争，不管经过怎样的曲折和反复，新的方面终究会取得支配地位，战胜旧的方面。对于新生事物来说，遭受挫折是暂时的，其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壮大，并最终取代旧事物。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过程看，前进总是它的主流和本质，而倒退只不过是它的漩涡，是暂时的现象。苏联资本主义的复辟，只能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丝毫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但可以肯定地说，经过尖锐曲折的阶级斗争，它终究还要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来。毛主席曾经指出：“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毛主席在谈到我国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时候说过：“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些论断，揭示了共产主义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总而言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将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能够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敢于承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不回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尖锐的问题，并且敢于公开见诸报章向全国和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进行宣传，正是我们有力量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一切修正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一定**“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防止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力求避免片面性和主观主义。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革命者，既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要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取得胜利的必然性；既不要因为前途光明而看不到斗争的艰难曲折，也不要因为斗争的长期和曲折而丢掉信心，做半截子革命派。革命导师列宁早就坚定地指出：“共产党人应当知道，未来无论如何是属于他们的”。让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吧！



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

——学习《国家与革命》第五章

钟 实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中，写下的一部系统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光辉著作。在这部著作的第五章，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实质，并且着重阐明了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真学习列宁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理解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是有现实意义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个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开始提出来了。后来，他们总结了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法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代替它。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考察了资本主义即将崩溃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第一次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理论，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这样，就彻底地粉碎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所制造的奇谈怪论，形成了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集中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理论，并且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辩证关系。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消费品的分配“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资产阶级法权，是在平等的口号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一样，都是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制度，在这一点上它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给这种不平等披上了一件平等的外衣。这个特点，是由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商品经济产生的。商品经济的规律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商品生产者按照价值进行交换。这看起来权利是平等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生产条件不同，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不一样，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在劳动市场上，工人出卖劳动力，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表面上也是平等的。实际上，资本家能够购买劳动力是因为他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出卖劳动力是因为他一无所有。工人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必须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受资本家的剥削。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宣扬什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都是维护这种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的。

资产阶级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提出平等口号，是为了用它来反对封建特权，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说：“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是用一种不平等代替了另一种不平等，它“虽然名义上承认公平原则，但是事实上时时刻刻都在肆无忌惮地抛弃公平原则”。这正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它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比以往的社会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但是，它又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拿按劳分配来说，它是对资本主义分配原则的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最多只能获得劳动力的价值，



而且由于大量失业人口存在，他们的工资还经常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资本家积累的资本越多，劳动者就越贫困。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所有制变更了，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第一次有可能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和“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社会主义原则。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按劳动分配产品，这里通行的仍然是商品等价物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相交换。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以劳动作为尺度领取消费品，这是一种平等权利。但是，这种平等权利仍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正如列宁所说，它“**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由于每一个劳动者在体力或智力上不完全相同，获得的产品的数量并不一样，而要获得等量产品，他们在事实上却要付出不等量的劳动；同时，由于赡养的人口多少的不同，即使领取的消费品数量相等，事实上也还有富裕程度的差别。所以，这种“**‘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从这方面来看，按劳分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当马克思论述社会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他是从这样的设想出发的：第一，生产资料已经全部归社会所有；第二，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已经消亡。当时，也只能作这样的设想。因为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后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并且还会存在个体所有制的残余。与此相适应，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也不可能很快取消。因此，我国现阶段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比起《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情况来，要广泛一些。在所有制方面，我们不仅要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差别，而且要承认集体所有制内部（公社和公社、大队和大队、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承认某些个体所有制残余的存在。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在某些人中间还会出现贮藏货币、发财致富，甚至变货币为资本的动机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总想竭力维护和扩大这种不平等，去追求个人的私利，以致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



土壤和条件。

正是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并且进一步明确地说:“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维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它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完全相反,为什么又说它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呢?列宁在回答这种疑问时指出,“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列宁在这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不过是新事物中的旧的残余,是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要保卫这种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平等的权利。正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它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保留资产阶级法权,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目的根本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既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又要限制它,而且要创造条件最后消灭它。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可以使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由于我们现在还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允许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但要逐步缩小实际上存在的不平等,创造条件最后消灭这种不平等,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一种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培育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就是在“全民国家”的



口号下，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既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去勉强做那些现在还做不到的事情，又不能忘记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决不能以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平等的王国，把它凝固化，把资产阶级法权永久保留下去，甚至加以扩大。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承认某些方面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的制度，又要根据客观条件的发展对它加以限制，并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它，“**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我们党采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例如，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坚持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使企业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在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壮大社队经济，逐步缩小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走五七道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分配方面，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逐步缩小个人收入差别，等等，都应当坚持下去。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有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过程，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一个由量的减少到质的消亡过程。如果认不清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就会迷惑于平等的口号，看不见各个领域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不平等的制度，对它不加限制，任其扩大，就会增加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今天世界上，“**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只要我们加强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一定能够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完成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历史任务。当全世界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了，“**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总结经验 促进学习

李 扬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为了“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坚持理论和实际结合，不断把学习引向深入。有些地方，结合理论学习，认真回顾和总结本地区、本单位解放以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加深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也是理论联系实际，促进学习深入的一个方面。

解放以来，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战线上进行了一系列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各地区、各单位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不同程度地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例如，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经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经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经验，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经验，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等等。认真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是不是认真总结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经验，这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各项工作，很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工作做过了，可是对工作中的经验不重视，不善于总结，做对了的讲不出什么道理，做错了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错，因而行动上盲目的；另一种态度是对以往的经验能认真总结，经常看看自己是在怎样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经受教育和锻炼的，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又有哪些错误的教训，通过总结，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自觉地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好工作。有的同志所以不断犯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善于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有的同志所以能够工作得比较好，与他善于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分不开的。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经验，在没有对它加以总结之前，它还只是一些感性的东西，我们对它的认识是不完全



的；而对这些感性东西进行科学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就可以使我们的思想大大提高一步。正因为如此，毛主席非常重视总结经验。毛主席说：“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成功的经验，通过总结可以进一步提高认识，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使这些经验得到更好的发挥。错误的教训，通过总结能使我们认识到犯错误的原因，化消极的东西为积极的东西，使自己更加努力去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此，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错误的教训，对我们学习理论，搞好工作，都是宝贵的借鉴。

毛主席说：“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我们不管搞什么工作，都是在实行政策，不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就是执行错误的政策。我们工作中的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经验。认真总结本地区、本单位实行政策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实质，知道现在应该怎样去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很有好处。我们党不仅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而且为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制定了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比如，我国实行的是商品制度，但必须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农村可以有少量家庭副业，但不能利用家庭副业发展资本主义倾向；在工厂必须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办企业路线，等等。这些方针、政策都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客观实际制定出来的。这些方针、政策在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也在斗争中不断为广大干部、群众所认识和贯彻执行。刘少奇、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干扰和破坏党的方针、政策。我们有的同志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时就分不清政策问题上的是非界限，左右摇摆，给工作造成被动局面。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照自己以往实行政策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知道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怎样去做，反对任何偏离党的方针、政策的作法。在当前的学习运动中，我们要把学习理论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结合起来，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切实地做好我们的工作。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开展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取得了不少新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促进理论学习不断深入，也是我们领导学习运动时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工人阶级也要不断学习和改造

洪 滨

努力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全国人民当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工人阶级更应该认真学好。工人阶级只有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能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充分发挥领导阶级的作用。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革命阶级。毛主席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作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因此，它有着其他阶级所不能具备的许多特点，如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特点，决定了它是革命事业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实现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的。工人阶级不仅要团结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并剥夺其生产资料，镇压他们的反抗，而且要改造和教育小生产者，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还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直到消灭三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十分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工人阶级必须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它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我们工人阶级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能够在自己的先锋队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分子，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最后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关于工人阶级的学习和改造，毛主席作过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和指示。早在一九三七年，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一九四九年，在我国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时刻，毛主席深刻地教育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一九五七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在强调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时再次指出：“**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对于毛主席的这些谆谆教导，我们工人阶级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应当反复学习，不断实践。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工人阶级的学习和改造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骄傲起来。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还是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这种矛



盾和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工人阶级内部来。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列宁说过：“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小生产者的思想作风，以及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侵蚀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总是要不断吸收其他阶级的成员参加自己的阶级队伍，这样就必然把其他阶级的思想带进工人阶级队伍。改造自己阶级队伍成员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无产阶级的一项重要任务。这种状况说明，在工人阶级内部发生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甚至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毫不奇怪的，同时还说明工人阶级也需要不断学习和改造。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还保留着从旧社会带来的痕迹，“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是产生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资产阶级腐蚀和无产阶级反腐蚀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列宁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有意要分化工人，以便使工人阶级中一小撮上层分子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资产阶级利用金钱腐蚀、物质引诱的方式，收买工人贵族，培养工贼，作为他们剥削压榨工人阶级、维护资本主义罪恶统治的一种手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老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名声已经很臭了，从工人中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来同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比他们亲自出马更为有利。因此，他们更加注重采用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法，从工人阶级中收买、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便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一类拚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妄图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温床上培养出新的工人贵族，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中某些不注意



学习和改造的不坚定分子，就有可能沾染旧世界的污泥，甚至掉进资本主义的泥坑。

毛主席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工人阶级要胜利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和侵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努力学习和改造。同样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为什么许多人能面对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巍然屹立，越战越坚强，而有人在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面前，晕头转向，发生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学习和改造的自觉性。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同资产阶级作各种形式的斗争的丰富经验。这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优胜条件。只要坚持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就能够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防止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一旦产生出来，就能及时识破他们，并坚决与之斗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不断纯洁自己的队伍，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许多青年工人学习和改造是很努力的，历次运动中都有一批青年工人成为学习和斗争的积极分子，但也有的青年工人往往不大注意学习和改造。这些同志不了解革命胜利得来之不易，不了解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他们认为自己出身好，可以“自来红”。这种想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出身好，只是学好马列主义理论、改造世界观的一个有利条件。但是如果把它当作包袱背起来，以此作为放松学习和改造的理由，那就会走向反面。地主资产阶级的教唆犯，往往利用一些青年工人的这种弱点，以物质引诱、思想腐蚀为手段，企图把他们拉下水去。林彪一类不就是这样干的吗？好脑袋是“爹妈给的”这种谬论，正是林彪一类用来骗人的鬼话，革命青年决不要上当。世界上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什么“自来红”。不注意学习和改造，决不能自发地产生无产阶级的思想，相反地，倒是可能“自发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甚至逐渐演变成新资产阶级分子。进了工厂，并不等于进了红色保险箱，穿



上工人服装，并不等于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和优秀品质。先进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在不断地学习马列主义和不断地参加变革现实的斗争中获得的。各级党的组织，共青团和工会，都应当把对青年工人的教育当作一件大事，把它抓紧、抓好。

加强学习和改造，对老工人也同样是必要的。老工人在旧社会深受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对旧社会的人间地狱有深仇大恨。解放后，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对党对社会主义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经验。但是，决不能以此为满足，还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只有把朴素的阶级感情提到路线觉悟的高度，把感性的经验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同各种旧的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老工人还担负着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任，路线觉悟的高低，思想作风的好坏，对青年工人影响很大。如果自己学习不好，又怎么会有好的思想作风去培养、教育工人阶级的后代呢？那种以为“船到码头车到站”，“该歇歇脚、松口气、享享福了”的思想，就是剥削阶级的旧思想侵蚀我们工人队伍的一种反映，坚持继续革命的老工人应当坚决抵制它、批判它，同它划清界限。许多老工人讲得好：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要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毛主席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为革命而学习，为革命而改造，贵在自觉，持之以恒，决不能中途停顿，更不能倒退。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思想不断跟上发展变化着的客观情况，不致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世界的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终究要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这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工人同志们，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朝着这个远大目标前进吧！



深入学习理论必须端正学风

中国共产党盘锦地区委员会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来，我们地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广大干部通过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对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对改造小生产的长期性等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了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今年，我们地区虽然遭受地震和洪水两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在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战斗，各项工作都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毛主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回顾我们地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发展过程，我们体会到，把学习不断引向深入的关键在于端正学风，坚持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长期以来，有的同志在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上，总是处理得不那么正确，他们或者不重视理论学习，或者学了理论不去应用。在这次学习运动中，这两种毛病也经常表现出来，需要不断地加以克服，而且不是强调一、两次就可以解决的。我们正是由于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既提倡认真看书学习，又强调把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去，才使学习运动能够逐步深入，取得一些成效。实践证明，把学习引向深入的过程，也就是促进理论和实际不断结合的过程。

提高学习的自觉性，是搞好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使学习不断深入的前提。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发表，激发了广大干部的学习热情。可是，也有少数同志对这次学习理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认识不足，说什么“我们同地、富、反、坏、右斗了多少年，天天搞无产阶级专政，不学也离不开大格”。因此，他们对学习就不够自觉，总是推一推，动一动，常常落后于群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举办了领导干部学习班，反复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着重讨论为什么“**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许多同志联系苏联修正主义上台的历史教训，总结同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经验，深切



地认识到，我们不仅要认清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坚持同地、富、反、坏、右斗，而且要认清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土壤和条件，坚持同修正主义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斗。搞社会主义，就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离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就会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认识提高后，学习的自觉性就增强了。过去，有的同志学习《国家与革命》年年开个头，几年都没有读到尾。这次，一连学习了好几遍，并且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写了一些心得。

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还表现在学习中不能抓住重点，领会精神实质。有的同志往往在一些名词、概念上兜圈子，钻牛角尖，或者对某些具体经济政策和制度方面的问题争论不休。这样的学习，表面上看热热闹闹，实际上是不入门，还不懂得这次学习要搞清楚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切实领会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我们反复强调学习的重点要紧紧围绕着“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心问题，着重弄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为什么小生产经常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修正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对这些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要求达到正确的透彻的理解。我们地区许多单位的领导班子，由于抓住了重点，学习就有了一定的深度，能够运用理论比较正确地分析和解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现实问题。

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光坐在屋子里读书还不够，还必须抓住调查研究这个促进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环节。我们有的同志自认为在基层工作多年，闭上眼睛也能琢磨个八、九不离十；还有的同志虽然也下去跑一跑，了解到一些情况，但只是罗列一堆现象，不愿做系统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我们考虑到，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提高大家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地委一班人要以身作则，深入基层。我们决定地委常委都分别深入到工厂、农村、街道、机关、学校中去，围绕着学习重点，进行专题调查研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就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教育和改造小生产、加强对集市贸易的管理、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加强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并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毛主席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过去，我们只知道一些党员犯错误，但对他们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和



阶级根源理解不深。这次，我们通过对新屯大队党员状况的调查，对党员一部分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以及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大队土改以来，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其中多数朝气蓬勃，发挥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作用，也有部分党员不同程度地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个别的甚至蜕化变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有的人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克服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腐蚀，就很容易被“糖衣炮弹”打中。通过这样的调查，我们不仅加深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理解，而且明确了进行党的建设的方向。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武装广大党员的头脑，提高他们的反修防修的自觉性，才能有效地防止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查和不调查大不一样。调查研究搞得越深入，对理论问题的理解就越透彻，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就越有把握。要使学习运动不断深入，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和分析。

在把学习不断引向深入的过程中，我们还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不要联系解决本地区、本单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问题？对这个问题，多数同志的回答虽然是肯定的，但做起来就不一样了。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对实际情况又不甚了解，就草率从事，动手解决问题，必然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妨碍学习的深入。但是，从我们地区来看，影响学习深入的主要问题，还是学了理论不去应用，口头上说的是一套，行动上做的又是一套。当然，解决实际问题也要抓住重点。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我们强调重点是解决各级领导班子的方向路线问题，因为这关系到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关系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我们对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等方面的问题，要求在学习中逐步解决，解决得越彻底越好。从我们地区的情况看，有的同志对解决实际问题不那么主动，主要是“怕”字作怪。解决团结问题怕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怕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怕得罪人，有少数自己身上不干净的人还怕牵连自己。因此，我们在学习中启发这些同志去掉“怕”字，换上“敢”字。我们地区是新开发的地区，干部来自四面八方。过去，由于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在新干部和老干部、本地干部和外地干部、这部分干部和那部分干部之间，都存在一些不够团结的现象。我们强调要建立一



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大家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讲路线，讲全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促进了安定团结，发展了我们地区的大好形势。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大多数同志的理论水平都有一定的提高。这时，有的同志觉得，书读了一些，调查研究搞了一点，有的问题也解决了，学得“差不多”了。这种满足现状的思想，是影响学习深入的一个障碍。我们及时召开县以上的领导干部会，分析了学习形势，引导大家正确地认识我们学习理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仅仅是个开始，学习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例如，我们对于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有了一些认识，可是，还很不系统，很不深刻。要真正搞清楚这些问题，还必须作长期的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了使学习继续深入下去，我们举办了县以上领导干部的政治经济学读书班，选学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有的同志原来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为什么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理论上讲不清楚。学习政治经济学以后，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一方面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腐蚀下，有人就会利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占有大量的商品和货币，甚至将它们转化为资本。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的这种消极作用，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我们通过这段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更加深切地感到，学习马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既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如果浅尝辄止，学到一点就满足起来，就不可能持之以恒，学到更多的东西。有的同志说得好：“学习理论也要有登山队那样的精神，不怕任何困难，克服重重障碍，不断攀登高峰。”

我们感到学风是否端正，不是一般的学习方法问题，而是党风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只有把学风端正了，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效地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最近，我们地区的广大干部正在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期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学习和时局》等光辉著作，克服学习理论中的不正之风。我们决心以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著作作为指针，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逐步引向深入，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翻身农奴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

朱 锋

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纪念日。西藏各族人民满怀胜利的喜悦欢庆这个节日。

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驱逐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一九五九年平息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以后，百万农奴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变封建农奴主所有制为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一九六五年，西藏自治区光荣诞生了。

民主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西藏往何处去？是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甚至让封建农奴制度复辟？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西藏各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边疆的巩固。西藏自治区各族人民没有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期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群众运动的推动下，百万翻身农奴和其他劳动人民，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阔步前进，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正在蓬勃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十年来，西藏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雨后春笋，茁壮成长。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而今，从三江流域到阿里台地，从藏北草原到喜马拉雅山麓，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

西藏各族人民在封建农奴制度的废墟上，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经验是什么呢？

首先，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坚持开展阶级斗争，打击反动农奴主阶级的复辟势力。毛主席教导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只有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观察问题和对待问题，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社会矛盾，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我们继续对农牧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西藏民主改革以后，反动农奴主阶级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百万翻身农奴成了西藏的主人。但是，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如果不加改造，仍然有可能成为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农奴制度的经济基础。为了积极引导广大农牧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从一九六五年开始，抓了创办人民公社的试点，并逐步推广。现在，全自治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乡都建立了人民公社，基本完成了对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在西藏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西藏的伟大胜利。

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个运动，比民主革命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它不仅是在所有制方面，同时也是在政治、思想各方面的一次革命，是逐步铲除资本主义赖以滋生和发展的土壤的一个重大步骤。封建农奴主和城乡资本主义势力都知道，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建立以后，要搞复辟，要发展资本主义，就更困难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阻挠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西藏各级党组织，坚持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群众，武装群众，使广大群众认清这场斗争的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也是关系到能不能防止封建农奴制度复辟的问



题。翻身农奴和其他劳动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认识到，人民公社是通向彻底翻身解放的“金桥”，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踢开了种种绊脚石，奋勇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旧的上层建筑包括旧的意识形态都是为其腐朽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民主改革的胜利，推翻了反动地方政府、寺庙和贵族三大领主的统治，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受到很大的冲击。但要在这块长期受封建农奴主阶级统治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清理旧基地的斗争仍然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千百年来，农奴主阶级总是以“天命”、“神权”作为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他们把西藏最高反动统治者说成是受命于“天”来统治百万农奴的“活佛”，而把农奴受到种种骇人听闻的残害、压迫和剥削说成是“命中注定”的。反动阶级往往以此来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翻身农奴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的“先验论”、“天命观”，向“天命”、“神权”宣战。他们召开各种批判会，举办阶级教育展览，运用回忆对比等多种形式，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过去一生病，寺庙、头人就要人们念经打卦，敬神送鬼，现在已初步建立了医疗卫生网，六千多名赤脚医生在防病治病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过去不敢触动“神山”、“神水”、“神土”，现在劈山引水，改土造田，向大自然宣战。为了使广大群众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打碎“天命”、“神权”等等精神枷锁，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广大农村和牧区创办了政治夜校、读报组、业余文艺宣传队，一支拥有三万多人的工人、贫下中农（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已经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正在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事实证明，“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就愈牢固。

斗争的实践还使我们深深体会到，紧紧依靠百万翻身农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发展的基本保证。

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正如列宁指出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百万翻身农奴是西藏各民族的主体，是



创造西藏历史的动力。没有他们的真正觉醒和英勇斗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总是归于失败？为什么社会主义事业能象雅鲁藏布江水一样奔腾向前？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百万翻身农奴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翻身农奴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受压迫受剥削最深，因此，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无比热爱。他们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伟大的真理，就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斗争。他们是建设新西藏的依靠力量。

依靠百万翻身农奴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他们中培养和选拔大批的民族干部。毛主席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过去的奴隶，在反动统治者的眼中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现在，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了共产主义的战士。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革命斗争风浪的锻炼和考验，涌现出大批具有一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先进分子，许多人被党和群众选拔到不同的领导岗位。全自治区少数民族干部已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县、地区和自治区三级领导班子中，少数民族干部占百分之四十六。农牧区的区、人民公社的主要领导干部，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干部。一大批少数民族女干部也在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不愧为西藏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好儿女，是党和西藏人民宝贵的革命财富。

十年来，西藏之所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又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执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

西藏是伟大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西藏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一直得到国家的大力帮助和兄弟民族的热情支援，这充分体现了党对西藏人民的巨大关怀和各民族间的亲密团结。这种帮助和支援，对促进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面貌，搞好西藏的革命和建设，还要靠当地群众和干部的艰苦奋斗。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



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是强调困难，当“伸手派”，反映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它关系到能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西藏在历史上长期受国内外反动派的压榨和掠夺，一穷二白，基础薄弱，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尤为重要。在领导西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西藏各级党的组织，始终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教育干部和群众，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批判懒汉懦夫世界观，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西藏各级党组织拿出很大的力量，积极领导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并且采取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用心总结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发现和树立了列麦公社、红旗公社、加加养护段等一批先进典型。这些先进典型生动地说明，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已经在西藏高原上生根、开花、结果。这就使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更加深入人心，从而大大推动了全区各条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西藏的劳动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历史上，他们曾以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开发了西藏高原，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解放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西藏各族劳动群众同驻藏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的同志一道，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克服困难，艰苦创业，在“世界屋脊”上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英雄业绩，为祖国做出新的贡献。

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旧西藏的情景，看一看解放以后的发展变化。在封建农奴制度下，西藏的工业完全是一张白纸，连螺丝钉都不能制造；交通阻隔，运输全靠人背畜驮；农牧业生产处于靠天吃饭、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农奴们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过着人间地狱的悲惨生活；群众缺医少药，各种疾病猖獗；至于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那就更谈不上。解放以后，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百万农奴推翻了农奴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奔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他们无穷的创造力就迸发出来，西藏的面貌就迅速改变了。据一九七四年统计，全区已建成中小型厂矿二百五十多个，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近三倍。粮食总产量比民主改革前的一九五八年增长一倍半，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



粮食自给。畜牧业生产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牲畜头数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一点三倍。在交通运输方面，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以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为干线的全区公路网，百分之九十七的县通了汽车。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加，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取得可喜的成绩。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毛主席指出的伟大真理：“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西藏能够由封建农奴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实现历史性的飞跃，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领导。

毛主席、党中央历来十分关怀西藏人民，十分重视西藏的革命和建设。毛主席关于西藏问题的多次指示，及时地给西藏的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并且规定了具体的策略和方针。无论在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党中央总是教导我们，一定要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慎重稳进，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去夺取胜利。实践证明，只要坚决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去做，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革命就发展，就前进；反之，就会犯错误，出岔子，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这是我们多年来最深切的体会，也是西藏工作中一条最根本的经验。

搞好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西藏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发展，基层干部和群众中涌现出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这就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准备了很好的群众基础。经过整党、建党，全区农村、牧区党的基层组织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一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党的支部。全区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党员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近三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西藏地处边疆，阶级斗争复杂，战略地位重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党、政、军、民的革命团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西藏的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干群团结、民族团结，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有着很好的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进驻西藏以来，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西藏劳动人民结成了鱼水深情。他们充分发挥了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作用，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进藏工作的工人、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与当地群众和干部打成一片，互相尊重，亲密团结，共同战斗，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对于上层爱国人士，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服务。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对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西藏各族干部和群众，体会是十分深切的。

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欢庆这个节日的时候，喜看西藏高原江山多娇，翻身农奴引吭高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翻身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这首歌曲，唱出了西藏各族人民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无限深情，表达了西藏各族人民继续革命的坚强意志。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向全党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国各族人民的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同这个任务相比，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前，西藏自治区同全国一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在深入开展。西藏各族人民决心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学好理论，加强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

（本文作者系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工作人员）



依靠群众赢得了高速度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筹建指挥部

正在建设中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又称金山工程，是一个以石油为原料，生产多种合成纤维的现代化大型联合企业。这项工程从筹建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依靠全市和全国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援，依靠工地上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工程进展很快。原来的茫茫海滩上，如今已是建筑成群，管道纵横，塔罐林立。厂区外，万吨级钢桩墩式进油码头基本竣工，铁路支线和黄浦江铁路大桥已建成通车。

金山工程建设的高速度进展，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所取得的成果。

金山工程是一个大型工程。它要求在海滩上兴建起包括炼油、裂解分离、抽丝到污水处理等十个大型工厂，以及一系列附属工程和生活设施，并要求在二、三年内建成投产。怎样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这个大规模的现代化工程？我们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利用上海市原有的工业基础，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组织社会主义的大协作。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了全市工业部门、设计单位和近百家工厂分别承担各个项目的建设任务；全市的工农商学兵都动员起来，形成了一个千军万马战金山的群众运动。

依靠群众，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许多本来认为无法做到的事也可以做到。工程规模大，任务重，就更应该大搞群众运动。金山工程的厂址确定之后，为了避开大潮汛，要赶在冬季内完成围海造地的任务。数万贫下中农在寒风刺骨的冬天，自带工具，在短短的三十二天内，就完成了一百二十万土方，在海滩上筑成了一条长达十七里的长堤。工程建设全面开展后，来自各条战线的五万建设大军集中到工地上，用高速度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现代化工程。制氧车间按常规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成，现在从施工到投产总共只花了一百三十四天；建筑面积三万



四千平方米的腈纶厂北纺拉丝车间，过去建设最快也得半年，现在只花四十五天就建成了。工地现场上群众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工地之外的全市各个行业以及全国许多工厂，也在为支援金山搞得热气腾腾。单以上海来说，就有五百多家工厂为金山工程赶制设备和材料。这中间，有万人的大厂，也有里弄小厂，还有郊区的社队工厂。输油码头和黄浦江大桥的建设急需四百多根钢桩，焊接这些钢桩相当于三条万吨轮的焊接量。但上海各船厂分担任务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完成并送到了工地。去年七月，金山工地的设备安装进入高峰，各类物资的供应十分紧张，市清仓节约小组发动工厂、部队、学校、机关等五百多个单位，几天之内清出了价值六百多万元的物资，并派出一百六十多辆卡车，浩浩荡荡送到了金山。两年多来，金山工程建设的每一个进展，都是与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分不开的。毛主席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基本建设也是这样，越是现代化的大型工程，就越应当大搞群众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为工程建设赢得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的进展。

石油化工是新兴工业，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易污染等特点，工艺复杂，技术要求高，各个环节都需要严格保证质量。在这种情况下，更要依靠广大群众的高度自觉。只有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大家都重视工程质量，各项工作都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才能做到多快好省。金山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工人们提出“向大庆工人学习，精心施工，自觉从严”的口号，努力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就拿焊接安装钢体球罐来说吧，这种球罐是储藏各种液化气的，大小共有三十三只。最大的有五六层楼那么高，由六十六块高强度的弧形钢板拼接而成，全部焊缝要求很严，一处焊接有问题，就会引起球罐爆炸。在国外，焊接这种球罐的工人要有六年以上的焊接工龄，还要经过特种考试。我们工地上焊接力量本来就不足，要照国外的标准选焊工就得停工。怎么办？还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攻下这个技术难关。工地上负责焊接最大一只球罐的，是只有二百多名工人的上海第二焊接厂。他们推选了三十六位同志组成了一支战斗队，其中除六名老师傅外，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工人，女青年占了一半，有些还是未满师的徒工。可是，他们满怀豪情地说：“球大，没有我们的干劲大；钢坚，没有我们的意志坚。”为了把每一条焊缝都焊好，他们刻苦钻研，开展技术练兵，许多人衣服烧破了，脸熏肿了，手上烫起了泡，但没有人



叫一声苦。在焊接过程中，有些焊缝很长，要达到质量标准，需要连续高空作业。他们就把干粮带上高空，饿了，就啃上几口，不焊好不下火线。经过一百八十多天的奋战，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质量完全符合要求。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发挥技术人员作用的问题。我们体会，大搞群众运动，应当包括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在内，使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要建设金山这样现代化的大型工程，需要有专门的技术知识，需要充分发挥具有某些专门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但是，不论什么工作，包括一些复杂的技术问题，都要广泛发动群众，从各个方面揭露矛盾，分析矛盾，才能从实践中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金山工程中，大型设备共有三百多件，其中最重的二百多吨，最长的六十米，最大的直径六米多。如何把这些重的、长的、大的家伙运到工地来，确实困难很多。如果从公路上运，沿途十九座桥都要翻造加固，经济上不合算，时间上也来不及；从海里走，金山沿海没有码头，运不进；从内河通过驳船运，航道浅窄，桥洞低，钻不过去。怎么办？我们在市有关部门支持下，召开了交通运输系统各单位的会议，把工程的意义和困难直接同群众见了面。一发动群众，办法就有了。那些在旧社会被称为“排头”、“排花子”的扎排工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使用我国古老的运输工具——木排，解决了这个大难题。上海南市区、川沙县的一百五十多个扎排工人，在三、四天时间里，群策群力，画出了五十多种不同形状的草图，又经过分析比较，根据运输各种不同形状大型设备的要求，设计出了好几种新型的木排，终于把这些大型设备完整无损地迅速送到了工地。

技术人员只有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使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金山工程要建造一个万吨的进油码头。开始时有人认为，当地风大、浪急，潮差大，不能造码头。究竟能不能造？负责勘测、设计的交通部第三航务工程局、上海港务局、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研究、技术人员，到陈山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现场调查，访问了很多贫下中农和老渔民，并且在台风季节和当地渔民、筑港工人一起在船上持续观察了十二个昼夜，终于摸清了陈山海域的自然状况，掌握了当地大风大浪时水文气象的变化规律，最后得出了陈山海域可以建造深水码头的结论。经过一年多的奋战，陈山码头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建成，现在已经停泊油轮并开始进油了。技术人员感受很深地说：“坐在办公室



里,看到的只是小天地;和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大搞群众运动,必须加强领导。群众运动的规模越大,对于领导艺术和组织工作的要求越高。建设象金山工程这样的企业,只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使群众运动深入持久地广泛开展下去。

金山工程的大小项目有四十六个,参加筹建、设计、施工的单位上百个,队伍来自全国各地。为此,必须统筹兼顾,合理组织,把各方面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一股劲,才能保证工程建设的高速度进行。我们对工地上的各个建设项目和各主要生产装置,都建立了筹建、施工、设计三结合的指挥小组。在物资供应方面,实行市内物资部门和工地物资部门挂钩,合署办公。这样做的结果,精简了机构,提高了效率,改变了过去那种层次多、手续繁、相互扯皮的现象。同时,我们强调各级指挥部在工程的每个阶段都要加强调查研究,做到胸中有全局,安排有重点,在每个工程的施工、安装前,做好各方面力量的组织和调配工作。同时,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工程总进度的要求和各个阶段的主攻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歼灭战。

加强领导的根本问题是加强思想领导。几万人的建设大军,要统一指挥,统一步调,统一行动,首先就得统一认识。工地上单位多、部门多。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想尽快把自己的那部分任务抢先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统一领导尤其重要。不然的话,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就乱了套了。我们在组织群众搞大会战的过程中,组织大家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积极引导大家发扬“想全局、急全局、为全局”的共产主义风格,抵制和克服形形色色的本位主义和小团体观念,使大家围绕工程建设总进度的目标来安排本单位的工作。这样做的结果,整个工地上呈现出“一盘棋大家走,龙江花遍地开”的生动局面。工人同志说得好:“你家,我家,干革命不能分家”;“你需要,我需要,服从全局最需要。”所有这一切,都生动地说明了加强领导的重要性。思想领导加强了,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能保证群众运动自始至终蓬蓬勃勃地开展。

金山工程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整个工程还处在建设过程中,还有许多艰巨的战斗在后头。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努力学好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一仗一仗地打下去,多快好省地完成建设金山工程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努力把基本建设搞得更好

姚 尚

如何把基本建设的事情办好？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基本建设是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需继续努力。基本建设，对于我们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多快好省地进行基本建设，有利于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进一步增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有利于更好地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我们战斗在基本建设战线上的广大干部、群众，都要充分明确自己的光荣责任，树雄心、立壮志，抓革命、促生产，努力把基本建设搞得更好。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办好基本建设的事情，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什么时候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就能团结战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把基本建设的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多快好省。二十多年来，我们所以能够胜利地建成许多大型的现代化工厂、矿山、油井、电站、交通运输设施和遍及全国城乡的“五小”工业，就是因为广大干部、群众，排除了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坚持了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为了使基本建设的事情办得更好，我们务必牢牢记住这条基本的经验。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也必然要反映到基本建设战线上来。国家每年把大量资金投入基本建设，怎样运用这些资金？基本建设战线有**几百万人**的勘察、设计、科研、施工队伍，怎样带领这支队伍？按照什么原则来处理基本建设战线各企业之间、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建筑企



业和其他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要不要在这些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等,都有一个方向道路的问题,有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由于基本建设工作同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能不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仅关系着基本建设部门走什么道路,而且会对其他部门有很大的影响。当前,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要认真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切实把思想政治路线搞对头。这样,我们在抓任何一项基本建设的时候,才不致迷失方向,走错道路,才能使基本建设事业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在基本建设战线上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求我们经常注意研究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积极地慎重地限制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基本建设所需要的建筑材料、设备和施工力量,虽然主要是由国家按照统一计划分配和调拨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市场采购和由集体所有制单位提供的。在进行基本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和国民经济许多部门,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单位,频繁地进行商品交换。基本建设战线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同商品制度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搞基本建设,无论安排计划、审查方案,还是解决材料、设备、施工力量等方面的问题,都应当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充分考虑是不是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

提倡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同多快好省地进行基本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我们发展基本建设事业,同发展其他社会主义事业一样,说到底,是为了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如果眼睛只看到自己那里的基建项目,见材料就抓,见施工队伍就拉,而不从政治上、从全局的观点看问题,不考虑是不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这就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根本上违背多快好省的要求。材料、设备、施工力量是进行基本建设的重要条件,当然是需要解决的,但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国家把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纳入统一分配和计划供应的渠道,既是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也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表现。如果不顾政策,不择手段地乱抓建筑材料,乱拉施工力量,私自承发包基建工程,或者以协作为名,拿国家统配物资搞以物易物,把分配渠道的东西转到流通渠道,那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原则,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那样



做,不仅不能把基本建设的事情办好,而且正好迎合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需要,会使地方建筑材料和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劳动力,盲目流动,从而助长农村的“重副轻农”、劳力自由支配等错误倾向,甚至会给新老资产阶级分子造成可乘之机。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有些地方出现建筑材料、施工力量不足的情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应当而且也有可能通过国家计划去进行调节。其实,从目前整个基本建设战线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施工队伍并不算少,材料、设备也有潜力可挖。关键是要加强领导,做好工作。有的地方所以一时出现被动局面,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路线没有搞对头,工作不得力,不敢坚持正确的原则、抵制不正之风。不少地方的经验说明,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又能从全局出发,统筹安排,保证重点,并且经常不断地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大力提高劳动效率,用现有的人力物力承担更多的建设任务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坚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这也是基本建设战线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坚持这个方针,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力、物力、财力的作用,既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又有利于抵制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根据需求和可能,从实际出发,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就能把基本建设工程建立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上,使每一个需要上马的工程,能够从计划的渠道及时得到所需的材料、设备和施工力量,迅速建成投产。如果摊子大,战线长,力量分散,不仅欲速不达,建设项目不能迅速建成投产,而且还会人为地制造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供求矛盾,给资本主义活动提供地盘。我们需要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坚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个方针的重要意义,并认真地、切实地执行这个方针。

毛主席说过:“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搞基本建设也必须懂得这个道理。在战略上,我们一定要而且能够把各条战线、各个



方面的基本建设搞好，但具体的做法也只能各个解决。和打仗一样，基本建设也不是孤立进行的，要有各方面的条件相配合。只有根据需求和可能，分别轻重缓急，紧紧抓住关系全局的重点项目和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集中人力、物力，有计划地、有步骤地、一项一项、一批一批地进行，才能取得建设的主动权，迅速发挥投资效果，有效地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光有良好的愿望，不顾条件是否许可，企图一口吞掉一桌酒席，一下子就把什么建设项目都兴办起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会把事情办坏。许多事实证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就能多快好省，分散力量打消耗战，必然少慢差费。

要坚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必须提倡顾全大局的思想。“**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反映在基本建设战线上，难就难在有的同志胸中无全局。从局部利益出发，把本部门、本地区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总想多要投资，多上项目，甚至无视国家统一计划，随意上计划外项目，擅自修建楼、堂、馆、所等等；或者在本地区、本部门的建设中，不注意抓重点，搞全面开花，齐头并进。这都是缺乏全局观点的表现。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我们应当从全局出发，认真检查一下本地区、本部门的基本建设，是不是符合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要求，战线是不是长了，主攻方向是否明确，人力、物力、财力保证了重点没有？下决心避免那种战线长、力量分散、打消耗战的错误作法。为了全局，该上的就上，该缓的就缓，把好钢用到刀口上，把力量集中到关键处，真正打好歼灭战。

毛主席指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为了使基本建设事业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这对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建设是必要的，对一个工程、一个项目的建设也是必要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工程，所以能收到多快好省的效果，就是因为上海各级党组织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充分发挥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使全市人民群众都知道建设这个工程的重要意义，人人关心，争做贡献，并且组织了各条战线、



各个单位的社会主义大协作、大会战。许多这样的事实说明，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把建设的任务、理由、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群众懂得了真理，就会齐心来做，就会一鼓作气把它做好。

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力量源泉。搞基本建设，无论是大工程还是小工程，是自造设备的项目，还是引进设备的项目，都必须坚持依靠群众，自力更生。以为引进设备的项目，就谈不上自力更生，那是错误的。引进设备，是为了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做到“洋为中用”，以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这些项目的时候，在设备方面，凡是我們自己能够办的事情，就要坚持自己办。在技术方面，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虚心学习人家的长处，又注意总结我们自己的好经验，使人家的东西真正做到为我所用。要做到这些，没有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不可能的。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下决心，才能真正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破除承发包制度，积极推广大包干的办法，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承发包制度片面强调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建设单位互相制约，实质上是把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变成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买卖关系。早在一九五八年，我国广大工人群众就对它进行了批判，并且创造了大包干的办法。毛主席当时就指出：“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实行大包干的办法，能够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从资金到设备，从建筑材料到施工力量，都能统一调配和调剂，既有利于各方面的团结协作，互相配合，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做到多快好省，也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本主义倾向。象承发包制度这样一些旧事物，我们需要发动群众继续批判，象大包干这样一些新事物，需要积极加以推广。从计划管理到物资供应，从政治思想工作到经济核算，从设计到施工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凡是合理的，就要严格执行，凡是不合理的，就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坚决加以改革，逐步建立、健全一套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章制度。我们深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只要各级领导认真学习和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放手发动群众，努力做好工作，基本建设事业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在抗灾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

山东诸城县新河崖大队党支部

我们这个大队，原来不叫新河崖，是叫惠家河崖。去年八月中旬遭到一场特大洪水，把整个村庄冲毁了，庄稼被淹没，房屋大部分倒塌。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俺村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团结奋斗，依靠自己的力量，又建起了新的家园。贫下中农豪迈地说：“大水冲走了一个旧河崖，抗灾抗出了一个新河崖。”于是，就改名叫做新河崖大队。今年，我们的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五百六十四斤，一季过了《纲要》，向国家交售十一万斤，这个数字超出了全年征购任务的百分之五十。

新河崖啊，新河崖，这一年的抗灾斗争对我们的锻炼可大啦！它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对待自然灾害，同对待其它一切困难一样，不能有丝毫的怯懦和畏难。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任何灾害和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

去年秋天，我们大队满坡的庄稼一片丰收景象。可是，就在八月十三日这天，突然遭到一场暴雨，村前村后大小河流洪水横溢，平地水深两米以上，五百多亩庄稼全部泡在水里，全大队五百八十三间房屋，倒塌了五百五十七间，集体和社员的粮食损失了四十三万九千多斤，生产工具和社员的生活用品，不是被水冲走就是被砸坏。面对这种情景，有些人确实被严重的灾情压得有些抬不起头来了，说什么“多年的血汗一水漂，那年那月才能恢复起来”。

一些人把困难看得重一些，多一些，这是难免的。谁能说这场水灾不厉害呢！但是，人定胜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应当坚信不移的一条真理。大多数党员和贫下中农并没有被灾害所吓倒，他们在同洪水作斗争中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风格。摆在我们党支部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正确地分析困难，认识困难，带领群众战胜灾害。这对我们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



们的勇气。”大水过后，我们党支部成员和贫下中农一起，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感到格外亲切。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认真分析了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

第一，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战胜困难的根本保证。当着我们被洪水包围的时候，毛主席、党中央立刻派来了飞机，空投了大批熟食和救灾物资。各级领导同志涉水踏泥赶来同我们一起进行抗灾斗争。亲人解放军派来了医疗队，许多工厂的工人同志和兄弟社队的贫下中农，也从四面八方赶来慰问和支援。这不但在物质上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党的关怀、阶级友爱的温暖，给我们的抗灾斗争增添了无穷的精神力量。

第二，我们遭受的灾害，尽管是严重的，但它毕竟是暂时的、局部的。五百亩被水淹了的庄稼，除了绝产和基本绝产的二百四十亩外，其余的二百五十多亩还能够有所收获。一部分成熟了的早秋作物有些可以抢收回来；二百亩晚秋作物，水过之后加大增产措施，还可望有一个好的收成。抓紧种好小麦，又能为明年的丰收打下基础。房子塌了，一部分物料还在，可以先搭起窝棚住进去。

第三，洪水冲走了房屋财产，但是，贫下中农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是永远冲不掉的。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我们坚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党员和群众，是有能力战胜灾害的，这是克服困难的基本力量所在。总而言之，有困难，有办法，任何悲观失望的情绪和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把这种分析和认识，在全体党员、群众中，进一步广泛宣传，使大家找到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增加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更加积极地投入抗灾夺丰收的斗争。

正当我们带领群众进行抗灾斗争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跳了出来进行捣乱。他们散布孔孟之道的“天命论”，胡说什么“命里吃八升，捞不着吃一斗”，还吓唬群众说，“今年是个大灾年，大灾大难还在后边”，到处搞破坏活动。个别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一心想搞歪门邪道，散布什么要来个“老牛过河，各奔前程”。这使我们警惕到，抗灾斗争不仅是人与自然的斗争，而且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必须针锋相对，首先抓好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激发起人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夺取抗灾斗争



的胜利。

针对阶级敌人的破坏和一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我们组织群众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忆苦思甜，开展革命大批判，深入地批判了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天命论”。贫下中农一针见血地指出，“天命论”是一副精神枷锁。历来的剥削阶级总是说受灾是因为我们劳动人民的命不好，得罪了“老天爷”，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我们要我们做大自然的奴隶，老老实实地听从剥削阶级的摆布。有的老贫农把这次水灾同六十年前的一场水灾作了对比。六十年前那场水灾，比这次水灾小得多，但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不管人民的死活，还乘机敲诈勒索，致使当时仅有五十户的村庄，就有三十五户被逼下了关东，十三户妻离子散，全村二百四十口人就死去了四十九人。这同今天我们受到的党和政府的无比关怀，成了鲜明的对照。难道那个时候，我们贫下中农的命都不好吗？什么“天命”，完全是鬼话。我们还组织群众总结了一九六二年和一九七一年两次抗灾斗争的经验教训。一九六二年水灾后，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一些人只顾个人，不顾集体，结果地里的积水没有及时排出去，轻灾变成了重灾。一九七一年受灾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党支部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日夜苦干，很快排除了积水，接着又采取增产措施，结果，灾年变成了丰年，这一年粮食每亩比一九七〇年增产了近百斤，跨过了《纲要》。事实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社员们说：“社会主义是靠山，集体力量大无边。”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紧紧依靠集体的力量，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才能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力量，同灾害作斗争。国家和兄弟社队的援助，是我们战胜灾害的重要条件，我们十分珍视这些援助，但是只有坚持自力更生，得到的援助，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没有自力更生精神，即使得到的援助再多，也是不行的。根据这个认识，我们在抗灾斗争中提出的口号是“自己能站起来，就不要别人扶”。受灾后，我们经过两昼夜的奋战，就搭起了一百二十个简易棚，解决了全村的临时住宿问题。灾后第六天全村就开始自炊，不要国家的熟食供应。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在洪水刚刚退走的土地上，挖沟排水，把洪水冲倒的一百多亩玉米、高粱，一棵一棵地扶起来，洗净泥沙，把一百多亩淤在泥里的地瓜蔓抠出来，加大措施，精心管理。抢种小麦的时候，有四、五万车肥料需要往地里运，可是全大队只剩下三辆小胶轮车，怎么办？有



人想向国家伸手，但大多数群众不同意那样做，他们说，国家对我们的支援够大了，我们不能再给国家添负担。妇女们主动把运肥任务包了下来，她们找来扁担和抬筐，日夜奋战了半个月，把肥料全部运到了田间。同时，我们还把各单位和人民解放军送来的工具、化肥、种子、水泥、药品等，交给公社，统一分配到各受灾单位。不光我们这一个队受灾嘛，我们应当使其他队的阶级兄弟多得一点援助。

毛主席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通过这次抗灾斗争，也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这个道理。在这里，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我们这样做了，取得了好的结果。

抗灾抗出了丰收年。一九七四年抗灾夺得了粮食亩产四百七十五斤，除留足种子和社员口粮外，还向国家交售了粮食两万八千斤，做到大灾之年，对国家仍有贡献。今年春天，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员群众的革命干劲更加高涨，我们又提出了“重灾面前志更坚，季上《纲要》年过千”的指标。麦季跨过《纲要》后，当前秋季作物长势也好于过去任何一年。社员们信心十足，都说，大灾促进了大干，大干带来了大变。

抗灾抗出了新村庄。洪水冲毁了旧村庄，我们又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统一规划，集体盖起新房四百一十七间。现在的村庄是，道路整齐，新房成行，呈现一片新气象。

抗灾抗出了新思想。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变化是大的，但是，更大的还是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抗灾斗争，锻炼了我们领导班子，锻炼了党员和群众。在救灾的过程中，一方受灾，八方支援，使我们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我们这个队虽小，但是它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家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热爱无产阶级专政，更加热爱人民公社这个集体。同时也积累了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

我们取得了抗灾斗争的胜利，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农业生产总是要在不断地战胜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前进，没有一点自然灾害是不可能的。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开展三大革命运动，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相信，有了这个思想准备，任何困难也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克服。





红旗

一九七五年第十期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五年第十期 目 录

学习理论 总结经验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认真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谭 枫 (5)

积极办好中小工业.....江 虹 (11)

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

.....中国共产党昔阳县委员会 (16)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

——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赛福鼎 (20)

大有希望的新生事物

——江苏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的调查报告..... (27)

建设理论队伍 推动群众学习

.....天津市染料厂党委会 (31)

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

——上海沪东造船厂的调查报告..... (35)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

评投降派宋江.....安 群 (39)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兼驳胡适吹捧金批本《水浒》的谬论……………闻 钟（46）

《水浒》与宋代的阶级斗争……………杨荣国（52）

宣扬投降是对农民革命的歪曲

……………山东梁山县后集大队《水浒》评论组（56）

《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

……………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 陈大康（59）

思 想 评 论

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石 平（61）

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巴 山（65）

用什么标准要求学生？……………上海市本溪中学党支部（68）

科 学 史 研 究

同位素年代学与人类对自然发展史的认识

……………朱炳泉 周新华（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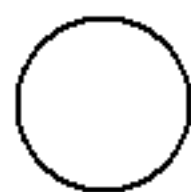
国际述评：苏修争霸世界的经济根源……………梁 效（81）

☆ 十 月 一 日 出 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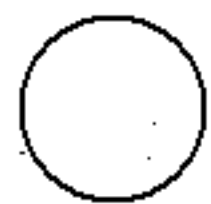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语录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and 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学习理论 总结经验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认真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

谭 枫

近几年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发展很快。农村广大群众和干部把学大寨看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自觉性越来越高。大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根本经验，在全国各地到处传播，大寨式的大队、公社遍布乡村，还涌现出一批大寨式的县。“奋战三、五年，普及大寨县”。无论南方、北方，内地、边疆，山区、平原，干部和群众都在这么说，也在这么做。这个运动的深入发展，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着广大农村的面貌。农村中广大群众和干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不断提高，批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越来越足，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农业技术改造的步伐正在加快，抗御自然灾害的力量不断增强。农业生产在连续十三年丰收的基础上，今年夏粮、早稻又获丰收。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加发展壮大，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更加巩固，大寨道路越走越宽广。

自从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来，经历了同刘少奇、林彪两次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大寨在斗争中越战越强，大寨的经验也更加丰富和发展了。在农村中广大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以后，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如何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如何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如何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逐步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缩小三



大差别创造条件？大寨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全国农村亿万干部群众，把大寨的经验同本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学大寨精神，走大寨道路，战天斗地斗敌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为着从物质和精神方面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斗争。这是农村中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在这方面，各地也都积累了许多很好的经验。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器，把这些经验认真地加以总结，特别总结好如何建设大寨县的经验，进一步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尽快普及大寨县，这是在农村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

实践证明：象昔阳县那样建设大寨县，领导是关键。一个县，有一个好的县委领导班子，这个班子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端正，搞马克思主义，团结一致，能够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有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雄心壮志，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大寨的经验就能在全县迅速推开，普及到每一个社队。昔阳所以能很快变成大寨县，关键就在这里。继昔阳之后，全国各地出现的许多学大寨、赶昔阳的先进县，关键也在这里。大寨人常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一个大队是这样，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地区、一个省都是这样。那个县的县委能够自觉坚持继续革命，那个县就有希望很快变成大寨县；那个地方注意抓县委领导班子的思想和组织建设，那个地方大寨县就出现得多，发展得快。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县委带头学大寨，根本问题在于把县委的思想政治路线搞对头。路线端正，就能抓住学大寨的根本，大寨经验才能学得到，推得开。讲路线，就要讲党的基本路线，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大寨执行的是毛主席制定的基本路线，大寨所走的是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大寨所做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工作。学大寨，就是要学这个。这样学，才是真学到了根本。许多学大寨的先进县，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经历：开始只把大寨作为生产典型来学，学了一些表面的东西，没有学到根本上，结果学来学去，人心依旧，河山未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通过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吸取经验教训，端正了路线，广泛地发动干部群众学理论，抓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这样一学一批，干部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资本主义



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发展起来了。这就说明，县委的路线是不是正确，决定了这个县学大寨运动的规模和速度。

许多同志说得好：农业学大寨，步子快不快，不在群众在领导，不在条件在路线。如果领导的路线不正确，肩膀是软的，没有战斗力，抓阶级斗争胆小，抓生产斗争劲小，听任资本主义泛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起不来，条件再好也迈不开大步。相反，领导的路线搞对头了，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同昔阳山连山、地连地的寿阳县，是个多年没有变的穷地方，由于学大寨、赶昔阳，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反对了资本主义，两年就打了翻身仗。江苏有个宿迁县，地处淮北沂、沐、泗河下游。那里原来大部分是盐碱土、薄岗地、砂礓滩，易旱易涝，也是个有名的低产缺粮县。粮食亩产长期徘徊在两百斤左右，国家每年要给这个县供应五千多万斤粮食。后来，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把县委一班人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抓住根本学大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煞住了资本主义歪风，结果，五年迈开五大步，头一年实现粮食自给，第二年向国家卖余粮，第三年粮食生产过《纲要》，第四年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长一倍多，第五年在遇到重大灾害的情况下，总产量仍然比第四年增长百分之七以上。今年三麦又比去年增长五千万斤，一季的增产量超过去年全年的增产量。许多这样的事实都说明，“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只要领导的路线搞对了，对阶级敌人敢斗，对资本主义倾向敢批，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条件再差也可以改变，困难再大也能够克服，学大寨就能跨大步。

县委的路线端正，才能认真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复杂、尖锐的。在集体经济内部，劳动力如何支配，种植计划怎样安排，农副产品从什么渠道出售，社队企业如何发展，集体收入怎样分配等等，都有一个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社队领导班子里面来。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少数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农村基层干部，妄图通过干部来为他们的资本主义活动打掩护、发放通行证。这就需要县委领导同志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以便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



的问题，划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不致把正确的东西当成错误的加以批评，把错误的当成正确的加以赞同。在学大寨的运动中，就会注意坚持对基层干部进行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正确地带领基层干部开展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搞好社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那些学大寨的先进县，正是这样做的。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扎扎实实地抓好后进单位的转化工作，也是建设大寨县的重要一环。建设大寨县，应当是社社队队学大寨，大寨花开遍全县，每个社队都能象大寨那样，批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搞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不仅要抓先进，而且要抓后进。为什么有的地方能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普及大寨的经验，建设大寨县，而有的地方停留在只有少数先进社队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县委领导同志是不是认真抓后进社队的转化工作。湖南安乡县原来有五个公社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在革命和生产上都拉了全县的后腿。后来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领干部，深入下去，重点帮助他们解决方向道路问题，使全县学大寨运动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地发展，带来了农业生产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地发展。一九七四年这个县粮食平均亩产一千一百多斤，皮棉一百四十二斤，生猪饲养量一人一头。吉林伊通县也是由于在抓先进的同时，重点解决了五十二个后进大队的问题，使全县二十二个公社，一个上《纲要》，二十一个过“黄河”。无论一个县还是一个地区、一个省，都应注意抓后进。抓先进带后进，抓后进促先进，先进后进互相促进，大寨经验就能由点到面迅速地铺开，就能加快建设大寨县的步伐。

毛主席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满足于几个先进典型，不抓后进，这样，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各方面的差别就会扩大，不利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利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为什么要抓先进？不是为了装门面，而是为了通过典型推动面上革命和生产的发展。后进单位不学先进或学得不好，那就要推它一把，促一促，帮一帮。所谓后进，无非是那里工作落后一些，问题多一些，困难大一些，集体经济不那么发展，社会主义阵地不那么巩固。这主要同那里领导班子的路线有关。这种状况长期没有多大改变，又往往是由于上面的干部去得少，关心不够的缘故。这就更需要我们的领导同志到这些单位去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到这样的地方去工作，当然比较艰苦，可能要遇到不少麻烦和困难。这对我们的干部是个考验。“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许多县委的同志正是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克服怕苦、畏难的思想，深入到后进单位去蹲点、劳动，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他们的实践说明，后进单位也并不难改变。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发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就能找到那里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许多事实都说明，后进单位的群众并不落后。只要我们相信群众，相信那里的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要革命的，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向干部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发动他们认真看书学习，解决好方向道路问题，并能正确地执行政策，帮助那里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展集体经济，那里的面貌就能迅速改变。

领导干部到后进单位去，既能帮助后进单位改变面貌，又有利于领导干部改变精神面貌。我们的领导干部，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拚命精神，背起背包，扛着锄头，到艰苦的地方去，同农村基层干部、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研究农业学大寨的问题，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许多干部下去以后，官架子打掉了，唯心精神受到了冲刷，同贫下中农的感情加深了，新型的干群关系随着学大寨运动的发展而发展。干部关心群众，群众爱护干部，干部群众一条心，团结战斗，又能促进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地发展。这种作风是需要我们大力提倡的。

建设大寨县，步子如何走？还需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比较可行的远景规划。许多地方的经验表明，有没有这样的规划，情形大不一样。这种规划的好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发动群众制订远景规划，能使广大群众看到远大目标，从而激发革命热情，鼓舞战斗士气，有利于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干部群众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干大事业，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有了规划，还能够加强计划性，避免盲目性，不致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有利于保护群众的积极性。甘肃民乐县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提高了认识，通过调查研究，与群众商量，搞了一个十年发展规划，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斗



志。他们抓长远，促当前，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就平整条田六万五千亩，修成中小型水库六座，渠道八百多条，长达三百三十多公里，育树苗六千多亩。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制订规划的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各地都在发动群众制订出自己的规划。队有队规划，社有社规划，县有县规划，不仅规划如何改变山河面貌，而且规划如何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提出发展规划来，并且领导群众为之奋斗，一步一步地付诸实现。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很有好处。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的保守思想也会常常出来作怪。这种思想在领导班子中表现出来，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一小二私，这就带来许多弱点。受了这些东西的影响，往往站不高，看不远，看不到群众、集体的力量，有点成绩就自满，遇到困难就低头，胸无大志，不敢想不敢干。“只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才能迈开学大寨的步伐。”这是许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共同体会。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经常不断地清除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才能够想得远，干得大，不断前进。

大干社会主义农业靠什么？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靠亿万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靠大寨精神。全国数百个学大寨的先进县，无一不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的结果。在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西藏高原出现上十个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的县，就是最好的证明。依靠群众胆子大，自力更生办法多。制订规划，实施规划，都要充分发动群众，都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这是学大寨的力量源泉，大干快上的可靠保证。“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通过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把农村中广大干部、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把各行各业的力量组织起来支援农业，那末，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能办得多快好省。在农业战线上，我们还有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还有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我们深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亿万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只要我们奋发图强，努力工作，就一定能搞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寨式的县一定会普及到全国去，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步伐一定能够加快。



积极办好中小工业

江 虹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工业战线呈现一片蓬勃兴旺的景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工人和干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空前高涨。我们不仅建设了和正在建设许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而且有大量的中小型企业在城市和农村象雨后春笋一般生长起来,日益发挥出它的积极作用。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曾经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实践证明,毛主席所制定的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认真执行这个方针,有利于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可以更好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促进工业生产高速度地发展。

毛主席指出:“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积极发展中小工业,包括社队办的工业,有利于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现代化的大型企业,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高,是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技术改造的主要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一批大型企业,并加强对这些企业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大型企业需要大量投资和大型设备,技术要求高,从一个省、一个地区来看,由于受资源、资金、设备等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办得很多。要多办,就必然伸手向中央要投资,要设备。相反地,中小企业投资少,设备容易解决,技术容易掌握,建设时间短,资金周转



快,积累也快,地方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优点,按照自己的条件,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需要与可能因地制宜地去办。这样,不仅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发展小城镇,形成合理的工业布局,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而且可以更好地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中小企业一个一个地看起来规模小,产量不大,但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小企业办多了,加在一起,产量就大了。拿化肥来说,目前江苏全省小化肥厂生产的合成氨相当于大型化肥厂生产的四倍。如果只搞大的,不搞中小,一条腿走路,工业的发展势必要少慢差费。

中小工业有广阔的发展天地。农村社队办的工业更是如此。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辽阔,资源丰富,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办工业的人力、物力方面,都有巨大的潜力。尤其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只要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进一步调动农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社队工业一定会更加多快好省地发展起来,并促进整个工业更快地发展。

为了更好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从地方来看,也必须多办中小工业。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江苏省有相当大的地区是粮棉高产地区,复种指数很高,还有些地区地多人少,这些地区劳动力紧张,劳动强度大,都迫切需要以机器操作代替手工操作。机器从哪里来?光靠大型企业生产的机器是不够的。比较好的办法,是两条腿走路,除了大的农机厂外,县、公社、大队都能分别生产一些小型农机具或者进行修配。我国农业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各地地形、气候和耕作制度有很大不同,对农业机具的需要复杂多样。以中小工业为主,可以在数量上、品种上和性能上,更适合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对农业的支援也更及时,更方便。江苏省近几年来,每个地区都建立了拖拉机厂,根据各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和耕作制度,生产型号不同的拖拉机,例如,徐淮平原地区生产中型拖拉机,沿江水网地区生产小型手扶拖拉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有利于较快地提高全省农业机械化水平的。

无锡县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县,过去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



扰，地方工业发展缓慢，不少地方是“没有机器想机器，有了机器买不起，机器坏了愁修理”。一九六五年，全县只有六台拖拉机。文化大革命以来，**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广大贫下中农为了增产粮食，多做贡献，积极改革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农忙季节争劳动力的矛盾更加突出，迫切要求工业部门提供更多更好的农业机械、水利电力设备、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等。无锡县的干部和群众没有等、靠、要，而是根据毛主席制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自力更生，积极发展县社队工业，用自己生产的机器武装自己。一九七四年，全县已办起一千六百多个工厂，工业总产值接近两亿七千万元，不仅能生产一般中小型农具，而且能大量生产拖拉机和柴油机了。现在，全县已有机械动力二十一万马力，平均每四亩田有一马力，机耕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九年来，建电灌站九百九十四座，修地下渠道一千四百四十六公里，百分之九十八的生产队通了电，基本上实现了耕作、脱粒、植保、排灌、粮食和饲料加工等项目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一九七四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一千四百六十七斤。

围绕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积极办好中小工业，逐步建立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对工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也促进了工业本身的发展。在为农业生产解决排灌、农副产品加工、耕作和运输机械时，需要发展机械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解决农药、化肥时，需要发展化学工业；机械、建筑材料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又促进煤炭、冶金、电力和其他原材料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群众把这种互相促进的关系形象地叫做“农字当头滚雪球”，是很恰当的。

是立足于自力更生，依靠群众，在发展大型工业的同时，积极地发展中小型企业；还是两手向上，只热衷于搞大的、洋的、全的，轻视中小型企业，这反映了工业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林彪鼓吹“大、洋、全”，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他们崇洋迷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具体表现，需要继续批判。同时，也要教育我们队伍内部的某些人，改变那种迷信“大、洋、全”，轻视中小型企业，轻视群众的错误思想。迷信“大、洋、全”的人，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们不懂得，大是从小来的，小可以转化为大；洋是从土来的，土可以转化为洋；全是从不全来的，不全可以转化为全。常州市生产手扶拖拉机，曾经订



过两次“大、洋、全”的计划，都落了空。后来，他们把基点转到自力更生，挖掘老厂潜力方面来，利用水泵厂搞总装，柴油机厂搞动力，锻造厂搞钣金件，农具修配厂搞齿轮，十几个单位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生产拖拉机配套，两年时间就形成了年产三千台手扶拖拉机的生产能力。经过大搞技术革新，填平补齐，现在手扶拖拉机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一万五千台。这个市的经验表明，在统一规划下，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围绕若干主要产品，打破行业界限，把有关厂组织起来，搞好协作，形成“一条龙”生产线，同时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逐步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是一个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好办法。常州市在组织几个小厂生产拖拉机的时候，有人说桌子上不能唱大戏。工人们响亮地回答：“一张桌子小，几张桌子拼起来就能唱大戏”。这句话包含着辩证法的思想。现在，江苏省不仅有一个市范围内的“一条龙”协作，而且出现了全省范围的“一条龙”协作。这种社会主义的大协作，有利于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挖掘原有企业的潜力，发扬穷办苦干的革命精神，加快工业发展的步伐，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办好中小工业，关键是抓路线，坚定不移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对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方向、道路问题放任不管，让资本主义倾向自由泛滥，是错误的。但缩手缩脚，不积极支持新生事物，不努力发展中小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也是错误的。中小工业的特点是：分散、数量多，所有制不同，有全民所有制，又有集体所有制。在存在着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的条件下，如果路线不对头，很容易受价值规律支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从许多地方发展工业的情况来看，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利润挂帅；是支农第一，还是赚钱第一，突出地表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论在大型企业或中小型企业中，这种斗争都将是长期的。我们要牢记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既要用积极的态度办好中小型企业，又要自觉地认识到这种斗争的复杂性，因势利导，用社会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

为此，必须加强党对于中小工业的领导。近几年来，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以来，许多地方党组织，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武器，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反对资本主义倾向，针对每一个时期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整顿，对



于保证中小工业的健康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今后，必须继续加强党对中小工业的领导，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使它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社队企业有如山花烂漫，正开遍祖国大地，显示了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这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所在。它的发展对于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对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缩小三大差别，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的人民公社经济，现阶段一般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将来，要逐步过渡到大队统一核算和公社统一核算。实现这种过渡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公社、大队的经济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而要壮大公社、大队的经济，除了全面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外，必须大力发展社队工业。无锡县社队工业发展得比较快，它的公社、大队两级的经济的比重也比较大。一九七四年，公社、大队两级已经占三级固定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五。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支持社队工业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加强党的领导，相信和依靠群众，积极把它办好，使它从少到多，不断发展和壮大。“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社队企业的发展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好的，改正错的，问题并不难解决。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分清事物的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主流方面和非主流方面，“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我们切不可忘记。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建国二十六年来实践证明，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工业发展就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步子就迈得快；相反，受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工业发展就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步子也迈得慢，甚至要停滞、倒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认真总结发展工业，包括发展中小工业的经验，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按照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中小工业办得更多更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更大的贡献。



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

中国共产党昔阳县委员会

今年以来，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紧密联系实际，分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形势，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研究了如何继续抓好后进队的转化问题。为此，县委派出了二十多个调查组对后进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重点帮助这些队的干部群众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端正方向、路线。在这个基础上，专门召开了后进队学理论汇报会议，以大寨为榜样，找差距，揭矛盾，促进大干快上。这样一抓，一批后进队的精神面貌明显改变，奋起直追，迅速赶了上来。它们的进步，既影响了中间的，也震动了先进队，大家都感到形势逼人。经过这段工作，我们深深体会到，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的革命形势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必须端正思想，改进自己的工作，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是落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需要，也是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建设大寨县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们陆续抓了一批后进队的问题。这些队大多数是“老大难”单位，人口多、土地广，潜力也大。经过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有的已成为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先进和后进是比较而存在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深入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队能够坚持继续革命，就做到了先进更先进；有些队变化不大或停步不前，掉在后头。据我们初步调查，按照建设大寨式大队的要求，全县目前仍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大队处于后进状态。这些队多数是偏僻山区的小村、小队。几年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动下，这些单位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集体经济还不够壮大，无产阶级专政也不那么巩固，生产发展的步子不大。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片面地认为，只要全县多数队上去了，这些小村小队关系不大，因而出现了只重视抓先进队、抓大村大队，而忽视抓这些后进队的现象。结果，与多数队比较，这些队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影响了后进队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也使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得不到全面平衡的发展。



要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首先就要解决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后进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体会是要坚决丢掉一点论,坚持两分法,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善于发现后进队的积极因素,调动、扩大和发扬后进队的积极因素,促进它们向先进转化。

后进队有没有积极因素,有没有可能向先进转化呢?这是长期以来许多同志头脑中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有的同志对后进队总有一种埋怨情绪,老是怨这些后进队干部不努力,群众落后,工作不好领导。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后进队的实际情况的。相对来说,后进队的问题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花气力去调查研究,才有可能解决。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另一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就是在后进队的群众中同样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几年来,在帮助后进队的工作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迫切要求改变后进面貌;那里的多数干部也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本质上是要革命的。而且即使在这些地方,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分子也是不少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同样在不断涌现。关键在于我们县、社干部要丢掉一点论,善于用一分为二的观点,从本质上发现和调动这种积极因素和潜在力量。我们县皋落公社有个南庄大队,长期处于后进状态,被人们认为“板上钉钉,没法变”。今年以来,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县、社干部转变了思想,派出工作组帮助这个大队坚持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群众,深入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积极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干部,表扬了一批热爱集体的先进社员,使这个大队正气上升,邪气下降,调动了社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学大寨迈出了新步子。象南庄大队这种明显转变的事例很多,它都说明要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首先就要克服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才能真正深入下去,采取正确的方法,帮助解决问题。

事实上,先进和后进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先进队就是由原来的后进队转化过来的。就以我们县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南埝、武家坪和石坪等大队来说,当初它们也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学大寨以来,由于这些大队的党支部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就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这说明,后进队转化为先进队的过程,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斗争,不断发展和壮大那里的积极因素,逐步克服和消除那里的消极因素,使积极因素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是着眼于发现和调动积极因素,只是消极地埋怨、批评和指责,那就会越批越糊涂,越整越泄气,挫伤后进队干部、群众向先进队转化的积极性。因此,解决后进队的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抓,一是要揭露矛盾,批判错误的东西;否则,就看不清问题,分不清是非。一是要发扬积



极因素，支持新生事物，鼓舞干部和群众的革命斗志；否则，就不能促使其内在因素发生作用，从后进向先进转化。这都是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所必需的。

后进队的问题不管表现形式怎样，实质上仍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在帮助后进队的工作中，我们始终是从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入手的。大寨的道路，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我们强调学大寨学根本，首先指的就是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一条，无论对于那种类型的社队都是适用的，就后进队来看，显得更加需要。有的同志过去所以对帮助后进队转变缺乏信心，主要是感到那里阶级斗争复杂，不好解决。其实并不是这样。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后进队前进的动力。许多事实说明，后进队所以后进，并不是由于那里阶级斗争特别复杂，而恰恰是由于那里的领导班子没有能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紧阶级斗争造成的。一旦他们端正了方向、路线，敢于狠抓阶级斗争，情况就会迅速发生变化。洪水公社东沟大队原来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大队党支部提高了觉悟，明确了方向，带头自觉革命，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反复批判资本主义，革命和生产搞得热气腾腾，面貌焕然一新。象东沟大队这样抓住关键去解决后进队的问题，那么后进队的转化既不会慢，也不是那么难的。过去，我们县、社两级党委有的同志也抓后进队，但是由于很少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没有真正抓住方向、道路问题，帮助后进队的同志从两条道路斗争中提高认识，而往往是用简单的办法处理问题，结果，使后进队的问题越来越结成了疙瘩。这种状况目前有了改变。

抓好后进队的阶级斗争，重要的是要帮助这些后进队建设一个敢反资本主义，敢干社会主义的党支部。后进队的领导班子所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学习理论不够，缺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因此，必须重视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教育后进队的干部。我们在帮助后进队的过程中，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即：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用继续革命的思想教育干部，帮助他们打破小生产的狭隘眼界，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思想；用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思想教育干部，使他们树立一心为公、一心为集体的思想。进行这些教育的目的，着重是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我们既要敢于把那些能够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能够密切联系群众、能够带头大干苦干的干部，及时提拔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又要注意保持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对于后进队



的干部，换人不如换路线、换思想。干部做工作，有个学习、熟悉和提高的过程，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从斗争实践中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如果一犯错误就撤换，那是不符合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也不利于后进队的转变的。

要改变后进队的面貌，还必须帮助它们逐步改变生产条件。一般说来，后进队也是穷队，集体经济的基础比较单薄，发展生产有一定困难。我们在充分调动后进队内部积极因素的前提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他们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国家拨给农业的机械设备优先照顾后进队；县、社举办的大中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优先考虑后进队的受益，联办工程由县、社多负担投资，让后进队多出工，少出钱；县、社企业同后进队联办一些力所能及的副业，由县、社投资，大队出工，收入分成；在有条件的公社，从社办企业积累中抽调一些资金支援后进队，等等。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我们坚持了两条原则，一条是一定要有利于发扬那里干部和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再一条是一定要着眼于发展集体经济，促进那里改变生产面貌。实践告诉我们，坚持这两条原则是很重要的。大寨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假如当地的干部群众还没有觉悟起来相信和依靠自己的力量向困难作斗争，那么，国家和集体给的支援常常不能发挥它应起的作用，甚至助长一些人的依赖思想。但是，当着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已经充分调动起来的时候，给予必要的经济上的帮助，就有利于尽快地改变落后面貌。

后进队的问题发生在基层，责任在我们县委领导。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我们的情况怎样呢？总的来看，对先进队注意得多，对后进队就差些。现在的一些后进队，大部分在边远山区。战争年代，那里的干部和群众曾经为革命做出过贡献，是当时全县的先进地区。解放以后，我们进城了，对它们不重视了，去得少了，抓得少了，放松了领导。群众批评说：“战争来了，你们吃在山区，住在山区。现在搞社会主义了，有些干部就看不起山区了，不到山区了。”这个批评，启发我们认识到，对后进队的态度问题，实质上是县委思想革命化程度的一个反映。不是后进队“难办”，关键是我们县委对待后进队的认识和工作作风能不能端正。我们针对后进队的问题，从县委身上找原因，发动干部群众给县委提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并带领一批得力干部，深入到后进队蹲点。这样，促进了县委自身的革命化，也带动了后进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推动了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全面深入地发展。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

——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

赛 福 鼎

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中，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来的二十年，是各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战斗的二十年，是沿着社会主义大道胜利前进的二十年。二十年来，各族人民以空前的革命热情，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与进行颠覆和侵略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斗，使新疆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巨大的变化。各族人民遭受残酷、野蛮的压迫和剥削的贫穷落后的旧新疆，变成了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日益繁荣兴旺的社会主义新新疆。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二十年来新疆各族人民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和取得的巨大胜利，使我们深刻体会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胜利。没有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就没有少数民族的翻身解放，就没有今天繁荣兴旺的社会主义新疆。

毛主席教导我们：“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这是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最根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民族是划分为阶级的。每个民族都有两种人：一种是人数极少的剥削者，一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正如列宁所说：“在任何真正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集团都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划分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新疆解放以前，民族压迫的实质，就是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和汉族的反动统治者勾结在一起，对各族劳动人民（包括汉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种压迫和剥削，是造成民族对立和民族隔阂的根源，也是造成各少数民族长期贫困、落后的根源。因此，要彻底解决民族问



题，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使各民族走上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握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二十多年来，新疆社会面貌的每一次改变，都是经过大的革命运动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取得的。解放以后，首先摧毁了各级反动统治机构，把政权夺回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使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历史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压迫和剥削。紧接着，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仍然是十分激烈的。封建地主、牧主及一切民族反动派，利用他们残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常常披着民族和宗教外衣，进行破坏和捣乱；他们甚至同国外的阶级敌人相勾结，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在党的领导下，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和各族人民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剥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谓“维护民族利益”的外衣，揭露阶级斗争的实质，使群众不受他们的欺骗和愚弄，并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粉碎了内外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批林批孔和目前正在开展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在革命的带动下，各条战线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同烂漫的山花，开遍天山南北。事实证明，没有这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不可能有今天新疆的大好形势。

长期以来，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同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反动的民族上层一唱一和，竭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抹杀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例如，在如何看待革命条件的问题上，他们总是强调少数民族地区这方面或那方面落后的东西，而不愿首先看到各族劳动人民受压迫剥削特别深重、革命要求非常强烈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方面。事实上，各族人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和建设事业最重要的条件。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曾经热情赞扬“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是很高的”（《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一文的按语），并驳斥了那种认为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现合作化的谬论，批判了轻视少数民族的错误观点。



实践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新疆各族农、牧民，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全国五亿农民基本上在同一时期实现了农牧业合作化，随后又以基本上相同的步伐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但是，认为少数民族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的观点，在以后的各次革命运动中还是时有发生。在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同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新疆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为了正确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处理好各民族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共同性和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关系。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矛盾同样是阶级矛盾，主要的斗争同样是阶级斗争。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新疆地区的落后状况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各族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阶级要求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指导思想，党的基本路线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光明大道，无产阶级专政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护身法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族人民不可分离的伟大祖国。所有这些，都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愿望，是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团结进步的根本保证。离开这些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就要背离新疆各族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离开阶级斗争的共同规律，离开各族劳动人民共同的阶级利益，以超阶级的观点看待民族问题，就必然要滑到民族主义的斜路上去，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各个民族都有它产生和发展的过程，都有它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在某些方面，就有其特殊性。在充分遵守共同的阶级斗争规律这一原则的基础上，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充分照顾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特殊的一面。如果在工作中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那就容易犯“左”的错误。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对于发展新疆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主席特别重视，谆谆教导新疆的干部要努力做好经济工作，做到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进行反修防修斗争，逐步消除各民族间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都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在新疆这样一个过去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践踏、蹂躏因而十分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那些对少数民族抱轻视态度的人，是大有疑问的。他们总是强调新疆经济文化落后，认为搞建设不能高速度，只能慢慢来。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看来，新疆固然一穷二白，可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介绍一个合作社》）何况，辽阔的新疆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一千多万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又有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兄弟省区的大力支援，只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完全能够高速度发展的，任何悲观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对此，新疆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事实，已经做出了最有力的证明。

解放以前，新疆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现在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工矿企业。一九七四年的工业产值，比一九四九年（那时主要是手工业）增长了二十多倍，比一九五五年自治区成立时增长了将近四倍。仅原油一项，现在新疆一年的产量，比解放前夕全国一年的产量还多好几倍。随着工业的发展，各民族的工人阶级队伍逐步成长壮大。农业生产根本改变了解放前用木犁耕地的落后状况，正向着机械化的方向阔步前进。与解放前相比，耕地面积和灌溉面积都扩大了一倍半以上；机耕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七点八。粮食产量，今年与解放前夕比较，预计增长近三倍，牲畜总头数增长一倍多。随着生产的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自治区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各项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批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走进大学，现在高等学校的学生，比自治区成立时的一九五五年，增加一倍半以上。中专和中学的学生，增加近十三倍。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医疗卫生方面，医院和病床比一九五五年增加六倍多。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是在农牧区，现在农牧区医务人员占全自治区医务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病床占百分之七十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牧业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遍及各农村牧区，共有一万多名。旧社会农村无医无药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发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了显著的发展。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四年，维、哈、蒙文图书和中小学



课本共发行六千四百一十多万册，平均每年发行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一点二倍；维、哈、蒙文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共发行二千八百多万册，平均每年发行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十点三倍。

新疆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飞跃发展的事实生动地说明：各族人民群众只要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正确的路线，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坚决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为此，除了要解决好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保证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解决好要不要实行和能不能实行自力更生的问题。那些对少数民族抱轻视态度的人，往往强调新疆落后，情况特殊，认为搞经济建设不能自力更生。二十多年来，新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就是在同这种错误思想的不断斗争中取得的。我们强调自力更生，当然并不是不要援助。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疆，由于过去受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长期压迫，经济发展水平较内地一些省、市更为落后，在解放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和兄弟省、市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不断给了大量援助。这种援助，是过去新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今后还是必要的，特别是人力的支援更是必要的。但是，经济建设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只有充分发扬新疆各族人民的自力更生精神，国家援助才能发挥作用，决不能因为有了国家援助，就滋长懒汉懦夫思想。要不要自力更生，实际上是要不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的积极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是要不要实现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逐步提高新疆经济的自给水平，并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的问题。那种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躺在国家援助上当伸手派的思想，是非常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搞好民族团结非常重要。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战胜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侵略活动，战胜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一小撮民族反动派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历史的经验证明：在新



疆，没有各民族的团结，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就不会有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各族人民团结的思想基础。我们所说的民族团结，是各民族真正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建立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在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斗争中，携手前进，并肩战斗。这样的民族团结，只能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上。为了搞好民族团结，多年来新疆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不断进行无产阶级民族观的教育，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增强民族团结，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促进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

为了搞好民族团结，必须坚决执行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一系列政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各自治州、自治县的成立，标志着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胜利实施。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各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有利于调动各族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潜力，增强各民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自治区成立后，努力进行党的建设，发展少数民族出身的党员，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培养和提拔了大批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和妇女干部。现在全区少数民族党员比自治区成立时增长了五点八倍，少数民族干部增长了一点零五倍。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了自治区各级党组织、革委会和经济文化部门的领导核心。在各级党委委员中，少数民族出身的占百分之六十五。少数民族出身的党员、干部，与汉族出身的党员、干部，紧密团结，并肩战斗。新疆这支由各兄弟民族组成的干部队伍，经过国内外阶级斗争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证明是能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能够团结各族人民胜利前进的。党的其他各项民族政策，也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

党的团结是民族团结的核心。而加强党的团结的关键，是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要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团结的、坚持反修斗争的、有朝气的、联系群众的战斗堡垒，通过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去带动党的团结和各族人民的团结。



二十多年来，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是在同危害团结的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中实现的。毛主席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种反映，都是资产阶级思想，都是同无产阶级的民族观根本不相容的。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在一九五二年开展了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又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伙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进行了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进行了民族政策的再教育。每一次斗争，都使各族人民受到了深刻的无产阶级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都进一步促进了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在斗争中，注意了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把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区别开来，前者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后者则是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是苏修的代理人。这样，就既能有力地打击顽固的敌人，又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新疆地处祖国反修前哨。苏修叛徒集团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不断对新疆进行颠覆和侵略活动，妄图变新疆为他们的殖民地。新疆的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则是苏修的走狗和内应。因此，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就必须坚持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进行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斗争。我们必须牢牢掌握对敌斗争的大方向，深入进行反修防修教育，提高警惕，进一步加强团结，随时准备粉碎苏修颠覆、侵略的罪恶阴谋。过去，我们新疆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今后，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苏修和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妄图进行颠覆、制造分裂，永远不可能得逞。

回顾过去，豪情满怀，展望未来，信心百倍。各族人民在欢庆节日的时候，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光荣历史责任，决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增强民族团结，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好战备工作，使新疆成为祖国西北边疆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障碍，新疆各族人民将再接再厉，勇往直前，以更加坚韧、奋发的革命精神，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大有希望的新生事物

——江苏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的调查报告

根据毛主席关于发展工业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的方针，江苏无锡县近年来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社队工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要不要办工业？怎样才能办好社队工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这个县长期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农村社队的任务是搞农业生产，工业应该让国家和城市去搞。还有的同志看到社队工业在发展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帮助它解决，而是持消极态度，不敢支持它。结果，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一直停滞不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无锡县广大贫下中农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积极改革耕作制度，扩大“三熟”面积，迫切要求工业部门提供更多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县委认识到，单纯等待和依赖城市大工业的支援已经不能充分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了，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积极发展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他们通过实践体会到，对于一个县来说，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处理好农业和社队工业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农业要持久地以较髙速度发展，又需要工业的支援。当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不积极发展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就会影响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农业和工业协调发展，才能促进整个经济不断高涨。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于是，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农村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等指示，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力更生，积极发展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一九七四年，全县办起工厂一千六百三十八个，其中社办二百二十九个，队办一千二百七十四个，社社队队都有了自己的小工厂；工业总产值达到二亿六千九百多万元，其中社队工业占一半。在工业的支援下，农业生产也得到迅速发展，一九七四年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平均亩产一千四百六



十七斤。

实践表明，社队工业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对于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有着很大的作用。

社队工业的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提高了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充分显示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过去，这个县多数公社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生产水平比较低，公社、大队两级所有的经济比重很小。随着社队工业的发展，公社、大队所有的固定资产，已占三级所有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五。公有化程度的提高，标志着社会主义所有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对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深远的意义。社队工业用自己积累的资金，支援了穷队的农田基本建设，缩小了穷富队之间的差别；为农业的技术改造，提供了大量的设备、资金，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材；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使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机械产品以中小为主、农业机械购置以集体为主的方针逐步得到落实。例如，梅村等六个公社，社队工业一九七四年积累资金七百多万元。他们拿出三百多万元武装农业，支援穷队，为各大队和生产队添置农业机械、机床，修建地下渠道，开展农业科学实验，修盖猪舍等。有的队过去底子很薄，现在也有了车床、手扶拖拉机，盖了猪舍，经济力量逐步壮大。目前，全县已有农业机械动力二十一万马力，平均四亩地有一马力。拥有拖拉机二千九百多台，机耕面积达到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百分之九十八的生产队通了电，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社队工业的发展，有利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改造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用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雄厚的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引导农民战胜资本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广大社员看到社队经济“一步一层楼”，感到集体有靠头，社会主义有奔头，就更加热爱社会主义。随着社队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得到初步普及，抗灾能力进一步提高，这本身就是对“天命论”、“上智下愚”等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它有利于使农民更坚决地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同时支持了农村的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卫生革命，有利于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

发展社队工业，也加快了整个工业发展的步伐。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贯彻落实大中小企业并举的方针，必须因地制宜地积极发展社队工业。社队工业具有



规模小、投资少、建设快的特点，能够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无锡县的经验证明，积极发展社队工业，同时办好县办工业，大大加快了工业的发展速度。只几年的时间，这个县每年已经能生产钢和钢材各一万吨，合成氨七千多吨，柴油机九千多台，手扶拖拉机三千多台，电动机二十二万瓩，水泥二万多吨，聚氯乙烯树脂近二千吨。

发展社队工业的根本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针。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社队工业同样存在着这种斗争。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社队工业是集体所有的，产供销没有全部纳入国家计划，受价值规律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在发展社队工业中，办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按什么价格销售，都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企业，还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利润挂帅；是支农第一，还是赚钱第一。无锡县委在发展社队工业过程中，针对这些问题，经常向社队工业的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认真组织他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端正企业的方向路线。同时，反复地宣传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使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正确认识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是我们党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重大措施，并且采取具体办法，保证把支援农业，坚持为农业服务，作为社队工业发展的重点。例如，在办厂次序的安排上，把支农厂放在首位，首先集中力量办好对支援农业有决定意义的工厂；在产品安排上，把支农产品放在首位；在生产安排上，把农机修配放在首位。

加强对社队工业的领导，把产供销不同程度地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是使社队工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无锡县在县、社两级都成立了社队工业的管理机构，由县集中统一安排社队工业的产供销计划，逐步做到有些产品纳入县或省、地的计划，有些产品与大厂挂钩定点加工，有些产品则由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目前这个县的社队工业产供销已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以不同的形



式分别纳入国家和地方计划的轨道。他们对一些原材料来源没有保证，销路又不稳定的产品，还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同时，充分发挥财务部门和银行的监督作用，从生产、交换等环节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本主义倾向，保证社队工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

社队工业不仅产品主要应为农业服务，积累也应该主要是为发展农业生产和实现农业机械化服务。无锡县委在实践中体会到，社队工业积累不仅要用于本身的扩大再生产，特别是要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实现农业机械化。如果社队工业的积累不为农业服务，就可能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产生盲目发展的倾向。他们总结了各社队使用社队工业积累的经验教训，规定社队工业的积累，百分之六十左右用于购置农业机械，兴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农副业生产和支援穷队改变面貌，百分之三十左右用于社队工业扩大再生产，百分之十左右用于文教、卫生等事业。严格禁止社队用工业积累搞楼堂馆所。这就使社队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方向越来越明确，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无锡县社队工业实行的是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和评工记分的计酬方法，这是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生事物。这个县的社队工业工人，农忙务农，农闲做工，每年有三、四个月回队参加农业劳动，既保证了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又有利于工业的发展。他们规定亦工亦农人员，包括社队企业干部，都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收入归队，参加生产队统一分配。对一些技术比较熟练的人员，给予必要的补贴，但补贴也不能过高。在劳保福利方面，除了必要的劳动保护外，其他都和社员一样，不搞两种制度、两样待遇。这样，既稳定了农村劳动力，又调动了亦工亦农人员的积极性，使广大社员关心工厂的发展，在工厂劳动的社员也关心农业生产、关心生产队的事，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社队工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无锡县委在社办企业建立了党支部，队办企业建立了党小组，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对保证社队工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发展壮大，起了重大作用。

现在，无锡县社队工业的广大职工，正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总结经验，乘胜前进。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建设理论队伍 推动群众学习

天津市染料厂党委会

我厂工人理论队伍是在批林批孔中建立起来的，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又进一步成长、壮大，目前理论队伍成员已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六。他们在党委会和支部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同时，也积极带动和辅导职工群众进行学习，推动了我厂学习运动的逐步深入。现在全厂广大职工学理论，抓路线，讲团结，促生产，进一步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工人理论队伍建立以后，我们始终注意抓好理论队伍的思想领导，帮助他们克服各种思想障碍，引导他们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锻炼，在斗争中提高。开始，有的同志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理论基础差，“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思想上有自卑感，行动上畏缩不前；也有的同志抱着“行就干，不行就散”的试试看的态度。针对这种畏难情绪，党委会反复进行了思想工作，从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全面专政的高度，启发大家认清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鼓励他们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参加理论战线的斗争，做一个能文能武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认识提高以后，压力变成了动力，在领导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理论队伍勇敢上阵，朝气蓬勃地前进了。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包含着矛盾的，理论队伍建设中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长期存在的。当理论队伍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以后，有的同志又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听不进群众的意见。党委会和支部认识到，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侵蚀工人理论队伍，如果不加以抵制，工人理论队伍就会走偏方向。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及时组织理论队伍学习毛主席关于“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和“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帮助他们认识：做无产阶级的理论战士，必须拒腐蚀，永不



沾，在参加生产劳动和现实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冲洗资产阶级的政治灰尘，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帮助理论队伍建立和健全生活会制度，使他们提高了改造思想的自觉性，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为革命学习，为革命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

正象有的工人说的：“打铁先得自身硬。”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只有自己首先“搞清楚”，才能帮助职工群众学好。因此，我们不断加强对理论队伍的学习领导，要求他们发扬知难而进的革命精神，刻苦读书，努力钻研，学懂弄通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在原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同时，党委会又采取各种措施，想方设法使他们多学一点，学好一点。我们围绕各个阶段的学习任务和内容，经常举办理论队伍成员读书班，开办一些基本理论知识讲座，组织他们认真看书学习。除了要求他们同班组里的职工群众一起学习以外，每星期还给他们安排半天的学习研究时间。并且根据需求和可能，选派他们到上级机关举办的读书班去学习。此外，我们还强调理论队伍成员要在业余时间养成自学的好习惯，除了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还要学一点历史、文学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以便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更好地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还要读点反面教材，从正反两方面增强识别能力，提高战斗水平。目前，我们厂的理论队伍正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水浒》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开展研究和评论。

对于工人理论队伍本身的学习，既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又要注意严格要求。我们认为，文化程度低一些，理论基础差一些，这都不要紧，由浅入深，从头学起就是了。但是，一定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风，坚持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这是理论队伍学习和提高的关键。我们强调要努力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善于把所学的革命理论用来分析和解决本单位的方向、路线问题，促进安定团结，把各项工作搞上去，防止那种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错误倾向。这样抓了以后，理论队伍中出现了刻苦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的好风气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的好学风。二车间理论小组为了弄懂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怎样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问题，认真学习了《国家与革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等著作的有关章节，还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经过多次讨论和研究，认识到它们在基本适应的情况下，还有不相适应的方面。这些不相适应的方面如不很好解决，就会损害社会主义公有制，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因此，必须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他们在对这个问题基本弄清楚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车间存在的人与人关系方面的问题，帮助车间领导提高依靠工人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认识，改进工作方法，从而增强了干群团结，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举办了六期工人轮训班，引导工人群众增强当好企业主人的自觉性，使车间革命和生产出现了新气象。

工人理论队伍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基层和群众之中，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工人理论队伍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放在本单位，立足于班组，帮助群众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就要求理论队伍的成员充分利用自己生活在群众之中的有利条件，坚持与群众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既当先生，又当学生，为要当好先生，首先当好学生。如果认为自己身上沾过“油泥”，就不需要当好学生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理论队伍虽来自群众，但也有一个继续和群众结合的问题；理论队伍成员虽是工人，但也有一个向工人群众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问题。认识提高了，理论队伍的成员以自己的带头作用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班组学习活跃起来。他们在同群众一起学习当中，也使自己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提高。

为了发挥工人理论队伍在群众学习中的带动作用，我们一直坚持了以下几种做法：

一、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工人理论队伍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方面，理论队伍密切关心车间班组学习情况，把群众学习中遇到的难点作为自己学习研究的内容。三车间“三八”工段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对于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争论热烈，有的同志总感到似懂非懂，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清楚。理论小组成员在研读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的同时，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资产阶级法权在本单位的各种表现，然后经过综合分析，再向群众进行讲解。这就使群众对资产阶级法权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提高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自觉性，促进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班组学习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理论队伍开展专题研究，并把研究的成果拿到群众中去讨论、



修改、提高。四车间理论小组研究苏联变修的原因，写出初稿后即主动征求群众的意见，随后又根据群众的意见作了修改，再交给群众讨论。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多次反复，稿子的质量就大大提高了。这种理论队伍和群众之间的互相促进，有助于把学习不断引向深入。

二、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深入调查研究，努力将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为了弄清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与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关系，四车间理论小组与工人群众一起调查了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物质刺激”造成的危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厂里搞“评工记分赛”，干什么活都记分，闹得工人不团结，涣散了人心，影响了生产。一些老工人气愤地说：“评奖评奖，越评越僵，越评越伤。”理论小组根据这些实际材料，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分析了如果 unlimited 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将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的关系起破坏作用，使领导和职工深受教育，进一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调动了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大干快上。

三、坚持为班组学习服务，为群众学习服务。理论小组经常分析车间班组学习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帮助搞好学习。他们还根据班组学习的进度和需要，有的放矢地进行集中和分散的辅导，用通俗的语言，结合生动的事例，对基本理论问题作比较明白透彻的讲解。群众反映：“这样的辅导针对性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我们欢迎。”除此以外，理论队伍还帮助群众总结学习经验，整理学习心得体会，组织交流和推广，对广大群众的学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通过这些办法，较好地发挥了理论队伍在群众学习中的带头作用，使群众的学习扎扎实实、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工人同志称赞工人理论队伍说：他们是群众学习的骨干，基层领导的得力助手和好参谋。

工人理论队伍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出现的新生事物。它的历史虽然还不长，但已经显示出重要的作用。今后它在理论战线的斗争中必然要担当起更加繁重的任务。我们通过初步的回顾，提高了对工人理论队伍的性质、作用的认识，决心更加爱护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把它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加强党的领导是建设好理论队伍的关键。放任自流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一定要把建设理论队伍作为反修防修、实现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战略任务，经常不断地抓紧，抓好。



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

——上海沪东造船厂的调查报告

一九六八年，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毛主席及时地向我们指出了一系列政策问题，包括鼓励技术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和发挥他们积极作用的问题。毛主席指出：“**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毛主席的这一政策，鼓舞了广大技术人员的前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沪东造船厂技术队伍的变化，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沪东造船厂目前担任技术工作的人员有七百七十五人，大多数是从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来的，从工人中选拔的技术人员占百分之二十以上。这支技术人员队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绝大多数人的精神面貌起了显著的变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从这个厂技术人员的状况看，绝大多数人是愿意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广大技术人员为革命而钻研技术，迫切要求为尽快地改变造船工业的面貌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个厂的党委分析了技术人员的状况，根据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和他们的政治思想表现、技术专长，对他们作了适当的安排：有百分之八十九的技术人员在厂部和车间技术部门工作，其他同志在班组边参加劳动、边帮助工人搞技术革新。原来下放劳动的技术人员，大多数都已安排使用。在安排技术人员的过程中，他们既注意防止把技术人员单纯作为劳动力使用，充分发挥各类技术人员的专长，又注意在使用中加强教育，在工作中提高他们。

技术人员的使用和改造，两者是一致的。只有在使用中加强对技术人员的思想教育，不断鼓励他们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才能既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又能使他们的世界观进一步得到改造。毛主席说：“**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技术人员的世界观问题，往往集中地反映在对待技术知识的态度上。在开展技术工作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很容易在部分技术人员中以各种形式反复表现出来，形成这种



或那种片面性的认识。针对这种情况,这个厂的党组织通过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技术人员摆正政治与技术的关系,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同时,积极鼓励他们抢挑重担,对于做出一定成绩的技术人员,及时地进行表扬。对同工人“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创造发明”的技术人员进行报导和鼓励。这一条很重要,这是调动技术人员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重要方法,也是体现党的政策的重要方面。而当工作上发生差错的时候,只要不是严重失职,就由领导主动承担责任,并教育干部和工人群众支持技术人员做好工作。有一次,厂领导分配原副总工程师负责设计厂里第一台一百吨高架吊车,这是制造万吨轮的一个关键设备。开始,有人批评说这是走“专家治厂”的老路,这个工程师也顾虑重重。后来,党委及时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认清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鼓励他们和工人群众结合,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它和“专家治厂”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同时,厂领导鼓励这个工程师虚心向群众学习,有事找群众商量,大胆负责,积极工作。并向他指出,只要主观上作了最大的努力,即使设计的一百吨高架吊车制造出来后的起重能力只有六十吨、八十吨,也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个工程师在得到鼓励与支持后,和其他技术人员一起同工人群众密切结合,精神振作,工作大胆负责,胜利地完成了设计任务。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走上技术工作岗位的工人技术人员,包括一部分刚从学校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这个厂的党组织也坚持在生产实践中进行培养、提高。这些工人技术人员,敢想敢说敢干,有较高的路线斗争觉悟,但理论知识和技术工作经验不够。有人认为,既然工人技术人员缺少理论知识,那就应该关起门来学习、提高。这个厂的党组织回顾本厂文化大革命以前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沉痛教训,认识到按什么样的路线去培养工人技术人员,这是关系到工人阶级占领和改造技术阵地的大问题,不能走过去的老路。他们既强调工人技术人员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觉悟,又注意有意识地让他们独当一面搞设计工作,以便得到较多的锻炼机会。同时,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和原来的技术人员互帮互学,取长补短,举办“七·二一”大学、专业技术训练班,为工人技术人员进修技术理论提供各种条件。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工人技术人员成了技术骨干,有半数担任了各级技术领导工作。

技术人员要和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就必须坚持参加生产劳动,这是他们改造世界观、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这个厂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许多技术人员一进技术部门,往往是“一块绘图板,一张写字台”,闭门翻书查资料,长期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结果,不少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技术理论知识也



不能在生产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下放科室人员**”的号召，上船台，下车间，和工人群众一起劳动，做到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块流，改变了过去那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状况，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焊接试验室有个青年技术员，进厂后闭门找数据、搞试验，不了解焊接生产的情况，工作了几年，也搞不出什么成果来。文化大革命中，他脱下蓝大褂，拿起电焊枪，和别的技术人员一起到车间劳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时，电焊工人用氩弧焊的老工艺焊接柴油机排气阀时，由于加工的部件要用两只大电炉预热，得冒着高温连续操作五、六十分钟，劳动条件很差。工人们看到技术人员下来劳动，高兴地说：“你们能不能和我们一起革掉高温的命？”工人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正是焊接试验室需要研究解决的课题。这个青年技术员和别的技术人员同工人在一起，边劳动，边研究，终于试制成功了等离子电焊机，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许多技术人员正是在参加生产劳动中，逐渐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找到了发挥技术理论知识的广阔天地，增强了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自觉性。

这几年，随着造船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有更多的技术人员从事产品设计、研究试制工作。技术人员回到了技术工作岗位以后，还要不要继续坚持参加劳动？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开始有的技术人员思想上有顾虑，认为参加劳动在时间上得不偿失；也有的认为参加一段劳动以后“毕业”了，可以埋头于业务工作了。这个厂的党委，通过总结经验，反复帮助大家认识到：科学技术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技术人员头脑里固有的，只能来源于广大劳动群众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实践。技术人员只有坚持参加劳动，才能通过生产实践明确技术工作的努力方向和任务，使技术理论水平不断地得到充实、提高。现在，这个厂技术人员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已经坚持了五年，并且创造了许多有效的形式。全厂技术人员，除老弱病残者外，每年参加劳动的时间，一般都在两个月以上，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技术人员还掌握了一至二种操作技术。他们参加劳动并没有影响专业工作，相反地，实际完成的技术工作量还比以前成倍地增长。如造船技术组，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人员没有增加，实际完成的设计任务却增加了七、八倍。

技术人员坚持参加劳动，改善了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关系，为技术人员联系实际发挥技术专长，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有的同志曾担心，技术人员参加劳动，会不会影响钻研技术，妨碍技术工作的开展？沪东造船厂的经验证明，技术人员



坚持参加劳动，经常深入现场，同工人群众结合，有利于推动技术工作的不断提高和发展。技术人员掌握的理论知识，是总结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经验而得来的。生产技术在不断发展，技术理论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在生产技术飞跃发展的情况下，如果不坚持参加劳动，就会脱离实际，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近两年，这个厂试制一种新型大马力柴油机，在试车时发现曲轴表面有小麻点的“穴蚀”。开始，技术人员关门查阅外国资料，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后来，他们通过参加劳动，广泛征求工人的意见。工人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从各方面寻找原因，提出改进方案，把工人的生产实践经验同技术人员的技术理论知识结合起来，终于在设备制造和工艺上作了改革，解决了这个技术关键问题。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双方都提高了技术水平。

技术领域过去一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袭领地，资产阶级思想在这里的影响很深。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选拔优秀的工人充实技术队伍，使这种情况起了较大的变化。但是，技术领域里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依然激烈地存在着。为了走自力更生地发展我国造船工业的道路，这个厂的党组织经常组织技术人员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并结合工厂实际，不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划清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在批判中，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掌握政策界限，注意做到：第一，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启发和引导技术人员自觉地联系思想实际，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第二，组织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进行批判，进一步加强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相互团结；第三，划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界限，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要批判崇洋迷外思想，又要洋为中用，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学习与研究外国的先进技术；既要批判个人名利思想和白专道路，又要提倡技术人员为革命钻研技术，坚持又红又专，等等。这个厂通过抓紧上层建筑领域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使广大技术人员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进一步发挥，为发展造船工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沪东造船厂党组织在培养技术人员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对于造就一支工人阶级自己的宏大的技术队伍的战略目标来说，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最近，这个厂的党组织通过学理论，进一步总结经验，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成绩，改正缺点，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一九六八年指示的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

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调查组



评论《水浒》反修防修

评投降派宋江

安群

宋江是《水浒》作者全力歌颂的主要人物。这种歌颂应不应该？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以往的评论很不一致。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路线上划清革命派和投降派的界限，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并回答人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水浒》所描写的时代是北宋末年。这时，宋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围绕着是起义还是投降，在梁山农民起义军中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从开始反对晁盖起义，主张投降，到接受招安，去打方腊，一直到最后毒死李逵，所推行的完全是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他是一个坚持奴才立场到底的投降派。

有人曾根据宋江放晁盖这件事，把宋江说成梁山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似乎没有他，就不会有梁山农民起义。这种看法是受了作者美化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影响。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晁盖领导的黄泥岗暴动，才是梁山农民起义的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小说所描写的只能看作是故事的铺垫，是梁山农民起义的背景。有了这次暴动，才有晁盖等人的上山；有了晁盖等人的上山，才有梁山农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王伦占据梁山，只是“打家劫舍”。晁盖作了寨主，才有“共



聚大义”的纲领和路线，梁山才成为各路起义英雄众望所归的根据地。所以，梁山事业的奠基人是晁盖而不是宋江。宋江放晁盖，只是叫晁盖离家避难，同时也使自己落个“仗义”的好名声，扩大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决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叫晁盖上山造反。这从宋江对待晁盖“劫取”生辰纲、带领起义队伍上梁山的态度看得很清楚。“劫取”生辰纲不义之财，宋江认为是“犯了迷天大罪”；擒何涛，俘黄安，杀官兵，坚持武装对抗，宋江认为这都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他对晁盖聚众起义，压根儿就是反对的。所以，宋江极力要和梁山切断联系，宁愿自首吃官司，刺配江州，也不愿上梁山。这样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怎么能说成是梁山事业的“奠基人”！

宋江上了梁山，作了头领，是否就由不革命转向革命了呢？没有。他混进梁山革命队伍后，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继续经营他的反革命事业。晁盖一死，宋江立即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厅是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象征。宋江这一改，标志着梁山路线的根本改变，灭了革命派的志气，长了投降派的威风。这个改变，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摊牌。如果说，晁盖在世时，宋江还有所顾忌，主要在暗地里培植党羽，进行破坏；那么，晁盖一死，宋江就明目张胆地亮出他那修正主义的招牌，公开“修正”晁盖的起义路线，强迫梁山农民起义军实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从此，这支革命的队伍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宋江处心积虑搞修正主义，究竟要“修正”什么呢？主要就是要把晁盖既反贪官，也反皇帝，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修正”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皇帝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总代表。因此，农民起义如果要向前发展，就决不会把自己的斗争只限制在反对几个贪官的范围内，而要发展到反对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尽管《水浒》的作者为了突出歌颂投降派宋江，有意少写或不写晁盖的革命思想和言行，但我们从书中只言片语还是可以看到，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晁盖上梁山之前，烧掉自己的庄院，武装抗拒官军的追捕，就表示了他背叛地主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义无反顾的决绝态度。他的绰号叫“托塔天王”。“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既要称王就不可能不反对皇帝。在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的指导



下，朱贵喊出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李逵多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凭借反革命的嗅觉，也看到晁盖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是以反皇帝为核心的。因此，惟恐晁盖“托胆称王”，就让他“归天及早”；而让所谓“呼群保义”的宋江来“把寨为头”。这个“忠为君王恨贼臣”的投降派一为头，就把梁山农民起义的斗争限制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框子内，彻底“修正”了晁盖的起义路线，背叛了农民革命。

《水浒》为了宣扬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着重写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与高俅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政治遭遇的不同，在实现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野心和贪婪地掠夺人民财富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形成了地主阶级内部不同的两个派别。而他们在反对农民起义上又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不同和有矛盾的话，不过是一个钻到里面反，一个站在外面反；一个属于招安派，一个属于围剿派。正是由于宋江的混入，里外配合搞招安，才扑灭了梁山农民起义的烽火。他起到了高俅所不能起的作用。招安派和围剿派在本质上又是共同的。宋江不反皇帝，结果受招安，去打方腊。这时，他同高俅一样，又成了围剿派，抓住起义的农民，剖腹剜心，表现了他的地主阶级的极端残忍性。象宋江这类混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叛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最后必然是不反贪官，不反皇帝，专反农民起义，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这是搞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

二

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必然要在组织上闹分裂，破坏革命团结。宋江为了把梁山搞成投降派的山头，要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大搞招降纳叛。他是搞分裂主义的罪魁。

排斥晁盖。晁盖是梁山起义的领袖，宋江搞分裂主义，首先就把矛头针对晁盖。他借京师童谣这样的谰言，把自己吹嘘成天命攸归的领袖人物，为篡权制造舆论。为了达到排斥晁盖的目的，他玩尽了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每当梁山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宋江总是不让晁盖出马，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架空，叫晁盖成为徒具虚名的“空头司令”。而他自己带兵出征，俨然成了部队的最高统帅；得胜归来，又树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从篡夺军队指挥



权入手，一步步地篡夺梁山的全部领导权。晁盖对宋江的篡权阴谋，逐步有所觉察，并进行了斗争。打曾头市，晁盖决定亲自出马，照例又受到宋江的阻挠。晁盖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了宋江争功劳、捞资本的老底。晁盖的临终遗言，也否定了宋江作为当然的“梁山泊主”的资格。可惜为时已晚，宋江已经大权在握了。

贬低革命派。晁盖死了，投降的最大障碍排除了，但是李逵、吴用、三阮这些革命派不愿意投降。吴用是同晁盖一起起义的，对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江心里明白，如果让吴用掌握大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就难以得逞。所以他不惜一切，从千里之外把卢俊义这个对农民起义充满刻骨仇恨的大地主拉上山来，排在吴用之前，坐了第二把交椅。结果，忠义堂前升起了“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两面白旗，标志着宋江为实现投降完成了领导核心的改组。

招纳和重用投降派。宋江为了扩大投降派的势力，大量招纳贵族豪绅、地主恶霸、朝廷军官，并把他们安插在梁山起义军的重要位置上，作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依靠力量，改变了起义军基本队伍的阶级成分。这些人或者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受到排挤，暂依梁山而本性不改；或者是在被俘无奈的情况下，暂居水泊，等待招安。宋江把这些人纠集在一起，就组成了以他为首的钻入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地主阶级别动队，随时都准备从堡垒内部把梁山革命根据地毁为瓦砾。这绝不是什么“招贤纳士”，而是地地道道的“招降纳叛”。宋江自己就曾得意地宣称：“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李逵的话一语破底：“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你的多”。这说明宋江为了实现投降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拼凑成了投降派的班子，在组织上为受招安作好了准备。

有人曾经认为宋江这一切活动是为了“团结起义军”，这是离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看问题的结果。宋江为什么要梁山一百〇八人“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呢？是为了要大家死心塌地，听从他的摆布，服从他搞投降主义路线。投降派宋江要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篡夺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清楚地表明他不是什么梁山上“团结”的旗帜，而是搞分裂主义的阴谋家、野心家。

三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宋江搞投降主义，不是偶然的，是



由他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是他所信奉和宣扬的孔孟之道的产物。

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后虽混迹江湖，但“尽忠报国”，“青史留名”，仍然是他的“凌云志”。他上了梁山，手捧“天书”，满口“忠义”，一直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地主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没有丝毫的改变。

宋江这个儒家之徒所信奉的主要是宋代的反动理学。宋代理学把儒家的三纲五常进一步绝对化，把它炮制成所谓“天理”，发挥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儒家谬论，认为“忠君”是顺“天理”的；反君是逆“天理”的。《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深深打上了理学的烙印。它通过九天玄女授“天书”、“石碣受天文”等荒诞的故事情节，大搞“天人合一”，把对皇帝“全忠仗义”与“替天行道”凝为一体。宋江正是这种反动思想的号筒。他认为效忠皇帝就是“顺天”，上梁山造反就是“上逆天理”。这就是他不反皇帝，接受招安，搞投降主义的反动思想根子。

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只有冲破孔孟之道的束缚，农民才能起来造反；而农民起义又是对孔孟之道最有力的批判和冲击。因此，宋江要搞投降，就一定要拿起孔孟之道这个反动思想武器，在农民起义军中推行儒家思想路线。他依照理学的反动教条，不遗余力地把“天命”和“忠义”凝为一体进行兜售，给农民起义军重新套上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按照地主阶级的面貌改造梁山农民起义军。

晁盖在世时，宋江遵照所谓九天玄女的“法旨”，宣扬“替天行道”，“尽忠报国”。晁盖一死，他就把“替天行道”的旗帜公开打了出来，作为投降主义纲领。正当梁山一百〇八人会聚的时候，他利用“石碣天文”进行欺骗，于是，在组织上把他自己和支持他搞投降的那一伙排在重要的“座次”上，就成为“天地之意”，谁也不敢反对了；在政治上他谋求皇帝招安的行径，也就成了符合“天命”，谁也不能非议了！我国历史上有些农民起义是利用宗教、借助“天”或“神”作号召的，但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而宋江却借助天命来证明对反动派投降有理，真是反动已极！

宋江为了把农民军引上投降的道路，还千方百计叫大家“共存忠义于心”。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他在梁山上公开挂出的“忠义”招牌。“忠义双全”，这是他为农民起义军确定的指导思想。“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这是他要一百〇八人共同遵守的誓言。宋江平时“忠义”不离口，直到临死还恬不知耻地



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他所谓的“忠义”，并不象有人所说的是“忠义”于梁山的革命事业，而是根据所谓九天玄女“为主全忠仗义”的“法旨”，忠义于大宋皇帝。其目的，就是要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军捆绑起来，掷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脚下，使他们重新遭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奴役。

但是，“忠义”，特别是“忠君”思想，和起义农民长期养成的敌视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是不相容的。宋江贩卖的这一套，也不是处处都能为起义军所接受。即使受招安之后，反对儒家“忠义”思想在一些人中也还存在。“燕青秋林渡射雁”，不过是从空中射下一些雁子，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宋江却借题发挥，又是吟诗，又是作词，大讲特讲“仁义礼智信”。这正是因为受招安之后，投降和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当时，李逵等革命派不愿意投降，“反心尚兀自未除”，一再想反上梁山。宋江感到单用“忠”字笼络不住众人的心，很有必要加强儒家思想的全面宣传，进一步用儒家的“五常”和“忠义”一起来禁锢他们的反抗精神，摧毁他们的革命意志。如果说在招安之前，他推行儒家思想路线是为了把农民起义军引上阶级投降和忠君的死路，那么，在招安之后，他继续推行儒家思想路线则是要他们投降到底，当奴才到底。

宋江推行的这一条儒家思想路线，简直是一服烈性毒药。梁山农民起义军之所以会和平演变成地主阶级的官军，正是吞下了这服烈性毒药的结果。要坚持革命，反对投降，必须彻底批判孔孟之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四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水浒》的投降主义总倾向是通过歌颂投降派宋江来表现的。因此，揭露投降派宋江的真面目，对于认清《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极为重要。

在文艺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农民阶级的代表，坚持的是农民起义路线；以宋江为首的投降派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推行的是投降主义路线。可是，《水浒》却把宋江及其投降主义路线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贯串全书的始终，这就决定了全书的总倾向，必然是贬晁扬宋，丑化革命派，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

一部《水浒》，对宋江竭尽美化之能事：无耻的叛徒被颂扬为梁山的“恩主”；皇帝的奴才被美化为“能救万物”的“及时雨”；反动的投降主义路线被写成了上



符“天意”、下合“人心”的正确路线；受招安的丑剧被夸耀为梁山革命根据地的盛大节日。《水浒》通篇到底，对宋江及其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全是歌颂，没有批判。有人曾经认为《水浒》写了宋江吃御酒而死的结局，就是对“投降主义批判”。事实并不是这样。象《荡寇志》那样，写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个个长命富贵，固然是一种露骨的反革命的歌颂；象《水浒》那样，写宋江以身殉投降主义路线，也是一种隐蔽的反革命的歌颂。它写宋江对投降主义路线宁死也不动摇，毒酒入肠后，还不忘亲手毒死“情分最重”的结义兄弟李逵，甚至写宋江之死，竟然感召了不愿意投降的吴用自缢于墓侧。就这样，作者呕心沥血表现了宋江对投降主义路线的死而后已的忠诚，最后完成了这一个“全忠仗义”的投降派形象，达到了歌颂的顶点。

晁盖、李逵、吴用、三阮是好的，不愿意投降。但是，这些革命派却被贬低、被歪曲、被放在陪衬的地位。“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便是《水浒》作者贬低革命派很隐蔽也很恶毒的一手。不论是在《水浒》成书前的《宣和遗事》和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还是在成书以后的明人杂剧《豹子和尚》中，三十六人内都有晁盖。可是，《水浒》作者把很多记载和传说都篡改了，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列宋江于一百〇八人之首，把他作为主要人物来歌颂，甚至把元曲中的晁盖打祝家庄，也偷换成为宋江打祝家庄。成书前的很多记载传说都是说晁盖反皇帝，宋江不反皇帝，一直到明末张岱的《水浒牌四十八人赞》还是说晁盖“盗贼草劫，帝王气象”；说宋江“忠义满胸，机械满胸”。正因为这样，所以《水浒》贬晁扬宋，其目的是为了突出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是一部反面教材。但是，以往对《水浒》的评论中，有很多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对宋江作了错误的评价，看不清《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总倾向，分不清路线是非。买办文人胡适曾经用唯心论的观点来研究《水浒》，给一些人的影响是很坏的。胡适从一九二〇年起写了几篇关于《水浒》的文章。他站在帝国主义奴才的立场上，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唯心论的实用主义方法，歌颂宋江是“永不会磨灭的英雄人物”。在当前深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有必要结合批判胡适的唯心论，肃清其流毒。

《水浒》评论的历史和现状，充分证明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兼驳胡适吹捧金批本《水浒》的谬论

闻 钟

明朝末年，反动文人金圣叹腰斩《水浒》，是当时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它的影响极坏，流毒深远，贻害至今。

崇祯十四年左右，金圣叹伪称得到了早已失传的施耐庵的七十回《水浒》古本。实际上，他是把当时流行的百回本拦腰斩断，砍掉七十一回以后的“受招安”、“征方腊”等二十多回，并删去原七十一回“排座次”以下的文字，加上一个卢俊义惊噩梦的情节，作为全书的结束。这个本子，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欣赏和提倡，从此就压倒其它版本，广泛地流传开来。

“腰斩”起了恶劣的作用，对此，鲁迅非常不满意。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然而，金圣叹恰恰把这部反面教材写投降全过程的许多极为重要的内容都砍掉了。

从他砍掉的二十多回中，我们可以看到，投降派如何利用篡夺到手的领导权，施展阴谋手段，把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强加给了革命队伍，造成革命的失败。菊花会上那场斗争，实际上是两条路线的交锋。投降派宋江利用革命派笃信义气等弱点，采取软硬兼施、分化瓦解的反革命手法，击败了革命派，强行通过了投降主义路线；接着就不择手段地向宋王朝献媚、请赦、投降。宋江为此窜进东京，钻营门路，不惜重金行贿，巴结皇帝宠妓李师师，拉拢朝廷重臣宿元景，双管齐下，打开了通向宋徽宗的门路，终于做成交易，叛变成功；然后充当宋王朝鹰犬，去打方腊。就这样，宋江这个可耻的带头羊，把起义农民领进了封建统治者的屠场，完全葬送了梁山革命事业。鲁迅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①宋江就是一条大蛀虫。金圣叹砍掉这些内容，对蛀虫的危害性，就不容易认识清楚了；此外，还砍掉李逵扯诏，阮小七偷换御酒，李俊等违抗宋江旨意杀掉被俘朝廷将领等情节，掩盖了革命派反对投降的斗争精神。

在留下的七十回中，金圣叹也做了许多恶意的删改。原书中指责贪官的文



字，他都做了仔细的推敲。凡被认为“过火”，象“涂炭万姓”^②一类有可能祸及朝廷的字句，以及象“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③之类的歌谣，都被删去。第四十四回戴宗说：“朝廷不明”，“奸臣闭塞”。他也觉得不妥，改为“朝廷闭塞”，“奸臣不明”。这样不但更加强了《水浒》原有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倾向，极力替皇帝开脱，而且也为贪官减罪。对起义农民的诬蔑，金圣叹总嫌施耐庵还不够狠。如把张横唱的“不怕官司不怕天”，改为“不爱交游只爱钱”^④；让吴用说出什么“春暖无事，正好厮杀取乐”^⑤。六十回写晁盖率军去打曾头市，宋江两次“苦劝”，一次“恐吓”，阻止晁盖去亲自指挥。宋江一贯架空晁盖，篡夺指挥权。晁盖发觉大权旁落，想通过曾头市一战，夺回指挥权。而金圣叹把“苦劝”、“恐吓”等内容也删掉了。

一部《水浒》，经金圣叹这么一砍，便成了“断尾巴蜻蜓”，使人民认不清宋江这条投降主义路线如何在革命队伍内部得势、膨胀，直到完全葬送了整个革命事业的全过程；也认不清投降派背叛革命、充当奴才的丑恶嘴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砍掉了，不真实，使《水浒》不能充分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

那么，金圣叹究竟为什么腰斩《水浒》，其反动目的何在？这需要分析金圣叹的思想立场，也要弄清是怎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得金圣叹干起了腰斩《水浒》的勾当。

金圣叹于明万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年）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地主阶级家庭，从小受到封建儒家思想教育，醉心科举，却屡试不第，一直未能捞到官做。他虽然生在明清之际，但对明清两代的封建主子，都极表恭顺。清顺治皇帝曾表示欣赏他的文笔，他得知后感激涕零，“叩首敬赋”，说什么“忽承皇帝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⑥，活现出一副令人恶心的奴才相。清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他因“抗粮哭庙案”，被清政府以“谋反”的罪名杀了头。其实，金圣叹这样满脑袋孔学秕糠的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怎么会“谋反”呢？鲁迅曾把他与清政府的矛盾，比做买办资产阶级文人与蒋介石之间的争吵，只不过金圣叹的运气更糟糕，“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⑦。

金圣叹的思想是非常反动的。他是孔孟之道的虔诚信徒，狂热吹捧孔老二这个反动家伙在世时“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⑧；他美化“六经”，说靠了这些儒家的“圣经”，封建统治者的江山才能代代相传。他死心塌地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当明王朝在农民起义风暴冲击下土崩瓦解、朝不保夕之际，金圣叹痛心疾首，力图挽救。可见，金圣叹的出身、教养、思想，决定了他极端仇视农民起义。

明朝末年，由于地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了全



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其中李自成和张献忠率领的两支起义军最为强大，他们纵横南北，所向披靡。明王朝的反动统治岌岌可危，摇摇欲坠。当时，崇祯皇帝对农民起义采取所谓“剿逆抚顺”^⑨这一镇压与招抚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主抚派搞政治欺骗，妄图收买、分化、瓦解起义队伍。但是起义农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明王朝的招安阴谋。崇祯年间，许多有名的大臣，如兵部尚书熊文灿、兵部右侍郎陈奇瑜、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等，就都因主抚失败，被明王朝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这一情势，对金圣叹在反对农民起义的策略上，具有重要影响。他从明王朝招安政策的不断失败中，汲取了教训，总结了反革命经验。他激烈地反对招安，通过评论《水浒》，疯狂地鼓吹军事镇压。他所以选中《水浒》，是因为这部作品流传广泛，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影响；还因为它反对农民起义，在基本立场上同金圣叹一致。而它宣扬的主抚政策，金圣叹则认为效果不佳，又必须设法消除。这就是金圣叹之所以篡改、腰斩《水浒》的原因所在。

金圣叹通过评点、篡改、腰斩《水浒》，宣扬了哪些反动观点呢？

首先，金圣叹对农民起义进行恶毒咒骂和无耻诽谤。他大骂起义农民是“寇”，是“祸连朝廷”的“群丑”^⑩，是“天下之凶物”^⑪。他借评论梁山头领绰号为由，歪曲诬蔑，大放厥词。林冲绰号“豹子头”，他便说：“则知一百八人者皆恶兽也”^⑫；李逵绰号“黑旋风”，他便说：“旋恶物聚于一处”^⑬，并说李逵入水泊，日月无光，故谓之“黑”。他攻击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正义斗争，是“杀人夺货”，“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在他这个地主老爷眼里，农民只有俯首帖耳当奴隶，老老实实受宰割，如若反抗，定要杀掉，所以他在批语中叫嚣“造反者族”^⑭。本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农民造反是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造成的。金圣叹却颠倒黑白，说起义者从小“皆豺狼虎豹之姿”^⑮，长大了又“父兄失教，喜学拳勇”，“不事生产”，“不免困剧”，“试为劫夺”，“遂成啸聚”^⑯。这种奇谈怪论掩盖了地主阶级的血腥罪行，抹煞了阶级矛盾，把农民起义者诬蔑为天生坏种，充分暴露了金圣叹和一切反动派一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唯心论者。

其次，他对封建统治阶级忠心耿耿，竭力维护；对孔孟之道喋喋不休，拼命鼓吹。他认为皇帝是“圣人”，是“天子”，只有皇帝才“有位”、“有德”，一切都必须对皇帝无条件地尽忠，不准有半点异心。为此，他在批语中拼命鼓吹孔孟之道的忠孝观念：“忠者，事上之盛节”，“与人之道”^⑰，“孝者，百顺之德也，万福之原也”^⑱，它们是“量万物之斗斛”，“裁世界之刀尺”^⑲，“推而放之四海而准”^⑳。在农民起义烽火燃烧之际，金圣叹大谈忠孝，把儒家这些反动思想吹捧为天经地义、万古长存的真理，就是要用孔孟之道麻醉人民，瓦解人民的斗志，



维护奄奄一息的封建王朝，其反动政治目的是昭然若揭的。金圣叹对《水浒》中反贪官的描写说过几句好话，对贪官有过一些责骂，但这正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无非是担心贪官们胡搞下去，会把皇帝的政权搞垮，如此而已。如果在这里给金圣叹涂脂抹粉，那就不仅仅是昏庸的问题了。

其三，金圣叹通过篡改、腰斩《水浒》，狂热鼓吹“斩尽杀绝”论。他攻击主张招安的人是“温语求息，失朝廷之尊”，使“无罪者生心，从此无治天下之术”。他不相信“诱一贼攻一贼，以冀两斗一伤”的如意算盘，认为结果会适得其反，“势将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④金圣叹与《水浒》作者施耐庵，虽然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都反对农民起义，甚至他对施耐庵还不无溢美之词，但在对付农民起义的策略上是有分歧的。施耐庵是个主抚派，他的一部《水浒》就是歌颂招安，宣扬投降的。金圣叹则认为招安宋江这样的“盗魁”，并给官做，实在危险极了。他按照自己的愿望，把《水浒》原书七十一回以后的二十多回砍掉，造谣说这些回目不是施耐庵原书所有，一口咬定是罗贯中“横添狗尾”^⑤，借以掩盖他和施耐庵的分歧，以便把施耐庵歌颂招安的《水浒》改造成一部要杀尽起义农民的书。他捏造出一个天神嵇叔夜，在卢俊义的梦境中把梁山一百〇八名头领统统杀掉，实际上只是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既愚蠢又可怜。他乞求的天神嵇叔夜，不过是没落阶级心造的幻影；他迷信的屠杀政策，也和招抚政策同样无用。就在金圣叹腰斩《水浒》后的第三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打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就吊死在煤山上了。革命的农民起义横扫了贪官和皇帝，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地嘲弄了金圣叹之流的反动派。

对金圣叹腰斩《水浒》，地主资产阶级十分赞赏。他们竭力吹嘘金批本《水浒》“深得剪裁之妙”^⑥，有“开拓万世”^⑦之功，竟使造反的农民“不寒而栗”，从此“畏罪不敢为非”^⑧，等等。其中，洋奴文人胡适，吹捧得最起劲。他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和一九二一年六月，先后炮制了《〈水浒传〉考证》和《〈水浒传〉后考》两篇长文。胡适为什么花这么大心血干这件事，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有“历史癖”和“考据癖”^⑨。

事情真的象胡适说的那样吗？否！

什么“历史癖”、“考据癖”，拆穿了说，就是“反革命癖”。胡适的两篇毒草出笼时，正是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重大转折时期。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怒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时，混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实在忍不住了”，抛掉了“新文化战士”的伪装，大叫“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⑩，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后来，他一头扎到帝国主



义和封建势力的怀抱中，表示忏悔，说什么“小人无罪”，“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斗争的光荣’”^②，并供认他参加新文化运动是“逼上梁山”^③。原来他和宋江一样，也是一个投降派。

胡适用唯心主义来考证《水浒》，其目的是在于破坏革命运动的深入，把青年领到邪路上去。他自诩要教给青年人“一点防身的本领”，“教人一个不受人感的方法”。要防什么呢？他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④一语泄露了他的反革命天机，原来他搞烦琐考证，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当时确有一些青年受了胡适的毒害，埋头读书研究，掉在烦琐考证的迷宫里，不关心祖国的命运，脱离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北洋军阀政府用警棍、水龙、洋枪办不到的，胡适这个投降派在某些青年身上办到了，难怪军阀们那样宠爱这个现代的宋江。胡适在文章中谈杀尽强盗，天下太平，这实际上是为军阀政府出谋画策，制造舆论，以便绞杀革命。所以，胡适关于《水浒》的考证，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

胡适出于反革命政治需要，竭力吹捧金圣叹是“绝顶聪明的人”，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⑤。这是奴才赞奴才，小丑捧小丑。胡适吹捧金圣叹，是因为他们思想相同，感情相同，立场相同。他们都仇视人民革命，都面临革命风暴的冲击，都妄图作垂死挣扎，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叫做“遭际有相同处”^⑥。胡适吹捧金圣叹，还因为他要借用金圣叹的旗号，宣扬自己的反动观点。他战战兢兢请出金圣叹的亡灵，借助它来挽救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失败命运。然而，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了胡适的痴心妄想，同金圣叹当年呼唤天神嵇叔夜一样，都是一枕黄粱，无法实现的。

对金圣叹腰斩《水浒》，胡适赞不绝口，并为金圣叹圆谎，硬说他确有《水浒》古本。他吹捧金批本是什么“永不会磨灭的奇书”，“不但是集四百年水浒故事的大成，并且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⑦。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胡适能给予这么高评价的恐怕只有这本“奇书”了。谁都知道，在胡适这个洋奴眼里，中国无论什么都不如洋大人的好。他对祖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一向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为什么唯独对金批本《水浒》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呢？奥妙在于，他要利用这部作品干反革命勾当。胡适不是标榜自己是实用主义信徒吗？实用主义的精髓是“有用即真理”，也就是说，凡对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有用”，就是“真理”。胡适觉得金批本《水浒》对他们有用，他就舞文弄墨，胡吹乱捧。实际上，他捧金批本《水浒》，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要人们相信他从中挾发的反动思想，就是：强盗“格外反抗政府”，“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⑧，“强盗灭绝之



后天下方得太平”^⑤。显然，他这里说的“强盗”就是影射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他所要的“天下太平”就是要镇压革命，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胡适比金圣叹跑得更远，他不但背叛了新文化运动，向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投降，而且要把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是个无耻的民族投降派。

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国人民在五十年代曾对胡适的反动思想，做过深刻的批判，但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胡适的流毒未能彻底肃清。特别是在《水浒》的评论和出版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一些人拾胡适的余唾，继续吹捧金圣叹对《水浒》的“腰斩”，说什么金批本是“很好的节本”，“能够保持它的完整性”，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六十年代初期，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时，学术界曾刮起过为金圣叹翻案的歪风。这些言论都同鲁迅的论述唱反调，掩盖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使人们认不清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都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

今天，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金圣叹和胡适的反动思想，肃清他们的流毒，还《水浒》以本来面目，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注：

- | | |
|--|--------------------|
| ① 鲁迅：《给肖军肖红的信》。《鲁迅书信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 ⑬ 金批本《水浒》第十回总批 |
| ② 《水浒全传》第六十三回，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版 | ⑭⑮ 金批本《水浒》《宋史目》 |
| ③ 《水浒全传》第十六回 | ⑯ 金批本《水浒》第五十七回总批 |
| ④ 金批本《水浒》第三十六回 | ⑰⑱ 金批本《水浒》第四十一回总批 |
| ⑤ 金批本《水浒》第六十七回 | ⑲ 金批本《水浒》序三 |
| ⑥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 | ⑳ 金批本《水浒》第七十回总批 |
| ⑦ 鲁迅：《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 ㉑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 |
| ⑧ 金批本《水浒》序一 | ㉒ 廖燕：《金圣叹先生传》 |
| ⑨ 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兵部题为恭报诛剿渠魁等事》 | ㉓ 王望如：《评论出象水浒传总论》 |
| ⑩ 金批本《水浒》第十七回总批 | ㉔⑳㉑⑳⑳ 胡适：《水浒传考证》 |
| ⑪⑫⑬ 金批本《水浒》序二 | ㉕ 胡适：《我的歧路》 |
| ⑭ 金批本《水浒》第十四回夹批 | ㉖ 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 |
| | ㉗ 胡适：《逼上梁山》 |
| | ㉘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
| | ㉙ 胡适：《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 |



《水浒》与宋代的阶级斗争

杨 荣 国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和宋江搞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真面目。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场重大斗争，它对于澄清过去多年来在评论《水浒》中的错误观点，对于我们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具有深远的现实的意义。我想结合宋代农民战争史实，谈谈自己学习毛主席指示的一点体会。

反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中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试金石。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封建王朝是地主阶级对农民专政的国家机器。所以，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起义，总是把矛头指向皇帝和封建王朝的。《水浒》里的李逵，曾一再大声疾呼“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正是一种起义农民对推翻地主阶级专政，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朴素要求。但是，在《水浒》全书中，李逵反皇帝的革命精神是被否定的，宣扬的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水浒》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写成农民起义的主导思想，完全歪曲了北宋时期阶级斗争的真实历史。

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到宋代大大加强，皇帝在封建国家中拥有绝对的权力，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剥削者。北宋历代皇帝对外屈辱投降，对内拚命掠夺的反动政策，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激起了一系列反对皇帝、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军喊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提出对土地的要求，坚决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和土地制度，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他们还建号称王，署置官吏，建立起同封建王朝相对峙的革命政权，表明了打倒宋朝皇帝、推翻封建政权的决心。到宋徽宗赵佶在位期间，农民和皇帝的矛盾更加尖锐。赵佶设立了后苑作、营缮所、西城所等机构，指使杨戩、李彦等封建官吏替他大量“括民田”，进行赤裸裸的土地掠夺；又在长江下游富庶地区搜括奇



花、异石等珍贵物品，用船运往京城玩赏。受尽苦难的农民以坚决的武装起义来回答皇帝的沉重压迫和剥削。和宋江同时的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对群众愤怒控诉了宋朝皇帝的内外政策，指出“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号召农民起来造皇帝的反。他还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作出了“十年之间，终当混一”，即起义军将于十年内推翻宋王朝，统一全国的估计。这是起义农民决心砸碎封建国家机器的大胆宣言，洋溢着“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情壮志。这些历史事实证明，革命农民与封建王朝是势不两立的。《水浒》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安到革命农民头上，是对农民起义的恶毒诬蔑。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完全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的。历史上，每当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激化，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些皇帝往往也发出“反贪官”的叫喊，假惺惺地表示要“澄清吏治”，企图欺骗农民，借以达到转移革命锋芒，瓦解起义队伍的罪恶目的。例如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宋太宗赵匡义就虚伪地对起义农民表示，“汝曹本非为恶，但官吏失于抚御，致尔为盗”（《宋朝事实》卷十七），还说什么“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挠我蒸民，起为狂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六）。赵匡义把自己打扮为一心爱民，只是偶然失察用了几个“贪官”的“好皇帝”，而把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责完全推在几个官吏身上，想以此欺骗农民。《水浒》里反复鼓吹徽宗“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还借宋江之口咒骂农民起义是“罪恶迷天”，这和赵匡义唱的是同一个调子。《水浒》作者生当元朝末年，那时也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代。《水浒》作者竭力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目的正在于散播对皇帝和“清官”的幻想，麻痹起义农民的革命意志，取消农民夺取政权的斗争，完全是从维护反动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的。

《水浒》为了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竭力回避农民和皇帝的矛盾，这也是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梁山农民起义明明是对宋王朝把梁山泊收为官有、勒令渔民“立租算船纳直”的武装反抗，《水浒》对此却一字不提，也丝毫没有提到革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宣和遗事》里梁山三十六人中有十二人与花石纲有关，但因为花石纲是赵佶直接施行的暴政而被《水浒》作者大加删略。另一方面，《水浒》却处处把宋江同高俅放在对立面来写，着重渲染这两个人的矛盾和斗争，甚至还把高俅等称为“元凶首恶”，列为梁山起义军的主要敌人。其实，这是在玩弄障眼法，企图通过突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来把宋江装扮为起义农



民的英雄,掩盖宋江的投降派实质。毛主席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也好,高俅也好,都是起义农民的死对头,都是真正的元凶首恶赵佶的忠实走狗。在维护以皇帝为总头子的地主阶级根本利益上,宋江和高俅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宋江混入了农民起义队伍,披着革命者的伪装来干反革命的勾当,这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能起到高俅所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队伍内部都曾出现过投降和反投降的激烈的路线斗争。这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在起义军内部的反映。封建统治者使用残酷的武装镇压和阴险的政治欺骗(包括招安)的反革命两手来对付农民起义,这是起义队伍内出现投降主义路线的外部原因;而起义队伍内混进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或是产生了被地主阶级腐蚀拉拢而蜕化的变节分子,则是出现投降主义路线的内部原因。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农民战争中,只有革命派坚持起义路线,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革命才能够得到发展和胜利。如果让投降派篡夺了起义领导权,就会使起义归于夭折。这从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也可以得到证明。方腊于公元一一二〇年(宋徽宗宣和二年)十月起义,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就席卷江南地区六州五十二县,起义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和“横行齐魏”的梁山起义军形成了联合夹击北宋王朝的有利形势。革命的迅速发展正是方腊坚持起义路线,提出推翻北宋王朝的明确纲领,广泛发动群众的成果。同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水浒》中梁山起义军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本来形势很好,却因投降派宋江窃踞领袖地位,搞修正主义,结果向赵佶屈膝投降,随后就去打方腊。因而起义军全军迅速归于毁灭,宋江也落得个“兔死狗烹”、饮鸩而亡的可耻下场。梁山起义军失败的这个惨痛教训,是值得革命的人们永远记取的。

《水浒》作者把投降派宋江美化为英雄,为他安排了“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的理想结局,就是想劝诱革命人民都去当宋江,走奴才的道路。《水浒》对“托胆称王”、“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晁盖却是另一种态度,让他“归天及早”,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借以反衬投降是农民起义的唯一出路。事实上,宋江和晁盖是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阶级的不同路线;晁盖是起义农民的领袖,他的“聚义”是号召农民起来造皇帝的反,坚持了农民起义的路线。

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水浒》还对梁山起义军中反投降派的形象进行恶毒的丑化,把李逵、三阮这些反投降的英雄,写成终究不能完全摆脱宋江的错误领导。



历史上有过许多对投降派进行斗争的农民革命英雄。例如，唐末农民起义中的黄巢，他当众怒斥另一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准备接受唐王朝招安的无耻叛卖行径，毅然和王仙芝决裂，率领起义军主力转战南北，使革命继续取得重大胜利。南宋初年，在洞庭湖地区起义的杨么，他多次坚决拒绝宋王朝和伪齐刘豫政权的诱降；当起义军中有一些人动摇变节时，杨么坚决顶住投降妖风，英勇抵抗，被俘后慷慨就义。这些坚决反对投降的英雄，代表了我国农民起义的光荣革命传统，显示了“宁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的英雄气概。为什么《水浒》的作者抛开千百次农民起义视死如归、坚持战斗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不写，却偏偏把投降派宋江作为全书的中心人物，美化为起义农民的英雄，企图把革命农民引上宋江的道路？这不是《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明显证据吗？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成为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所以农民战争最后总是陷于失败。但是，失败决不等于投降。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起义是同封建统治者奋战到底的，宋代三次大的农民起义就都坚持到最后。和宋江同时的方腊，横眉冷对赵佶的“招抚”骗局，领导起义军数万人坚守帮源洞根据地，英勇战斗，最后壮烈牺牲，以热血谱写了英雄的乐章，这怎么能象有些人所说的投降是农民起义的“规律”呢？“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革命农民坚决反对投降，既反对阶级投降主义，也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杨么、方腊都是典型的例子。方腊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不但是对封建剥削而且也是对宋王朝将人民的膏血奉献给辽、夏统治者的罪恶行径的愤怒控诉。这是革命农民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表现。修正主义者出于对革命人民伟大力量的畏惧，拼命诬蔑农民，抹杀农民的革命性。林彪诬蔑农民只会耕田种地，只懂油盐柴米；苏修御用学者不承认中国历史上有过农民革命，他们和《水浒》的作者正是一丘之貉。

我们评论《水浒》，要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对照起来研究，通过分析古代投降派宋江来更好地看清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丑恶面目。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反复学习和深入领会毛主席的指示，积极投入战斗，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把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宣扬投降是对农民革命的歪曲

山东梁山县后集大队《水浒》评论组

我们大队居住在梁山脚下。梁山周围，在古代是一个很大的湖泊。传说《水浒》中的梁山泊，指的就是这一带地方。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们这里和其它地方一样，多次爆发过农民起义。但是，被有的人称为“农民革命史诗”的《水浒》，却根本没有正确地反映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战争。最近，毛主席深刻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俺大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水浒》这部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评论。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水浒》竭力歌颂投降派，宣扬阶级投降主义，这是对农民起义光辉历史的肆意篡改，是对农民革命战争的极大歪曲。

翻开《水浒》就可以看到，上梁山的许多人，不是因为赌博输了钱，做生意折了本，就是因为想做官，弄个“封妻荫子”，很大一部分则是为了报个人恩怨上山的。这种描写，完全是从地主阶级的需要出发，它掩盖了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战争的真正原因。

农民究竟为什么要举行起义和斗争，这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原因的。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才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农民起义，包括梁山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在旧社会，梁山地区的人民群众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宋末年，宋王朝把梁山泊收为“公田”，规定群众下湖采莲捕鱼都要缴租。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逐步衰落，它们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甚至连养鸡、走路、过河坐船、小孩出生，都要纳捐纳税，人们叫做“百样捐”，其实哪止一百样！到清代末年，这里种一亩地，连租带税就要纳九吊钱，合九十斤小麦，而当时一亩地只不过收六、七十斤，还不够缴租税的。“东平州，十年九不收。”遇到灾年，景况就更惨了！光绪年间，我们这里遭了一场大水，官府各种捐税按例照收，分文



不减。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农夫苦，农夫苦，胥吏催租，收成不足无钱付，只得咬牙切齿，售儿卖女。”那时我们村六百多口人，冻饿而死的就有五十多人，很多人走上了起义的道路。这就说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完全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压榨下逼出来的，而决不是因为什么“输了钱”，“折了本”。农民起义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决不是什么个人的恩怨造成的。我们知道，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才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把农民同地主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归结为个人恩怨，这是历史唯心论的反动观点。

抱着升官发财、封妻荫子的卑鄙目的上山入伙的人是有的，例如《水浒》中的宋江一类就是这种人物。他们或者是地主豪绅，或者是朝廷命官，或者是落第秀才，他们的要求和愿望与地主阶级的利益确实是根本一致的。这种人不过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宋江这种人和高俅之流的矛盾，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宋江他们上山入伙根本不是要搞什么农民起义。

《水浒》把宋江推行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捧上了天，把“替天行道”，即为封建皇帝效劳，当做农民起义军的宗旨，这也是完全违反我国农民革命的历史事实的。我们梁山地区农民革命的事实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明代末年，在这一带就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起义群众明确地提出“要不穷，杀朝廷”、“均贫富，不受苦”的口号，作为他们反对封建制度的政治纲领。不仅起义军反对皇帝，就是那些没有参加起义军的贫苦农民，也对腐朽的封建皇帝怀有深仇大恨。捻军和黑旗军转战到这里时，梁山的广大贫苦农民，热烈地参加和支援起义队伍，与僧格林沁率领的清王朝的精锐部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把他们打得狼狈不堪。当时，这里有一首歌谣说：“老爷生在芦花滩，不怕皇帝不怕官。”这首歌谣表达了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及其总头子皇帝的斗争精神。据记载，仅在清代咸丰年间，梁山一带就发生了满光印、席万林、董增奇等领导的农民暴动，重创了反动军队，击毙清军副都统舒明安等，打击了封建统治。

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最大的地主。在皇帝的卵翼下，地主阶级的官僚无官不贪，他们都是执行皇帝的意旨来镇压和剥削人民群众的。既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那末农民革命就决不仅仅反对一部分官僚，而是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皇帝，指向整个地主阶级。正是“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象《水浒》所歪曲的那样，农民起义只反贪官，不



反皇帝，那末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岂不成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皇帝统治地位的帮手吗？这种谬论，早就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等农民革命口号和历史上一个个反动王朝在农民起义打击下倒台的事实彻底粉碎了。

《水浒》把接受招安当作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这也是对农民革命的极大歪曲。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任何想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调和起来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过去，梁山这个地方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封建统治者一再惊呼“梁山泺，素多盗”，是一个“久反之地”。地主阶级和封建皇帝从来都把农民起义看作洪水猛兽，恨不能一下子斩尽杀绝。北宋末年，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了梁山起义者，据他们供认，所杀“不可胜计”。清王朝在梁山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梁山营”，派来重兵把守。这个“梁山营”就安在我们后集村。但是，地主阶级的武装镇压，只能激起农民阶级的更大反抗。擒军起义时，有个农民军英雄叫胡四，他领着起义军在梁山一带屡次打败清兵的进攻。后来战败被俘，反动派用零刀碎剮来威胁他，但他并没有向敌人低头，最后壮烈牺牲。胡四等人的英雄事迹充分证明，招安决不是真正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

招安政策是地主阶级扑灭农民起义的一种反动政策，是武装镇压的补充手段。《水浒》中的宋江接受招安，大搞投降，围剿别的农民起义军，充当地主阶级的鹰犬，不过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内奸和叛徒。他的可耻下场，同农民革命军英勇悲壮、前赴后继的斗争，是没有半点共同之处的。农民阶级作为一个被压迫阶级，它是不可能向地主阶级投降的。有人把《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说成是农民的“阶级局限性”，这种说法完全否认了农民战争反封建的革命性质，是对农民革命的诬蔑。斗争不屈而失败，同为了升官发财而屈膝投降，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决不可混为一谈。《水浒》把招安当作农民起义的归宿，宣扬革命无理，投降光荣，其目的是要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放下斗争武器，忍受剥削阶级的宰割。这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梦想！

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而失败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革命路线，才能领导和指引我们劳动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梁山人民特别感到幸福。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



将长期存在。资产阶级总是要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因此，必须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分析能力，善于识别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修正主义者，识别阶级投降派和民族投降派。在帮助人们识别什么是投降派和投降主义方面，《水浒》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应当很好地利用它，通过讨论和评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划清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原则界限，充分揭露古代的投降派宋江和现代的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丑恶面目，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进行到底。

《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

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 陈大康

《水浒》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这一回里，用“石碣天文”公布梁山头领一百〇八人的名单。在这张名单上，晁盖这个梁山革命事业创建者的名字被一笔勾销了。

关于这一点，能不能用晁盖牺牲在前、名单公布在后的理由来解释？不能。拿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来说，尽管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肖朝贵早在革命初期的战斗中就已牺牲，但在太平天国后来公布的“朝天朝主图”上，仍然有冯云山和肖朝贵的位置，以表示对牺牲了的领袖尊崇和怀念。在《水浒》故事的前身——话本《大宋宣和遗事》里，尽管晁盖后来是牺牲了，但它借“天文”所公布的梁山英雄名单（当时是三十六人）里，也有晁盖的名字。《水浒》却完全相反，不仅在七十一回的“石碣天文”公布的名单里把晁盖屏于一百〇八人之外，而且在《水浒》的最后一回里作了这样的精心安排：宋徽宗“亲书圣旨”，令济州为宋江建“靖忠之庙”，庙内“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员天罡正将”，“列朱武为头七十二座地煞将军”。至于晁盖，则一笔勾销了，作者与皇帝都认为他没资格享受“万年香火”。由此可见，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乃是作者贯穿全书的意图。



《水浒》为什么要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作者在第七十一回里给我们交了底：“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

“托胆称王”是什么意思呢？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向整个封建制度、封建地主阶级挑战。既然“托胆称王”，那就必然要建立与封建政权相对抗的农民政权，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皇帝。用朱贵的话来说，就是“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用李逵的话来说，就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晁盖的“托胆称王”反映了梁山农民起义队伍中革命派的意志和愿望，为此，《水浒》由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仅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还要恶毒地让他“归天及早”，以便使宋江及早“把寨为头”。

宋江的“呼群保义”与晁盖恰正相反。他的“呼群”，是在梁山上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为日后投降受招安作准备。他的“保义”，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心要做忠于封建王朝的奴才。因此，晁盖的“托胆称王”与宋江的“呼群保义”分别代表了两条不同的路线。前者是一条坚持斗争的革命路线，后者是一条鼓吹招安的投降路线。

宋江这个阴险的两面派，很善于伪装自己。他在晁盖在世时，“哥哥”、“晁天王”叫不离口；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是处处排斥晁盖，架空晁盖，在梁山农民军内部组织了一个由反动军官、大地主结成的投降集团。晁盖一死，他立即全面地修正晁盖的革命路线，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开亮出了“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旗号。但狡猾的宋江这时在忠义堂上仍然供起了“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的灵牌，用两面派的行径来骗取拥护晁盖革命路线的头领们的信任。这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当革命领袖逝世后，反动阶级就“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一旦投降成功，宋江也就公开地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不仅“尽行拆毁”梁山根据地的城垣房屋，连晁盖的灵牌也被他一把火“焚化”掉了。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在古代投降派宋江身上，有着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特点。为此，我们必须搞清楚《水浒》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的真实用意，识破宋江之流的两面派面目。这对于我们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别革命派与投降派，是很有益处的。



思想评论

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

石 平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说明了在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过程中，干部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向我们指出了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的重要性。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各级领导班子加强了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对于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又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现在，许多领导班子的成员，特别是第一、二把手，带头学习理论，带头调查研究，带头联系实际解决矛盾，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许多地区、单位的领导班子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顾大局，讲党性，团结战斗，发挥了自己在各项工作中的领导作用。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对领导班子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因此，各级领导班子应当把加强自身的建设作为一项经常的工作，注意抓紧抓好。

各级领导班子是党在各个地区、各个单位的具体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各级指挥部。我们党正是依靠着各级领导班子把党的政治路线与各个地区、各个单位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具体的工作方针和方法，并对广大群众进行恰当的组织和有利的领导，使党的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党的政治路线就不能很好地贯彻下去，群众的积极性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和持久的发挥。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



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然要遇到阶级敌人的破坏，受到修正主义路线和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没有一个路线斗争觉悟高、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战斗、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去组织和领导群众，善于集中广大群众的正确意见，克服群众中某些不正确的意见，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也是很困难的。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正在不断深入发展，要使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加强，无论是在上层建筑还是在经济基础领域，无论是在调整生产关系还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斗争复杂，任务艰巨。各地的经验告诉我们，哪里的领导班子团结一致，联系群众，坚定不移地带领群众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能落实党的政策，能识别和顶住错误的东西，哪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搞得扎扎实实，步步深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就蓬勃发展。相反，如果领导班子不能这样办，革命和生产就必然处于后进状态。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各级领导班子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自己真正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进行战斗的指挥部。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这是毛主席对我们党的建设所进行的科学总结，对于我们领导班子的建设，也是一条宝贵的经验。“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纲，把领导班子的路线搞端正。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是对全党的要求，而首先是对各级领导班子的要求。这三项原则中，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各级领导班子是不是能有力地领导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向阶级敌人作斗争，向资本主义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并取得胜利，不断前进，决定于它是不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因此，我们各级领导班子，应当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



命路线的自觉性，这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最根本的问题。

各级领导班子要在自己所在的地区、部门发挥有力的领导作用，必须是一个团结的集体。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各级领导班子更加团结了，但还需要进一步地巩固和加强这种团结。毛主席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中，曾经批评那种“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的现象，并指出“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毛主席的教导，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的同志，要时刻不忘党和人民的重托，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利益，不断加强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使“一班人”拧成一股绳，做到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一致，以更好地带领广大群众去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作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真正做到实质上的一致，必须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过集体讨论，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做出明确决定；而一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事情，就应当贯彻执行，决不允许会上一套，会后一套。领导成员间如果有意见分歧，应当摆到桌面上来，使矛盾得到充分的暴露，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讨论，肯定和发扬正确的东西，澄清和克服错误的东西，以消除相互间的隔阂。作为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应当做到不但能够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这样，领导班子内部才会有实质上的一致，才会有真正的革命团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地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这是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我们党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事业，不是一代两代人可以完成的，“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从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来考虑，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长期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老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锻炼，有较丰富的实际经验。很多老干部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用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革命传统教育青年干部，使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很多青年干部虚心学习，把老一代的好经验、好作风接过来，努力接好革命的班。同时，青年干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热情、蓬勃向上的精神以及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也使老干部受到很大鼓舞，促使他们更好地为党为



人民工作。总之，由于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发展了革命的同志关系，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增强了党的团结，大大提高了领导班子的战斗力。我们应当继续坚持三结合的原则，做到无论老干部、中年干部、青年干部都能**“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很多同志进一步认识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对于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毛主席说：**“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同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这对于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经常都在对人们起着腐蚀、侵袭作用。我们党是执政的党，我们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战争年代优越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要紧紧地同群众联系在一起，**“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细心地倾听群众的意见，虚心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把它看作是反修防修的一件大事。这样的领导班子，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才能领导群众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打硬仗。如果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滋长了骄气、暮气、官气、奢气和惰气，欣赏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甚至利用职权搞特殊化，如毛主席所批评的**“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就必然脱离群众，不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方向，甚至会蜕化变质。因此，我们应当把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放在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地位。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开展以来，很多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认真学习理论，紧密联系领导班子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应当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把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使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得更加坚强。



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巴 山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地走过了二十六年的战斗历程。全国各族人民满怀团结战斗的革命豪情，欢欣鼓舞地庆祝这个光辉节日。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进一步提高了亿万人民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促进了全国的安定团结，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到处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大好形势激励着广大群众和干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雄心壮志，同时又对各条战线、各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总结经验，乘胜前进，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长期坚持下去，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正在进行的工作。这几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安定团结，是建立在学理论、讲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之上的，它又是胜利地进行反修防修斗争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我们一定要把安定团结提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认识它的重大意义，自觉地为促进安定团结而斗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的根本保证。这一点，已经为无数事实所一再证明。有些地区和单位之所以一度不够安定团结，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些地区和单位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懂得了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进一步理解了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目标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并同不利于安定团结的现象作斗争，很快就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把革命和生产推向前进。可见，实现安定团结必须以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作指导；理论学得深，路线分得清，安定团结才能搞得更好。为了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项基本原则，紧密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搞好安定团结，必须充分依靠群众，善于用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造成一个人人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强大的革命声势。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不能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安定团结，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只要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交给群众，就会变成促进安定团结的巨大力量，社会主义的正气就会上升，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就会下降，一小撮阶级敌人就必然陷于孤立，他们的破坏活动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安定团结才是可靠的，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各级党委是领导和团结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战斗指挥部。领导班子的路线是否端正、本身是否团结，这是能否实现安定团结的重要关键。有了敢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战斗指挥部，就能领导群众为促进安定团结而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的各级党组织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多数的领导班子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党的组织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处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政治灰尘，必然会侵蚀到领导班子中来。这就要求我们在斗争中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使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同时要着重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搞好“一班人”的革命团结。对于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班子，对于在工作中大胆负责，努力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的同志，上级领导机关应当给他们以支持和帮助。敢于大胆放手地工作，也可能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上级领导机关有责任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做好工作。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是常胜将军。我们党打了几十



年仗，有一条经验，就是打了胜仗要多敲警钟，防止骄傲自满，打了败仗不要责怪下面，领导要承担责任。这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促进安定团结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在斗争中实现的，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安定团结，而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要制造混乱，挑拨离间，造谣诬蔑，以便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我们要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罪恶活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人民内部也会发生某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例如，资产阶级派性，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等，就是危害安定团结的消极因素。正因为如此，进一步实现安定团结，就要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

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促进安定团结必须坚持的根本政策。凡属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提倡以大局为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上增强革命团结。对于犯错误的人，要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耐心做好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样，我们就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真正落实到基层。为了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矛盾，各级领导机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十分重要。通过调查研究，认真分析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总结和推广促进安定团结的好经验，克服影响安定团结的消极因素，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解决问题，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就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一步加强党群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努力造成毛主席提出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用什么标准要求学生？

上海市本溪中学党支部

今年六月三日，我校七六届八班的学生孔宪凤，在学农期间，为了抢救落水的同学，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象这样一位优秀的革命小将，生前却没有被吸收参加红卫兵组织。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几个月来，我们围绕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和培养教育学生这个问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革命导师关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论述，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偏见，使学习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广大师生焕发了革命干劲，增强了革命团结，思想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究竟是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来培养学生，还是用“五分加绵羊”的标准去要求学生，这是教育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这次孔宪凤为抢救战友而牺牲自己，使许多同志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但是，也还有人认为，小孔生前“表现一般”，“不怎么样”。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反映了看待学生有不同的标准。

孔宪凤究竟是“好得很”还是“不怎么样”？通过讨论，认识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要使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孔宪凤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优秀青年。她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决心冲破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束缚，为缩小三大差别而奋斗，立志到大西北去放马；她为革命勤奋学习文化知识；她敢于对错误的东西开展批判、斗争；她临危不惧，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舍己救人。这样的青年，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的青年一代的优秀代表之一。

那么，对小孔这样一个优秀青年，为什么会有“不怎么样”的看法呢？讨论中，小孔班级的班主任忻老师举了小孔生前两件事情，使大家很受启发。今年初，小孔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背诵毛主席的诗篇《送瘟神》。她背了几遍，感到没有把诗中的感情表达出来，还要继续背，但忻老师以为小孔是为了分数，就对她说：“你已经背了好几遍了，不要再背了，我给你记个‘良’，你该满意了吧！”小孔却回答：“我不是为了分数。”今年五月，小孔那个班级下乡学



农，她主动要求担任先遣队和炊事班的工作，而忻老师却认为小孔有私心杂念，想“出风头”。小孔不接受这种错误看法，他就觉得小孔“不听话”。可见，所谓“不怎么样”，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偏见在我们教师头脑中的反映。

列宁指出：“**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讨论中，很多教师举一反三，列举了不少事例，说明这种资产阶级偏见的危害。大家回忆起我们学校七四届毕业生分配时，也有一个原来被认为“不怎么样”的学生小黄，他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坚决要求到黑龙江干革命，有的人对小黄说：“你的两个姐姐已经上山下乡，你可以留在上海了。”小黄回答说：“我是新中国的青年，应当为缩小三大差别作出贡献。”有人怀疑他是为了“出风头”，说他是“唱高调”。但小黄冲破了重重阻力，终于到达黑龙江农村干革命。从孔宪凤的英雄事迹到小黄的革命行动，生动地说明了在党的教育下，一代新人在茁壮成长。而我们领导和教师如果不清除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偏见，就看不见青少年身上那种闪光的共产主义思想，很有可能会扼杀新生的共产主义幼芽。

我们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就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发扬他们身上的共产主义因素，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增强他们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而决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整一整”的做法。过去有些同志由于受了“师道尊严”的影响，总认为对后进学生是“整”得不够，因此，对学生动不动就给予处分。有的教师平时手头上有一个小本子，专门记学生的缺点错误，为的是可以算老帐、整学生。有的用取消学生学工、学农的权利来压学生。当这些做法行不通时，又感到“难弄”，撒手不管。这样做的结果，师生关系就紧张了。

最近两个多月里，我们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学习、宣传孔宪凤的英雄事迹和先进思想，引导学生讨论“怎样才能象孔宪凤那样学习、战斗、生活，使青春闪闪发光？”学英雄，见行动，学生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团结战斗、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处处闪光。七五届学生掀起了“学习英雄孔宪凤，上山下乡干革命”的热潮，有一百五十多名同学表示了上山下乡的决心。一些原来比较后进的同学，也纷纷找差距，学英雄，争上游，有了显著的转变。小孔同班有个同学小阙，原来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我们给他记了一次小过。他认为自己已经认识错误还要处分，不服气，撕掉了处分布告。为此，我们又给他记大过处分。在今年学农时，抓住小阙一些缺点，又给他记了一次大过。小阙受到三次记过处分，情绪对立。可是在小孔舍己救战友的精神鼓舞下，小阙在关键时刻毅然跳进水里，先后五次潜入水底把小孔托出水面。这件事对大家触动很大，教师也改变了对小阙的看法，热情地鼓励他、帮助他。开展学习孔宪凤的活动后，他积极宣传英雄事迹，自觉



克服不良习气，努力学理论，学文化，做好事，决心毕业后走上山下乡的道路，现在已经参加了红卫兵。小阙激动地说：“过去我在家里、学校里，看到的都是冷面孔，只听见训斥、处分，于是就抱着‘横竖横’的态度。现在大家满腔热情地关心我、教育我，我要象小孔那样，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小阙同学的变化，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孔宪凤的榜样鼓舞着同学们奋发向上，而一个同学的转变，又带动了别的同学共同前进，积极分子队伍象滚雪球一样地在扩大。这一系列事实，给了我们领导和教师极为深刻的教育。大家体会到，对学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学校中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曾经指出：旧学校“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如果我们采用“整”的办法，实际上是扩大了在师生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使师生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对立的关系，不是把学生争到无产阶级这边来，而是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但是，反对“整”学生，决不是说可以撒手不管，冷眼旁观，而是要引导学生坚决按照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去做：“**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要满腔热情地做学生的思想转变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要转变学生的思想，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抓先进典型，带动一般，依靠群众做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发扬青少年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引导他们在斗争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革命传统，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为革命而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提高学生遵守革命纪律的自觉性。

由于集中力量抓了理论学习，抓了思想工作，学生中革命精神大发扬，教师的革命积极性也大为高涨。原来有些教师感到“学生难弄，教师倒霉”，对搞好教师工作信心不足。现在看到了革命小将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增强了当教师的光荣感，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有个青年教师原来一直想跳出校门进厂门，工作上得过且过，现在决心向孔宪凤学习，让自己的青春闪闪发光，在教育战线上战斗一辈子。有个老年教师，原来只盼望早点退休，现在她表示“年老志坚心更红，誓为党的教育事业立新功”。大家提高了在斗争中认真学习和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决心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通过这样回顾总结，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而要端正路线，就一定要认真学理论。特别是学校领导班子的成员，一定要努力学好理论，使学校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我们在学习中取得了一些收获，但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党支部和全校师生决心继续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紧密联系学校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把学习运动深入下去，使教育革命进一步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胜利前进。



科 学 史 研 究

同位素年代学与 人类对自然发展史的认识

朱炳泉 周新华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自然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历史。物质世界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运动，宇宙万物自星云、银河、太阳、地球到微观物质的各个层次以及生物和人类社会，都是这种矛盾斗争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因此，在对自然发展史的认识上，也必然充满着矛盾和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毛主席应用人类社会及亿万年自然界的发展史实，精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唯心论、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



随着放射性的发现，现代自然科学中出现了一门利用天然放射性同位素衰变等规律来为自然过程计时的学科，即同位素年代学(注)。这门新兴学科数十年的发展及其在自然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大大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辩证发展历史的认识，用更多、更清楚的事实，进一步表明了“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辩证唯物论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的锐利武器。

人类社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几千年，只占人类整个历史的一个很短的阶段，与天体、地球和生物史相比，只是一瞬间。人类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宇宙万物皆生、皆灭、皆动、皆变，每一自然过程都有自己生气勃勃的发展史。为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过程，就必须有相对精确的时间和空间的量度。

时间和空间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人类认识时间又总是通过由具体运动形态所测度的相对时间来实现的。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利用日地运行规律，建立了“日晷”等装置来计时，并制订了各种历法。然而，在时空问题上从来就存在着两种世界观的剧烈斗争。反动哲学家一贯宣扬什么“穷天地终始”、“有理而后有气”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自然观；而具有唯物论思想的哲学家或科学家，如荀况、张衡、祖冲之、沈括等人，则重视生产实践和实际观测，坚持“天有其时”、“宙之端无穷”等唯物论的时空观，有的人并创立或肯定了如“大明历”等适合当时农业生产需要的科学历法，其中有些历法所据的原理在数百年后才被西欧所采用。在对反映地层史变化的古生物遗迹的认识上，同样存在着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唐宋以来，沈括等人曾对螺蚌壳化石与地球沧桑变化之间的关系作过科学的唯物的论述；然而，反动宋儒朱熹剽窃他们的记载后，却从唯心论出发，炮制出“山勃

(注) 同位素年代学是研究测定自然界岩石、矿物形成年龄的科学。它根据天然岩石、矿物中某些放射性元素(如铀、钾⁴⁰、铷⁸⁷)含量和它们的放射性蜕变产物(如铅、氩⁴⁰、锶⁸⁷)含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计算岩石、矿物的年龄。由于放射性元素蜕变的速度不受温度、压力、化学反应等外界条件的影响，所以能正确计量岩石、矿物的形成时间。



川湮,人物消尽”、地球成为“鸿荒之世”的灾变论,妄图继续维持“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反动统治理论。

在中世纪的欧洲,科学被禁锢在神学之中。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向宗教的“创世说”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十八世纪中叶,康德创立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正象恩格斯指出的,这一假说,第一次动摇了“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反杜林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自然辩证法》)。随后,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开发和农业育种,在客观上为当时地质学与生物学的发展积累了资料。在这一基础上,赖尔、达尔文等人创立的“地球均变说”和“生物进化论”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雄辩地说明了自然界是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

生物的演化必然要反映到地质历史的各种地层的生物化石或遗骸上,这就为衡量地球及生物演化找到了一个有用的相对时标。赖尔等人根据这个时标,采用“将今论古”的方法,阐明了地质发展过程,估算了以亿年计的地球年龄。人们并将地球发展史由老到新地分为前寒武纪(过去认为无生命)、古生代、中生代及新生代(有各种生物群)。与此同时,开始了测定地球年龄的尝试,人们将某些地质历史过程(如海水中的钠盐的积累、海底的沉积物积聚及地球由熔融态到冷却固化)视为单向的均速过程,推算得出地球的年龄为数千万年至数亿年。所有这些进化的、渐变的、“将今论古”的观点,对过去的认识来讲,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这种认识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上述理论日益不能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人们迫切要求自然科学能提供一种技术,来更准确可靠地测度自然界前后相继的历史。

十九世纪末,在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推动下,近代自然科学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电子、X射线和放射性的发现,揭示了原子世界可变、物质不可穷尽这一真理。在这些新的发现面前,资产阶级代言人马赫之流却发出“物质消失”,时空是“主观感觉”等绝望叫嚣,企图使自然科学倒退到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那里去。而坚持唯物论的科学家,则极为重视这些新的发现,并开始探索原子的内部结构。随着



原子核理论及放射性研究的深入，人们很快从物质结构这一新层次之中找到了测度地球、天体演化过程的“信息密码”。一九〇二年，有人提出利用天然放射性的衰变规律测定矿物地质年龄的建议，相继开始了应用铀→氦、铀→铅衰变规律测定含铀矿物结晶年龄的尝试，并发现了钾、铷的天然放射性。用同位素衰变规律来测定地质年龄这一新生事物刚刚诞生，就在地质学领域中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传统势力的种种怀疑、非难甚至反对。一九〇八年，美国就有人利用这种新方法还不成熟的缺陷，企图根本否定用放射性衰变规律测定地质年龄的可能性。然而，在社会生产的推动下，加上核物理学的发展，使同位素年代学很快奠定了本身的理论和技术基础。至本世纪五十年代，利用铀、钍、钾、铷等同位素衰变规律度量时间的方法，在地质年代、陨石年代、地球及太阳系历史、生物及人类进化、考古诸方面开始广泛应用。

近二十年来，由于开发矿产资源、地质调查、卫星考察以及海洋、环境、工程、水文、考古等工作的实际需要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同位素年代学向许多新领域进军，并因学科的相互渗透而建立了一系列新方法。生产实践中大量的年代学研究成果，为探讨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提供了与日俱增的新资料，有力地冲击着这些领域中的某些传统观念。

二

科学史证明，当一门自然科学积累了大量资料，使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取得新进展时，由于还未能从一个新的高度，从广泛的普遍联系中将分门别类的研究所取得的资料加以“辩证的综合”（《反杜林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总是还要盘踞在那里，不肯退出阵地的。那些资产阶级学者们往往趁机混水摸鱼，炮制出种种杜林式的“世界模式”与“永恒真理”，妄图把一门科学的新成就绝对化、孤立化，制造新的固定不变的界限和不可认识的界限，甚至把它变成一种阐明陈旧观念的工具。牛顿力学导致了“机械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最终陷入了“庸俗进化论”，难道不都是如此吗？资产阶级总是借助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来达到其反对社会变革，维护和复辟旧制度的政治目的。叛徒、卖国贼林彪对科学一窍不通，却在反粒子上大作文章，叫嚷什么“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它就会破坏统一”，实际上林彪是极端仇视革命破坏了旧世界、旧制度的“统一”。



虽然同位素年代学诞生以来,大量的矿物岩石年龄测定及其广泛应用,使人们对地质历史的研究从定性走向了定量,但是,同位素年代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和传统的地质学以及其他科学一样,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近几十年来,地质学的一些学说中,就充斥着“固定论”、“轮回论”、“直生论”以及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烦琐哲学。国内外地质学中的马赫主义者,如旧中国的洋奴、买办丁文江,喋喋不休地喧嚷什么对自然界只能进行“分类”求“秩序”,而不能认识规律,等等。所有这些都给同位素年代学以深刻的影响。传统的习惯势力往往把同位素年代学只看成是划分各种地质界限和进行分类的“绝对精确”的数字工具,年龄测定不过是为了一幅固定不变的“世界模式”再添加上一个时间“定数律”。某些国外学者不是早就给它戴上了“绝对年龄”的桂冠吗?他们把根据同位素比值所确定的岩石年龄、地球年龄视为岩石和地球的绝对起点。在研究地质史时,他们总是希望同位素年龄划分的地质界限是一个“没有误差”的时间点,并且试图依据年龄的大小来划分出岩浆活动期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有一些根据古生物划分界限的研究者,总是希望找到不同“种”、“属”之间的截然差异及它们固定的时间起点和终点。当转向地质空间时,国外某些学者又企图依据年龄数据大小和一些片面的地质现象,划分出所谓绝对稳定的古老“地台”与绝对活动的年轻“地槽”之间的界限。所有这些界限的划分,虽然在各自的小天地里具有相对的正确性,但当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之后,就会显出绝对化、固定化的弊病,并出现各种混乱和矛盾。为了弥补漏洞和掩盖矛盾,他们进而搬弄出各种“新”名词和“新”界限,并在定义上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企图以烦琐哲学代替自然界的辩证法。在同位素年代学的深入研究中,得到了大量与传统的地质概念不相符合的实验资料,如古老的变质岩可以测得相当年轻的同位素年龄,相反,年轻的火山岩却测得了古老的年龄;同一岩石的不同矿物,同一样品根据不同方法,有时可以测得差异显著的不同年龄;在具有相互穿插关系的地质体中也可以测得互相倒置的年龄等等。在这些“返老为童”、“父子颠倒”的表面现象面前,某些研究者不是去探讨事物的本质,而是持根本否定的态度,发出了“同位素年龄不可信”、“与地质观察不符”等悲观论调。从“绝对精确”走向“不可信”,这就是形而上学者“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反杜林论》)所必然带来的后果。

上述种种狭隘概念的产生,从认识根源上说,就是因为受到形而上学思想方



法的束缚，以致使人们把地球、岩石、生命的形成从物质演化的“长河”中隔离开来，把物质的运动与时间、空间隔离开来，孤立地进行研究，而不考虑事物总体上的内在联系。“物质在原始星云之前已经经过了其他形式的无限序列。”（《反杜林论》）同样，地球形成之前，太阳系已经经过了它的无限序列，花岗岩形成前，成岩物质也经过了无限序列，并且岩石形成后又经过了一系列的变迁。自然界在不断发展变化着，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运动着的物质可以从一种状态转化为人们看来似乎与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地质学中那些在一个时期内曾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界限，都被新的观测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如认为前寒武纪没有生命这种界限，被越过显生代界限及更为古老的多种生物化石的发现所突破；传统历史地质学中“变质愈深时代愈老”的概念被许多变质程度相差很大的古老岩层年龄测定打破了；大批年龄数据的统计分布证实的岩浆活动周期性与连续性特点，则打破了不同岩浆活动期之间的截然界限。我们说某变质岩是年老的，只是指变质以前的原岩形成时间较老而言，而后在温度、压力影响下的变质作用已使岩石重新结晶，变成了一种新的岩石体系，因此也可以说它是年轻的。当这种变质作用非常强烈时，可以使岩石发生半熔或全熔而形成面貌全非、很年轻的混合岩或岩浆岩。这样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岩石同位素体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可以测得各种不同的年龄数据。这里某一单一的生成时间并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而只有用演化时间序列才能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人们正是从同位素年代学与旧的传统概念相矛盾的观察资料中，找到了研究地球物质演化时间序列的新途径。在突破原来认为岩石、矿物是绝对封闭体系（即岩石形成后没有任何物质的带出与带进）这一旧概念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认识、实践，建立了一系列测定岩石、矿物中同位素体系发生多次飞跃变化与渐进变化的新技术和新的计算理论。根据新的方法，人们可以计算出岩石形成及形成之前的某种变迁和形成以后的变质作用发生的时间。这样，同位素年龄已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与物质运动相分离的时间点，而是成了与物质运动不可分离的时间。尽管目前这些理论与方法还不够成熟，但必将导致同位素年代学向新的阶段飞跃。

随着同位素年代学日益摆脱地质学中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的束缚，它取得的越来越多的新成果有力地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太阳系、地球、生物、人类以及作为计时



形式的自身——元素与同位素,都有着复杂的发展史。社会革命和自然观的变革,使人类在认识自然、能动地改造自然的征途上,又进一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现今,依据铅、铀等同位素衰变规律计算的地球年龄约为四十五点六亿年,各类陨石年龄约为四十五至四十六亿年,从月球表土测得的月球年龄也约为四十六亿年左右,并据推算,三者形成时有着相似的铅、铀同位素比值。这表明太阳系星体大约是在四十六亿年前从原始太阳星云中分化出来。这一重要结论,推翻了以往一切根据机械及化学运动所推算的地球年龄的看法,从而也表明地球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什么机械运动的重复。但是四十六亿年是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太阳系起始点呢?同位素年龄的深入研究否定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见解。不同陨石群及各陨石内部所测得的年龄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说明太阳系各天体的形成也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人们对某些地球上已绝灭核类的衰变产物的研究,又为探索地球及行星形成以前到银河系形成的历史打开了一个缺口。使用这些方法研究的初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地球—月球—陨石体系的形成,仍然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而太阳系大约已有五、六十亿年的历史,银河系的历史则更为悠久。所有这些成果,都有力地批驳了那些认为应用同位素年代学无法认识地球形成以前历史的谬论,同时也充分地说明了宇宙物质的演化同样不是简单重复着某一过程,而太阳系形成之前的物质却有着与今不同的运动形式。

地球从原始太阳星云中分化出来后,仍然处在一分为二的矛盾运动中。目前测定的最古老地壳物质年龄约为三十七点五亿年(格陵兰地块),说明了地球上至少在那个时间就有了地壳。由地球内部的重力能、放射能及自转动能等等导致了地壳活动和地核、地幔的内部运动。全球性的同位素年代学数据表明,地壳中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既有周期性,又有连续性。早期历史上,大约在距今二十六亿年、十八亿年、十亿年左右,岩浆活动与变质作用表现为最强烈,这是地球内部物质运动的一种反映。因此,借助同位素年代学资料,可以研究地球内部运动的过程。地球近期的岩浆活动,又大约显示出一亿年或二亿年为一周期。分布在海底和世界各大陆的岩石同位素年龄及同位素分布特征,进一步揭示了地球物质存在着大规模的水平运动和上下对流运动。对于这种运动发生的机理,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我国一部分地质工作者提出,地球内部的运动可以引起自转速度的改变,从而导致海水南北向的进退及表层柔性岩层的纬、经向流动;而另外也有人认为,地幔物质以玄武



岩等形式不断加入到地壳，地壳物质则通过板块运动等再次进入地幔，从而发生更大的迁移，这一运动也使原来连在一起的大陆可分割漂移至千里之外。这些假说，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地球运动复杂而丰富多采的形式。岩石古地磁研究的深入及同位素年代学资料的配合，表明地球的磁极也同样不是固定不变的。地球南、北极在地质历史中有着较为复杂的迁移及多次倒转。所有这些新认识，都有力地批驳了形形色色的大陆、海洋、地壳、地幔的固定论和永恒论，也使只着眼于地壳升降、褶皱运动的片面的研究进入更广泛更普遍联系的研究领域，打开了禁锢地质学发展的精神枷锁。

我们今天的地球虽已经历了多次沧桑巨变，但它仍很年轻，还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对西藏——“世界屋脊”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察。经同位素年代学与其他学科配合研究表明，喜马拉雅山地区曾在六亿多年前发生过剧烈的地质变动，而巍巍的珠穆朗玛峰顶峰岩石虽可能已有四亿多年的历史，但整个喜马拉雅山脉出海成山却只是一千多万年前的事，并且至今仍在上升。

地球上生命的起源过去一直认为是从寒武纪（约五点七亿年）开始。新的资料证明，生命由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而后自有机界中诞生出来，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五点七至七亿年的前寒武纪地层中，已发现了大批腔肠动物等动物化石，在十亿年的地层中找到了真核细胞（绿藻）的化石，在十至三十二亿年的地层则有各种形态分化的细菌及蓝绿藻化石。近来，在非洲南部年龄达三十二亿年的地层中，已发现属原核细胞的细菌化石。至于更为古老的陨石及月球岩石，人们已从中分离出多种构成生命的基础——蛋白质与核酸的主要有机化合物，如氨基酸、嘌呤及嘧啶等。这幅自然界从化学进化到生物进化的图景，表明了各种形态的生命进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近年来，由于同位素年代学在技术上的进展，有力地配合了古人类学的研究，因而加速了对早期人类进化史认识上的深化。恩格斯很早就指出，劳动使猿进化为人，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因此研究人类史，必须考察人类制造工具的历史。过去一直认为，人类只有四十至五十万年的历史，最早在我国发现的“北京猿人”大约就是这一时代的人类。然而“北京猿人”不但能制造工具，而且已经使用了火。“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



界分开”（《反杜林论》）。可见北京猿人已经是比较进化的人类。现已确证，在猿开始制造工具向人进化到“北京猿人”之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六十年代初以来，在非洲东部一些地区发现了大量能制造工具的“古猿”——人类的祖先。根据同位素年代学和古地磁的资料证明，东非“古猿”至少已有二百六十万年的历史。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人类史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

恩格斯指出：“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自然辩证法》）。地球、生物、人类以及地球上的各种地质体都是永恒运动中的有限存在形式，只有把握住它们之间质的差别和相互之间的联系，才能正确地认识自然界的历史。

三

正如现今的天体、地球及生物已经经历了演化的无限序列一样，宇宙间的各种形态的物质肯定要向各自的“明天”转化。人类对自然发展过程的认识也将继续无限地深化。用同位素年代学来探索太阳系、银河系以至宇宙的发展史还仅仅是开始，现有的方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很多缺陷。由于人们对宇宙演化过程中核子转化及“基本粒子”转化的规律认识还不充分，有关天体演化过程的时间量度基本上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可以相信，随着人类对物质世界无限层次的认识的深化，将会找到测度各种演化时间过程的更多新方法。然而，近几十年来国外风行着形形色色的“宇宙论”，推算出什么“宇宙年龄”、“宇宙半径”，大谈“物质创生”、宇宙运动开始于“宇宙大爆炸”，等等。不难看出，这些“学说”不过是唯心论和宇宙有限论者的庇护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们象快淹死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来救命一样”，企图利用这些披着时髦科学外衣的荒谬结论为“信仰主义保持或寻找地盘”（《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因此，必须从政治上、哲学上和自然科学上批判这些唯心主义的谬论，揭露它们的反动本质。我国对时空理论和天体演化理论的研究，必将在实践和战斗的批判中获得发展。

随着天体物理和核物理学研究的深入，多年来已提出了有关物理学常数（如引力常数、同位素地质年龄计算中常用的放射性衰变常数等）有无可能随时间发



生变化的问题。根据大量实践中所发现的一些矛盾现象，同位素年代学也从另一侧面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常数”不常，这从辩证法来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反常”现象，并不象某些人所担心的那样会推翻同位素年代学的理论基础。列宁早就告诫我们：“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相对的，但绝对真理是由这些相对的观念构成的；这些相对的观念在发展中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的时空观念的可变性也没有推翻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因此，任何悲观的情绪和否定同位素年代学的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作为科学发展一定阶段产物的同位素年代学，将来必然也会被更新的、更接近绝对真理的计时学科所代替。

当前，我国同位素年代学的研究还应以地球为主要对象。地球——这一人类的摇篮，是几千年来自然科学研究的最主要对象。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地球的结构、早期状态和内部动力学过程等均了解甚少。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迫切需要解决资源开发、地震预报、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地球的演化规律。即使对研究天体演化史而言，首先从地球史着手显然也有重要的意义。地球参与了太阳系的演变过程，并且至今还不断接收到大量来自太空的空间物质。因此，对于地球初期演化史及地球—月球—陨石系统的确切认识，无疑将是打开太阳系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然而，在国际上，美苏两霸打着开展空间、海洋和全球性“科学研究”的幌子，为它们争霸大陆、海域、外层空间的帝国主义政策服务，并制造全球性公害和散布种种“地球毁灭”、“能源枯竭”等无耻谰言，企图以此来掩盖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已处于总危机的真相。对此，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决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内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积极开展对渗透在自然科学中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批判。自觉地应用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来研究和分析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及存在的问题，“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是我们面临的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 国际述评 ·

苏修争霸世界的经济根源

梁 效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业已蜕变成到处进行侵略扩张、竭力争夺世界霸权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可是，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很害怕“霸权”这个词，一听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这丝毫也不奇怪。他们“就象小偷避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对“霸权”一词讳莫如深，这正好说明世界人民奋起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受着帝国主义规律的支配，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由于它是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复辟资本主义而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因而又有着它的某些特点。

列宁说：“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在帝国主义国家，是金融资本统治一切。它在政治上，必然走向全面反动；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上，必然“力图兼并一切国家”。垄断的这一根本特征，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身上暴露得再明显不过了。“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上，苏修今天在“力图兼并一切国家”。它在“经互会”国家中大搞什么“共同所有”、“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进行兼并。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间，苏修在它的对外贸易中，单是不等价交换一项，就使东欧五国遭受一百九十亿美元的损失。对苏修来说，贸易和“文化交流”不



过是渗透的渠道，“援助”和贷款不过是资本输出的别名，“友好条约”不过是控制、干涉别国内政的手段。至于所谓“华沙条约组织”，既是苏修进行经济兼并的军事后盾，又是它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的侵略工具。它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样，加入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列，妄想建立起老沙皇所梦寐以求的殖民帝国。苏修悍然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它社会帝国主义狰狞面目的大暴露。而苏修的这种到处搞侵略、颠覆，不断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反抗，也就埋伏着它的彻底失败。

“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的统治代替了自由竞争，但竞争仍然存在，而且竞争的规模、深度、强度和破坏性更大更凶。列宁指出：“正是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基础都是垄断资本主义，两国的大资产阶级都力图在垄断本国经济的基础上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它们必然展开全面、激烈的竞争。它们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是扎根于这种竞争和垄断不可分割的现实联系之中。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帝国主义筵席上的迟到者。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苏修首先向许多昔日的“兄弟国家”开刀。它对“经互会”一些国家的政治控制、军事占领和经济兼并，使它拥有一个排斥其他国际垄断资本的势力范围。不仅如此，苏修还竭力打入美帝的势力范围，大挖其墙脚，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大肆进行渗透和扩张。这样，两个超级大国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必然愈演愈烈。它们**“为了垄断一切，就不仅要国内市场上（本国市场）上，同时还要从国外市场上，从全世界上把竞争者排除掉。”**它们争夺霸权的斗争，已经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而重点是在欧洲，包括地中海和欧洲的侧翼中东、波斯湾。勃列日涅夫曾公开宣称：欧洲问题在苏联“对外政策中占着一个中心位置”。苏修兵力的四分之三本来就放在欧洲，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又以每年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速度继续增加在欧洲的军事力量。美苏两霸这样剑拔弩张地争夺下去，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美苏两霸是今天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开了多年最近才收场的所谓“欧安会”，不过是两个超级大国利用军事集团划分势力范围的别名，实际上是欧危会。苏修到处鼓吹什么“持久和平”、“安全”、“缓和”，统统是骗人的鬼话，其目的都是掩盖它日益加紧的扩军备战和战争政策。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出，如果不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



本的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和霸权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更不是取决于某些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苏修法西斯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帝国主义规律起支配作用的必然结果。美苏两霸的争夺，是帝国主义争霸史的继续和发展。“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

二

今天苏联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形成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人和人的关系以及分配方面，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统治。这一经济结构本身的特点，使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具有更加横暴的性质。

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比较起来，苏联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性强，集中程度高和国家控制紧。它的一切经济命脉，包括军事工业，都是由掌握国家机器的苏修叛徒集团直接控制的。这个特点使得苏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有类似之处：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它低于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性方面，在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高于美国”。

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里，“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是交错在一起的”。这种“交错”，以私人垄断为主，而国家垄断实质上是私人垄断集团利用国家机构作为自己牟取最大限度利润的工具。这种国家垄断，经常地、大量地采取加工订货或者减税、补贴等方式，使国家机构为私人垄断资本服务。即使由于特殊情况，例如发生战争或危机时，在某些企业、某些部门实行一定时间或一定程度的国有化，也“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在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采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形式。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只是统治几个生产部门或几十个行业，而是几乎囊括了整个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公用事业和国营农场等等。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几个大财团并立的情况不同，苏修的垄断资本是由一个中心集中控制。这个中心，就是“理想的总资本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代表就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垄断全国经济和国内市场的后果之一，是使苏联亿万人民生活 在极端专横的垄断统治和经济强制之下。粮食匮乏吗？消费品奇缺吗？反正就生产这么多，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不管人民怨声载道，他们照样榨取垄断利润。垄断必然导致腐朽。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果，不能不使它的国民经济出现腐朽停滞趋势。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便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兼并新的领土，掠夺国外的廉价原料，倾销商品，输出资本和转嫁危机。据不完全的统计，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苏修向第三世界输出的资本总额达一百三十多亿美元。通过资本输出扩大商品输出，把大量的滞销品倾销到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间，高价出售到这些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达一百六十多亿美元，搜刮了几十亿美元的高额利润。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另一后果，是促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在今天的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过着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生活，广大劳动人民则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新沙皇的剥削率，超过了老沙皇的一倍。苏联农庄庄员的半数以上和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生活在官方承认的贫困线以下。市场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死攸关的问题。国内市场的日益相对缩小，必然促使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加倍疯狂地去抢占国外市场，从而同美帝发生剧烈的贸易战、投资战、资源和海洋争夺战。

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相结合，使得苏修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可以把经济力量同政治、军事等各种力量汇集起来，在经济实力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成为与美帝争霸并在争霸中采取攻势的超级大国。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就是通过这条相似的途径跃登世界头等帝国主义强国“宝座”的。正如列宁所说：“德国的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制度结合了起来，于是德国走到前面去了。”这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

大量事实证明，正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经济上、政治上的这些特点，成为刺激它疯狂向外扩张侵略、拚命争夺霸权的强烈兴奋剂，使它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横行霸道、穷凶极恶的核霸王角色，正在为自己的灭亡创造条件。

三

苏修疯狂地推行扩军备战和侵略冒险政策，这是它的社会帝国主义本性决定



的，也是苏修经济上的腐朽性、落后性的一种反映。

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民地等等，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也就是以一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东西为根据”。由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实力落后于它的对手美帝国主义，它要称霸世界就必然拼命地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而苏联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为它的军国主义化提供了条件。勃列日涅夫叫嚷：“国防问题处于我们一切工作的首位”。也就是说，把加紧准备侵略战争放在首位。为此，苏修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使苏联整个国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战争经济。

目前，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而它的军费开支却同美国不相上下。据估计，苏联的军事开支约占其当年国家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占其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苏联全部工交企业的百分之六十都直接或间接用于军工生产。根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材料，从一九五三年以来，苏联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其中许多就是用于军火生产，而用于消费品生产的只占百分之十五左右。十几年来，苏修仅用于核武器方面的开支就达一千多亿美元，它的洲际导弹十年中增加了十四倍，海军舰艇吨位十年来增加了近一倍，核潜艇在四年间增加了四倍半以上。另一方面，消费品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却日益下降，由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三十点八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民用工业部门由于不断受到军火生产的冲击和排挤，资金和劳动力严重不足，许多陈旧设备得不到更新，劳动生产率很低，尽管苏修当局一再压低生产指标，还是经常完不成任务。同时，由于产品质量低劣，又造成大量积压。苏修的农业更是长期落后，特别是粮食产量极不稳定，经常依赖进口。所有这些，使苏联经济的发展更加畸形，而长期陷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这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的必然恶果。

苏修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必然使它的庞大军事工业出现生产“过剩”。为了给那些技术陈旧的“过剩”军火寻找出路，苏修成了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军火商。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二年期间，苏修出售的军火达二百八十五亿美元，仅在中东地区，苏修从一九七三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底期间输出的军火就达六十七亿美元，比它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一九七二年为止的十多年内向中东销售军火的总额多十四亿美元。苏修还乘机敲诈勒索，要购买军火的国家用农产品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的外汇付款，从中牟取暴利。

一个在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帝国主义大国，通过国民经济军事化而妄图用武力称霸世界，这是老沙皇走过的道路。列宁曾经指出：沙皇俄国在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是“**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然而，经济上的落后丝毫没有使老沙皇的野心有所收敛，相反，它使沙皇俄国在政治上更加反动，军事上更富于冒险性，经济上更加贪婪。当时，“**在俄国，资本帝国主义较薄弱，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比较强大的**”。在这方面，苏修新沙皇完全步老沙皇的后尘。沙皇俄国曾经依靠这种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而“**牢固地保持了世界宪兵的荣誉**”，今天，苏修新沙皇的这一“荣誉”，比起他们的前辈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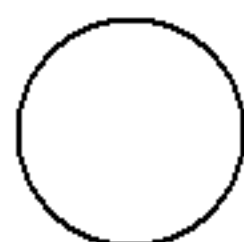
苏修无限制地扩张军备，给苏联劳动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了大量剩余价值以后，又以居民税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多一层剥削。据苏修自己公布的材料，苏联一九七四年的居民税竟比一九六〇年增加近两倍。苏修还通过抬高物价、推迟偿还公债等手段肆意搜刮。同时，为了缓和经济上面临的困境，苏修不得不以高额利息向西方国家大举借债。这就使苏联劳动人民变成了新的债务奴隶。所有这些层层盘剥，使苏联劳动人民的贫困化日益严重，从而加深了苏联国内的阶级矛盾。

勃列日涅夫上台的十年，是苏修疯狂扩张的十年，也是它到处碰壁、内外交困的十年。在国内，苏修的两个五年计划连年落空，农业生产十年中有六年减产，今年的收成更糟。它的整个国民经济困难重重，危机四伏，连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认“**人力和财力不足**”。苏联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使苏修新沙皇如同坐在火山口上。在国际上，第三世界作为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在斗争的实践中越来越认清了披着“天然盟友”外衣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从而把斗争的矛头日益指向这个危险的敌人。第二世界近年来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使苏修向西欧的侵略扩张遭到了抵制。东欧国家和人民反对苏修控制、压迫的斗争日益增强。苏修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毛主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别看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张牙舞爪，其势汹汹，实际上是外强中干的。它妄图称霸世界，其结果只能把更多的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而把另一端交给世界各国人民，最后逃脱不掉灭亡的命运。



红旗



一九七五年 11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 目 录

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3)

思 想 评 论

结合评论《水浒》 深入学习理论.....池 恒 (5)

学大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华 云 (8)

以点带面 推动全般.....庄 宁 (12)

学根本 抓路线 普及大寨县

学大寨要永不停步.....中国共产党营口县委员会 (16)

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谭 枫 (21)

穷要长志 富要防修.....吉林榆树县小乡生产队党支部 (26)

自力更生就可以大有作为

——山东烟台地区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调查报告..... (31)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

反对投降主义的重要文献

——学习《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田志松 (36)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余 凡 (41)

透过现象看本质

——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方 荆 (47)

农民起义有这样的“规律”吗？

杨 宽 (51)

“让贤”与投降

北京卫戍区某部一连理论小组 (56)

我们评论《水浒》的一点体会

.....河北深县护家池大队党支部 (59)

文 化 战 线

大海的力量

——评影片《第二个春天》的主题思想

秦 新 (62)

重视科学普及工作

项 群 (68)

让革命诗歌占领阵地

——重读鲁迅对新诗形式问题的论述

任 轶 (73)

杂文：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

阳 戈 (76)

☆ 十一月一日出版 ☆



毛主席语录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
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
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
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
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
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
正在向前奋进。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今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满怀革命豪情，纪念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第二年十月，红二方面军会同红四方面军也到达陕北。至此，三支主力红军先后结束了战略大转移，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红军长征，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山，走过人迹罕至的草地，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红军长征的历史功勋，永远铭刻在祖国各族人民的心中。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永远鼓舞我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一代一代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长征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个英明的论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没有军队建立了军队，没有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根据地，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发展了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九三一年，由于王明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在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使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在党和红军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从军事上和组织上纠正了王明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才保存和锻炼了红军的骨干，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胜利结束了长征，开创了我国革命的新局面。回顾长征的历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不论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执行毛主席的路线，革命就胜利，就向前发展；离开了毛主席的路线，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自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先“左”后右，最后叛国投敌，当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的走狗。张国焘反对北上抗日，主张南下逃跑，最后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当了可耻的叛徒。刘少奇、林彪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这就告诉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就要反对投降派。

长征是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材。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现在还是这两个可能。今后五十年或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荣传统，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评论；进一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通过学习和批判，使全国人民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这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可靠保证。

搞团结还是搞分裂，是长征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明搞宗派，“以我为核心”；张国焘恃仗人多枪多，另立中央。他们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不得人心，不可能不垮台。毛主席提倡要搞“五湖四海”，不管是那个山头、那个方面军的，不管是北方、南方的，都要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团结起来。正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了各路红军，长征才以敌人的失败和我们的胜利而告结束。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团结战斗的光荣传统，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促进安定团结。

长征途中遇到的困难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红军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气概也是史无前例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军英雄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中国的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正象毛主席教导的，“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现在，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之红军长征时候不知好了多少倍，但是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不能丢。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怀念在长征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向继续战斗在各条战线的老红军，致以亲切的问候。当前，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打仗而努力奋斗。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革命传统，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思想评论

结合评论《水浒》 深入学习理论

池 恒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教导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里，毛主席既向我们提出了学习的深度——“要搞清楚”，又提出了学习的广度——“要使全国知道”。经过这一时期的学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促进了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收效是很大的。但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求来衡量，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还需要作长期的努力。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给理论学习以新的推动。我们要结合评论《水浒》，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坚持下去。

半年多来学习运动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具有动员群众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强大威力；学好理论，端正路线，是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根本保证。无论那个地方，那条战线，要发展大好形势，夺取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都要把学习理论作为关系路线、关系全局的大事，继续抓好。当前，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下，正在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我们要引导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取得更大的胜利，也必须抓好理论学习，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武器，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以进一步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学大寨是这样，其他工作也不例外。越是工作忙、任务重，越是困难多、阻力大，越需要抓好学习，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强大威力。

目前正在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是政治思想战线上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内容。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使人民都知道”同“要使全国知道”一样,都是要求我们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地进行教育。毛主席历来重视反面教员和反面教材的作用,在正面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开展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评论,可以使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照中,更深刻地认识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原则的重要性。通过评论《水浒》,认清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看一看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如何破坏革命斗争、瓦解起义队伍、葬送革命事业,总结一下两条路线斗争的种种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的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很有教益。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历史上有,现代有,今后还会有,这对革命事业是最危险的东西。刘少奇、林彪这些修正主义者,就是现代的投降派。他们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的。评论《水浒》,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从而在今后的斗争中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长期以来,在对《水浒》的评论中有不少错误观点,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划不清革命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界限,甚至为投降主义路线作辩护。《水浒》评论中这种错误倾向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说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占领阵地,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任务还需要继续落实。《水浒》所宣扬、歌颂的,是孔孟之道;宋江搞投降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孔孟之道。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论《水浒》,弄清楚它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澄清种种错误观点,这不仅有利于在文学方面扩大马克思主义阵地,而且有利于在哲学、历史、教育以至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某些从旧时代流传下来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所以,评论《水浒》,同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一致的,应该恰当地结合起来。掌握好理论武器,才能彻底揭露和深刻批判《水浒》所颂扬的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及其指导思想孔孟之道;而通过评论《水浒》,又会推动理论学习进一步深入。许多地方对学理论与评《水浒》统一部署,统一安排,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入分析《水浒》,通过分析和批判又深刻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收到较好的效果。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提倡的。



为了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引向深入，我们要很好地总结前一段认真看书学习、密切联系实际、学习和应用相结合等行之有效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对学习运动的组织和领导。

现在，我们仍然需要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下功夫。就是说，不仅要认真学习革命导师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和有关著作，全面地领会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精神实质，而且要根据现实斗争中迫切需要弄清楚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有系统地读一些书，以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更好地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提高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注意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便在各方面的工作中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抵制修正主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

继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坚持学习和应用相结合，是把理论学习引向深入的关键。联系实际，主要是联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联系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各条战线、每个基层。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离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离开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就会脱离我国革命最基本的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根本不可能把学习搞好。实际斗争中提出了许多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予以正确回答。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广大课堂。许多地方学习搞得生动、扎实，效果较好，就是把学习同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起来，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际斗争，又在实际斗争中学习理论。这样，既推动了工作的发展，又促进了学习的深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是一项重要任务。有些地方把学习理论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结合起来，同改造世界观结合起来，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方面的经验需要加以总结。

自满情绪和松劲情绪是深入学习的障碍，要不断克服。要经常分析学习运动的发展形势，定期总结交流经验，抓好典型，推动全般。对那些长期比较落后的地区和单位，要大力帮助，积极促进，使其尽快赶上来。要继续办好读书班。要加强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建设，不但要用，而且要帮，即从政治思想上、理论水平上、工作作风上帮助和培养这支队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发挥他们在群众学习中的骨干作用。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深入下去，坚持下去，必将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向着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大踏步前进。



学大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

华 云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了。大会发出战斗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头，带领群众，齐心协力，把这一运动搞好。

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大寨的方向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方向。普及大寨县，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要求；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我国在本世纪内走在世界前列的迫切要求；又是和敌人争时间，比速度，做好战备工作的迫切要求。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从明年开始，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到一九八〇年，我国将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国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这个宏伟目标，需要做多方面的艰苦的工作，其中关键的一环是把农业搞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建设不起来；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不能展翅高飞。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们要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工农联盟，贯彻落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创造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物质条件，都需要在农业上下功夫。不把几亿农民动员起来，不把农业搞上去，是什么事也办不好的。



发展农业,要办的事情很多,中心环节是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学大寨以来,全国各地已经涌现出三百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县。从一些先进县的经验来看,在一个县的范围学大寨,便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把全县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带起来,步子大,收效快。如果在五年以内,把我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寨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将进一步得到巩固,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会更加深入,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有更大发展,我们的国家也就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再过些年,全国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县都建设成为大寨县,那个时候,就会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我们整个国家的面貌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普及大寨县,要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农村的矛盾很多,基本矛盾还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它的集中表现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不仅已经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企图复辟,而且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农民中,小生产的传统影响还存在,一部分富裕中农还有比较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资本主义道路,过去有人走,今后还会有人走;混进党内的坏人会走,觉悟不高的好人也可能走。有些社队,条件差不多,甚至山连着山,水连着水,但有的发展快,有的停滞甚至倒退,原因在那里?只要认真调查一下,主要问题都是出在是不是抓住了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的问题上。经验证明,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就欣欣向荣;领导权掌握在坏人或者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手里,滑向资本主义邪路,集体经济就停滞落后。大寨的同志说得好:“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规律还缺乏理解,他们的思想实际上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上。因此,往往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对于集体经济中的方向、道路问题,对党内路线斗争问题,就不敢抓,甚至绕开走。这怎么能学好大寨呢?有的同志说:“昔阳对资本主义敢管、敢批、敢斗,我们有的地方不敢管、不敢批、不



敢斗，特别是对集体经济内部存在的方向、路线问题，解决得不力。”这正是一些后进县同昔阳县差距最大的地方。要学大寨的根本经验，就要对照大寨县目前的标准，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敢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在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上下功夫，把大寨只看作生产的典型，就生产论生产，是断然学不好大寨的。

普及大寨县，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也是一场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我们不但要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同各种错误思想斗，而且要搞好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改变懦夫懒汉的世界观，不断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错误思想。

有的同志说：“我们条件差，不易学大寨。”这种想法必须改变过来。条件好坏，是相对的，而且不是固定不变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主席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走大寨的道路，加速农业发展，是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共同愿望。几亿农民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重要的是我们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这种积极性。论客观条件，昔阳县的条件好吗？林县的条件好吗？宿迁县的条件好吗？寿阳县的条件好吗？但是，那里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放手发动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自力更生，重新安排河山，有的几年，有的两三年，山也变了，水也变了，产量也变了，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县变成了学大寨的先进县。

这里的关键，是各级干部要象大寨和昔阳的干部那样，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有“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有一个很大的革命干劲，密切联系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要有改天换地的气魄，要冲破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只顾眼前，不看长远，只算小账，不算大账，这种习惯势力对我们一些干部还是一种精神上的束缚。不打破它，就看不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看不见气势磅礴的群众力量，就不敢大干。当然，我们说大干，是指把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的大干，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真正要在一个县的范围内重新安排河山，不采取科学态度是干不好的。

有一些同志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说什么比过去好得多了，比别人差不多了，因此，躺在成绩上不再前进。这种态度也必须改变。我们共产党人是要



解放全人类的。我们的工作取得一点成绩，甚至取得不小的成绩，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任务比，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有什么理由当作自己的包袱呢？大庆工人在石油战线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他们总是和八亿人口的需要比，和共产主义的大目标比，还是觉得贡献太小了。我们要有工人阶级的气魄和胸怀，把自己的工作同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联系起来，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当作迈开新的步伐的起点。只有这样，才能越干越感到有差距，越干争上游的劲头越足，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先进单位也要一分为二地看自己。昔阳县的同志说得好：“先进队之所以成为先进队，就是因为那里的干部和群众敢于揭矛盾，搞斗争，把资本主义斗下去了；如果先进之后，就不承认矛盾，不搞斗争，今天是先进队，明天就会转化为后进队。”越是先进队，越要多看自己的不足之处，为自己提出更大的目标，这样，才能先进更先进，从一个高峰攀登另一个高峰。先进队也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例如，怎样在发展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怎样扩大公社、大队两级的经济，促进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发展？怎样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增加积累，增加储备，争取为国家多作贡献？怎样进一步提高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看到共产主义大目标，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都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导下正确地加以解决。在生产上，也要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进军。生产发展是无止境的，我们没有理由满足于已有的成绩。

当前，形势大好。普及大寨县有许多有利条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越来越雄厚。只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发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作用，就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实现普及大寨县的任务。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曾经指出：“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奋斗吧，一幅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画图正展现在我们面前。



以点带面 推动全般

庄 宁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摆在各级党委面前的任务很艰巨，工作是十分繁重的。在毛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战斗号召，形势大好，形势逼人，各项事业都要有一个新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呢？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般”。（《合作化模范邓家乡》一文按语）这是毛主席历来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我们要总结经验，提高自觉性，把这一科学的工作方法运用到自己的斗争实践中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的先进经验已在全国不少地方开花结果，大寨式社队大批涌现，全国已有三百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县。这同各级领导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过程中，实行以点带面、推动全般的工作方法，是分不开的。在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各个地区、各条战线的许多领导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扎根基层，艰苦工作，学习和总结先进典型的经验，努力把先进经验推广到面上去，收到了很好的成效。群众高兴地说：“以点带面滚雪球，革命生产争上游。”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应该更好地实行以点带面、推动全般的工作方法，使自己的领导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我们从事革命工作，是一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要想在工作中达到预期的目的，就要使自己的工作方法合乎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合乎人类认识运动的客观规律。

以点带面、推动全般的工作方法，是建立在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的基础上的。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



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由点到面，体现着这样的矛盾发展过程。先进的典型是新生事物，开始的时候总是少数，甚至只是一两个点。但正由于它是新生事物，又必然在同自己的对立面的斗争中，由点到面，发展壮大，取得支配的地位。这样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事物改变面貌的过程。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可以看到，当一个地区、一条战线的先进典型还只是少数的时候，还不能说这个地区、这条战线的面貌在总体上在全局上起了根本的变化，最多也只能说是部分的质变。但如果这种先进的典型普及到面上去，使之由少数变成多数，使先进点变成先进面，这样，就会使一个地区、一条战线的面貌发生质变。我们采用以点带面、推动全般的工作方法，正是掌握事物发展的这一辩证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使新生事物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少数到多数地逐步成长，实现革命的变革。

实行以点带面、推动全般的工作方法，又是和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是人类认识的两个互相联结的过程。“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矛盾论》) 这种认识过程中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则表现为点和面的关系。我们的领导同志，深入蹲点，对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领导这个运动等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点上的经验也有比较充分的了解，这样，对整个面上的工作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就能运用点上的经验，带动面上的工作。而把点上的经验向面上推广时，还会遇到新的问题，学习到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带着这些问题、经验再到点上进行研究。每次这样的循环往复，都把革命工作推进了一步，都可以使我们指导运动的经验更丰富、更完善，增长领导的才干。由点到面又由面到点的工作过程，是我们的认识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不断深化的过程，这是提高认识、做好工作的客观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如果背离了认识过程的客观规律，往往不能取得胜利。

以点带面、推动全般，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工作上的具体运用。我们要坚持这一科学的领导方法，就必须注意破除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



不断提高坚持抓点、以点带面的自觉性。

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点和面的关系。毛主席指出：“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矛盾论》）点和面这对矛盾的关系也是这样。面是由点组成的，没有点也就没有面；而离开了面，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在工作中，如果抓了面忽视了点，或者抓了点丢了面，都是不符合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我们的领导，下功夫，花气力，深入蹲点，培养先进典型，使干部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这是非常必要的。所谓“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抓好典型，这仅仅是做好工作的第一步。把先进典型的经验向面上推广，这是更为艰巨的。只满足于抓了几个先进典型，不求在面上前进，这不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态度。“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普及到面上去，使后进变先进，先进更先进，整个工作才会有新的飞跃。以点带面、推动全般是一套完整的工作方法。什么时候离开了点，面上的工作就不能做好；而脱离了面，点上的工作就失去了全局的意义，达不到抓点的目的。

在具体工作中，往往发生把点上的经验向面上推广不很得力的情况。有的同志总觉得先进典型条件特殊，经验难以推广。这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在作祟，看不到在一定的条件下，点上的经验是可以转化为面上的成果的。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先进典型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的经验有特殊的一面。运用这些经验到面上时，要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不然不能取得成功的。但是，特殊性总是和普遍性联系在一起。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尽管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但无不受着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制约和支配。先进典型之所以先进，主要是因为它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照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客观规律办事。就这一点说，它们的经验有着普遍的意义，反映了革命斗争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如果片面强调先进典型特殊性的一面，而否认它的普遍性的一面，那就否认了先进经验中最主要最根本的东西。事实上，很多先进典型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战胜了种种困难逐步成长起来的。如果说“特殊”的话，就是先进单位的干部和群众经



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比较高，社会主义的干劲比较大，而这是任何地方经过努力都可以做到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否端正，路线端正了，先进典型的经验就能在面上开花结果。

客观事物的发展，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在革命的进程中，总是有的地区、有的单位走在前面。它们的先进经验，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方向。然而，为什么有的地方先进典型的经验老是推不开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里的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落后于形势，跟不上先进典型前进的步伐，对推广先进典型的经验缺乏自觉性。推广先进典型经验的过程，也是各级领导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的过程，是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过程。我们的领导，要经常以先进典型作镜子，对照检查，找出差距，促进自己继续革命。领导的路线觉悟不同，对先进典型的认识就不同，推广先进典型经验的态度和效果就不一样。我们应当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实际、跟上形势，使工作跟上革命发展的需要。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推广点上的经验也是这样。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又指出：“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推广点上的经验，要先在一定范围的面上进行。如果急于求成，全面动手，必然达不到推动全般的目的。为了切实做好以点带面，我们必须对全局工作作出全面规划，妥善安排，既要有明确的目标，又要有具体的办法，做到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分期分批地把点上的经验扎扎实实地向面上推广。只要领导思想明确，措施有力，就可以做到以点带面、推动全般，使工作不断前进。

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工作方法，是贯彻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毛主席指出：“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的工作方法》）实行什么工作方法，是一个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问题。我们要不断破除形而上学的思想束缚，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坚持以点带面、推动全般的工作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战胜困难，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



学根本 抓路线 普及大寨县

学大寨要永不停步

中国共产党营口县委员会

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下，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发展，如何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建设大寨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我们县委联系实际对全县农业学大寨的情况进行了总结，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努力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旺盛的革命精神，才能在学大寨的道路上一往直前，永不停步。

大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从不能满足已取得的成绩，年年都迈出新步伐，年年都作出新贡献。学大寨，决不可忘记这一点。我们在开展学大寨运动中，往往缺乏大寨那种永不满足、不断前进的精神，常常在取得一点成绩之后，就自满自足起来，摇摇摆摆，走走停停。回顾我们县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一九六五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推动下，我们县粮食亩产就达到了四百三十三斤，是辽宁省上《纲要》较早的一个县。但是，直到一九六九年仍然没有过“黄河”，一连五年在四百到五百斤之间徘徊。那几年，我们觉得生产达到这样的水平是满不错了，学大寨也算有了几分成绩。因此，每当总结工作和介绍经验时，总是在“稳”字上唱喜歌。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推广了昔阳三年建成大寨县的经验。对照昔阳三年三大步，一步一层天的事实，我们才开始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这个“稳”字，见到了差距，认识到骄傲自满的危害，并迈出了新的步伐。一九七〇年全县过“黄河”，以后每年前进一步。一九七四年全县粮食亩产达到八百一十三斤，成为我省第一个过“长江”的县，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两亿斤，比一九七〇年增加近一倍，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翻



了两番。总结前五年停步不前、后五年继续前进的经验教训，我们体会到，学大寨的过程首先是我们县委不断提高继续革命觉悟的过程，只有不断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才能树立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雄心壮志，破除满足现状、不求上进的思想，把大寨经验推开。

骄傲自满是一种严重的盲目性。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农村始终激烈地进行着。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就有可能陶醉在已有的成绩中，忘乎所以，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不去调查研究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现状。或者尽管下去了，由于政治嗅觉不灵，对两条道路斗争在当前的表现和特点，认识不清。这样，对资本主义活动就可能听之任之，甚至开放绿灯。事实正是如此。正当那几年我们抱着“稳”字自我欣赏的时候，一些社队资本主义倾向又在抬头。有的大队，“一把瓦刀，外出单干；一把斧子，乱砍滥伐；一把镐头，搞小开荒”的歪风盛行。有的大队，“重副轻农”、“重钱轻粮”等表现在集体经济内部的错误倾向，畅通无阻。结果，不少后进队，长期改变不了面貌，有的先进队，也走了回头路。这就说明，“稳”字后面，掩盖着许多问题。从农业生产上看，我们也不能满足于稳定在一个水平上，而要继续前进，不断增产，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可见，骄傲自满是建设大寨县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有了这种思想而不及时克服，势必在尖锐复杂的两条道路斗争中，不能带领群众打进攻战，主动战，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阵地，相反却会把它让给资本主义去占领。难道这本身不就是一个路线问题吗！

许多先进单位的实践证明，用大寨精神学大寨，不断扫除盲目自满这个阻挡我们前进的思想障碍，永远把成绩当作继续革命的新起点，任何时候都不忘阶级斗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能够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我们县水源公社的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公社原来是个十年九涝的盐碱洼，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艰苦奋斗，逐步改造成高产稳产的鱼米乡。可是，他们以大寨为榜样，不满足已有的成绩，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特点，放手发动群众，主动揭露矛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特别是着重批判少数人打着集体旗号搞的资本主义活动，不断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结果，一九七〇年跨“长江”，一九七二年超千斤，近年来又有新发展。水源的经验又一次说明，“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群众有学大寨、赶昔阳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对我们县五年停步不前是不满意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县委领导上必须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才能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



性充分调动起来，在学大寨的道路上迈开大步，不断前进。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千头万绪的农村工作中，抓住了这个纲，其它各个矛盾就迎刃而解，就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农业迅速发展。几年来，我们紧密结合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注意分析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势，及时抓住各个时期的主要倾向，运用典型事例，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努力做到资本主义倾向一露头就进行批判，歪风邪气一出现就坚决抵制，阶级敌人一捣乱就狠狠打击，使全县学大寨运动深入地向前发展。原来比较先进的社队，迈开了新的步伐；后进的社队，迅速赶了上来。同水源公社紧邻的沟沿公社，论自然条件比水源还要好些，但由于公社党委一度滋长了骄傲情绪，认为“水源有啥我有啥，我比水源不差啥”，抓两条道路斗争不那么认真了，“重副轻农”、“重钱轻粮”的错误倾向抬了头，战天斗地的劲头也不那么足了。结果，水源过“长江”，他们还围着“黄河”转。后来，他们六去水源学经验，看到自己同水源有一条最重要的差距，就是没有象水源那样抓住根本学大寨。经过反复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干一年过了“长江”，一九七三年又超千斤。

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建设大寨县的道路上，是不断前进还是停顿不前，关键在于县委能不能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能不能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能不能不断端正本身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县委只有善于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来分析和对待县委“一班人”自身的革命化问题，才能永不自满，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蓬勃的革命朝气，成为带领群众建设大寨县的战斗指挥部。

在学大寨的道路上，要不断迈出新的步伐，还要冲破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惯的束缚，树立起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断改变生产条件。有的同志往往缺乏这种大干快上的革命精神。我们县粮食亩产达到七百斤以后，有些人又算开了细帐：西部水田过了“长江”，再增长油水不大了；东部山区条件差，一时难以改变面貌。归结起来就是：大干到头，增产到顶。显然，这是十分错误的。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所谓大干到头，增产到顶，这是小生产者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思想的反映，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形而上学观点。我们县东部山区的吕王公社是全县自然条件最差的，人们



说：“一进吕王沟，步步踩石头，土地山上挂，春种秋不收”。可是，广大贫下中农决心象大寨那样大干苦干，尽快改变山区面貌。他们冒严寒，踏冰雪，登上海拔一千多米的辽南第二高峰老轿顶山，背腐殖土垫地，造平原，修梯田，大搞山区建设，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群众的实践说明，学大寨的道路无止境，生产条件的改变也是无止境的。全县“更上一层楼”，大有潜力，大有希望，大有可为。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很大的干劲。只要县委“一班人”树立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和宽广胸怀，就能站得高，看得远，制订全县的统一规划，带领群众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几年，县委领导同志三次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调查了各公社学大寨运动的情况，根据群众的经验和要求，针对中、东、西部的不同特点，制订了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综合治理规划。西部水田地区以修条田为主，中部旱田地区以修园田为主，东部山区以修梯田为主，带动整个农田基本建设。全县迅速出现社社有工程，队队搞建设的新局面。中部地区六个公社，缺水易旱，为了尽快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一九七一年，我们计划在大清河上修建一座蓄水三千一百万立方米的水库，并劈开一道岭，凿透两座山，跨越两条河，把水引到中部来。当时，由于县委一些同志满足于过去的小打小闹，怕这怕那，束手束脚，拖了两年。一九七三年，县委通过整风，大批唯心史观，大破保守思想，统一认识后，原定两年搞完的工程，一年多一点就完成了。其它农田基本建设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全县高产稳产田已达到六十二万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平均每人一点二亩，比一九七〇年增加一倍。

农业学大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不但要排除错误思想、错误路线的干扰，还要随时准备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对自然灾害不存有任何侥幸心理，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才能战而胜之，使农业生产尽可能减少损失。如果骄傲自满，掉以轻心，一旦严重自然灾害袭来，就会造成很大的被动。自然灾害也是对我们学大寨决心和成果的考验和检查。只要大寨精神深入人心，在灾害到来时，就能够顶得住，冲得上，战得胜。

今年二月四日，我们这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七月末，暴雨成灾；紧接着，在庄稼灌浆的时候，又出现了罕见的秋旱。短短七个月，三次严重自然灾害连续袭来。特别是地震以后，给农业生产带来了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大批农田水利工程被震毁，大片平展展的条田被喷沙覆盖。面对这样严重的灾情，怎么办？当时，少数人有些灰心丧气，认为学大寨迈不开大步了；还有少数人想走歪



门邪道，说什么只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是被天灾吓倒，还是树立人定胜天思想，是靠社会主义抗灾，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寻“出路”，这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严重斗争。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们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大寨三战狼窝掌，三年抗旱灾的革命精神，广泛开展新旧社会对比，教育干部和群众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依靠集体力量能够战胜灾害。广大干部和群众信心倍增，干劲十足。他们说：人还在，地还在，房子倒了重新盖，受灾更要学大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各社队迅速动员起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继续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西部地区修复震坏的农田水利工程，按常规速度最快也要半年时间，有人担心，搞不好今春连地都种不上。可是，各社队男女老少齐动员，开展大协作，大会战，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保证了水稻插秧按时进行。地处震中的官屯公社，灾情最重，斗志更坚。在余震不止的情况下，一春修梯田五千亩，超过往年同期的几倍。全县人民就是这样，又接连战胜了洪水和干旱。今年是我们县解放以来灾害最多最重的一年，也是农田基本建设搞得最多最快的一年，同时也将是收成最好的一年。实践证明，只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坚持正确路线，用大寨精神抗灾，在抗灾斗争中深入学大寨，我们就能够战胜自然灾害，在建设大寨县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毛主席教导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自然灾害是坏事，它给我们造成一定的损失和困难。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把它变成好事。问题在于加强党的领导，紧紧依靠群众。通过抗灾斗争，可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很好的锻炼和深刻的教育，更加振奋起革命精神，进一步看到大寨道路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必由之路。通过抗灾斗争，还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以便今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加快步伐。比如，我们发现这几年由于搞了一些农田基本建设，增强了抗灾能力，对于今年抗灾夺丰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农田基本建设的标准还不够高，有些工程还没有及时抓紧配套，不能适应可能发生的更大灾害的要求。要在各种灾害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往最坏处着想，作好几手准备，高标准，严要求。我们决心在当前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抓紧时机，乘胜前进，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争取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谭 枫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随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为了争取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工人阶级在加油，贫下中农在鼓劲，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工作。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我们这个有几亿农业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用机器操作代替手工操作的光辉前景，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信心百倍地带领群众前进，在普及大寨县的斗争中，使农业机械化的步子迈得更大些，发展得更快些。

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毛主席就及时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一件大事。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如果象刘少奇所主张的那样，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实际上是不要合作化，其结果必然资本主义化。正是由于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批判和抵制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几亿农民才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为了引导农民群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还必须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条件。人民公社加机械化，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必由之路，而且是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它能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有利于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对于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些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的县、社、队，农业机械化的作用正在生动地表现出来。看看这些地方的新面貌，可以受到深刻的教育，开阔眼界，鼓舞信心，增添力量。由于机器操作代替了手工操作，成倍成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抗御



自然灾害的力量大大增强，农业生产向着深度和广度进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社会主义阵地更加巩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得到更好的发挥。农业的发展，又为工业、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积累资金，提供粮食、原料和劳动力，扩大工业的国内市场，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样，就可以更好地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大量的事实，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优越性，因而更加自觉地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摆脱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和影响，更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在全国各地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那将会出现一个何等崭新的面貌啊！

争取在几年之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一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但是，不论什么地方，什么单位，最主要的是，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做好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工作。“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过去实现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生命线，也是我们今天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生命线。历史的经验证明，要不要搞农业机械化，如何搞农业机械化，靠国家包办，还是主要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农业机械如何管理、使用，是否真正为农业生产服务，在这些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今后这种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农业合作化以后，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这十年，我们农业机械化的工作抓得不好，主要原因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对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用革命化统帅机械化，机械化有了方向，有了灵魂，步子就大大加快了。近四年来，为农业提供的排灌机械、化肥、拖拉机，超过了过去十五年的总和。一九七四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排灌机械的产量增长十一倍，拖拉机增长五倍，化肥增长一倍半。正如广大群众所说的，路线一偏，停步不前，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实践告诉我们，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步调，是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根本保证。今后，在实现农业机械化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反对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

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干、闯、造，还是依赖国家，等、靠、要？在农业机械化问题上的这两种方针，反映了两条不同的路线。毛主席历来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办农业机械化，尤其需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努力发展为农业和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地



方工业。这样，才能坚持农机制造以地方为主的方针，做到因地制宜，多快好省。我国地域辽阔，有山区，有平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土质、气候不同，种植的作物和耕作制度也不一样，需要的农机具数量既多，又有不同的特点和重点，单靠少数大型企业，靠一条腿走路，那就不能及时地满足各地多方面的需要，机械化的步伐就迈不大。各地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地办一些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等地方工业，搞农业机械化就有了主动权。在这方面，广西的同志深有体会。一九七〇年以前，由于领导思想没有跳出等、靠、要的圈子，机械化的步子走得很慢。一九七〇年以后，他们解放了思想，把等、靠、要换成干、闯、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从钢铁、煤、电搞起，大大提高了农机生产能力。同一九七〇年相比，今年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可增长六倍多，丰收—37型拖拉机、内燃机可增长三倍多，化肥可增长一倍半以上。农用两吨半载重汽车从无到有，今年可产八百辆。为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配套的犁、耙、拖车、防滑轮等农机具的生产能力也不断增长，基本上能解决现有拖拉机的配套问题。这就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广西原来的工业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一九六五年以前，这里的钢铁工业还是空白，煤、电的生产水平也很低。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把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加快了。还有一个湖南，过去化肥生产的底子也很薄，近几年来，自制八、九十套小化肥设备，化肥的生产能力就显著上升了。许多这样的事例都生动地说明，在农业机械化问题上，同做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物质条件是重要的，是需要解决的，但它又是靠人去掌握去创造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机器可以造出机器，机器少可以逐步变多，技术水平低的可以向高的发展。对于条件差、基础弱的地方，在物资、技术方面，国家是要给予支援和帮助的。但是不能单纯依赖它。认为工业基础薄弱就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为什么许多工业基础不那么厚实、生产条件不那么好的地方，农业机械化步子却快一些，而一些工业基础并不差，资源、技术条件也不坏的地方，反而慢一些呢？这就说明，主要问题不在工业基础的强弱，而在于领导干部路线觉悟的高低，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树得牢不牢，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决心大不大。有了抓农业的决心，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支援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就一定能够加快。工业基础厚实的，能够更好地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为农业提供更多的机械和其他产品，尽快把本地机械化的事情办好，并对全国各地作出更多的支援。工业基础较差的地方，也可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先从当地急需的搞起，搞不了大的先搞小的，



搞不了机械化的先搞半机械化的，造不了机器先造配件、搞维修。从小到大，从易到难，从简到繁，逐步发展，这样坚持下去，也不要很长时间，就可以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相反，如果坐等条件，依赖支援，那就不晓得要等到何年何月。

经验告诉我们，坚持以地方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并不需要新建很多的工厂，最主要的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工矿企业，走革新、改造、挖潜的路子。江苏常州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现有企业全面规划，组织协作，打破行业界限，进行技术改造，合理分工，定点生产，较快地达到年产手扶拖拉机一万五千台、小柴油机三万八千台的生产能力，投资只相当于新建同等规模工厂的百分之三十七，而且产品成本低、质量好。山东烟台地区也是由于采取了“一厂一件、百厂成线”的办法，发挥了全区一百多个企业单位的积极性，做到能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就一个省、一个地区来说，总是有一点工矿企业的，小工厂、手工业社到处都有。抓紧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把工业支援农业的积极性组织起来，老厂带新厂、大厂带小厂，分工又协作，就能够迅速形成较大的生产能力，在少建或不建新厂的情况下，为农业提供数量多质量好的机器、配件和其他产品。

要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还必须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的力量，充分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不是相信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能够自力更生办农业机械化，这也是一个路线问题。认为农民落后，搞所谓国家出钱，农民种田，那是刘少奇主张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践已经证明，那样做，不仅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机械化，而且会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由于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也就调动了农民群众办机械化的积极性。广大农民群众长期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最了解农村情况，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有力量、有智慧把机械化的事情办好。农业机械化，先化什么，后化什么，什么样的机器最适合当地的需要，农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实行科研、生产、使用单位三结合，注意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才能使农机具的生产，因地制宜，数量多，质量好，品种全，成本低。农机具的购买、管理和使用，更要依靠农民群众。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展壮大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才能坚持农机购买以集体经济为主的方针，做到买得起，管得好，用得好。

积极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建立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是依靠农民群众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一个重要措施。发展社队企业可以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增加人民公社的公共积累，提高公有化的程度，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



大差别创造条件。这同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根本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搞农业机械化，首先要解决方向道路问题。从物质上说，无非是一要机器，二要资金，三要技术。机器要适用，有了机器买得起，机器坏了能修理。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积极开展多种经营，从当地的资源条件出发，根据需求和可能，在不和大工业争原料、不破坏国家资源、不和农业争劳力的原则下，积极发展种植、养殖、加工和采矿等社队企业。社队有了自己的企业，有了自己的修造厂，就能为机械化积累资金，培养亦工亦农的技术力量，就地解决修配问题，有条件的还可以自己制造一些中小农机具，这就能够加快机械化的步伐，不断提高机械化水平。上海郊区是农业机械化水平比较高的。灌溉已经机电化，机耕面积达百分之八十八，按耕地面积每亩施化肥达二百六十斤左右，植保、脱粒、农副产品加工都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购买农业机械的资金，基本上都是公社、大队自己的积累。上海县华漕公社，过去向国家和兄弟公社借款买机器，到一九七〇年底欠债四十六万元。有了社办工业以后，三年时间不仅全部还清欠款，还添置了十六台中型拖拉机、四辆卡车、三条拖轮，并兴办了一些其他的集体生产事业。群众称赞社队企业是农业机械化的金翅膀。

随着农业机械的不断增多，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建立一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又红又专、亦工亦农的农机技术队伍，越来越迫切。遵化县机械化的工作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称赞，最突出之点就是用革命化统帅机械化，不断发扬“穷棒子”精神，使机器越来越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坚持用“穷棒子”精神教育农机技术人员，帮助他们树立为贫下中农掌握技术的思想。为什么有的地方农机不务农，拖拉机增多了，机耕的面积却增加不多，甚至有所减少？这主要是由于那里领导班子思想政治路线不端正，阶级斗争抓得不紧，对资本主义倾向批得不力，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机技术队伍没有建立起来。在实现农业机械化过程中，也必须坚持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挑选那些思想好、肯学习的青年社员，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作为农机技术骨干，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努力钻研技术，提高技术水平。这是做到农机务农，充分发挥农机效力的重要保证。

毛主席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在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涨。寄希望于人民群众。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力量源泉。在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希望就在这里，把握就在这里。



穷要长志 富要防修

吉林榆树县小乡生产队党支部

小乡这地方过去是个穷山沟。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带领群众苦战奋斗十几年，把穷小乡变成一个比较富裕的新小乡。回顾小乡的发展变化，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斗争中，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和社员，不断克服小生产的传统影响，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做到穷要长志，富要防修。

我们这里原来是公社的饲养场。饲养场撤走后，留下十六户人家，于一九六二年末建立了生产队。那时，四头老牛，两头瞎，两头老掉牙。还有两头小毛驴，一辆破花轮车。这就是全部家当。能下地干活的只有十九个人，八个老头，八个妇女，三个小青年。一百五十五亩瘠薄地，大大小小五十五块，粮食亩产只有一百三十来斤。社员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是全县有名的穷队。

在困难面前，怎么办？贫下中农要干，有的人却主张散，说什么：“树挪死，人挪活，挪出三五里就是好地方，何必在这里挨累受穷！”是干，还是散？斗争很激烈。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介绍一个合作社》）穷要有个志气，不能气馁。散，实质是看不到集体的力量，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缺乏信心，反映了小生产者害怕困难、无所作为的心理状态，也是农民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的一种表现。共产党员、队长齐殿云同志下决心要和贫下中农一起干下去。她和八户坚决不走的贫下中农，挨门挨户去做那些思想动摇的人的工作，向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她说：“咱们这个地方条件确实差，但是，不能因为条件差就离开这个地方。旧社会咱穷人连巴掌那么大块地也没有，现在毛主席、共产党给了咱们地，咱们要长志气，把心用到社会主义上来。依靠集体的力量，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穷的山沟也能变样！散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是资本主



义道路，这条路不能走。”这些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大家还学习了王国藩合作社的“穷棒子”精神，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决心要在小乡干，定叫小乡变。

有了信心就有干劲。小乡的地被人说成是“兔子不拉屎”的地。为了多打粮食，社员们就起圈底、挖草炭、拣散粪，广开肥源。缺少畜力，又没有车，大家就人挑肩扛，把粪肥送到地里。种地时没有绳套，女社员就把纳鞋底用的麻和小孩摇车绳拿出来交到队里。齐殿云同志还带领七名妇女，顶着冷风，脚踩冰碴，挖沟治水。休息时，她给大家讲苦难家史。想起旧社会的苦，大家觉得干社会主义再苦再累心也甜。她们苦干了四十多天，块块地都挖了排水沟、顺水壕。建队后第一年就打了个翻身仗，粮食亩产达到四百多斤。大家在实践中看到了集体的力量，干得更心盛了。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社员们打心眼里高兴。大伙说：“咱们小乡要前进，就要学大寨。要坚持政治挂帅，改土治水一齐抓，让沟沟坡坡都长出好庄稼。”可是，有人却说：“这是傻干，现在粮食够吃，该往钱上使劲了。”当时的一个生产队长把大车赶出去，到外地倒腾椽子，低价买，高价卖，还说这是“一天一个秋”，可以使小乡富得快。穷小乡是要变成富小乡，我们也想变得快。但是，怎样由穷变富，这里有个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说搞农田基本建设是傻干的人，自以为心眼活，其实是让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迷住了心窍。我们抓住这件事及时地对大家进行了教育，使大家认识到，改变贫困面貌，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能走邪门歪道。大家说，要干社会主义，就得斗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邪路堵不死，大寨的道路就走不成。从那以后，比较重要的经济活动，我们都交给群众讨论，看是不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符合的就大干，不符合的就坚决抵制。

人穷志不短，手勤地不懒。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干社会主义，不几年就摘掉了穷队的帽子。粮食亩产从一九六六年起连续四年跨“黄河”，一九七〇年过“长江”，一九七一年以来年年超千斤，今年达到一千六百斤以上。平均



每户每年向国家交售的粮食，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是二千八百一十一斤，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上升到四千二百九十一斤。林、牧、副、渔也有很大发展。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生活也逐步提高。现在全队二十八户人家都住上了新砖瓦房，不仅丰衣足食，而且大多数人家有存款和余粮。

过去，我们有一种错误认识，以为穷的时候思想工作难做，要啥没啥，不好说话；集体经济发展了，社员生活富裕了，思想工作就好做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富裕了，也带来了新问题，更得抓紧思想工作。

集体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多了，有的人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多分一点。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生活水平应该逐步有所提高。这里的问题是对国家对集体抱什么态度，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是积极发展集体福利事业，还是只顾个人发家致富。有的人干着集体活，想着个人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为了自己增加收入，而对于给国家多作贡献，增加集体经济力量，发展集体福利事业，则很少考虑。这就是小生产者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一种反映。按照这种思想去做，势必忘了国家，富了个人，穷了集体，把集体经济搞成空架子，在社员之间也会扩大贫富差别，甚至出现新的两极分化。因此，我们特别注意引导干部和社员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积累与社员分配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集体福利部分和个人消费部分之间的关系。有一年，我们队获得了大丰收。如果沿用过去的分配比例，每个劳动日可以分三元四角，但我们只分了二元一角，比上一年只增加一角，公共积累却比上一年增长两倍半，交售给国家的粮食超过征购任务的三倍半。从一九七二年开始，经过群众讨论，把劳动日值稳定在一元五角。我们还注意发展集体福利事业，加强合作医疗，搞好普及教育，集体造房改善居住条件，使每个社员的生活都能稳步而合理地得到提高。这就使群众进一步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主义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爱国家、爱集体的思想得到发扬。

生活富裕了，在一些人当中，也滋长了贪图安逸、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过去有的人踩着冰碴挖排水沟，争先恐后，现在插秧时节下水田，却嫌凉叫苦，甚至提出“苦战奋斗到什么时候是个头？”生活比过去富裕了，似乎目的就达



到了。“砖瓦房，玻璃窗，电灯底下亮堂堂，座钟挂表响丁当”，这就满足了。这同土改以后出现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生产者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条件变了，标准高了，其实都是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和半截子革命思想的表现。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经常对干部和社员进行共产主义大目标的教育，使大家懂得，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不是自己吃饱穿好就行了，而是要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在地球上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尽管我们比过去富裕了，但和要实现的大目标比起来，距离还远着哩。我们不能当半截子革命派，要苦战奋斗一辈子，不能只干一阵子。

自己队富了，要不要关心兄弟队，帮助兄弟队，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小乡摘掉穷队的帽子，离不开党的领导，国家的帮助，兄弟队的支援。社员们都记得，一九六三年春我们建队不久，邻队曾经送给我们一个花轮车的车轱辘，虽然是旧的，和我们原有的一个车轱辘又不一样大，但在那种最困难的时候，它毕竟使我们那辆破花轮车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转动起来了。当时大家的心里多么激动啊！我们今天经济力量壮大了，不能忘了过去。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我们经常教育社员，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终究要向大队乃至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所以，只想个人发家致富固然不行，光顾自己小集体富裕也不行。自己队富了，有责任帮助兄弟队，要为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壮大公社、大队两级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新形势下遇到的这些新问题，总起来说还是不断对农民进行教育改造的问题，是进一步克服小生产的传统影响的问题。由穷变富以后，广大农民群众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更加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劲头更足。但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和传统心理，并不会随着经济情况的改变而自然消失。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不会因为生活更加富裕而得到克服。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



来。”(《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因此,穷的时候要反修防修,富了更要反修防变。富了以后一旦放松政治工作,就不能继续革命,甚至要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把教育干部和社员克服小生产的传统影响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多年来,我们坚持办政治夜校,组织全体社员学理论、学文化、开展革命文艺活动,用革命的思想和文化去占领农村阵地。我们发动群众,人人都做思想工作。支部抓党员,党员带群众,使思想工作越做越细致,越做越深入。每年我们都搞几次检查、总结,用回忆对比的方法,看一看我们的步子是不是都迈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苦战奋斗的精神是增了还是减了,对国家的贡献是多了还是少了?不断检查,不断提高,年年总结,年年前进。

教育社员克服小生产的传统影响,关键在党员和干部。社员身上表现出来的小生产者思想,固然有它的历史条件和深刻的阶级根源,但也和我们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过去,我们常常用“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锅里有了碗里也有”的道理教育社员,这为的是要社员爱护集体经济。但是,有的社员把“小河满”、“碗里有”看作是目的,一旦由穷变富以后,生活比较富裕了,觉得自己的“碗里”有了,“小河”也不干,目的已达到了,往集体使的劲就不那么大了。这说明我们过去对社员进行教育时没有完全摆脱小生产者思想的束缚,容易把满足个人利益作为发展集体经济的动力。那种认为生活富裕了思想工作就好做了,社员的经济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的想法,也就是这样来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深深感到,教育社员首先要教育党员和干部克服小生产的传统影响。因此,我们对党员和干部提出严格的要求,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求群众学习的内容,让他们先学一步,支部定期检查学习的情况。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党员和干部带头学习,带头联系实际,解剖自己,克服自己的小生产者思想,并在社员大会上作汇报。这样,也推动了社员群众的学习。

我们过去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差距还很大。我们决心响应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出的战斗号召,进一步总结经验,克服缺点,继续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和社员,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农业作出新贡献。



自力更生就可以大有作为

——山东烟台地区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调查报告

烟台地区有九百万人口，一千四百六十多万亩耕地，百分之七十为山丘梯田，是山东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这个地区坚持用大寨精神办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持续前进，农业机械化的水平有较大提高。到一九七四年底，全区每个生产大队平均拥有动力机械一百零二马力，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八倍多，比一九七〇年增长了两倍多。机耕面积由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十六，提高到百分之五十；机灌面积也由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五；脱粒、磨面、捕捞、饲料加工和运输等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粮食产量，一九七四年平均亩产达到六百七十多斤，林、牧、副、渔也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广大农村，社社有工厂，队队有农机，亦工亦农的队伍不断扩大，社会主义阵地更加巩固。这一切都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创造条件。

烟台地区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过程，充分显示了自力更生方针的威力。他们的实践说明，只要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搞端正了，不断提高对农业机械化重大意义的认识，依靠群众，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就可以大大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大办农业机械化，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从烟台地区的情况来看，农村实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后，新的生产关系有力地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寨精神深入人心，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



一批批先进的高产单位先后涌现。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就日益突出起来。比如：过去几年，县、社、队为了战胜旱灾，兴修了许多水库、塘坝、扬水站，打了不少机井，由于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效益；同时，随着复种面积的扩大，首先迫切需要耕作、脱粒等方面提高机械化的程度；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单靠锹挖镢刨、人挑肩抬显然是不行的。此外，粮食要高产，需要更多的化肥，养猪要大发展，饲料粉碎也要跟上；渔业向深水远洋进军扩大再生产，靠摇橹扬帆也远不能适应要求。面对着这种客观形势，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还是依赖国家，消极等待，就成为发展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烟台地区通过几年来的实践，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能不能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展农业机械化，对各级领导来说，实际上也是能否坚持继续革命的一个检验。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地区农业生产发展速度是很慢的。那时，领导农业生产，没有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只是忙于催耕催种，也没有努力发展机械化，不抓工业支援农业，而是靠锄、镰、锨、镢四大件，满足于“粮食产量每年能增点，除吃之外能剩点，对国家的贡献能有点”。结果，从合作化到一九六五年，十年间，全区农用动力机械平均每个大队只有十点九马力，每年只增加一个马力；粮食亩产到一九六五年只有三百六十八斤，平均每年增加九斤，农村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各级领导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农业生产所以发展缓慢，机械化的步子迈不开，主要是没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影响下，各级领导冲不破小生产者狭隘眼界的束缚，因此，在对待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上，因循守旧，右倾保守，依赖国家，消极等待，甚至错误地认为“早化晚化，关系不大”。自然条件较好的黄县，粮食亩产很早就上了《纲要》，但是由于县委领导上对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认识不清，认为全县水井遍布，“有三万六千轱辘把，老天再旱也不怕”，放松农业方面的技术革命，不去积极抓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徘徊状态，集体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直接影响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影响了工农之间的关系。黄县的教训给大家启发很大。这几年，烟台地区领导组织各级干部



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教导和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指示，批判各种错误思想，认识到：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农村中的一次伟大革命。不搞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不能占领农村阵地；不搞农业机械化，社会主义还是不能牢固地占领农村阵地。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紧接着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用社会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的路线问题。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才能坚持自力更生，加快它的发展步伐。

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不能不遇到许多困难，遇到各种思想障碍。烟台地区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也就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他们体会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断破除懦夫懒汉世界观。举办小钢铁工业的前后，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烟台地区小钢铁工业是一九六七年开始筹办的。当时地区领导为了适应农业机械化逐步发展的需要，决定要利用本地区资源，办起小钢铁工业。这个问题提出后，有人强调困难，认为“地方的财力有限，办不起”，主张自己不办，上级给多少钢铁就办多少事。也有人说，办小钢铁工业是“头脑发热了”。究竟要不要办？能不能办？关键还在于对农业机械化是不是那么热心，对物质条件的困难持什么态度。地区领导分析，有的同志口头上讲机械化，实际上在那里“等、靠、要”；有的同志只讲物质条件，关起门来算死帐，却看不到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因此，便引导大家总结历史的经验。一九五六年大跃进时期，烟台地区曾经依靠自己的力量办起了小钢铁工业。但是，后来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被全部砍掉。尽管本地区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十几年来却一直依赖国家，自己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这就说明，不是“办不起”，不是“没条件”，而是没有决心自己动手。许多同志认为，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广大群众办小钢铁的积极性很高，单就物质条件来讲，也比一九五八年好多了，那个时候能办到，为什么现在不能办到呢？通过总结讨论，信心有了，劲头足了，小钢铁工业也就办起来了。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初步建成了一个从采矿、选矿、烧结到炼铁、炼钢、轧材的小型钢铁联合企业。几年来，这个“小钢联”生产了十三万三千多吨生铁，三万一千多吨钢，二万四千多吨钢材。这样，全地区制造和



修配农业机械所需要的钢铁就有百分之六十可以做到自给。在办小钢铁工业的同时，他们还相继办起了铜、铅、锌等小型矿山三十六处，三年来共生产铜、铅、锌等有色金属四百七十多吨，基本上满足了自己制造农机具的需要。

群众发动起来了，各方面办农业机械化的劲头很足，但是怎样才能把地、县、社各级和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迅速把农机制造能力搞上去，这是烟台地区自力更生办农业机械化碰到的一个问题。开始有的同志主张重大的项目都由地区来搞，各县、社则强调自行安排，事实证明这些做法都不能达到多快好省的要求。几年来他们从实践中逐步摸索到一条路子，这就是在地区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把全地区一百三十多个工厂企业组织起来，采取“一厂一件，百厂成线”的办法，分工协作，定点生产，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农机会战。协作创造一种生产力。这样做，有利于调动地、县、社各级的积极性，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组织起来，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多快好省地生产农业机械。现在这个地区自己制造的二十马力的拖拉机，就是由二十二个小厂协作生产的；柴油机是由三十一个单位协作生产的；配套机具是由二十一个单位协作生产的。全地区柴油机年产能力达到三十四万马力，中小型拖拉机年产能力达到五千台。近四年来，自己制造的农机具已占到新增加部分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对这一总方针，各级领导是否能够全面深刻地理解和贯彻执行，对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关系很大。过去，烟台地区各级领导在认识与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存在着“单打一”的形而上学观点，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分割起来，互相孤立起来。有的同志片面地认为，烟台地区是农业区，只要抓好农业就行了。因而，就农业抓农业，不重视发展地方中小型工业，不认真去抓工业支援农业。结果，虽然主观上也想把农业发展的速度加快一点，步子却迈得很慢。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虽然也办了一些项目，但是，由于没有牢固地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没有坚持地方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工业本身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最近几年，他们通过实践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工业和农业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必须切实地把农业放在首位，对干部和群众反复地进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教育。事实证明，尽管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并非是都已经牢固地树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以县、社工业来说，这几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也出现过认为搞支农产品利润少，麻烦多，不愿当配角的思想；有的则盲目发展，生产的产品和农村的需要对不上号。对这种情况，他们主要是帮助大家提高工业支援农业的认识，坚定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并及时表扬先进的典型。即墨县第一农具厂，几年来做到农业出题目，他们做文章，生产了大量为当地群众所欢迎的农具和农用机械，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他们的经验推广以后，对办好县、社工业起到很好的作用。工业积极支援农业，工业本身也得到发展。目前，全地区范围内，已初步建立起以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等为主体的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公社工业企业已发展到四百六十多处，每个公社修配厂的设备平均达到二十多台，百分之九十的大队建立了修配组。

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各级干部在领导农业生产方面，也比较自觉地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以主要精力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增加公共积累，提高购置农业机械的能力。现在，这个地区公社、大队两级的收入已占三级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从一九七〇年以来，全区购置农业机械资金的百分之八十五是社、队自筹的。

最近，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烟台地区各级领导通过学习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提高了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自觉性。他们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中，进一步认识到，大办农业机械化，不仅能够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对于充分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他们重新修订了规划，决心进一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把农业机械化的事业办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调查组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

反对投降主义的重要文献

——学习《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田志松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全党全国人民正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以《水浒》为反面教材，广泛开展评论活动，批判宋江搞修正主义，搞投降，“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深入批判投降主义，吸取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斗争，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这篇重要著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主席这篇著作发表的时候，抗日战争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由于实行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在正面战场上屡遭溃败，短短几个月内就失地千里，大片国土沦丧，上海、太原相继陷入敌手。“**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打拉并举，一面继续向南京和长江流域纵深进攻，一面大放和平空气，进行诱降。本来就消极抗战的国民党此时更加动摇。但他们懂得，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战态度，是他们实现投降的主要障碍。为此，他们在“共产党投降”和“停止阶级斗争”的喧嚣声中加紧反共活动。与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相呼应，在我们党内，曾经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的王明，现在转而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极力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国民党实行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以适应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政治需要。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



和全国人民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强调“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

反对阶级投降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保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以后，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时，也就是说：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革命路线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原则分歧。国民党反动派鼓吹什么“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在全国以当然领导者自居，极力反对和排斥共产党的领导。而在资产阶级中，“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是否能坚持自己的正确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不仅决定着抗日战争的胜败，而且关系到党的存亡。毛主席明确提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既统一，又独立”的正确方针，以确保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并发展革命阵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叛徒王明却大肆吹捧国民党和蒋介石，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革命领导权拱手送给国民党和蒋介石，而让共产党作其附庸。这是十足的阶级投降主义。“它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不克服这个倾向，就不能进行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保卫祖国。”

阶级投降主义必然导致民族投降主义。毛主席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实行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这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带有很大的买办性，直接依附于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所豢养并为帝国主义服务。对他们来说，没有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只有一个害怕和反对无产阶级、人民大众起来革命的问题。因此，尽管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打击了英美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以及依附于这些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蒋介石



集团被迫参加抗日，但他们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胜于害怕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超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条件，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王明否认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向资产阶级投降，就必然以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策为转移，滑到民族投降主义的泥坑里去。为了坚决有力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首先必须反对和克服共产党内部的阶级投降主义。鉴于历史上投降主义断送了革命这一血的教训，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谆谆告诫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是坚持革命、反对投降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当时所以采取了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政策，是由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所决定的。正如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所指出的：“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总是采用种种方式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取消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使之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国民党反动派从未停止所谓“溶共、限共、防共、制共”的活动。他们炮制了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并用升官发财酒色逸乐引诱共产党的干部。足见在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只有坚决克服党内当时存在着的“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挫败投降阴谋，保持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历史经验证明，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王明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果按照他那一套去办，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就会更加嚣张，反共活动就会更加猖狂，共产党就要被瓦解，抗日战争就要失败。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广大群众，教育他们识别投降主义、反对投降派，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我们反对投降主义的一条重要经验。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指出克服投降主义的办法是：“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



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这篇著作中,毛主席再次强调,要使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这就告诉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武装全党全国人民,揭露投降主义的实质,认清投降主义的危害,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广大群众首先是共产党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就能够分清什么是革命派,什么是投降派,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自觉地抵制和克服投降主义。“投降主义者没有了群众的基础,即无所施其伎俩”,就会彻底孤立起来,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就不能得逞。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以及其它一系列坚持革命、反对投降主义的光辉著作,极大地教育和武装了全党全国人民,指导全党全国人民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

经过严酷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是更加成熟和巩固了。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虽然一度使某些地区的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并造成了“皖南事变”的惨重损失,但是总的说来,它的危害只是局部性的,而且迅速被发现、被纠正。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批判和清算了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使党更加牢固地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活动和分裂阴谋,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主席后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对这次斗争进行了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说明,要革命就要反对投降主义,就要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不反对投降主义,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宝贵的历史经验。



党内出现投降主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毛主席在分析陈独秀尾巴主义即投降主义的时候深刻地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资产阶级在同无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从不忘记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并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在无产阶级队伍内部培植代理人。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抵制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经受不起反动派的欺骗利诱，就会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堕落成为可耻的叛徒。我们党的历史充分证明，只要阶级斗争存在，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存在，就可能出投降主义。民主革命时期，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阶级投降主义者。王明先“左”后右，搞阶级投降，最后叛国投敌，成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鹰犬。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我们党先后经历了四次大的路线斗争。四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必然要搞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头子都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国内，他们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搞阶级投降主义；在国际上，他们寻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作靠山，搞民族投降主义。这种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要搞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同阶级投降派、民族投降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已经成为一个执政的党、领导一切的党。党的地位变了，但是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仍然要警惕放弃革命领导权和丧失革命原则性的现象发生。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贯串在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比如，对于修正主义思想，对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倾向，是听之任之，任其泛滥，还是坚决批判，坚决斗争，用社会主义去占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侵蚀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是泰然处之，不问不管，还是坚决抵制，认真纠正？对于外国的东西是批判吸收，正确借鉴，还是盲目崇拜，无条件地照搬照套？等等。这都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坚持原则。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积极地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余 凡

五四运动以后，用唯心论写“考证”《水浒》的文章，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胡适是最早也是最卖力的一个。一九二〇年七月，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作为他“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的第一篇出笼了。接着，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九年，他又先后炮制了《〈水浒传〉后考》、《〈水浒续集两种〉序》和《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真可谓连篇累牍。在这些考证中，贯穿着一条实用主义考证方法和历史唯心论的黑线，散布了许多对于《水浒》研究的反动观点，影响恶劣，贻害至今。当前，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很有必要把胡适炮制的这些毒草拿来再进行再批判，连同《水浒》一起，发挥它的反面教材的作用。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宣称，他搞《水浒》考证，是为了“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这是他搞《水浒》考证的目的和总的指导思想。那么，胡适所谓的“新方向”、“新道路”究竟是什么呢？用他自己的“简单一句话”来说，就叫做“历史的考据”，即用烦琐考证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多次说明这就是他搞考证的“基本方法”。其根本特点就是胡适经常宣扬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是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唯心论的货色。胡适考证《水浒》所引伸出的种种谬论，就是从这块实用主义唯心论的土壤中滋生出来的一棵棵毒芽。

且看胡适的考证吧！

首先关于《水浒》的版本，胡适东拉西扯，“考”出了金圣叹确有一个什么七十回的“古本”。别人不信，胡适就竭力诡辩，理由是：金圣叹“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大家知道，所谓“古本”云云，不过是封建文人金圣叹故意编造的谎言。他从疯狂仇视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出发，把一部《水浒》从“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以



后拦腰砍断，并伪造了卢俊义的一个“噩梦”，请出“天神”嵇叔夜来，把起义军头领全部杀死，然后假托“古本”，欺世惑众。鲁迅揭穿了这个骗局，把经过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加“楔子”实为七十一回）比为“断尾巴蜻蜓”。然而胡适对这个所谓“古本”却大加吹捧，说它是“重兴‘水浒’，再造梁山”，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经他这一吹，结果是这只“断尾巴蜻蜓”满天飞，而且从此不断有人为它叫好，甚至说什么金圣叹腰斩《水浒》动机很坏，“收到的效果却极好”。真是荒谬得很。

人们要问，胡适为什么如此推崇被金圣叹砍掉后半部的“断尾巴蜻蜓”？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他们共同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作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走狗胡适和封建文人金圣叹一样，对农民革命都怀着刻骨的仇恨，恨不得把他们斩尽杀绝，叫嚷“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并和金圣叹同样做着“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的迷梦。他不满意的只是金圣叹的评论，特别是对金圣叹贬低宋江、骂宋江假仁假义很不满。的确，金圣叹骂宋江是出于主张武装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因而误会了原意。无怪乎胡适要埋怨金圣叹“迂腐”，没有看出宋江是他们自己一家人，是从内部策动招安、瓦解农民起义军的头领。所以他极力为宋江剖白，说“《水浒传》写宋江，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并称颂宋江是“‘仁义’的英雄”。由于对《水浒》的基本看法一致，虽然胡适同金圣叹有这么一点分歧，但胡适还是极口称赞金圣叹的“文学眼光”以及他腰斩过的七十回本《水浒》，使金本《水浒》广泛流传，起了很坏的影响。

其次，胡适在他的《水浒》考证中，又考证出《水浒》的基本思想，是一部“反抗政府的书”，说它“处处‘褒’强盗，处处‘贬’官府”。这种观点不仅荒谬，而且是别有用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当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已经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时候，胡适如果明说《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怎么能适应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去发挥它腐蚀和毒害人民的作用呢？所以胡适要竭力掩盖它的投降主义本质，为它贴上“反抗”的标签，就如同金圣叹假托“古本”一样，以掩人耳目，欺世惑众。象《水浒》那样的“反抗政府”，必然搞投降主义，出卖人民利益，同反动的官僚、政客同流合污。在以后的《水浒》评论中，确实有些人受了骗，说什么《水浒》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政府、官吏、豪绅”等压



迫贫民的恶势力的“强烈的反抗”，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不朽史诗”。现在是彻底拆穿胡适的骗局、肃清其流毒的时候了。

胡适所谓“反抗政府”，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买办文人压根儿就不承认近代中国有封建制度，胡诌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我们走那条路》）他又是“好政府主义”的鼓吹者，认为丝毫不用触动反动制度，只要在政府里换上几个所谓“好人”，就可以解决问题。实际上他维护的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胡适是留过洋的，他知道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尽可以走马灯式的更换，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却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更换政府正是维持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联系胡适一贯的反动政治主张，我们就不难明白他所谓的“反抗政府”，并不是指反对封建制度，也不是反对反动统治阶级，而只是反对其中的一些个别人物，即所谓“奸臣”、“恶官吏”。胡适的立场跟《水浒》作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他所谓《水浒》是“反抗政府的书”云云，实质上，只不过是他美化投降派宋江的一种手法，掩盖《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一块遮羞布。

胡适还在他的《水浒》考证中，借口民族矛盾，考证出宋江投降有理。他在考证中为什么再三强调《水浒》寄托着“故国之思”、“种族之痛”，表现了“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宿怨”和“心理”？就是企图用民族矛盾来掩盖、抹杀阶级矛盾，把投降派宋江打扮成“民族英雄”，把《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说成是当时的人心所向，时代的强烈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有些《水浒》的评论为宋江搞投降辩护，其中一条理由就是认为宋江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为了“扫除边患，报效国家”，才归附宋王朝的；有人甚至说，在封建社会里，“爱国要通过忠君来实现”。从这些错误的论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胡适这个反动谬论的影响。对胡适的这种阶级投降主义的谬论，必须予以批判。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经常处于错综复杂的状态。有时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因民族矛盾上升，而**“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胡适妄图以民族矛盾即所谓“中原失陷”、“故国之思”等等，来抹杀北宋末年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尖锐的



阶级斗争，为宋江搞阶级投降找根据，这是徒劳的。毛主席明确指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民族斗争中，在反对外族的侵扰和掠夺的斗争中，从来就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水浒》故事发生的时代北宋末年为例，当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是抗战派的主力，是坚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而以赵家皇帝为头子的反动统治阶级则是主和派的大本营，是推行屈辱苟安的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水浒》写宋江把方圆几百里、兵强马壮的梁山革命根据地拱手交给了一贯对外屈辱苟安的宋徽宗，把农民革命武装改编成了赵宋王朝的“官军”，这就表明宋江已经彻底投入了投降派的营垒。请问，他还怎么可能又以什么手段去反抗外族侵入、“保卫民族利益”呢？宋徽宗甘当儿皇帝，宋江也只有跟随他的这位“至圣至明”的天子，去做汉奸的份了！这难道不是所谓“爱国”必须“忠君”、搞阶级投降主义的必然结果吗？然而，《水浒》通过“征辽”的几回书，不仅使宋江受招安、搞投降有了冠冕堂皇的解释，并使这个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摇身一变而为民族抗战的“英雄”。作者如此不择手段地篡改历史，为投降派宋江涂脂抹粉，胡适却硬说这是什么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异族统治下“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这恰恰表明他制造这种反动谬论，既是为投降派宋江辩护，也是为他自己当奴才做卖国贼辩护。

从吹捧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到歌颂投降派宋江，这就是胡适对《水浒》作的所谓“历史考据”“考证”出来的结果。他在《〈水浒传〉后考》一文中，还自鸣得意地吹嘘：“我这几篇小说考证里的结论也许都是错的，但我自信我这一点研究的态度是决不会错的。”这就是说，你不相信他考证的结论可以，但你得相信他搞的那套实用主义的“历史考据”方法。否则，他就要给你扣上没有“历史的眼光”、不懂“历史方法”的帽子。似乎唯独他是最尊重历史、最讲“历史主义”的了。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胡适根本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一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完全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反面。他在《水浒》考证中，用什么“发挥



一肚皮宿怨”、“想望英雄的心理”来解释《水浒》成书的历史原因，根本不作政治的、经济的分析。而他对《水浒》提出的种种谬论，都是从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引伸出来的。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胡适的所谓“历史考据”，不过是打着尊重历史的幌子，贩卖实用主义的唯心论罢了。他的这种所谓“历史方法”，完全是歪曲历史的方法，颠倒历史的方法！如果有人听信了胡适的欺骗，“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会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离开阶级分析，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胡适搞《水浒》考证，兜售实用主义的烦琐考证方法，正是要诱骗人们撇开对《水浒》的总倾向作阶级分析，而只抓住它的某个片断或某些字句大作文章。鲁迅说过：在文学评论中，“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惆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以往在《水浒》评论中产生的各种错误观点，都是由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结果。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和吸取这个经验教训。

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一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正在滚滚向前，为什么胡适却对《水浒》忽然发生了“思古之幽情”，大加考证，大肆吹捧呢？这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的反革命阶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胡适正是这伙反动势力在思想文化界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就从官僚父亲那里继承了程朱理学的遗风，长成又深受帝国主义文化的陶冶，是一个买办文人和洋奴。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的思想言行是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的。对内，他极力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外，他拚命鼓吹民族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胡适这个曾经混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投降派，有如一条丧家的乏走狗，只要是主子，不管是清朝皇帝、封建军阀，还是国民党反动派，他都卖身投靠，摇尾乞怜，为其奔走效劳。他以洋博士的身份拜见过前清废帝，口称“皇上”。他同北洋军阀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肮脏关系；而他写的《〈水浒传〉考证》，实际上是向北洋军阀写的一张表明心迹、出谋画策的投名状。后来，他又投



靠独夫民贼蒋介石，为国民党反动派“伸笔展纸”。可见，胡适宣扬《水浒》的投降主义，歌颂投降派宋江，完全是“惺惺惜惺惺”，奴才赞奴才！

胡适开始炮制《水浒》考证的年代，正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的时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着中国革命蓬勃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时刻，胡适这个“实验主义的信徒”，再也“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发愤要想谈政治”了。（《我的歧路》）为了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一面大声疾呼，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咬牙切齿地叫嚷“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面又以“学者”的身份，悠悠然摆出一副“青年导师”的架势，说什么“要把金针度与人”，（《醒世姻缘传考证》）要教人“学一点防身的本领”。（《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的这些歇斯底里的狂吠，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只不过充分暴露了他仇视无产阶级革命，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嘴脸。他的所谓《水浒》考证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一个黑标本。他的所谓“金针”，就是他以《水浒》等小说考证作例，搞出的那一套实用主义的考证方法。他的所谓“防身的本领”，就是他借这种“考证”所宣扬的那套革命有罪、投降有理的反革命理论。鲁迅对胡适玩弄的“考据”把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反动派“赏鉴”；（《华盖集·忽然想到（六）》）是要使“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一心跟着胡适这个“胡羊”导师走。鲁迅的这个分析是很正确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风暴中，谁受了胡适的骗，就会把自己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隔离开来。然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天一天地觉醒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早已粉碎了胡适的反革命迷梦。

铲除毒草，可以肥田。当前，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结合批判胡适的《水浒》考证，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彻底肃清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影响，而且有助于提高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唯物论的自觉性，反修防修，进一步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透过现象看本质

——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方 荆

翻阅《水浒》全书，人们可以看到，暂占水泊、标榜“替天行道”的宋江，同执掌朝政、鱼肉人民的高俅，时而恶语交加，时而握手言和，时而刀兵相见，时而叩头下拜。由于他们有时候争斗似乎很激烈，有的人便产生了一种错觉：高俅是坏的，宋江在同他斗争这一点上可能还不坏。应该怎样来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呢？宋江和高俅的斗争到底属于何种性质呢？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明确认识到，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不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而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派别的争夺。我们要从毛主席的这个分析出发，进一步弄清楚这两派的性质及其争夺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内部各个派别和集团之间的斗争，是不断出现的，它反映了这个阶级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利害冲突。随着封建社会主要矛盾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起义运动不断打击地主阶级政权，使地主阶级统治处于不稳固状态，它在没落时期特有的反动性、腐朽性日益显露出来，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和集团的斗争，也就会更加尖锐起来。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有着各种不同的状况和形式，其中经常发生的一种，就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为争夺权力和财富而进行的“狗打架”式的争夺。北宋末期，以宋江为代表的掌握王朝统治实权的一派，同以高俅为代表的掌握着朝廷实权的另一派的斗争，就属于这种情况。

宋江和高俅，都是强烈地追求升官发财的野心家、阴谋家。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只要能够满足向上爬的欲望，什么卑劣无耻的



勾当也干得出来，什么虚伪反动的思想武器都可以搬用。但是，宋江、高俅的社会地位和政治遭遇很不相同：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一个是朝廷“大贵人”，掌握着生杀大权，一个是“押司”小吏，凡事身不由己。当高俅早已“发迹”，跃居王朝显职，权势炙手可热，财宝滚滚进门，骄横跋扈，踌躇满志的时候，宋江无论在权势或财富方面都还不太显目，过着“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的日子。作为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势力的代表，宋江对此当然不会甘心，必然要想方设法向上爬，以遂其“凌云志”。而从高俅方面讲，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要排挤、打击不利于他们这一派发展的宋江一派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宋江高俅之间“饱狗饿狗”的争夺，就是不可避免的。宋江打进农民革命队伍，篡夺起义军领导权，接受招安，其目的是以此作为同高俅一派进行争夺的“资本”，力图在封建王朝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分得一杯羹。宋江和高俅的斗争，充分表现了没落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性和腐朽性。

由于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根本不是为了揭露和动摇宋王朝的黑暗统治，也没有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科学文化方面，提出一些进步性措施，而从思想上讲，又都是贯串着孔孟之道，因此，它和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不同。这种斗争既不是两条政治路线之争，也不是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顽固派之争。只能说，是孔老二两派信徒之间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奴才与奴才之间向主子争宠邀功的丑恶表演。但这种斗争的内容、形式和结局，正好说明了他们同属于反动地主阶级的这一实质。

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地分析一下宋江和高俅，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在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全力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疯狂镇压农民起义，甘心充当反动地主政权的奴才等方面，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效忠皇帝，竭力维护封建制度及其现存秩序，把自己的命运同反动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紧紧拴在一起，这是宋江与高俅本质上相同的基本点。高俅这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能迅速“发迹”，全靠宋徽宗赵佶的“抬举”。因之，他对皇帝谄媚巴结，愿效犬马之劳，是十分自然的。小说中写到了他鱼肉人民、凶横残暴，又处处可以看出他竭力维护封建制度及其现存秩序，是宋王朝所需要的鹰



犬。宋江在效忠皇帝、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比高俅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表现在：他提出所谓“替天行道”的政治纲领，要害恰恰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宋江看来，赵佶这个皇帝是非常好的，“今皇上至圣至明”，绝对反不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贪官、“谗佞”之臣，他们“欺君”、“乱国”，既侵犯了皇帝的最高利益，又阻挠宋江这类“全忠仗义”、“有仁有德”之士“同心报国，青史留名”，因而要反一反。如果把皇帝也反了，岂不是把自己的衣食父母和自己日夜追求“官爵升迁”、飞黄腾达的前途也一齐反掉了吗？所以，宋江一再表白自己对宋王朝“并无分毫异心”，“安敢叛逆圣朝”。他服药酒临死“忠心”不变，还将李逵毒死以防再次反叛朝廷。宋江这样矢志不移地忠于封建统治者，除了说明他甘心把自己的命运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紧紧拴在一起之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难怪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于这种奴才式的效忠行为，充分欣赏并加以肯定，称赞宋江“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在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的末尾，有一段叫做“徽宗帝梦游梁山泊”的描写，讲到宋江死后托梦伸冤，徽宗在得知真相后，大骂高俅、杨戩害死宋江是“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亲书圣旨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盖庙宇，建祠堂，大加表彰。这颇可以看出，虽然宋江、高俅都效忠皇帝，但在皇帝的心目中，还是对宋江这类奴才更喜欢一些。

宋江和高俅从维护封建反动统治出发，对农民革命都是极其仇恨的，竭力要扑灭这场熊熊烈火。高俅同蔡京、童贯等，凭着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本性，敏锐地感觉到，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是个“心腹之患”，不扑灭后果不堪设想。他们竭力主张并亲自出马武装围剿起义军的事实说明，高俅一伙是农民阶级的死敌，是地主阶级反动统治集团中的死硬派。而过着地主兼官吏优裕生活的宋江，对农民起义也是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的。后来不得已上了山，但这决不是意味着他叛变了自己的阶级，而是搞修正主义，蓄意利用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机会来瓦解起义军。果然，宋江施展种种阴谋诡计，篡夺了领导权，改变了起义军的正确路线，而代之以修正主义的投降路线。梁山农民起义的大好局面终于被断送了。高俅、童贯等率领十几万人马公开镇压所不能奏效的，宋江在短时间内做到了。在替反动政权打别的不“替天行道”的“强盗”的过程中，宋江又特别卖劲，仅在镇压方腊起义的一次战役中，就血腥屠杀了两万多人，为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请看，宋江的这种对农民起义由反对、叛卖到疯狂镇压的行径，同高俅相比，其罪恶程



度在哪一点上逊色？其反革命的性质、目的又有什么两样？说宋江是地主阶级反动派，丝毫也没有冤枉他。

宋江和高俅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这就是腐朽反动的儒家思想。他们都企图利用这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麻痹和消除人民的反抗意志，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高俅之类是靠孔孟之道和阴谋权术爬上高位的。为了保持自己的权位，欺骗人民，他们也始终以孔孟之道相标榜，不时抛出一些“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的鬼话。至于“自幼学儒”的宋江，小说中歌颂他贩卖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更比比皆是。什么“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啦，什么“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啦，什么“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啦，十足一副儒家伪善而丑恶的反动嘴脸！宋江用“忠义”瓦解了“聚义”，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是他誓以儒家思想为宋王朝效忠的自白书：小可宋江，一心只替圣君行孔孟之道，此外实无他意！可见，宋江和高俅都是地地道道的儒家之徒。

值得指出的是，《水浒》作者为了美化、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将农民革命引向地主阶级所希望的轨道，竭力掩盖宋江和高俅的共同阶级本质，掩盖宋江高俅的斗争同属地主阶级内部派别斗争的性质，掩盖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而把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描写为“忠良”与“奸臣”的斗争，他们最后都在皇帝的“仲裁”下得到了解决。这个用心是非常阴险恶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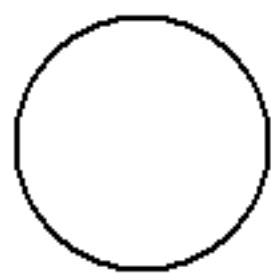
评论《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批判它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有助于我们识别修正主义者的面目，特别是识别宋江这类同另一个派别进行争夺的修正主义者的阶级面目。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宋江是不折不扣的反对农民革命的反动地主阶级分子。宋江同高俅都是扑灭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但是，一个明火执仗镇压农民起义，一个钻进革命队伍进行破坏，宋江比高俅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危险性。

长期以来，宋江的真面目，以及他同高俅的斗争性质，所以没有为许多人所认识，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因而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水浒》问题的重要指示，我们要进一步认清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实质，坚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各种问题，做到在复杂纷纭的事物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具有较高的识别能力。



农民起义有这样的“规律”吗？

杨 宽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就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要害所在。有些人为了《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辩护，认为不反皇帝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规律”。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有必要弄清楚。

不反皇帝是农民起义的“规律”吗？就以《水浒》中的梁山农民起义为例，在晁盖领导下，梁山农民军就曾经执行了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革命路线，表现了要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愿望。《水浒》的作者虽然竭力掩盖这一点，但仍然是否定不了的。晁盖原来的绰号叫“铁天王”（《宣和遗事》）。“铁”的意思是形容他顽强得如同铁铸成一般。《水浒》为了贬低晁盖的革命形象，把他的绰号改成“托塔天王”，掩盖了他称为“铁天王”的真相。但是，《水浒》毕竟还是透露了此中消息：“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什么叫“托胆称王”？就是敢于向封建皇帝挑战，自称为王。晁盖自称“铁天王”，就是要和方腊一样建立和宋王朝对抗的农民政权，把斗争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这反映了梁山起义队伍中革命派的坚强斗争意志。《水浒》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还使他“归天及早”，这种用心是很恶毒的。

宋江没有象晁盖那样“托胆称王”，而自称“呼群保义”或“呼保义”。这有两层用意：一层用意是要号召梁山起义农民服从他的封建家长制的统治，跟从他一起“全忠仗义”。宋江提倡“义气助家邦”，目的在于“忠心扶社稷”。另一层用意是表示自己死心塌地做皇帝的奴才。“保义郎”原是宋朝皇帝身边的低级武官的名号。宋朝武官有五十二阶，“保义郎”的官阶很低，只是第四十九阶。这种武官原来叫做“右班殿直”，是皇帝贴身的侍从。由于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皇帝宝座摇摇



欲坠，因此，宋徽宗特别鼓励臣下要对他“忠义”。公元一一一二年（政和二年），宋徽宗更改官名，把他的许多侍从武官，都挂上了“忠”和“义”的名目，什么“从义郎”、“秉义郎”、“忠训郎”、“忠翊郎”等等，而把“左班殿直”称为“成忠郎”，“右班殿直”称为“保义郎”，要这些侍从武官做到对他“成忠保义”。宋江用“保义郎”的名义“把寨为头”，无非是为了表示“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这实质上是把梁山起义队伍改变为保驾皇帝的“禁兵”。封建统治阶级对此是很赞许的。南宋末年，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就竭力称赞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还吹捧他“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宋江“不假称王”，就是不反皇帝。自称“保义郎”，以皇帝的低级侍从武官自居，就是为了“专等朝廷招安”。这在地主阶级看来，当然是“犹循轨辙”了。“循”的是什么“轨辙”呢？当然是宋朝皇帝的“轨辙”，也就是投降主义路线的“轨辙”。

在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在初起时，把矛头首先对准当地的官吏和豪绅，一时没有立刻提出推翻封建王朝的要求，反皇帝的旗帜不鲜明，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着的。它反映了起义农民在对待国家政权的问题上，有一个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但是，只要农民起义没有在短期内失败和变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最终必然要走向反对封建专制政权及其代表——皇帝的道路，并从而明确地提出反对皇帝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如果不反皇帝，就谈不上成为真正的农民革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纲领，只能适应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斗争的需要。农民军如果提出和实行了这个政治纲领，其结果必然是接受招安。例如东汉张婴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起义，坚持十多年，发展到几万人，杀了刺史。由于他不反皇帝，只反贪官，声称“不能自通王室”，只因“数为二千石（指刺史、太守）所枉”而参加起义。新上任的太守张纲就亲自前往招安，一面承认前任太守有罪而鼓吹“天子仁圣”，一面以爵禄为诱饵，再加上儒家忠孝之类的说教，结果张婴就向封建朝廷投降了。所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能是农民起义军内部投降派的政治纲领。

《水浒》中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必然接受招安。晁盖一死，宋江篡得领导权，采用两面派手法篡改晁盖的革命路线。宋江一面仍然推尊已经“归天”



的晁盖为“天王”，供着“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牌位；一面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抛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这时实际上的“天王”，已经不是晁盖而是宋徽宗，也就是宋江“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天王”。从此，宋江不但把宋朝皇帝称为“天王”，还把朝廷招安说成什么“重见天日之面”，见了朝廷命官就叩头下拜，诉说乞求招安的衷情，指望“上达天听”，以便“去朝京，与国家出力”。在一百〇八人结盟的盟誓中，宋江自称“上符天数，下合人心”，把“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作为“替天行道”的目标。这里，宋江搞了偷天换日的修正主义勾当，把反皇帝的革命路线篡改为“专等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接着宋江就一步步地谋求实现这条投降主义路线，终于接受招安，去打方腊，成为地主阶级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的帮凶。不反皇帝正是投降主义路线的要害，怎能象有些人所说的是农民起义的“规律”呢？

有人为了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说成是农民起义的“规律”，提出一个理由：说封建社会的农民没法理解压迫他们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封建社会制度，因此，他们只反对个别贪官而拥护“好皇帝”。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封建社会的农民揭竿而起，开始是自发的，当然还不能理解这种封建压迫是由于整个封建制度所造成的，也不能根据科学的阶级分析来制定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但是，他们长期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不断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不能不看到当时社会上贵贱不平、贫富不均的不合理现象，并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宋代农民起义就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尽管他们只用贵贱、贫富来表明社会关系，但是他们所反对的目标，已是所有的贵人和富人，实质上就是反对整个地主阶级，怎能说他们只是反对个别贪官呢？

有人为了证明不反皇帝是农民起义的“规律”，举出了有些农民起义军拥立前代皇帝后裔和农民军领袖冒称前代皇帝后裔的例子，作为我国农民起义拥护“好皇帝”的证据。对这个说法，需要加以具体分析。我国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中，拥立或冒称前代皇帝后裔的只是少数。这是他们用来反对当时掌权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的一种斗争策略。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由当时特定的阶级斗争环境所造成的。例如赵高和秦二世杀了公子扶苏而搞篡权复辟，因而陈胜、吴广抬出扶苏作为号



召，对推翻秦二世的统治起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又如王莽篡夺西汉政权而搞复旧倒退，因而绿林军和赤眉军都拥立刘姓宗室做挂名皇帝来作为反对王莽的斗争手段。再如元代和清代是少数民族的封建贵族灭了宋代、明代而建立的，因而元、清两代农民军有冒称宋、明皇帝后裔作为斗争手段的。这些都是为了反对皇帝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怎能作为农民起义不反皇帝的例证呢？

毛主席指出：“**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皇帝正是封建政权的总头目，地主阶级集中的政治代表，农民阶级最大的死对头。从皇帝、官吏一直到地主，象大山似地压在农民身上。农民的任何零星反抗，都会遭到极其残酷的镇压。农民要起来革命，要反抗和推翻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就必须推翻维持这种黑暗统治的权力机构——封建王朝，必须把斗争矛头直指皇帝。

《水浒》中宣扬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同中国农民革命的光荣传统相对抗的。从秦汉以来，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最终目的都是要推翻封建王朝和建立农民自己的革命政权，都是反皇帝的。“**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几个大的封建王朝，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被农民战争所推翻。从历次农民战争的战略部署来看，农民起义军都把封建王朝的京城、皇帝所在地作为主要进攻目标，或者作为最终进攻目标。从陈胜、吴广派遣周文西征，直到洪秀全派遣林凤翔北伐，都采用了这个战略方针。历史上的许多次农民起义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正确的战略，才推翻或者打垮了当时的封建王朝，武装夺取了政权。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以，在农民起义没有取得新兴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以前，革命的果实最终还是被地主阶级所篡夺。但是，农民阶级敢于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革命精神，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往往在组织农民军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就建立同封建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我国历次农民战争，都曾建立过



农民政权。陈胜、吴广起义一攻克陈县(今河南淮阳),就建立“张楚”农民政权。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不久,也就建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他们建立农民政权,都是为了达到推翻封建王朝的目的。农民战争从来都是由小发展到大的。在我国,不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有推翻封建政权和建立农民政权的要求,地区性的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同样有这种革命要求。正是这种革命要求,才能把农民群众进一步发动和组织起来,发展成为规模更大的农民战争。以宋代农民起义为例: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李顺自称“大蜀王”,建元“应运”;北宋末年方腊起义,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钟相自称“楚王”,建元“天载”,杨么自称“大圣天王”,并用作年号。他们都有称号、国号和年号,目的都是为了夺取宋朝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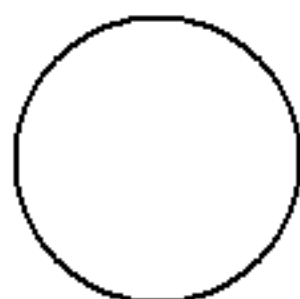
在《水浒》中,宋江、王庆、田虎、方腊被合称为“四大寇”(其中田虎和王庆完全出于小说作者虚构)。田虎、王庆和方腊都是“占据州郡,擅改年号”,“自霸称尊”,“自号为一国”,建立了农民政权,要夺取宋朝江山。而宋江则推行了根本相反的路线,不反皇帝,不自称王,不改年号,不占州郡。当宋徽宗下诏派宿太尉到梁山泊招安的时候,宿太尉说明所以要招安的理由是:“天子近闻梁山泊一伙,以义为主,不侵州郡,不害良民,口称替天行道”。因此,就是从《水浒》中也可看出,反不反皇帝是区别农民革命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分水岭。

《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要害是投降,而投降的原因是不反皇帝。把不反皇帝说成是农民起义的“规律”,等于说起义农民走向投降是必然“规律”。这就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抹杀了坚持农民革命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这种阶级调和论的实质,就是否认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要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它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阶级调和论从来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基础。历来的修正主义头子都是狂热鼓吹阶级调和论的投降派。刘少奇、林彪就是如此。今天,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这种阶级调和论,让《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充分发挥其作用,“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对我们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让贤”与投降

北京卫戍区某部一连理论小组



读反面教材《水浒》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看到，宋江上梁山以后，一会儿要把自己的“位”让给这个，一会儿又要让那个“为山寨之主”，三番五次地“让贤”。这当中究竟有些什么奥妙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宋江几次“让贤”的具体情况。

第一次，高俅派来征剿梁山起义军的“中军主将”呼延灼，被梁山英雄活活捉住。宋江立即喝叫“快解了绳索”，并表示“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

第二次，宋江令人赚北京大名府员外卢俊义上山。一到忠义堂，宋江就要让他“为山寨之主”。

第三次，蔡京派来镇压梁山农民起义的“领兵指挥使”关胜，宋江在阵上一见，就说：“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

第四、五两次又是宋江再三推让卢俊义“为山寨之主”。

第六次，梁山英雄生擒了东平府“兵马都监”董平，宋江当下就要让董平“为山寨之主”。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宋江所“让”的几位“贤”人，不是地主豪绅，就是朝廷军官，没有一个真正的起义军头领。李逵、阮氏三兄弟为梁山的农民起义事业出了那么多的力气，宋江从未有过半点要让位给他们的意思，反而处处压制、排斥他们，动不动就要杀李逵的头；而呼延灼、关胜、董平等人对梁山的革命事业，没有立过半点功劳，而且都是带兵镇压起义军的反动军官，但在宋江眼里，这些人却是“贤”人。其实，这也不奇怪。在阶级社会里，对“贤”的认识，不同的阶级历来都有不同的标准。象宋江这样一个标榜“忠义”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怎么能不把那些敌视农民革命、竭力维护封建统治的忠臣良将视为“贤”人呢？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宋江上山之初，对于梁山头领的座次，曾经这样说过：



“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几次“让贤”的事实充分说明，所谓“出力多寡”，纯粹是欺骗众头领的谎言。

宋江“让贤”，表面看来，似乎出于一片诚心。但仔细一看，也是真真假假，并非完全真心实意。不妨以让董平为例。在此之前，宋江曾三次提出让位给卢俊义，卢不肯就位，于是宋江出了个主意，说分头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先获胜者为山寨之主。但是，就在卢俊义那边胜败情况尚且不明时，宋江却又要让董平“为山寨之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个矛盾，正是宋江矛盾心理的反映。一方面，出于投降的需要，宋江的确真的想把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地主、降将。这样干，可以消释朝廷对起义军的疑虑，使他投降的反动理想顺利实现，使他自己可以爬上去。所以有时候，宋江让位，的确是真让。但另一方面，投降派宋江，同时又是一个野心家。他决心要“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即借着“领导”起义，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这样一个搞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怎么肯把自己篡夺到手的权力轻易地让给别人呢？因此，宋江让来让去，终于露出了他虚情假意的伪善面孔。

毛主席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搞修正主义的人一定搞阴谋诡计，历来如此。宋江自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这倒是一句真话。对于孔孟之道和反动阶级的阴谋伎俩他是深得其精髓的。“让贤”正是他玩弄阴谋诡计的表现之一。宋江曾对反对他让位的头领们大声呵斥：“汝等省得甚么！”的确，对于宋江这个“权谋”，起义军头领们哪能摸到底细？只有宋江心里才最“省得”，他的“让贤”权谋，可说是一箭数雕。

其一是通过“让贤”，标榜“义气”，欺骗起义将士，使他们胡里糊涂地跟着他走。我们知道，梁山起义军讲究“义气”，但他们对“义气”的实质却看不清。宋江正是利用这一点，用包括“让贤”在内的一系列权谋欺骗了他们。乍一看，宋江为了给山寨多招来一位“英雄”，连山寨头领、第一把交椅都可以不要，这是何等“仗义”啊！加上那些被“让”的“贤”人们一吹嘘，什么“兄长义气过人”，什么“人称忠义宋公明，话不虚传”等等，宋江简直成了“义气”的化身，有了更大的欺骗作用，谁还可能出来反对他呢？宋江要让位给别人，革命头领们是反对的，有两次李逵竟要“杀将起来”。但他们从未想到，从阶级本质上说，宋江和卢俊义等人是没



有什么不同的。因此，宋江每“让贤”一次，起义军众头领就起来反对一次，而被“让”的“贤”人则从正面大加颂扬一次，宋江的地位反而更巩固一次。

其二是借“让贤”机会，为投降造舆论。我们看到，宋江“让贤”，经常要大讲一番投降的歪道理。不说“一同替天行道”，便讲他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投降后可以“官爵升迁”，“使弟兄们尽生光彩”，等等。这一方面固然是在向皇帝和降将表明心迹；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运用这种反复讲述投降意义的办法，来麻痹、腐蚀起义军将士们，为日后大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鸣锣开道。

其三是为投降作组织上的准备。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光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实行，总是需要有一条跟它相适应的组织路线。“让贤”正是宋江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而搞的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宋江很清楚，那些地主、降将初到山寨，下马伊始即委以重任，众头领是不会心服的。经过宋江演出一场“让贤”的闹剧，再把他们安排在领导核心里，别人就很难再说什么了。且以卢俊义为例，赚卢俊义上山后，宋江给安排的又是鼓乐接，又是用轿抬；见了卢俊义后，“宋江先跪”，众头领不得不跪。这样一来，卢俊义身价一下子就抬高了。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结果“让”出了第二把交椅。而原来坐第二把交椅的吴用呢，对不起，往后推吧。到这里，真相大白了，所谓“让贤”的目的之一，不过是要梁山起义军的头领把位让给宋江的“贤”人。经过宋江耍阴谋、搞诡计，到了最后排座次的时候，他所“让”的“贤”，全部都重权在握，被排在头十五名，安插在领导核心里了。而真正起义军的头领，却被一挤再挤，如阮氏三兄弟，在晁盖领导下都是水军头领，宋江几个花招一变，把他们都挤到了三十名左右，而且在水军里头也不是主要头领了。到后来，起义军领导班子的成分改变了，大半都是朝廷降将，形成了一个投降势力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核心，这是宋江投降阴谋得逞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宋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宋江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员。在革命队伍里鼓吹投降，总是不得人心的。因此，投降派必然是两面派，他们拉山头，结死党，任人唯亲，一抬高自己，二组织人马。林彪不也是搞这一手的吗？今天，我们评论《水浒》，批判宋江，就是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对于我们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评论《水浒》的一点体会

河北深县护家池大队党支部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我们大队广大干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了对《水浒》的评论。我们把评论《水浒》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结合起来，联系实际进行生动的路线教育，使干部、群众进一步提高了识别投降派、识别修正主义的能力，增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评论《水浒》刚开始，有些干部、社员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比如，有的说，评论《水浒》是文艺工作者的事，农民大老粗评它干什么；有的人认为，书没读，戏没看，脑子里没有《水浒》传，评不评与己无关；还有些过去读过《水浒》书，看过旧“梁山戏”的老年人，老观点一时转不过弯来。我们感到，这些思想问题不解决，群众发动不起来，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就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

为了使干部、群众领会毛主席指示的精神，真正认识评论《水浒》的意义，我们采取骨干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发动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把毛主席的指示和鲁迅对《水浒》的评论印发到户，组织党、团员和理论骨干分片包户，宣传上门，并利用黑板报、有线广播等多种形式，反复进行宣传。同时，我们还以政治夜校和联户学习班为阵地，组织干部、群众展开了为什么要评论《水浒》的讨论。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评论《水浒》，不单是评论一部小说，而是进行反修防修教育，使我们提高识别修正主义、投降派的能力，它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工农兵群众是反修防修的主力军，他们的觉悟程度如何，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关系很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指出：“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毛主席在讲到要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问题时，特别强调指出：“要使全国知道”。现在，毛主席又指示我们，要把《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评论《水浒》，事关路线，事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决不仅仅是少数文艺工作者的事，而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应该积极参加的大事。很多贫下中农说：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评论。



群众起来后，如何把评论引向深入？毛主席指出，把《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就告诉我们，应该抓住《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在批判的过程中认识投降派的特点。宋江是一个反面教员，要通过宋江来看投降派、修正主义者是怎样篡改革命路线、叛卖革命的。我们和贫下中农一道，把评论《水浒》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与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联系起来，从他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及反革命手法等几个方面进行批判。我们知道，小说中的宋江和现实当中的刘少奇、林彪所代表的反动阶级不同，所处的历史条件也不同，他们的具体情况很不一样，但作为投降派，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曾混进革命队伍，耍阴谋，搞诡计，招降纳叛，篡改革命路线，最后出卖革命，充当反动阶级的走狗。这样，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这些投降派的面目，加深了对投降派的认识，激起了对投降派的愤恨。一切投降派都是革命队伍里的蛀虫，他们往往能起到公开的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正如鲁迅指出的：“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宋江修正了晁盖的农民革命路线，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葬送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革命事业，起到了封建朝廷用武力镇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苏修叛徒集团，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也正是当年希特勒想做而没有能做到的事。古往今来，革命阵营内总会出现投降派，这是阶级斗争规律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是投降派。只要国内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投降派就不会断种。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觉悟，提高识别和抵制修正主义、投降派的能力，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在评论《水浒》中，我们紧密联系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农村，地主富农这些公开的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是容易看到的；而一些隐藏在革命阵营里的敌人，通过歪曲党的路线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往往就不容易看到，所以特别需要警惕。宋江是以修正晁盖的农民革命路线来瓦解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刘少奇、林彪也都是钻进革命队伍中，以干扰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破坏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在农村刮起了一股单干风。当时，由于我们没有很好领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没有能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使集体经济受到了很大损失。后来，林彪反党集团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是由于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没有能够识别和抵制它，没有很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敢抓阶级斗争，致使弃农经商、分光吃净等资本



主义倾向又抬起头来,危害了集体经济。只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彻底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阴谋。评论《水浒》,联系农村这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情况,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一条正确的路线对于革命事业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干部和群众都表示,今后要坚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一个生产队干部联系本队有人打着“为集体”的旗号搞投机倒把的事实,说:“过去错误地认为,‘只要为集体,咋干咋有理’,对一些资本主义活动没有坚决斗争,结果损害了集体经济。今后,要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在评论中,我们还对《水浒》中宣扬的超阶级的“义气”,进行了批判。这种思想在农村的流毒是比较深的,不管看过《水浒》还是没看过《水浒》的,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一些影响。有些人认干亲,拜把子,只讲“哥儿们义气”,不分阶级,不讲路线。阶级敌人也利用“义气”搞认宗族、拉亲友的活动,妄图混淆阶级阵线。我们联系这些问题,开展对超阶级的“义气”的批判,揭露它的反动实质。大家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宋江的“义气”并不是超阶级的。宋江表面上同梁山上所有的人“都一般儿兄弟称呼”,什么“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但是,一到路线分歧时就马上原形毕露。在“菊花会”上,宋江叫嚷受“招安”,李逵坚决反对,宋江就要砍掉李逵的脑袋。宋江直到临死时,还怕李逵再起来造反,亲手用药酒将李逵毒死。这叫什么“兄弟情义”!贫下中农说,宋江讲“义气”,目的是为了模糊人们的阶级界限,以便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而李逵正是由于吃了这种“哥儿们义气”的亏,只讲“兄弟情分”,识不破宋江的反动面目,终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如果我们只讲“哥儿们义气”、“乡里乡亲”,不坚持党的原则,对资本主义倾向不批判、不斗争,对一些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不进行批评教育,就会助长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损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大家都表示,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吸取历史的教训,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大队有个“老水浒”,过去最佩服宋江的“义气”,开口“及时雨”,闭口“呼保义”。经过评论《水浒》,他的思想翻了个个,写出了“宋江是地主阶级的及时雨”的批判文章,揭露了宋江是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的真面目。

我们发动群众,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认识评论《水浒》的意义,并联系本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收到了一些效果。这说明,《水浒》的确是一部极好的反面教材。我们要认真总结前一段开展评论《水浒》的经验,进一步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评论《水浒》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文 化 战 线

大 海 的 力 量

——评影片《第二个春天》的主题思想

秦 新

辽阔的大海，洪涛澎湃，一望无际，显示着大自然的伟力，在彩色故事影片《第二个春天》中，可以看到一幅幅大海的壮丽图景；但是，真正吸引着我们的，是另一种“大海”，那就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奋勇前进的人民群众。

“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只有敢于在万顷波涛中破浪前进的人，才会真正懂得大海的力量。影片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冯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一个海军战士，他深深爱上了祖国的大海；而作为一个优秀的党的工作者，他对祖国另一种“大海”的力量，体会就更为深切了。

在那难忘的六十年代第一个春天，当冯涛到一〇六〇厂担任新舰艇的工委书记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场多么艰巨的战斗啊！经过三年奋战好不容易试制出来的新舰艇“海鹰”，在一声爆炸中烧焦了。厂长齐大同给炸蒙了，转向了；舰艇研究所副所长刘自强也失去了信心；总工程师潘文则乘机煽阴风、点鬼火，胡说什么找一找“海鹰”起火原因起码要三年。工人们心里急得着了火，负责设计的刘之茵义愤填膺，可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出路在哪里呢？对潘文言听计从的齐大同，一心想从那个号称“社会主义”实际搞修正主义的大国的所谓“援助”中找出路。对于这种“援助”，冯涛亲身经历的教训，是太深刻了。团山礁一战，就是因为刚刚进口的舰艇，主机出了故障，备用零件又对不上号，只好眼睁睁看着已经捏在手心里的敌人跑掉。在一次实弹演习中，也是这种“援助”来的舰艇炮膛爆炸，致使小战士小李倒在血泊之中。现在又来了个“飞鱼”，而且图纸上有三个重要数据又是对不上号。这一个又一个的教



训，使冯涛看清楚了：这种“援助”，对于受援国来说，“不是路，而是坑”！

真正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依靠“大海”的力量——中国工人阶级的双手，造出我们自己的舰艇来。

“大海”的力量是无穷尽的，原因就在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影片向我们表明，毛主席指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恰如大海似地汇合了亿万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希望，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

这个真理是朴素的。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却由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不同而各不相同。象冯涛这样优秀干部，不但掌握了真理，把真理化成了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善于把真理变成群众的行动，表现出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杰出的领导才能。而象潘文这样的人，则始终站在真理的对立面。象齐大同，则要在实践中经过反复的斗争，才会认识到这个简单的真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影片没有回避矛盾，而是通过冯涛、刘之茵、夏长发和齐大同、潘文在试制新舰艇的问题上，充分展示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亿万革命人民群众。影片刻画冯涛，没有过分地去渲染他个人的英勇行为，而是着重歌颂了冯涛处处把自己当作沧海一粟，自觉地汇入到“大海”——人民群众之中这一可贵的性格。冯涛一进厂，第一个行动就是迈开步子到工人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把烧焦了的“海鹰”摸了一遍。“海鹰”被拖走了，冯涛从群众愤愤不平的沉默中，看到了蕴藏在他们身上的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正是这些革命群众，给了冯涛无限的信心和勇气。刘之茵曾经激动地对冯涛说：“冯政委，原来你的决心这么大！”冯涛回答：“不，决心是造‘海鹰’的同志们下的。”老梁问冯涛要办法，冯涛笑着回答说：“书记的办法要出在同志们身上。我就是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铆钉啊。”

这些肺腑之言说得多么好啊！因为有了“大海”的力量，才会有冯涛的决心，才能找到战胜困难的办法。冯涛正是依靠了这股力量，才抵制了齐大同的错误路线，排除了潘文的干扰和破坏，挫败了赫文斯基的阴谋，顶住了苏修叛徒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卡住主机的压力，驱除了雪压冰封的严寒，迎来了阳光明媚的第二个春天。从冯涛的身上，我们不但看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也看到了继承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威力。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他只有汇入到“大海”之中，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托起万吨轮，浮起千条船。任何个人，只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站在他们之中，成为他们之中的一



员，他才能有浑身使不完的力量，才能象冯涛那样，集中群众的智慧，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是这样，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只要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带领人民群众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个党就有生气，这个国家就有希望，就一定具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

而那位齐大同，却从反面说明了这个真理。他是冯涛的老战友，过去两人是“两个身子，一个脑袋”。但在新的斗争环境中，冯涛一听到自力更生就浑身是劲，而齐大同却是“那么动摇、胆小，没有信心”。冯涛说齐大同变了。是的，为什么过去能在战火中猛打猛冲的革命战士，如今却让现代修正主义牵着鼻子走？这位齐厂长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呢？

齐大同和冯涛都要为海军造舰艇，但他们的立足点不一样。冯涛为了造出咱们自己的“海鹰”，始终投身于“大海”之中，从群众身上吸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而齐大同却只在“海”边徘徊，不但看不到“大海”的力量，还十分害怕“大海”的涛声。他认为靠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造不出军舰来的，这是他和冯涛的根本分歧点。齐厂长虽然手中有权，嘴上可以发号施令，由于他离开了人民群众，就感到自己身上没力量。十年前能快刀斩乱麻的老齐，如今他却认为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团乱钢丝，理不出个头绪”。一滴水离开了大海，是无法生存下去的。齐大同要造军舰，但又抛开了多数群众，那军舰是无法造出来的。怎么办呢？他就只好去依靠拜倒在苏修脚下的潘文，相信只有潘文掌握的那些洋教条才叫作“科学”，最后把希望寄托在苏修专家提出的所谓“两家联合试制”上，把别人设下的“坑”当作自己非走不可的“路”。这是齐大同不相信党和人民群众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失足的根本原因。因此，齐大同狠狠心丢掉的不只是一条“海鹰”，而是把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传家宝丢了，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这个优良传统丢了。

这样的人，在工作上必然夸大困难，看不到光明灿烂的前景。请听听齐大同的逻辑：“谁不想自力更生？别忘了，现在是要什么没什么的困难时期。”在他看来，暂时困难时期就是漆黑一团，人民的干劲不见了，自力更生的道路走不通了。一个人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就会被困难吓破了胆，精神萎靡不振，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以至成为革命的阻力。齐大同这个形象，难道不是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使我们看到干部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性吗？

困难，只能把齐大同这样的懦夫吓倒，而对冯涛这样的战士来说，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锻炼得更坚强。在同苏修的政治讹诈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冯涛和齐大同辩论如何对待困难的那场戏，其实是两种世界观的一次交锋。影片对这场高潮戏的艺术处理上，很有革命的激情和魄力：当齐大同提出“往下怎么办”的问



题时，镜头从厂长办公室跳到气势磅礴的船台广场，冯涛拿着苏修那封讹诈信，向着全厂工人群众发出响亮的回答：“我们自己干！”“协议让他们撕毁吧！专家让他们撤走吧！……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过得更好。”“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不吃他们那一套！”你听，一连串排炮似的誓言是那么铿锵有力，那么激动人心，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心声，是“大海”的怒涛声啊！一个接一个的特写镜头，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冯涛激愤的心情和坚毅的决心，在艺术上也很有感染力。影片通过冯涛的斗争表明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精神显得更加重要。冯涛的誓言完全正确，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路线，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呢？“海鹰”在六十年代第二个春天飞起来了。胜利是属于不怕困难、不怕失败、不怕敌人讹诈的冯涛，不属于畏缩不前、无所作为的齐大同。

自力更生是否就意味着某人的“自强”呢？研究所副所长刘自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认识不清楚的。这位在旧社会度过了大半生的老知识分子，身受过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迫。他认识到依靠外国人来搞我们的国防建设，那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赞成齐大同在“飞鱼”上找出路。爱国、想搞出我国自己的舰艇来，在这一点上，他和冯涛是一致的。但由于旧社会的影响，他错误地把自力更生理解为个人关门闭户的“自强”。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也曾经叫过“自强”的口号，但叫了几十年照旧还是一个空口号，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实行也不能实行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样，在看不到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创造精神这一点上，刘自强和齐大同则是一致的。当齐大同决定要把“海鹰”撤回来，刘自强就站出来表示赞同。在政治上，他不迷信苏修，更没有象潘文那样想当奴才，要投靠修正主义“老大哥”，在这点上，必须把他同潘文严格区别开来。但在世界观上，他却迷信外国资产阶级写的本本。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离开了工人群众，尽管他给自己起了个很动听的名字，叫“刘自强”，但“自强”了几十年，到头来，也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自然应该团结他，引导他投身到人民群众的“大海”之中，发挥他的积极作用。“大海”的波涛将会洗刷掉残留在刘自强身上的旧痕迹，帮助他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冯涛正是这样做的。当刘自强一头埋在故纸堆里找所谓例证时，冯涛一语双关地邀他走出小房子，到外边去“透透空气”。影片特意安排这样一组画面：在夕阳的余辉中，刘自强随着冯涛一步一步向高坡走去，此刻，欢乐的海涛声伴着悦耳的琴声阵阵传来，人们和大海都在期待这位爱国的老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有个新的飞跃。



在知识分子的形象中，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比较正确认识，是刘之茵。这个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年轻的设计师，由于社会主义美好制度和部队火热的斗争生活的熏陶，特别是由于她亲身花了三年心血制造“海鹰”的实践，使她认识到父亲那一套关在屋子里啃本本的方法很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她懂得自力更生不等于个人“自强”。虽然“海鹰”是她设计的，但她知道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海上飞的军舰，不依靠工人群众，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当齐厂长决定把烧焦的“海鹰”拖回来关禁闭时，她含着热泪恳求道：“不能这样呀，厂长，‘海鹰’离开工厂，离开工人，可真的要完了！”刘之茵对党的自力更生方针的理解之所以能比刘自强正确、深刻，潘文用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也不能把刘之茵从正确的道路上引诱开，根本原因在于她生活在“大海”之中，实行了同工人群众结合。刘之茵所走的路程告诉我们，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焕发出革命的青春，才能有所作为。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式的，知识分子在和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些反复也是正常的。当“海鹰”被拖走了，刘之茵孤身一人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感到茫然了。冯涛看准了刘之茵身上的这个弱点，鼓励她在受到挫折的时候，既要坚持真理，又要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去，把真理变成广大群众的行动，不然“你个人的信心有天高，‘海鹰’也飞不起来”。从刘之茵身上这个小小的曲折，可以看到革命的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要做到完全自觉，还要经过不懈的思想斗争和艰苦的磨炼。

影片中的潘文，是作为妄想和“大海”的力量对抗的形象而出现的。他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看待一切事物。群众自力更生，他攻击为“狂热蛮干”，“代替不了科学”。刘之茵坚持造“海鹰”，他从个人主义的角度理解为“想一鸣惊人”。资产阶级特有的偏见，使他由崇洋迷外发展到崇洋媚外。苏修专家的图纸明明有错，他连看也不看就训斥别人：“对国外技术，我们要端正态度”。在他的眼里，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中国“要造出一个超过别人的零件都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典型的洋奴哲学。当潘文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崇洋媚外的反动道路同社会主义制度，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发生冲突时，他就本能地要进行对抗，甚至要把“海鹰”图纸献给苏修专家，这就充分暴露了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潘文企图依靠外国人的势力来和“大海”较量，自以为得计，其实很可笑。外国人也是分阶级的，外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是不会容纳潘文这种人的。潘文所依靠的外国人，也只是外国人中的一小撮败类即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这些叛徒们不过是映上几个洋字码的污水泡，同样逃避不了被外国“大海”所吞没的命运。影片最后虽然没有交代潘文的下场，但是，对他的极端个人主义、洋奴哲学、投靠苏修的反



动道路，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潘文的失败，从反面说明了中国人民走自力更生道路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自力更生，并不是排斥外国的任何东西，在科学技术上，我们要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学习不等于依赖，不等于迷信，更不等于损害我们的主权去同别人做交易。影片贯串了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把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同反修防修、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使它的主题思想的深度超过了十二年前的原话剧本子。影片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敢于同苏修斗，同错误路线斗，同投降派斗，给人的启发是很深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只能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首先是依靠本国的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过去，我们闹革命，夺取政权，要遵循这条革命路线；今天，我们造军舰，搞建设，巩固政权，还要坚持这条革命路线。以前，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锁我们，固然要坚持这条路线；今天，这种封锁被打破了，我们仍然要坚持这条路线。冯涛说得好：“帝、修、反并不怕我们造了一个‘海鹰’，他们怕的是我们照着毛主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路线走下去，五年、十年、二十年，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今后，不论在任何条件下，我们都要坚持这条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影片《第二个春天》所反映的虽然是六十年代初期国防建设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它所歌颂的主题在今天、在将来漫长的历史时期，仍然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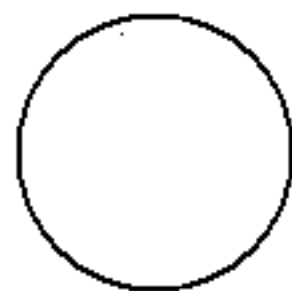
代表人民群众力量的，在影片中还塑造了老、中、青三代工人的形象。退休老工人老梁是部中国海军发展史的活字典，夏长发是坚持走自力更生道路的骨干力量，刘之华则是工人队伍中的新鲜血液。这三代工人有着不同的身世和经历，他们聚集在一起造“海鹰”，为表现自力更生的主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可惜的是，夏长发师徒三代工人的形象，比起刘之茵等三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来却显得逊色。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作者对工人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缺少感受外，在创作构思上也还有个值得探讨的方面。影片中的各类知识分子形象之所以栩栩如生，是因为作者敢于放手写他们之间在思想上、道路上的矛盾和斗争。如果作者也能放手去写工人，使他们的精神面貌能够在斗争中得到充分的展示，那么，工人英雄群象不仅会比现在更丰满，整个主题思想也会表现得更有力量。

影片中“海鹰”的诞生过程，就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缩影。四十五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曾把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比作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今天，我国亿万人民自豪地看到这条航船正在大海中飞驰，它将冲破一切封锁线，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飞向前方。



重视科学普及工作

项 群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祖国各地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无论是城市或农村都在不断深入。努力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鼓舞人心。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青少年，对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提出了多方面的和更高的要求，强烈呼吁有关部门重视这项工作，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有些同志认为，搞自然科学是专业人员的事，广大群众多学一点少学一点，关系不大。因此，把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看成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种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

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三十多年前，我们还处于革命战争年代。那时，毛主席就重视发展自然科学、向人民群众普及自然科学的问题。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今天，怎么能说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同广大人民群众关系不大、无关紧要呢？

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生产的发展。随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工农业生产中的新问题会不断出现，广大工农群众迫切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和各种先进技术。他们深深懂得：要改变国民经济的落后状况，把工农业生产尽快地搞上去，不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是不行的。几年来，通过科普读物和科教电影介绍的一些新成果、新技术，就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也迅速被他们所掌握，有效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例如，



杂交优势的利用，已成为广大贫下中农夺取粮食高产的群众性的实践；微生物知识的传播，带来了“九二〇”、“五四〇六”、春雷霉素、杀螟杆菌、青虫菌等的广泛应用；定向爆破的新技术，被用来搬山造田，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发挥了巨大威力；电子技术的普及，使各种程序控制的自动线不断涌现，大大改变了许多生产流程的落后面貌。所有这些，生动地说明：“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知识，采用先进技术，就能够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大显身手，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对于破除迷信，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提供了丰富的事实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在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他们的著作中，总结和概括了自然科学的丰富成就，列举了大量的科学材料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深刻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因此，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有助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入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不重视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技术，不只是因为对自然科学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同时，也是同受剥削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有关。科学技术本来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做好科普工作，就是使科学技术“回老家”。长期以来，剥削阶级鼓吹“上智下愚不移”，把科学技术上的发明说成是少数“天才”的活动，诬蔑劳动人民为“阿斗”，千方百计地将他们排斥在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刘少奇、林彪一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竭力反对劳动人民掌握科学技术。这些反动的唯心史观虽然受到了批判，但其影响是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消除的。科学普及工作的往往被忽视，究其根源，就是这种思想影响的结果。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向来重视自然科学，重视向人们普及科学技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掌握科学技术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列宁在领导苏联实现电气化计划的时候，一开始就提出：“必须宣传电的知识。”“赶写几本通俗小册子”，“以供学校教学和农民阅读之用”。（《给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毛主席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就号召全党努力学



习科学知识，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毛主席总结了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提出开展三大革命运动的光辉论述，教导我们要从建设社会主义、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和抓好科学实验运动。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广大工农兵群众阔步登上科技舞台，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蓬勃开展。科学技术工作只是少数人的事情的那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广大工农兵群众越来越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这是值得人们高兴的。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多科技工作者进一步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提高了对科学普及工作的认识。他们在努力从事科研和专业工作的同时，积极承担编写科普读物的任务。他们的辛勤劳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也有一些同志，不能正确理解科学工作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认为科普读物“没有什么新鲜东西，无非是抄抄写写”。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千百万工农兵群众所需要的读物，是十分错误的。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有些同志“**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科学地阐明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毛主席指出：“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自然科学的普及，主要也是对工农兵普及。我们决不能认为普及的东西就不重要，就采取看不起的态度。看不起科普读物，实质上是轻视工农兵的一种表现。

向工农兵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不仅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需要，也是发展自然科学本身之必需。生产和社会的需要，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例如，畜牧业和农业的需要产生了天文学，水利工程和建筑的需要产生了力学，测量土地面积的需要产生了几何学，等等。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致瓦·博尔吉乌斯》）广大人民群众改造自然的丰富经验和智慧，是科学技术的无穷源泉。科学技术的提高，需要总结群众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经验。科学技术知识越普及，就越有利于科学技术队伍的发展壮大，越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提高，使科学研究的提高获得更加广泛雄厚的基础。例如，我国地震科学研究的情况，就是有力的说明。地震预报，是地震科学研究中最尖端的问题。正是由于我们坚持向群众普及地震知



识，开展广泛的群测群报活动，实行专业人员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才使我国的地震预报研究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然，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事实上，普及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

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能不能在从事提高的工作中，同时也做好普及工作呢？我们认为只要从思想上真正重视了，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这可以举出许多科学家的事例。他们既搞“阳春白雪”，又搞“下里巴人”。在他们从事的专业研究范围内，关心群众的实践，了解群众的需要，认真地编写普及读物，向人民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样做，不仅没有妨碍他们自己的专业，相反的却促进了他们的提高工作。

搞好科普读物是一番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要编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做到比较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是不容易的；要结合科学技术的内容，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就更不容易。近年来，由于广大科技人员和出版工作者的努力，出了一批科学普及书刊和电影，其中不少好的，热情地反映和歌颂了我国科技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成就、新创造，并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俗易懂地介绍科学技术，使人看了既能学到科学知识，又能提高思想认识。《化石》这份杂志，就以它特定的内容——古生物和古人类，向人们宣传科学知识，进行生动、具体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内容丰富多采，版面生动活泼，形式也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但类似《化石》这样受欢迎的科普书刊，目前还不很多。我们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认真总结经验，努力实践，为广大群众出版更多更好的科普书刊。

科普读物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这种宣传是通过解释自然的规律和劳动人民改造自然斗争的过程，介绍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来进行的，而不是脱离这些具体内容空泛地讲政治概念和哲学概念。自然科学为哲学提供事实和依据，但自然科学本身并不等于哲学。我们在科普读物中希望得到的是结合科学技术知识的生动具体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而不是那种“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没有选择适当的事实来加以说明”的枯燥文字。有的读物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原因并不是有些科学技



术难以结合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而在于作者没有学好唯物论和辩证法。

自然科学普及工作，必须坚持为工农服务，这就需要大量地出版结合当前生产斗争需要的科学技术读物，以供工农群众的急需，使先进技术迅速在工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科学知识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工农群众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只要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广大群众都是欢迎的。我们不仅要满足工农群众各方面的需要，还要针对干部、青少年等各种对象，进行各方面的科学普及教育。当前，适宜于知识青年和中小学生的科普书刊太少。我们建议创办几种通俗易懂的、生动活泼的、有丰富思想和科学内容的杂志，特别是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杂志和科学画报，供青少年阅读。

要热情鼓励和支持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师编写科普读物，充分调动他们为革命创作的积极性。科技人员挤出一些工作时间和利用业余时间，积极为报刊、出版社写文章、编书，这是好事情，应当积极支持，给予方便。我们希望，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在制订研究和教学计划时，也要考虑到普及工作，把它当作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列入计划，积极承担起来。

我们还要热情地帮助工农群众写书。工农群众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科学技术上有许多发明创造，也最了解群众的需要，他们经过努力一定能够写出很好的书来。

搞好出版工作，是促进科学普及的重要环节。有关出版部门要努力跟上形势的需要。普及科学技术，不单是出版书刊一种形式，还有报纸、广播、电影、幻灯、展览、讲座、技术表演等，都是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好形式。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些形式，经常地、广泛地向人民群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让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努力做好科学普及工作。

更 正

《红旗》第10期第36页第4行“创造发明”应为“发明创造”；第7页第14行“增长一倍多”应为“增长二成多”；第47页第2至3行“以及象……的歌谣”一句，应删去；第51页注②“中华书局”应为“上海人民出版社”。



让革命诗歌占领阵地

——重读鲁迅对新诗形式问题的论述

任 犊

鲁迅对于新诗的形式问题，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后一段时期的历史经验。今天，我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诗歌创作的时候，重读鲁迅的这些意见，是很有益处的。

凡有旺盛生命力的革命文艺作品，总是力求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但“五四”以后的许多新诗却没有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和混进五四运动的买办文人胡适等人关系极大。胡适自称在进行一场“诗界革命”，怎么个“革”法？他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韵也不妨”。胡适的谬论，貌似“激进”，实际上却阻碍了新诗的发展，无音节无韵，以文代诗，成了“五四”以后不少“新诗”在形式上的一种倾向，从而为封建反动文化在诗歌领域的复辟留了后路。

新诗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鲁迅说：“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又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如果新诗“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在鲁迅这些具体论述中，包含着对中国劳动人民欣赏习惯和接受标准的细致考察。新诗要让人民群众接受，艺术形式上就必须民族化、大众化。

易懂是一切革命宣传的最起码条件。鲁迅对各种门类的新文艺都提出过“为了大众，力求易懂”的要求，他对新诗的意见正与此一脉相承。但诗歌自有其特殊性，除了易懂，还要易记、易唱。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新诗有节调和韵。如果无音节无韵，即使新诗有很好的革命内容，但人们记不住，唱不来，那末，



诗歌的特点就没有了。任何一种艺术样式取消了自己特定的艺术手段，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必要。鲁迅之所以一再强调新诗的节调和韵，原因就在于此。

鲁迅认为，革命诗歌光是易记、易唱还不够，还必须讲究艺术性，在文字表现上要求有“诗美”，不能“味如嚼蜡”。他因此而反对新诗中口号标语式的倾向：“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譬如文学与宣传，原不过说：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学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这种“故意做成”的口号式新诗，即使易懂易唱，也是不易流传的。“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离开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不注意锤炼文字，尽管内容正确，群众也是不赏识的。

革命文艺作品形式和内容的脱离，必然导致作品和群众的脱离。这中间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想让群众接受而群众没有接受，“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另一种是本来心目中就没有群众的位置，不愿以群众的是否接受来作为自己作品的检验标准。后者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世界观上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依靠人民大众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但当时有不少新诗作者，往往象鲁迅批评过的那样：“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而不是“目的都在工农大众”。没有为工农大众的目的，当然也就不能很好地掌握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手段。

这里就从艺术形式牵涉到诗歌作者究竟为谁去占领阵地的问题了。我们固然要为动机求效果，但反过来，又可以从效果去看动机。毛主席指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这是判别文学艺术史上许多复杂现象的真理。就拿胡适等人来说，他们对新诗也并不是不要任何形式，而是恰恰在进行着诗歌形式“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反动文人梁实秋曾代他们作过表白：“他们要试验的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装进外国式的诗意。”而这种“诗意”的阶级内容，又纯粹“是贵族的”。这种试验的结果，就产生了如此奇特的“中文外国诗”：“牛敦，爱迷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毫无疑问，这样的“艺术形式”，只能表现“月亮是外国的圆”这样的思想内容。他们还能创作出什么更新一点的艺术形式吗？不能



了。因此，新诗作者要探求为中国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首先应当从思想上树立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诚然，有了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决心而没有找到合适的形式，这种现象在革命队伍里也大量存在，但这是暂时的。有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们的诗歌作者就能不怕挫折和失败，终将在实践中创造出与革命内容相适应的形式，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牢牢地占领诗歌阵地。

各个阶级在争夺诗歌阵地的时候，诗歌的艺术形式也常常成了争夺的对象。鲁迅曾十分形象地描写了这一历史现象：“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在“五四”时期，胡适等人一面破坏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一面又从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出发收集旧民歌，便是一个例证。鲁迅曾在《门外文谈》等文章中精辟地阐述了劳动人民创造文化的历史，对于好的民歌也很重视，号召“注意于大众的艺术，来注意于这些东西”。同时，他又提醒大家，民歌中已“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需要重新进行提炼和改造。鲁迅很注意利用古代劳动人民的文化遗产来为现代劳动人民服务，对于被反动统治者夺去后已“弄得变成僵石”的诗歌旧形式，也进行了新的改造，注入全新的内容。鲁迅自己就曾经写过不少旧体诗，这些诗出色地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夜气如磐而又风雷激荡的时代，形象地记录了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闪耀着革命理想的光芒。这也是占领诗歌阵地的一个方面。

鲁迅强调对历史上文化遗产的继承，决不是提倡全盘接受，而是强调必须有批判有分析地去继承它。例如，他要求新诗能唱，有格式而不要太严，有韵而不必依旧诗韵，就正是这种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我们应该学习这种辩证的观点。批判什么，继承什么，如何改造，怎样创新，允许有各种各样的探索。于是，也就会有各种各样风格和流派的诗歌产生。有比较才有鉴别。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有利于新诗体的形成，有利于繁荣诗歌创作，扩大社会主义的诗歌阵地。

鲁迅早在“五四”时期就曾对一个刊物提过这样的愿望：“此后能多有几样作风很不同的诗就好了。”这个愿望，只有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实现。当然，毒草也很可能会趁机冒头，但这用不到怕，锄掉当肥料就是了。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才得到发展的。革命诗歌的发展道路也同样如此。

革命诗歌在斗争中一定能够牢固地占领诗歌阵地！



· 杂 文 ·

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

阳 戈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



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栽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且以他们自



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红旗

一九七五年 12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五年第十二期 目 录

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5)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齐永红 (13)

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俞 彤 (18)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齐 彦 (22)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前进

坚持青年同工农结合的正确路线

——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石 凌 (25)

永远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

.....叶 新 (31)

牢记党的基本路线

.....上海市第二中学党支部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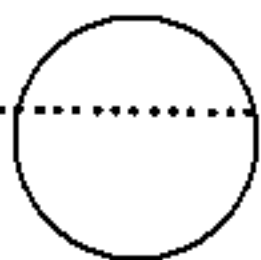
开门办学 越办越好

.....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党支部 (40)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

略论方腊.....史文(44)



从宋江看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袁青(51)

发动群众 评论《水浒》

.....甘肃庆阳县八里庙大队党支部(54)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各项工作做好

普及大寨县要抓好基本路线教育.....严群(58)

丰收了也要注意节约.....江景宏(62)

小评论一组(三篇).....(65)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依靠什么?

——陕西榆林地区的调查报告.....(70)

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

.....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党委会(75)

☆十二月一日出版☆



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毛主席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语录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主席语录

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

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当前，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同全国一样，教育战线的形势也一派大好。从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到辽宁朝阳农学院，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大寨学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朵朵教育革命的鲜花竞相开放。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明明是首先针对理工科大学怎么办而讲的，然而教育界的怪论却偏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强调理科“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请看，这不是明明要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吗？

学校究竟向谁开门，招收什么样的学生，直接关系到教育的阶级性质。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但在以往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里，却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解放后，工农群众成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主人。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广大工农兵竟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种状况。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大学开始改革招生制度，实现了亿万工农千百年来愿望。劳动人民进了清华、北大和其他高等院校，培养出自己的第一代大学生。从工农兵中间选拔大学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项重大的成果，是教育史上的革命。这个根本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这一新生事物经过几年来的实践，已显示出它明显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使大学面貌焕然一新。工农兵学员在工厂、农村参加过几年生产劳动，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对于他们上大学是很有好处的。他们通过学习社会，学习工农，提高了觉悟，充实了头脑，逐步明确了方向，这为进一步解决为什么人学习的问题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思想基础。同时，由于他们有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无论学文科，还是学理工科，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都比较强。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教育革命的一支生力军。这是过去那种从家门到校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生根本做不到的。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坚持从工农兵中招生，才能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阶级路线上得到保证。

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照此下去，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就会一步一步地被篡改，被屏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会被攻击，被否定。这样做，就是要“扭”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与此同时，广大工农兵就要重新被赶出高等学校的大门。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北大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工农子弟曾被诬蔑为“粗瓷茶碗雕不成细花”，用“泻肚子”的办法将他们赶出校门。那种资产阶级专



了无产阶级的政的历史，决不容许重演。如果有人要从理科开刀，重演这样的历史，那么，我们有权质问：这样搞，不也是要用“泻肚子”的办法将工农兵赶出大学校门吗？

二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兵，在学习期间还要不要与工农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学理论，学技术，学文化，还要不要和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还要不要不断改造思想？这是关系到工农兵学员沿着哪个方向提高，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才是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根本途径。而教育界那种怪论却把开门办学歪曲成“不讲学文化”、“实践——实践——实践”，这完全是对《五·七指示》道路的诬蔑。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社会主义大学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最重要的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学校有各种工作，一切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学生要进行多方面的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生要上这样那样的课程，首先要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所有这些，都是不能离开三大革命运动的。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社会主义大学应当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教育质量，引导学生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为革命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对技术精益求精”，掌握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列宁指出的，“全部关键”在于“把青年的学习、组织和训练的事业加以根本改造”。而坚持走《五·七指示》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根本改造”。学生只有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与工农相结合，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正确目的，才能产生真正强大的学习动力，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科学文化堡垒。只有立足于教育革命，批判封、



资、修的学科体系，彻底改革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组织教学，才能使學生既学到有用的书本知识，又掌握丰富的实际知识，“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离开了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还谈得上什么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正确道路”？

几年来，清华、北大发动广大师生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努力做到师生与工农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北大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紧密结合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最近评论《水浒》来组织教学，推动了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的改造。以“史”的课程而论，过去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现在努力阐述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过去尊儒反法，现在努力正确评价法家，深入批判儒家；过去厚古薄今，现在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清华大学打破了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老三段”旧体系，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把学生的学习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联系在一起。这几年共完成近千项生产、科研任务。水利系以万里黄河为课堂，坚持为治黄服务，为农业服务。治河泥沙专业十二名学员和三名教师，到山东某地结合“引黄放淤”的科研任务进行教学。他们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向贫下中农学习，打破书本上的老框框，完成了放淤工程设计。经过广大群众的奋战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这项工程今年一次就淤出五万一千七百亩良田。学员既为农业学大寨贡献了力量，又学到了丰富的实际知识，并在理论上有了新的创见。化工系二年级，在完成了一项填补我国技术空白的化工设计以后，师生共同编写了《化工车间设计》等两本教材和两篇科技论文，总结了工人的实践经验，并把设计中有创见的六项革新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由此可见，开门办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过程，就是始终贯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原则，使学员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的过程。那种把开门办学歪曲为“实践——实践——实践”的论调，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的一种捏造。

开门办学，出去以后，也仍然有一个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我们两校注意引导师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与工农兵一起战斗，想工农兵之所想，急社会主义之所急，虚心学习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教育，并且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积极改造旧教学体系。如果在下厂下



乡过程中不与工农结合，不认真参加到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中去锻炼思想，而把旧的一套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照搬下去，不花气力去切实组织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那就不是真心实意地实行开门办学。我们两校始终坚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努力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实践证明，实行开门办学，就可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学员，使他们在政治与业务两方面都得到锻炼，在斗争中提高觉悟，既懂得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又能够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刻苦钻研业务，善于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又不迷信书本，敢于创新，成为又红又专的战士。把开门办学诬蔑为“不学文化”，实际上就是要走资产阶级关门办学的老路，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

三



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总是在教育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批判“智育第一”。

对于教育质量，不同阶级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因此，看质量首先要看方向，看路线，要看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即使就业务学习来说，也决不能以上了多少课程、念了多少本本为标准，而必须看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旧北大、清华号称什么“最高学府”、“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可是，摇来摇去，许多学生被摇得晕头转向，追求个人名利，理论脱离实际。学哲学的搞不了哲学，学文学的写不了小说，学工科的既不会开机器，也不会修机器，学理科的只能关在高楼深院里纸上谈兵。有的人怕苦怕死，不服从党和国家的分配，有的甚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现在工农兵学员经过几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有提高，业务学习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人并有发明创造，在校期间就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清华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一个学员小组，与北京建筑安装公司的工人、技术人员共同努力，打破了外国焊接工艺规范，成功地进行负一百度低温用钢的焊接。电子系控制专业的五名学员和两名教师，同精密仪器系几名工人一起，破除迷信，解放



思想，研制成功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关键设备图形发生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员投身于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写出了充满革命激情的长诗《理想之歌》，出版之后，受到广大工农兵的欢迎。地球物理系和地质地理系的学员一听到云南昭通和辽宁营口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就立即奔赴灾区。在余震未平，山石还在滚动的情况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阶级弟兄和人民财产，并在现场进行科学考察，取得了可贵的资料。

工农兵学员毕业实践的丰硕成果，更是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所谓“质量低”的谬论。清华大学的两届毕业学员完成了五百六十四项专题研究、生产任务和重大技术革新，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或填补国家空白的项目占三分之一以上。电子系七二届学员担负的十二个项目，全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九项填补了国家空白。北大文科毕业学员结合战斗任务，编写了五十五本书，在报刊上发表了七百多篇文章；外语系的学员共翻译了十六种文字、二百五十万字的材料，为反帝反修斗争服务；理科学员完成了三百九十三项科研课题，七十九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还有一些项目，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事实俱在，不容抹杀。试问，现在的大学教育质量究竟是“不如过去的中技高”，还是旧大学所根本不能比拟的？

成绩是这样显著，对比是如此鲜明，为什么还出现了对质量问题颠倒是非的种种怪论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怪。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有人却采取折衷主义的手法加以歪曲，实际上是去掉两头，光要中间，把“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当“劳动者”扔到九霄云外，眼睛只盯住“文化”。我们必须警惕有的人故意混淆重视智育和“智育第一”的界限，企图利用人民要把科学文化搞上去的迫切心情，重新搬出“智育第一”的一套陈旧货色。所谓“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说穿了，就是反对批判“智育第一”。“智育第一”从来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吗？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教育早已作了深刻的批判，尖锐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搞“智育第一”，就是要继续让旧教学制度重新来摧残人材，摧残我们的青少年，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人们知道，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大都是经过大学培养的所谓“红色专家”，正是他们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



我们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四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清华、北大在文化大革命前为什么封、资、修的势力盘根错节，攻也攻不动？为什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之前，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而这几年学校却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原因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教育战线的反革命专政，粉碎了林彪一伙对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阻挠和破坏，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学校的领导权。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保证。

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要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所谓“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实质就是用抽掉阶级内容的手法，篡改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为什么羞羞答答、不敢和盘托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货色呢？无非是这种货色太臭了，拿不出手。于是，接过“外行能够领导内行”的口号，对外行加上“**热心科学**”的限制词，妄图以“不热心科学”的莫须有的罪名，把工人阶级的领导一举反掉，让那些“热心”搞资产阶级政治的人来把持教育领域。这就是他们要“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办法。

但是，对这套办法，我们并不陌生。在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决不是想发展什么科学，而是要共产党退出学校，搞什么“教授治校”，即由资产阶级统治学校。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党曾派出一批批干部来到清华、北大。他们先是被资产阶级诬蔑为不懂科学的“土包子”，但后来其中一些人经不住资产阶级的压力和腐蚀，对阶级斗争越来越不关心，把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基本路线置诸脑后，却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对修正主义那一套越来越“热心”。结果呢，不但科学没有搞上去，自己倒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历史教训，我们还记忆犹新。现在，有人竟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拖回到资产阶级右派梦寐以求的境地，这未免走得太远了吧！

学校是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决不是单纯传授知识和为科学而科学的场所。清华、北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正反面经验，都证明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伟大真理。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最痛恨



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又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经验。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工人阶级牢固地占领教育阵地，才能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才能使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一切工作沿着正确的路线蓬勃发展。许多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教育阵地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复杂、尖锐的，必须要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坚决同修正主义作斗争，要警惕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这样，才能把教育革命的光荣任务坚持下去。

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最近几年才开始。它不是过了头，而是刚起头。令人高兴的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正在茁壮成长。它一出现，就显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展现出光辉灿烂的未来。自然，它同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样，总要经历一个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我们的教育质量决不是到此为止了，而是还在发展、提高。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首先要看本质，看主流。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当然也不能忽略，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如果抓住新生事物的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利用一些同志暂时不理解、不适应的状况，否定教育革命的主流和方向，广大革命群众是决不会答应。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毛主席亲自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又亲自抓教育革命。教育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把路线是非弄清楚了，就能真正促进安定团结。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要经过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大、中、小学学生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不变颜色的百年大计。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齐永红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这场大革命所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光辉的真理。

对于这次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主席曾经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经过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广大干部群众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是十分正确、极为深刻的。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并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进行过多次的反复的较量，并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止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使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地向前发展，毛主席总结了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经验，找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通过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接着，我们党又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它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政治大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革，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蓬勃成长创造了条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在各条战线，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各族人民广泛持久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老、中、青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等等。这些新生事物象烂漫的山花开遍了祖国的大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途。正是这场大革命，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更加深入人心，造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推动着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强大了。亿万人民群众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大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同样要经历激烈的斗争。从历史上来看，每一次大的革命之后，必然会伴随着出现一场肯定还是否定这次革命的斗争。这是一场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其延续的时间，要比一场革命运动的本身更长得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只有积极参加今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实践，才能深刻地认识革命；只有真正理解革命的意义，才能坚持继续革命。因此，要使我们自己跟上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斗争实践，就必须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并且进一步提高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在参加运动的实践中不断深化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政



治较量。同时，又伴随着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潮，使这场伟大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但是，斗争越尖锐复杂，就越能帮助人们的认识走向深化。不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认识不足的同志，通过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斗争的革命实践，也不断加深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这个认识过程并没有终结。列宁曾经指出：“在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了解这种变革。”（《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既然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变革是极为深刻的，那么它本身的过程和由此引起的反应必然会延续一个很长的时期，而它的意义也将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才能得到充分的显示。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高潮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深刻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出来。正象毛主席一九四〇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总结的那样，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迅速地变成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它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亿万人民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但由此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里引起的深刻变革远远没有完成。因此，人们对它的必要性的认识也远远没有完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破旧立新的运动，广大革命群众在这场运动中创造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但正因为是新生事物，必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会直接导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抱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是必然的。对这些新的问题要加以具体的分析。这些新生事物代表了事物发展的方向，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它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方面。这是主流。新生事物成长中的问题，那是支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即使缺点再多，也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旧事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很象鲁迅在《战士和苍蝇》这篇杂文中说过的，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不仅对主流和支流要加以区别和分析，对支流本身也应



当分析。新生事物之所以会产生缺点或问题，有的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有的是由于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有的是由于革命在这个领域内进行得不够彻底，还有一些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或工作上的缺点造成的。事实上，那些攻击新生事物的人所反对的，恰恰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他们列举某些支流方面的现象只是一种借口。因此，决不能把支流当作主流，更不能被那些否定主流的错误言论所迷惑。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满腔热情地对待新生事物，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使之逐步完善起来，更好更快地成长。当前的大好形势为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我们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当坚定地站在积极支持的立场上，投身于使新生事物发展、完善的艰苦实践中，并在这样的实践中逐步获得对新生事物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采取何种态度，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们的世界观。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就能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真正认识到这场伟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就能抱满腔热情的支持态度，努力扶植它们成长壮大。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客观事物就会被歪曲，甚至被颠倒，文化大革命及其所带来的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就会同自己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就可能采取冷淡、漠视、怀疑的态度，就会有意无意地抓住某些缺点加以夸大，甚至把正确的东西歪曲为错误的东西，对新生事物加以全盘否定。因此，在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上，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观都在受到严格的检验。我们应当真正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不致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迷失方向。广大的老干部和新干部，特别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受过一些批评、现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志，要注意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问题，做到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对文化大革命心怀敌意、别有用心地妄图否定这场革命伟大成果的人也是有的，但他们是极少数，对于他们的种种谬论，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

当前我们的责任，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支持、发展



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开展起来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同样必须依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在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时候，在从事发展和完善新生事物的艰苦实践的时候，决不能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决不能忘记党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早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就深刻阐明了“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的重要性。毛主席说：“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我们党现阶段制定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都是从属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为它服务的。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继续前进，必须继续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但是，在贯彻执行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如果不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去认识和领会它们，甚至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就可能脱离正确的轨道，走到邪路上去。自从人类社会分化为对立的阶级以来，阶级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它都是目。只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在任何时候、任何工作中都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因势利导地夺取胜利，把各项工作做好。

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庆祝伟大的革命纪念日的最好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我们一定要继续发展大好形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长期坚持下去，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以阶级斗争为纲，带动各项工作，把革命的车轮不断推向前进。



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俞 彤

支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分界线。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必须旗帜鲜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涌现出一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例如，群众性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运动，举办工农兵干部学习班，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增强了反修防修的能力；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为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广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持走五七道路，推动着国家机关的改革；表现工农兵英雄形象的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和普及，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赶下了舞台；工人和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学校，工农兵上大学，使我国的教育战线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工农兵理论队伍的成长壮大，推动着上层建筑领域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农相结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正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合作医疗的普遍开办，赤脚医生的大批涌现，城市医务工作者上山下乡，改变着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等等。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产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人民群众有无穷无尽创造力的生动表现，它们从各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产生的，不可能在风平浪静中发展。毛主席指出：“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



种想法，只是幻想。”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概括了新生事物成长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新生事物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和发展也必然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尽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新生事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承认和拥护，然而，支持还是反对它的斗争仍然继续存在。

有的人总是看不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总是觉得“新的不如旧的好”。究竟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好，还是资本主义旧事物好？这是需要辨别清楚的一个原则问题。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亿万群众在清除资本主义旧基地的斗争中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崭新成果，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在本质上它是优越于一切旧事物的。事实难道不是明摆着吗？究竟是表现工农兵英雄形象的革命样板戏好，还是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戏曲好？究竟是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好，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好？究竟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好，还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好？究竟是开门办学好，还是关门读书好？究竟是让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锻炼好，还是关在“温室”里培养好？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于这些问题就很容易分辨得清楚。

阶级立场不同，思想感情也不一样。毛主席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主席的指示清楚地告诉我们，爱好什么，憎恶什么，都是有阶级根源的。为什么有的人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呢？其根源就在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旧事物十分习惯，津津乐道，恋恋不舍。这种人颇有点象鲁迅的小说《风波》里的九斤老太，总是在那里慨叹着从前的“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必将战胜资本主义旧事物，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就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摆脱一



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想束缚。否则，就有可能站在新生事物的对立面，成为它的绊脚石。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不可能完美无缺。要求它十全十美，不允许有缺点，这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如果抓住新生事物的一些个别问题和表面现象，任意夸大，加以否定，那更是完全错误的。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惯用手法。如果我们队伍中的同志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采取错误态度，一见它有缺点，就把它说得一无是处，那就把屁股坐歪了，立场站错了。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根本不懂得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的关系，不懂得“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本质上看问题，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共产主义的幼芽”，它的主流是好的，本质上是革命的。即使它有缺点和错误，也是前进中的缺点和错误，是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如果同旧事物相比，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这个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欺哄劳动者方面得到的成就。”（《给美国工人的信》）我们在肯定新生事物的同时，从来不否认它还存在缺点，需要加以克服。我们坚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依靠广大群众，新生事物在前进中的缺点，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任何对新生事物的讥笑嘲讽、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列宁：《伟大的创举》），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

当前，我们正在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政策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为了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更好地巩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成果；是为了更好地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不难理解落实党的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就会错误地估计形势，由此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乘党整风之机，利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利用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跳出来反对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九六二年，当我们党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时，刘少奇跳出来大搞工业



“下马”、农业“退够”，攻击教育革命是“乱、糟、偏”，妄图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忘记了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就会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有的人不能正确地看待落实党的政策，而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说明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还很不理解。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认真总结经验，避免犯新的错误。

在新旧事物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新生事物一边，同维护旧事物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毛主席在这方面的光辉论述和伟大实践，给我们树立了典范。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主席热情赞扬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好得很，痛斥了陈独秀诬蔑农民运动的反革命理论。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主席批判了林彪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主义论调，坚信革命高潮一定到来，坚信井冈山根据地的星星之火，必将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和按语中，毛主席驳斥了刘少奇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种种谬论，坚决支持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生事物，也都是毛主席的热情支持和培育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在当前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斗争中，回顾毛主席的伟大实践，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倍感亲切，使我们懂得应该怎样正确地看待和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同一切反对新生事物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

支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对新生事物的实质，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开历史的倒车。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坚决打击；对于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必须进行批判，分清路线是非；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则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帮助他们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认真总结经验，采取积极措施，帮助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克服前进中的缺点，使它更加健全、更加巩固，向前发展。“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资本主义的旧事物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必将不断地涌现，在迈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齐彦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对待犯错误干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时候，重温毛主席的教导，以提高执行这一方针的自觉性，是很必要的。

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毛主席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

毛主席的教导，体现了我们党的高度原则性和严肃性，也体现了党对干部的关怀、爱护和负责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贯串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对犯错误的干部以教育为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我们党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干部犯错误，大多数是能够在党的正确路线领导和教育下加以改正的，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是极少数。犯错误必然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这是坏事，但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接受了经验教训，就能够变得更聪明一些，把工作做得更好些，使坏事变成好事。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不是歧视他们，嫌弃他们，而是坚持进行教育和再教育，既开展严肃的批评，又进行热情的帮助，做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他们一道继续为革命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重申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且指示我们：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由于我们党贯彻执行了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教育和挽救了犯错误的干部，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各类干部都是适用的。无论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犯了错误，都要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基础上，认真执行这个方针。只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引导他们改正错误，接受教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革命的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那些犯过错误的老干部，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做好，以便充分发挥革命老干部的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级领导班子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各条战线都选拔出一大批新干部担任领导工作，这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增加了新的血液，新的力量。我们各级党组织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对他们认真进行培养、教育，使他们更好地经受锻炼，茁壮成长。我们许多革命的老干部，都是经受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这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锻炼，才逐步成长和成熟起来的。新干部的成长，当然也是这样。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侵蚀和影响下，有的新干部也难免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应该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严格要求他们，热情帮助他们，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那种轻视对新干部的培养、教育，对新干部的缺点、错误抱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是不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

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首先要对犯错误的同志有一个团结的愿望。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批评势必无限上纲，一斗争势必把事情搞乱。这就要求我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辩证的、具体的分析，不但看他们的一时一事，而且看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看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一贯表现，给以恰当的评价。应当看到，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不是敌我矛盾，就总是既有缺点、错误和消极因素的一面，又有优点、成绩和积极因素的一面，有的还曾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只要他们改正了错误，以后还可以做好工作。这样全面地看问题，避免否定一切的片面性，才会满腔热情地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在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批评或斗争的时候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另一方面，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来说，则应当虚心接受党的教育和群众的批评，**严于解剖自己**，下决心同错误的东西彻底决裂，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如果**讳疾忌医**，拒绝同志的批评和帮助，就会在错误的泥坑里越陷越深，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为了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必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弄清思想，接受经验教训。弄清思想是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前提。我们讲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



基础上的团结。这种革命的团结，只有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实现。那种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取消思想斗争，回避矛盾的做法，表面上看似乎是讲团结，是爱护同志，其实是危害团结，是害了同志。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同志，不去批修正主义，不去批资本主义，不向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开展斗争。用这种思想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就会一味迁就，甚至包庇纵容，使犯错误的同志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惩前”才能“毖后”，“治病”才能“救人”。不进行“惩前”和“治病”的工作，就不能达到“毖后”和“救人”的效果。没有积极的思想斗争，就不可能达到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

许多同志犯错误，主要是受了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弄清思想，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帮助他们分清路线是非，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抵制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侵蚀的能力。这就必须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认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性与危害性，真正与之划清界限，作坚决的斗争。党内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不仅要分析他们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要分析犯错误的环境，错误的社会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使他们能从阶级斗争这个根本问题上接受教训，提高觉悟。这是转变人的世界观的工作，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说服的方法。我们应当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战胜各种错误思想，把绝大多数犯有错误的同志教育过来。同时，应当相信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同志是能够接受教育，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只要犯错误的同志愿意改正错误，并且认真实行改正，就要信任他们，团结他们一道继续工作。强调思想教育，当然并不排除组织处理和组织上的整顿。清除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对极少数严重违反纪律的党员和干部，实行必要的组织处理，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加强党组织战斗力所需要的。但是，对人的处理应采取慎重态度，贯彻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草率从事，是不符合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的。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充分发挥革命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社会主义服务。认真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把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同志，教育过来，继续革命，这是加强党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一环。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不断总结经验，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前进

坚持青年同工农结合的正确路线

——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

石 凌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中，通过对中国革命任务、对象和动力的分析，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了革命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性，给青年工作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几十年来，我国广大青年在这条路线指引下，坚持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对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毛主席制定的这条正确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千百万知识青年实践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所提出的路线，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满怀壮志豪情，奔赴农村，奔赴边疆，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的热潮，把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广大知识青年同贫下中农一起，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战天斗地，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代新人正在茁壮地成长。他们正在逐步使自己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当了农村基层干部，有一大批成了学习理论的骨干，担任了农村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农业技术以及科学研究等各方面工作，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他们以实际行动，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工农的传统观念，给那些对青年



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持怀疑态度的人以很好的教育，给那些反对派以有力的回击。实践证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的重要措施，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它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农村的建设和推动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应该坚持这样做下去。在当前，重新学习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对于我们继续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做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批判和抵制某些违背毛主席路线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是有很现实意义的。

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这就清楚地说明，青年们是不是坚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一个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问题。任何一个青年人，只要他想投身革命，就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除此没有别的道路。同时也告诉我们，是不是积极引导和努力帮助青年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在青年工作中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革命青年要坚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主力军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群众的事业，根本的力量是工农群众。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作中，反复强调了工农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虽然不同了，但是革命的主力军，依然是工农群众，即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



主义，最后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没有广大工农群众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是办不到的。因此，我们按照毛主席制定的路线，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出发，引导青年走向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经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他们总是要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他们不是依附于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依附于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服务，二者必居其一。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两个阶级都要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把青年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我们坚持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路线，积极引导和努力帮助青年紧密地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就是要使他们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服务。否则，路线不对头，青年们脱离工农群众，就会被资产阶级拉过去。要不要青年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关系到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关系到能不能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我们按照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把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富有革命的热情，有为工农群众服务的强烈愿望。但是，正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指出的：“**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种情况，使一部分青年人容易忽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阶级敌人则总是利用这一点煽动某些青年人脱离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引导他们到工农群众当中去，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从中学习工农群众坚定的阶级立场、高度的



路线觉悟、崇高的思想品质和彻底的革命精神,就可以使他们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轻视工农的反动世界观的影响,在思想感情上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同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为工农群众服务。工人和贫下中农当中的知识青年,也要坚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虚心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服务。

坚持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路线,还有助于解决理论同实践的结合问题,使他们把从书本上学来的不完全的知识变成比较完全的知识。知识青年读了几年书,有了一些书本上的知识。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让知识青年到工农群众当中去,把学到的书本知识应用于群众的斗争实践,在实践中对它加以检验、丰富和发展,这样就可以使他们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掌握比较完全的、有用的知识。那种认为只有在学校课堂里学到的书本知识才算知识的看法,是片面的。毛主席关于什么是知识的问题,曾经作过精辟的阐述,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整顿党的作风》)要掌握这两门知识,光靠关门读书,是办不到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许多学生从小学读到大学,十几年不接触工农群众,不接触实际,能说是掌握了这两门知识吗?实践证明,那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办法。我们要把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必须让他们在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中进行锻炼,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要是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就必须这样做。

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肯定了当时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毛主席指出:**“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



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当时的延安青年，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走同工农结合的道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批判了几千年来旧的传统思想，批判了孔孟之道，成为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这个光荣传统，把毛主席制定的这条正确路线永远坚持下去。

要不要坚持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知识青年要不要上山下乡，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和林彪，都是青年工作正确路线的反对派，都是反对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都是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在青年问题上做文章，竭力散布什么“读书做官”、“下乡镀金”和“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青年引上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群众的邪路，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作中，深刻地批判了反对革命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错误倾向，并告诫广大青年说：“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我国广大青年没有忘记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深刻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对青年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坚持了正确的方向。他们就是在反对“那股黑暗的逆流”的斗争中，“向光明的前途进军”的。但是，这个斗争并没有结束。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总会有人反对正确的路线，反对革命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我们必须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黑暗的逆流”，同反对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种种错误倾向作斗争。

千百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大事情，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是并不奇怪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需要按照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和政策，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如果因为存在着缺



点和问题就看不清主流，对这项工作发生怀疑和动摇，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也是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我们应该为党的事业和青年们的前途着想，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从各个方面创造条件，支持青年上山下乡，引导他们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有的青年思想上出现反复是难免的，这就需要我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在生活、学习、工作方面的实际问题，要积极地帮助解决。对于当了干部的知识青年，要注意教育他们继续同群众结合在一块，不要把他们从群众斗争的土壤中“拔”出来，割断了他们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对于每一个知识青年来说，要解决一个真扎根还是假扎根的问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决不能只干一阵子，做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而要树立坚持在乡村干一辈子的思想，做一个铁心务农的革命者。下乡两三年，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难的是一辈子扎根农村。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把现实的革命斗争同共产主义大目标联系起来，把在农村从事的每一项平凡的劳动都看成是实现伟大理想的实际步骤，自觉地同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一起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服从国家的需要。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没有长期在农村干革命的思想，虽然身在农村，也很难同广大贫下中农结合在一块。所以，这个真扎根假扎根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真结合假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同贫下中农就会有共同的语言，对农村就会有深厚的感情，即使有什么歪风吹来，也不会发生动摇，能够顶得住，在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道路上走到底。

现在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在毛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号召。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改天换地的斗争。广大知识青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可以在学大寨的运动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同时，这样一个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又为青年们提供了最好的学习课堂，他们可以在这场斗争中同广大贫下中农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毛主席制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永远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

叶 新

毛主席早就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主席规定的这一方针，是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总结了国内外教育领域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刘少奇、林彪一类，为了把教育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都曾经千方百计地抵制、破坏和歪曲这一方针。尽管刘少奇、林彪的阴谋已经破产了，但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很激烈，还会长期存在。教育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这几年才刚刚开始，我们的战斗任务还很艰巨，这条征途是很不平坦的。但在任何时候，无论遇到什么风浪，我们对毛主席规定的教育方针决不能动摇，一定要在斗争实践中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使教育革命在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

在阶级社会里，从来不存在什么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列宁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你们都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多么虚伪。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他们从来不想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标榜什么“教育就是传授知识”，好象他们的教育是超政治的，这完全是照抄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他们所传授的知识中，渗透着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反动观点，其目的是为了把教育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我们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要求教育要同



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它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斗争，使它成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就必须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德育是统帅，居于首要地位。它决定着智育和体育的方向，是要解决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要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首先应当培养具有高度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战士，在这个前提下，努力学好文化，锻炼好身体。智育和体育，就是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解决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只有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他们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对于教育质量，应该从德、智、体三方面来看。但有的人则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口头上也承认要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而实际行动上却仍然习惯于把智育当作第一位的问题来抓，并在智育中又把书本知识教学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抓。教育战线上有一种议论认为，这几年来批“智育第一”批错了，使智育放松了，书本知识教学放松了，总之一句话，教育质量下降了。这种论调究竟对不对？是否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这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深思的问题。

毛主席历来强调“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如果不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怎么可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呢？列宁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在准备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的影响，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俄共（布）党纲草案》）如果不把无产阶级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怎么可能培养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一代新人呢？而“智育第一”，是同列宁的有关教导，同毛主席关于“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把德育放在第一位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的。把智育放在第一位，势必要取消德育的统帅作用，取消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以资产阶级政治为统帅。因此，“智育第一”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在这种路线支配下，学生除了整天死记硬背那些脱离实际的书



本知识外，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统统不知道，不仅越读越蠢，而且身体也会搞坏。如果说，培养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就叫做“教育质量高”，那么这种“高质量”显然不是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需要的，而是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智育第一”这种修正主义的谬论，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的损失难道还少吗？宣扬“智育第一”，就是要把知识变成个人的资本。从封建阶级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资产阶级所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套反动的传统观念不知毒害了多少青年。反对批判“智育第一”，实质上就是否定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就是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认为批判“智育第一”就是意味着放松智育，这完全是一种曲解。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在抓好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必须抓好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学好社会主义文化，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通过社会主义文化课，向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这对学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从来认为，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为了剥夺资产阶级在知识和技术上所占的优势，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无产阶级抓好智育是完全必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需要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学到比较丰富的社会主义文化知识。但是，我们抓智育和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抓智育的。我们所要学习的文化，是贯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对三大革命运动真正有用的知识。我们抓智育，要特别注意学科的思想政治方向，打破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体系，抓好学科领域中的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辩证唯物论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斗争。这种学习应当是生动活泼的，不是死读书。如果让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否定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使师生只记得“专业”，忘记了“专政”，忘记了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那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会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学校就会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沉痛教训，我们决不应该忘记。

在我们同旧传统观念实行决裂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总是妄图利用各种旧思想



来腐蚀青少年，这本来是不足怪的。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总会发生对青少年的争夺仗。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搞好教育革命，坚持青年同工农相结合的方向。如果不是采取加强革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反而否定教育革命，否定青少年学生的大多数，发出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论调，那就站错了立场，是在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有些人曾把学生作文中的错别字、句子不通的现象当作笑话传播，以此证明“教育质量下降”，必须关门死读书。其实，这种手法也不是新发明。嘲笑、打击学生的事情，历来就有。鲁迅曾经针对某些文人学士抓住学生考卷中的笑柄而“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说：“我以为既是学者或教授，年龄至少和学生差十年，不但饭菜多吃了万来碗了，就是每天认一个字，也就要比学生多识三千六百个，比较的高明，是应该的，在考卷里发见几个错字，‘大可不必’飘飘然生优越之感，好象得了什么宝贝一样。”在今天，有人还想抓住学生的错别字当作“什么宝贝”，除了想显示自己比青少年“高明”、“优越”之外，还有一层，就是指责教育革命，为旧教育制度辩护。其实，可笑的不是那些蓬勃向上的广大青少年，而是那些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青少年的人；应该受指责的，不是正在发展中的教育革命，而是那些站在教育革命之外、用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来攻击新生事物的人。

就无产阶级的智育而论，我们不能单纯地看学生掌握了多少书本知识，主要是看学生对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知识学得怎样，其中更要看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什么是知识？毛主席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而要教好、学好这两门知识，就必须使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继续搞好开门办学。旧学校课程太多，考试对学生搞突然袭击，害死人。近几年来，教育战线根据毛主席关于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导，广泛实行开门办学，冲破了过去的旧框框，使教育和生产劳动、理论和实际开始结合起来，学生不仅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学到了比较完全的知识，体质也比过去那种埋头读书的时候有了明显的增强。这说明，不仅搞好德育，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要搞好开门办



学，就是搞好智育和体育，也需要实行开门办学。不能把抓文化课（包括基础理论课）同开门办学对立起来。学生学的书本知识，即使都是正确的，如果不接触实际，也很难学懂，很难把它们变成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开门办学，学生经过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过程，才能正确地接受前人总结出来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知识。当然，开门办学要坚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原则，既要合理地安排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也要保证上社会主义文化课的时间。学生走出校门学工、学农，应当结合生产劳动进行文化课教学活动，或承担一些科研任务。在开门办学的过程中，如果不抓好思想教育和教学活动，同样不能使学生获得全面的知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办学要开门，开门要办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有用知识和本领。

实行开门办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重要途径。围绕着开门还是关门，真正的开门还是形式上的开门，也充满着激烈的斗争。有那么一些人总喜欢用旧尺子来衡量新事物，认为开门办学这也“不正规”，那也“不象样”。他们寻找借口，企图把青少年学生重新关在校门内死读书。他们要关的是广大师生同工农相结合的门，也就是通向三大革命运动的门。学校的大门，经过这几年教育革命好容易才打开，现在又要关起来，这不是要走向回头路吗？但是，别忘了，回头路是走不通的，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和工农群众是不会答应的。列宁说过：“学习、教育和训练如果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青年团的任务》）我们就是要对旧的教育制度、教学体制和方法进行彻底改造，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道而行之，继续把学校办到工农群众中去，办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

在毛主席教育方针的指引下，教育革命正在蓬勃发展，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起来，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教育战线出现的许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珍惜这些新生事物，使它们不断地完善起来。我们要进一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好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坚决批判修正主义，永远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百折不回地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牢记党的基本路线

上海市第二中学党支部

我们上海市第二中学在解放前叫“务本女中”，是一所有七十多年历史的老学校。解放后十七年，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学校虽然挂上了社会主义的牌子，但走的仍然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老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荡涤了学校里的污泥浊水，使这所老学校焕发出革命的青春。在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下，近几年来，全校组织了近二百个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小组，参加人数达一千六百多人，占全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师生员工广泛地参加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在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中，他们走向工厂、农村，接触了一百八十多个单位，向工农兵群众学习。在教学领域内，开门办学的路子越走越宽，学生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的劲头越来越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学校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并且有十九人参加了上海市第五届运动会，有两人参加了全运会。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九年，和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为什么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些年来为什么我校能出现这样蓬勃向上的景象？我们的体会，关键在于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进行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教育青少年这个问题上来。因此，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引导学生通过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按照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教育青少年树立革命理想，敢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我校七五届的一个红卫兵，在中学一年级时曾经贴出过一张批判教学领域里唯心主义的大字报，这几年他一直坚持学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他又组织了“金训华小组”，准备毕业后奔赴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今年八月十八日他向学校党支部递了入党申请书，并提出要去黑龙江插队落户。象这样在政治上、思想上朝气蓬勃的红卫兵，在我校不断涌现。一代新人的成长，本身就是对“一代不如一代”谬论的批判。

为了使学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批判“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谓“智育第一”，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罢了。我们这所学校，解放前办了整整半个世纪，它标榜的是所谓超政治的“务本”，可是，从师资的配备、教学的内容到学生的出路，哪一条没有打上资产阶级政治第一的烙印？解放后，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我们这所所谓“重点中学”，大搞“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有的学生毕业后考不上大学就对前途失去信心，这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又是什么？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智育第一”的流毒也仍然没有肃清。我校有一个红卫兵干部，他原先政治热情蛮高，可后来却变得对班级的红卫兵工作能推就推，十分冷淡，因为他整天脑子里转的是“电子”。他原来是这样想的：“我看到一些有技术专长的人，在社会上蛮吃得开，心想，学到东西，装在脑里，人家抢不走，骗不了；又听人说，技术是敲不碎的橡皮饭碗，因此，就一门心思钻起‘电子’来了。”这个学生在一段时间里的表现，不正是说明“智育第一”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吗？事实教育了我们，要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必须坚持在学校的一切工作中，“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我们批判“智育第一”，重要的一条，是要充分相信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威力。只要我们真正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家了，学生为革命而学文化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能得到充分的调动。我校七四届有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平时调皮捣蛋，学习不用功，各门功课都差劲。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认为自己反正是独子，将来笃定留城市工作，学习好坏一个样，乐得优哉游哉。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后，找他谈心，与他一起学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谈革命理想，还让他参加马陆公社的社会调查，看看社会主义农村的远景规划。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远大理想，和他原来缺乏革命理想、懒散的样子一对照，使他激动得不得了。我们又启发他：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应该怎样接好革命的班。经过教育，他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还买了不少农业科学小丛书，加紧自学，准备立志务农。可见，抓好政治思想工作，对促进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是十分重要的。

上文化课本身，决不是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标榜的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



而是充满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开展，对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也日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在这方面，我们的体会有以下三点：

第一，要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不应该只满足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高涨，还应当认真地抓好学生为什么而学习，即学习的方向问题。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只有坚持为革命而学，所学的知识才能为无产阶级所用。有一次，一个班级到校办工厂电子车间边学习边劳动，学生们对装收音机可感兴趣啦，到下班时刻，不少同学还留在学校里抓紧学习，不肯回家。但同时也发现，有些学生对承担国家任务的劳动却并不热心，很松垮。这一“紧”一“松”之间，暴露了学习动机上的问题。于是，我们引导大家学习《国家与革命》，又请退休老工人给大家上为国家为人民刻苦研制太阳灶的“思想课”。通过一系列教育，端正了学习动机。他们除了学习一定的理论知识和科学技能外，还组织了三个小队，到被单五厂试制、安装了光电自动探纬器，到郊区为贫下中农修理电动机，架设电线，还和学校附近的商业单位一起设计了自动控制售酒机。

第二，必须坚持开门办学的方向。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学生关在校内，不懂得工人怎么做工，农民怎么种田，商品怎么交换，脱离实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我们就是要同这样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引导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使学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到比较完全的知识。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因为他们毕业后是要上山下乡的，中等学校一定要为此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熟悉农业和工业生产，熟悉劳动人民。开门办学要取得预期的效果，根据我们的体会，必须做到有目的、有计划、有安排。所谓有目的，就是要坚持在开门办学中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同时也要学习一些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所谓有计划，就是在每一学期开学时，对各门学科在这个学期搞哪些主要的开门办学项目，要做到心中有数；所谓有安排，就是在处理校外大课堂与校内小课堂的关系上，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开门办学的各个环节作科学的安排，各项措施要落实，使大、小课堂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几年来，我校各学科都根据各自的特点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教学网，为深入搞教改打开了局面。

第三，必须根据各门学科的特点，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比如教代数、几何、三角，过去讲数不讲形，讲形不讲



数，形数分离，结果给学生灌输了形而上学思想。现在我们组织教师学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数学〕篇，在数学课中既讲形数之间的差别，又讲二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使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渗透到这门学科中去。过去的物理课讲蒸汽机的发明，归功于个别科学家的天才，宣扬了历史唯心主义，现在着重强调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就使学生学习的过程成为接受生动活泼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过程。

“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为人民服务的知识本领，而且要有强健的体魄。旧教育制度提倡死读书，残害青少年身体，这必须坚决批判。几年来，我们在抓好德育和智育的同时，还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采的体育活动。除了坚持两课两操活动，有计划地抓好体育教学外，还在普及的基础上，建立了篮球、乒乓球、田径等男女运动队。夏季长游，冬季长跑，春秋两季召开全校运动会，已经成为传统，学生的体质大大增强。在抓体育过程中，我们还注意批判锦标主义、技术第一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抓好体育作为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转变学生思想的重要一环。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学校应该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搞教育革命的过程中，我们总是尽可能充分发挥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每年我们总要在学生中树立一批先进典型，使学生自己教育自己。我们还在学生中广泛开展红哨兵、红宣队、互帮互学等活动。对学生中贴出的大字报，只要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都加以热情的欢迎和支持。同时，我们还注意调动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这样的老学校的特点是老教师多，有些教师过去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对于这些教师，我们根据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针对不同特点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正确吸取经验教训。教育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在业务上也有一个再学习的问题。因此，我们注意组织教师的政治和业务进修，使教师队伍更能适应教育革命形势的发展。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决心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革命大批判，**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贡献我们的力量。



开门办学 越办越好

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党支部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学校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的精神，实行开门办学，使学校开始与沸腾的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一九七一年，师生自己动手，艰苦奋斗，用一口大锅、一个大缸作基础，创建了校办工厂炼油车间，后来又在北京齿轮厂协助下，创建了汽车附件车间。此外，我们每年还组织师生下厂下乡，进行学工、学农，野营拉练。这就使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

新生事物的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教育这块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很复杂，很尖锐，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刮起了一股风，说是学校这样办下去，不象个学校的样子，学生的质量不如文化大革命以前了。在这股风的冲击下，教育战线出现了与挂钩工厂“脱钩”、从学农基地“撤点”的倾向。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再一次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论述。毛主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体会到，要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就必须开门办学。如果象文化大革命以前，把学生关在学校的四堵墙内，整天埋头读死书，教育如何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呢？学生根本不接触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实际，就不能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来，教育还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吗？在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显著变化，我们认识到，开门办学，是改变“三脱离”状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是不是坚持开门办学，是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能动摇。

思想认识的统一和提高，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继续搞好开门办学的决心。面对“脱钩”、“撤点”的倾向，我们顶住了这股风，而且采取措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开门办学基地。我们自力更生，对白手起家的校办工厂炼油车间进行了设备更新，并在北京齿轮厂的协助和学校师生的努力下，不断扩大汽车附件车间的机器设备和厂房，使各种机床由建厂初期的六台增加到现在的二十六台；我们进一步巩固了与北京齿轮厂的学工挂钩，还与空气调节设备厂建立了挂钩关系，保证每月有三个班的学生到这两个厂学工。我们还巩固了在顺义县马坡公社的学农基地，并且和我校毕业生插队地点延庆县城关公社以及近郊东升公社塔院大队四队建立了挂钩关系。去年，我校师生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又创建了一所农村分校。此外，为了学军、学商，我们还与一些部队和商店建立了联系。

在开门办学过程中，我们始终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引导学生参加实践，学习理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大大促进了学生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思想感情的变化。有一个同学，刚下乡时与老贫农同睡一个炕，他嫌大爷脏，不愿挨着睡，总想离远点。第二天，小组的同学开座谈会，请贫农老大爷参加。这位老大爷在会上回忆了苦难的家史和解放后生活的变化，使那个同学受到很大教育，从此他不再嫌老大爷脏了，并主动给他家挑水，扫院子。今年夏季学农拉练，我们组织学生学马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同学们认识到，学农拉练是走毛主席指示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是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具体行动。大家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冲天干劲，很受感动，决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同学们夜里偷偷爬起来到场里和贫下中农一起夜战，下雨天不约而同地跑去抢场。看到学生这些进步，贫下中农很高兴。学生们的这些变化，是思想感情的变化，是世界观的变化，这只有在开门办学的大熔炉里才能产生，关在教室里根本不会出现。

有人说，开门办学后，学生学到的知识少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什么是知识？毛主席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



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学习这些知识，读书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根本不接触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际，书本上的知识就很难学懂，即使死记硬背一些空洞的条条，也不知道如何应用，更不用说根据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原有的知识了。现成的书本知识，对于没有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来说，还是片面的。“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开门办学，正是使学生学到比较完全的知识的的重要途径。我校学生通过学工学农，大多数都会插秧、间苗、施肥、割麦、脱粒、开车床、炼机油，在农村分校的学生还会养猪、养鸡、养羊、种菜、脱坯、盖房，难道这些不是知识吗？这些知识，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学校能学到吗？更重要的是，学生有了感性知识以后，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和牢固地掌握书本上的理性知识，并把它变成自己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我校学生通过学军，实际参加了一些炮兵测量活动，此后再学习三角、几何等数学课，就不感到那么抽象难懂了。在此基础上，教师带领学生帮助当地社队对水渠改道工程进行实地测量，选出最合理的方案，绘制出工程规划图，计算出工程土方量及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日。贫下中农说：“这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这个例子说明，学生要学习那些真正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用的知识，并且做到学了会用，学校就必须开门办学。

开门办学是不是不要文化课呢？不是。有的人把开门办学与社会主义文化课的学习对立起来，似乎要学文化课，就不能开门办学；要开门办学，就不是以学为主了，这恰恰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门办学，只要有明确的要求、制度和具体的措施，不仅不影响学习文化课，反而能够促进学科的教改，促使小课堂教学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质量。关门办学时，师生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即使书本上有一些联系实际的内容，教师在讲解时也很难讲得生动、具体，结果仍不免是教室里炼钢铁，黑板上种庄稼。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五年级解析几何讲等速螺线，教师举苍蝇爬唱片为例来讲轨迹方程，严重地脱离实践。现在，教师用车床上的三爪卡盘为例，引导学生思考卡盘上的三个爪为什么可以同时伸缩，以保证加工零件的中心始终位于卡盘中心线，学生在校办工厂和北京齿轮厂学工工时都在车床上干过活，对这种情况很熟悉；教师在课堂拆开卡盘让同学看清内部构造，并且组织学生自己动手拆卸与安装，然后进行分析，用极坐标法写出这



一曲线方程，再进一步利用等速螺线的性质，进行几种规格凸轮设计。这种教学，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小课堂的结合，理解与应用的结合，学生看得懂，记得牢，用得活。文科的教学，也注意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三年级语文课作文写商业战线上的新人新事，学生到地安门商场边劳动边调查，写出了内容丰富、语言生动的好文章。这和开门办学以前学生写的那些空洞无物的作文，恰成了鲜明的对照。事实说明，开门办学不是不要文化课，而是使社会主义文化课上得更加生动活泼，理论和实际联系得更好。

由于实行开门办学，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显著提高，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这就有利于学生毕业后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组织学生学农，比较注意从思想上、文化上、身体上、生活上为将来扎根农村作准备。我们经常请社队干部、贫下中农、回乡和插队知识青年座谈，开展革命大批判，学生受到很大教育。七三届和七四届学生毕业时，绝大部分都能自觉地报名到远郊区延庆县插队落户。有一个学生，他的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了，当组织上准备留他在城里工作时，他说：哥哥、姐姐上山下乡代替不了我，我们青年人都应该走毛主席指引的路。他坚决到远郊区插了队。学生到农村后，绝大部分都表现出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能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同时，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领也一届比一届强。一个担任养猪工作的学生，平时刻苦钻研，初步试制成功一种新饲料，既营养丰富，又节省粮食，受到社员的好评。经过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有些学生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学生担任了理论辅导员、拖拉机手、会计、电工等职务，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贫下中农说：“这样的学生，来多少，我们要多少。”

新生事物总难免有缺点和不完善的地方，在发展过程中也会走一些弯路。我们对开门办学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从现在的情况看，我校开门办学的步子还迈得不够大，在大、小课堂的结合上，也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但这些不足之处，是前进中的问题，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目前，我们学校教育革命的形势很好。师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情很高。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不断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不断总结经验，就可以使开门办学越办越好，就可以进一步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

略 论 方 腊

史 文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在这里，毛主席明确告诉我们：宋江是投降派，方腊是革命派。最近，我们在皖南、浙西一带，对方腊的革命事迹进行了实地调查，搜集了一些谱牒、碑刻和传说材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方腊起义的有关材料，恢复被《水浒》作者歪曲了的方腊的革命派面目，肯定方腊领导农民革命的历史功勋，可以帮助我们划清革命派与投降派的界限，总结历史经验，服务于现实的阶级斗争。

—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农民革命英雄方腊的阶级地位过去被剥削阶级的记载所歪曲了。

方腊的阶级出身是什么？过去的封建文人说他“家本中产”，“有漆林之饶”，并当过“里胥”，起码是个中小地主。最先提出此说而被经常引证的，是南宋的《独醒杂志》。它的作者曾敏行，世代业儒，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派。此人二十来岁便“病废”在家，这本书是他关在房子里写的。其中的记载，往往“不辨而述”，“失之不考”，有的“尤如儿戏”，不足为据。^①我们最近调查，大量材料证明：方腊是今安徽歙县人^②，曾在歙县、青溪先后为佣，是佣工出身的贫苦农民。元代



徐直之写的《忠义彦通方公传》载：方腊，“其初歙人”，后来在青溪帮源方庚家做“佣人”。^③与徐直之同时的淳安（青溪）县尹刘彭寿，在他的《宋故承信郎彦通公墓亭记》中更明确地说：宋宣和间，“有歙人名腊者，来佣于家”。^④徐直之是方庚后代的亲戚，有关方腊为佣的情况，来自方家祖辈的传述；而刘彭寿生平喜听“田里遗事”^⑤，他的记载也应当是可信的。清初修成的《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有三处提到方腊是“佣人”出身。一是卷二选载的《桂林方氏谱序》中说方腊是方庚“家佣”；二是卷十二“余坡分派世系”前言里提到：“宣和间，（方庚）遭佣人方腊叛戮全家”；三是同卷“方有常”条，也提到方腊“向佣于家”。此外，民间传说方腊还做过桶匠。当时皖浙山区的桶匠，沿门替人做活，也属于短工、佣工一类。

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农民是革命的阶级，而其中雇农、贫农是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主力军。“佣工”即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在人身上受凌辱，“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宋代，贫苦的“客户”或“佣工”，处于最悲惨的农奴地位，“田主”、“富民”对待他们“鞭笞驱役，视以奴仆”，^⑥而方腊的雇主方庚之父方有常，是大米商、大地主，又是“大朝奉”兼“里正”；方庚本人，则是帮源一霸，那一带“众皆惮之”^⑦。方腊在他家为佣，其所受压迫和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使方腊心中早就埋下反抗的火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方腊便是从一个雇佣的奴隶走上革命道路的。

据南宋初年编写的《严州图经》记载：“方腊起歙岭”，即在今皖南歙县境内起义。这是关于方腊起义的最早记载。这次起义的情况，《山郭方氏源流族谱》记载得比较清楚：宣和二年（一一二〇年）十月初九，方有常、方庚全家由青溪帮源迁至邻近的歙县七贤村，“方腊党寇”来该村，手执锄铲“招舞”，杀了大地主方有常，并“缚杀家属四十二口”，只有方庚“跳墙走去”，才得逃脱。徐直之在《忠义彦通方公传》中也明确说过，方腊“首屠公家而起”。《山郭方氏源流族谱》和徐直之的记述，无异是对《严州图经》最好的注释。

毛主席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



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腊“起歙岭”的史实，不仅反转过来印证了他出身于佣工的可靠性，而且进一步表明：这次起义是从对土豪劣绅的营垒进攻开始的，代表了当时贫苦农民的阶级利益。曾敏行制造方腊“家本中产”、又为“里胥”的说法，歪曲他的阶级出身，其目的无非是歪曲这次起义的阶级基础，掩盖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有的史书不仅把杀方有常一家的地点误定为帮源，甚至把方腊与方有常、方庚说成是长幼兄弟关系，把方腊杀方有常一家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说成是父子相残、兄弟阋墙的家庭纷争，也完全出于同一目的。

方腊“起歙岭”的时代，宋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秋。以宋徽宗为首的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满足荒淫无耻的享乐需要，一再借口“租课太轻，不足于用”，下令“添立租课”。东南一带征发“花石纲”，闹得“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⑧。就在这举国上下民怨沸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方腊在歙县七贤村杀了方有常一家之后，便“还处帮源”^⑨，以当地穷苦农民信仰的“食菜事魔”教为纽带，把群众组织起来，并在宣和二年十一月（一说是十月）于青溪帮源起兵。方腊在一处漆园里发表了誓师演说。他义愤填膺地揭露了封建剥削制度的腐败，控诉了“官吏侵渔”、苛求无已的罪恶，反映了“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的悲愤心情，并且发出了“仗义而起”的革命号召。^⑩誓师之后，“贫乏”之民闻风响应，“数日有众十万”。^⑪就这样，方腊在东南一角擂响了向宋王朝进攻的震天动地的革命战鼓。

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区别革命派和投降派，根本的一条是看他制定和执行的是什么路线。

方腊起义后，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南面为君，提出“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的革命目标，^⑫决心推翻赵宋王朝。这是一条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封建制度的象征，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国家的最高权威。不反皇帝，就谈不上反封建，就算不上真正的农民革命；不反皇帝，就会“顺”皇帝，“保”皇帝，最后必然接受皇帝的招安，成为投降派。方腊在起义中敢于树立推翻赵宋王朝的革命目标，说明他的起义路线反映了农民阶级



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

方腊在领导起义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实践了这条革命路线。

打击地方官吏。方腊义军所到之处，“唯搜求官吏”^⑬，“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⑭。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吏，是皇权在各地的支柱，正如马克思说的：“就象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对地方官吏的打击，是打击皇权的重要步骤。

打击地主绅士。义军所到之处，“劫富室”^⑮，“劫取大家财”^⑯，对于为害一方的恶霸，则毫不留情地镇压。在封建国家中，皇帝“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打击这个“基础”，就是打击封建势力，也就动摇了皇帝的统治地位。

攻城夺池，“横行州邑”。方腊在青溪起兵后，旋即占领青溪县城，接着便乘胜进军，“连陷郡县数十”^⑰。义军到处，“官军莫能挫其锋”^⑱。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到一一二一年元月，“永乐”大旗已飘扬在睦（今浙江建德）、歙（今安徽歙县）、杭（今浙江杭州）、处（今浙江丽水）、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衢县）等六州五十二县。“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只有把地主阶级控制的州邑郡县夺过来，才能拔掉各地的封建堡垒，朝着“混一”全国的大目标前进。

反对孔孟之道。方腊领导起义军在思想领域里向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进行斗争，批判了反动的理学。宋代理学是孔孟之道的哲理化。它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俯首帖耳地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方腊在漆园誓师时，就指出压迫剥削无理，号召人民“仗义而起”。义军到处，就焚烧传播孔孟之道的“学官”，镇压反动儒生。同时，起义军“不事神佛”，“尤憎恶释氏”，^⑲到处拆庙宇，毁寺观。宋代，儒、道、佛三教合流，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束缚人民的思想绳索。起义军反对儒、道、佛的斗争，就是摇撼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

方腊的路线是革命的，还表现在他提出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⑳这个革命的政治纲领中。这个纲领继承了农民革命的“均平”思想的光荣传统，并把它大大推进了一步。在农民阶级反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方腊“法平等”的纲领击中了封



建等级制度的要害。方腊领导的起义军，在政治上，无视“君臣上下”^②；在经济上，“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③；并提出“男女无别”^④的平等主张。这虽然还只是朴素的平等观，但却表现了同封建等级制度不妥协的精神。

正确的路线，必然是保护人民、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为人民所支持和拥护的。在方腊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起义军对人民秋毫无犯。安徽黟县“灵惠庙”还有南宋绍兴二十七年（一一五七年）刻的一块庙碑（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其中有“昨方腊等贼入界，保全生灵安业”之语，这是方腊起义军保护人民的历史见证。相传浙江桐乡县乌镇有座“哭送亭”，是当年乌镇人民哭送起义军由秀州退军的地方。人民群众对起义军真是一往情深，亲如骨肉。

对方腊的革命路线进行分析研究之后，就能清楚地知道，这支起义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真正的革命派。而《水浒》中的宋江，打出的是一面“替天行道”的白旗，推行的是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投降派。

三

革命路线确定之后，能否把这条路线坚持到底，这是检验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方腊革命精神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同敌人浴血奋战的过程中，不动摇，不变节，不受敌人利诱，不惧敌人威胁，具有崇高的革命气节。

方腊领导的农民革命的烽火在皖、浙地区越烧越旺，以致“东南大震”^⑤。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惶恐万状，采取了反动统治阶级惯用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军事镇压与政治诱降。宋徽宗在得到东南告急的“警奏”之后，在气急败坏地调集“京畿禁旅及秦晋蕃汉兵”杀气腾腾扑向东南的同时，曾三次降诏“招抚”。方腊及其领导的起义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反动派懂得用“招抚”的一手瓦解革命比之用武力扑灭革命要“合算”得多。这可以不烦一兵，不费一矢，就能把革命力量转化为反革命力量，把“对头”变成帮凶。宋徽宗在“招抚”的诏书中，提出了论“功”给“赏”，“以靖南土”^⑥。对于宋徽宗的诱降，以方腊为首的起义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一次，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招抚”诏书声称，起义军“如能束身自归”，“即优与推赏”，^⑦而在二十九日，方腊却“进逼杭州，……州即陷”^⑧，这对宋徽宗是当头一棒；宣和三年



正月，皇帝再下诏书，特地提高赏格，用重金高官来诱降起义军，也就在这个月，“方腊陷婺州，又陷衢州”^②，再一次把“圣旨”踩在脚下；第三次招降是在同年二月，诏书下后，“方腊陷旌德县及处州”^③，吓得守将自刎而死。北宋王朝的“招安”政策就这样破了产。

招安政策，对《水浒》中的梁山义军能起作用，而在方腊义军面前却一再碰壁，原因何在呢？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反动统治者的招安政策灵不灵，主要是取决于革命队伍内部的状况。《水浒》中的梁山，因为被混进起义军的地主阶级分子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推行“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路线，给敌人的招安提供了内部条件。而东南起义军是由坚持农民阶级利益的革命领袖方腊领导的，它的领导骨干、战士又大多是坚定的革命派和苦大仇深的农民，他们坚定不移地跟随方腊，虽“死于汤镬”^④而不背叛，这就使宋王朝的政治欺骗无机可乘。当然，革命洪流一泻千里时，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革命队伍里出现几个叛徒也是毫不足怪的。正如列宁所说：“**在各个革命政党和各个国家里，总有一些叛徒**”（《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在方腊起义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洪载那样的叛徒。洪载是方腊进军浙东时起兵响应的一个将领，在敌人招安政策的诱使下，他企图率部投降，但是，由于方腊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他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洪载的部属闻讯后，痛骂他为“洪逆”，表示誓不投降，忿然散去。后来大部分转入其他各部起义军，继续坚持斗争。

宋王朝“软”的一手失败了，就变本加厉地对革命进行残酷镇压。面对几乎倾巢而出的“官军”，方腊领导起义军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抗击。在杭州保卫战中，起义军同十倍于己的敌人白刃相接，尽管战斗失利，“然二万之众无一降者”^⑤；宣和三年四月，在帮源保卫战中，二十余万起义军“腹背抗拒，……流血丹地”^⑥，最后除部分突围外，留下的七万起义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方腊也不幸被俘，八月在汴京英勇就义。方腊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最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敌我力量的悬殊而失败了。

方腊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经过这次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宋王朝的反动统治被大大削弱，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这次农民革命的杰出领袖方腊，虽然牺牲了，但他那光辉的革命思想，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却成为后世农民革命极宝贵的精神财富，博



得了人们的景仰和爱戴。至今在皖南地区的休宁、歙县一带，还流传着有关方腊起义的一些歌谣：“粮食登场官府抢”，“石塔露水腊为王”，反映了方腊在“粮食登场”、石塔露出水面的时节，领导起义，抗拒官府，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贫苦农民，因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爱和怀念。以宋徽宗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把方腊起义镇压下去了，从表面上看，他们是胜利者，但“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宋王朝的反动统治受到沉重打击，地主阶级哀叹“江南由是凋瘵，不复昔日之十一矣”^⑬。整个地主阶级也正是在农民革命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逐步衰落下去。

方腊领导起义的全过程，说明了领导权掌握在革命派手里的重要性。由于方腊坚定地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具有英勇无畏、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使这次农民起义事业坚持到底，在历史上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我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方腊确是一个真正的顶天立地的英雄。方腊领导起义的过程也说明了，用革命思想武装群众，动员群众坚持革命路线，是克服投降危险的重要保证。方腊起义军所以能一再挫败北宋王朝的招降阴谋，就是因为方腊的革命路线深得人心。投降主义者没有群众基础，便无所施其伎俩。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当前的反修防修斗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评论《水浒》，要恢复被它歪曲了的方腊的本来面目，划清革命派与投降派的界限，歌颂革命派，反对投降派；还要认真总结农民革命的历史经验，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注：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

② 详细考证见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③④⑤ 《桂林方氏宗谱》

⑥ 苏洵：《嘉祐集》卷五

⑦ 洪适：《洪丞相奏文》（见《桂林方氏宗谱》卷六）

⑧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

⑨⑩⑪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 洪迈：《容斋逸史》

㉔ 《宋史·陈遵传》

㉕㉖ 方勺：《青溪寇轨》

㉗ 《南涧甲乙稿·处州东岩梁氏祠堂碑铭》

㉘ 《两浙名贤录》

㉙ 《高峰文集·乞禁妖教札子》

㉚ 《老学庵笔记》

㉛ 《宋史·童贯传》

㉜㉝ 《宋会要稿·讨叛》兵十

㉞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四

㉟ 王国维：《谈武林旧事》



从宋江看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

袁 青

毛主席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我们看到了宋江修正主义的投降路线产生、发展和破产的全过程。修正主义作为革命运动的对立面而存在，古往今来，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宋江的修正主义，虽有其特定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内容，但这种阶级投降的思想，却表现了一切修正主义的本质特征。抓住这个特征，揭露宋江的真面目，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胜利地进行反修防修斗争，是很有益处的。

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要狂热地鼓吹阶级调和论，鼓吹向压迫人民的反动派投降的思想。在投降派宋江身上，这个特点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宋江却极力美化封建皇帝，把皇帝说成是全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在宋江看来，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利害冲突，被压迫人民只要跟着他“替天行道”，“同心报国”，就会过“万民乐业”的生活，什么起义呀，造反呀，统统是没有必要的。否认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取消了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宋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修正主义投降路线，正是直接从这种否认阶级斗争的历史唯心论中引伸出来的。

为了宣扬被剥削阶级应当向剥削阶级投降的反动思想，修正主义者总是竭力把矛盾的对立面调和起来。在《水浒》中，宋江一直把宋徽宗赵佶看作“与民同乐”、“爱民如恐不及”的“圣君”。晁盖一死，宋江就在忠义堂上宣布了他的施政纲领：“同心合意，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替天行道”是地主阶级的口号。照地主阶级的说法，作为“天子”的封建皇帝，就是秉承上天的意旨来统治人民的，也就是“替天行道”的。宋江也提出“替天行道”的口号，实质上是要把农民起义军引到地主阶级的轨道上去。既然农民阶级和封建帝王都可以“一同替天行道”，那还有什么阶级对立、阶级矛盾存在呢？第二国际时期的叛徒考茨基，宣扬什么“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确有共同利益”。刘少奇、林彪也大肆鼓吹阶级调和论，散布什么“两和皆友”的谎言。



这些事实说明，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妄图在敌对阶级之间寻找所谓“共同点”，作为他们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

毛主席说：“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的这个论断，彻底戳穿了修正主义者宣扬阶级调和的骗局，深刻揭露了修正主义者阶级投降的反动本质。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发展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继续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这种矛盾和斗争，非到过程完结之日，即阶级消灭之时，是决不会止息的。抹杀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区别，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鼓吹阶级调和，正是修正主义的谬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考茨基之流鼓吹这种谬论，目的在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向资产阶级投降，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刘少奇、林彪鼓吹这种谬论，就是妄图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投降，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把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限制在剥削阶级允许的范围内，牺牲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迎合反革命阶级的政治需要，这是修正主义者搞阶级投降的一个突出表现。宋江的“反贪官”，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宋江认为，封建皇帝是好的，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除掉“贪官”、“奸臣”，百姓就会“云开见日”。宋江把皇帝与农民作为矛盾的一方，把贪官和奸臣作为矛盾的另一方，这就偷换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掩盖了他同皇帝及贪官、奸臣同属地主阶级的阶级本质。历史上真正的农民起义，都是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这种斗争，具有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性质。宋江“反贪官”，根本不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目的是为了保皇帝，维护地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宋江把农民起义限制在只反贪官这个地主阶级允许的范围内，转移了农民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改变了梁山起义军的性质，使它走上接受招安的投降道路，成为赵宋王朝的“忠义救国军”。封建统治阶级发出“不爱黄金爱宋江”的赞许，原因就在这里。

修正主义者鼓吹阶级调和，其实质就是阶级投降。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在阶级利益上的根本对立，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个“吃掉”一个的关系。“对一些人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修正主义者贩卖可以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实际上也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这种教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阉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和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加以颂扬，用“议会道路”限制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以微小的政治变动和点滴的社会改良欺骗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根本不去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块基石。他们对资产阶级实行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甚至到反动政府中去享受“肥缺”，从资产阶级的吃人筵席上分点残羹剩饭。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出现过陈独秀、王明等机会主义头子，他们都把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右派，妄图将革命斗争引向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道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己一党的私利。这些都是阶级投降主义的表现。事实说明，他们用限制革命的办法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最后就使自己完全堕落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与奴才。

革命队伍内部出现投降主义和投降派，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这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反革命阶级政策的产物。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最害怕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它们一方面用反革命暴力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一方面还要散布阶级调和的反动思想，妄图模糊革命人民的阶级意识，磨灭革命人民的斗争锋芒。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的革命烽火连绵不断，严重地威胁着历代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地主阶级为了扑灭农民革命的烈火，总是软硬兼施，实行“征剿”与“招抚”的反革命两手。所谓“招抚”，即是反动统治阶级的诱降政策。宋江搞阶级投降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封建地主阶级这种思想影响和政策在农民运动中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还存在着修正主义赖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投降主义的反动思想就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修正主义者就还会混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纲领、政策、思想以及在实践上的原则界限，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发动进攻。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就要求我们，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在各项工作中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批判形形色色的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调和思想，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把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发动群众 评论《水浒》

甘肃庆阳县八里庙大队党支部

评论《水浒》，要真正收到成效，“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大队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发动干部和社员群众，积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一个多月来，先后举办三期学习班，轮训骨干八十多人，召开各种类型的群众评论批判会九十多次，深入群众辅导宣讲三十多次，写评论文章一百多篇，创作诗歌二百多首。此外，还办了墙报、板报、专栏，编写和创作了一些评论和批判《水浒》的故事、漫画、文艺节目等。通过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评论《水浒》，干部和群众明确了参加这一斗争的重要意义，知道了什么是投降派，什么是投降主义路线，增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的自觉性，抓革命、促生产的劲头更大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正在扎扎实实地深入发展。

发动群众评论《水浒》，先要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克服一些思想障碍。针对有的同志认为评论《水浒》是思想文化界、领导部门的事，与农村关系不大，以及生产任务重、哪有时间评《水浒》等不正确观点，党支部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回顾历史经验，把评《水浒》同学习理论联系起来，使大家认识到，它决不是与农村无关、可搞可不搞的小事。

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的指示，回顾党内第九次和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使大家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懂得评论《水浒》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林彪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其罪恶目的就是要颠覆无



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和孔老二、宋江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但在搞复辟、搞倒退、搞投降等方面却一脉相承，贯串着一条反动的思想政治路线。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今后还会出修正主义，必须高度警惕。我们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和宋江这个古代投降派，应该而且必须同批判党内的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现代投降派，紧密联系起来，把评论《水浒》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认真搞好。

我们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的教导，回顾了二十多年来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批判《海瑞罢官》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重大斗争的历史经验，提高了干部群众对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自觉性。大家联系实际谈到，虽然有的人没看过《水浒》这部小说，但书中宣扬的剥削阶级“仁义”、“官禄”的反动思想，今天还在群众中散发着臭气。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有的人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有的人见了损害集体的事，明知不对，也不斗争，讲什么“义气”；有的人身在农村不爱农业，一心想到城市赚钱。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动群众评《水浒》，认真抓好这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重大斗争，以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为了把群众尽可能广泛地发动起来，我们充分发挥了理论骨干的作用，组织他们深入田间地头，召开各种各样的动员会，向群众反复宣传毛主席的指示，读报刊上有关文章，大讲开展评论《水浒》的意义。同时，把《水浒》在农村的流毒和影响，通过调查，加以分析整理，供群众有的放矢地展开批判；把《水浒》的主要内容分成几个方面，编写成文字材料，广泛发动社员进行批判。为了使毛主席的指示家喻户晓，把学理论、评《水浒》的活动真正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评论应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形式。我们组织理论骨干从《水浒》中摘出露骨宣扬投降主义的情节，编成“屏晁盖宋江要阴谋，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等小故事，由看过《水浒》的老社员讲解，理论骨干引导群众分析批判。我们还发动学校的师生，选取《水浒》中宣扬投降的内容，画了两组漫画，配了说明，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宣传。此外，墙报、板报、专栏等也都利用起来了。这样，就大大调动了群众自觉参战



的积极性。群众反映说：“这样结合农村实际学理论，评《水浒》，有写的，有画的，突出重点不一般，咱们听得懂，看得清，批得了！”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根本目的是为了“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提高识别能力，批判修正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此，在评论中我们以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和评论《水浒》的指示为指针，引导干部群众，针对《水浒》所宣扬的反动思想，有重点地概括出几个问题，学习马列、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分析一个问题或一事实，联系实际引出一个结论，得出一条经验教训。

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路线问题的论述，分析梁山起义事业从胜利归于失败的全过程，引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结论，使大家认识到，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路线错了，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也会丧失掉。只有坚持正确路线，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断夺取新的胜利。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在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时说，学大寨是真学、假学，还是半真半假学，关键是路线问题。几年前，我们学大寨没有抓住路线这个根本，因此，年年学大寨，年年没变化。后来，我们学大寨抓根本，很快见效，粮食产量翻了几番，亩产由一九七〇年的一百多斤迅速跃过了“黄河”。事实教育了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是搞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根本保证。

学习革命导师关于领导权问题的论述，分析晁盖、李逵等人的农民起义路线被宋江篡改的事实，引出领导权问题至为重要的结论，使大家认识到，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革命派手里，是防止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得逞的可靠保证。宋江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篡夺了列宁创建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领导权，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在我国，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断战胜了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保证了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今后，我们要继续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样必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如果在某个部门或单位，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路线不端正，也就不可能真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带领群众去搞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大队的阶级斗争实践说明，在农村，



集体经济的领导权不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党的路线就不能贯彻执行，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就不能巩固，资本主义就会泛滥。

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斗争不能调和的观点，分析“菊花会”上的激烈斗争，引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决没有调和余地的结论。大家认识到，梁山两条路线斗争在“忠义堂”里从未间断过。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也还长期存在。不是执行正确路线，就是执行错误路线，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大家联系本大队阶级斗争的实际，一致认为要革命就必须发扬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敢于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

学习革命导师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论述，分析梁山起义队伍没有被高俅之流公开的敌人所打垮，反而被宋江等以伪装出现的敌人所断送的事实，引出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的结论，使大家认识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阶级敌人往往利用钻进无产阶级内部、或者通过寻找代理人的手法，篡夺领导权，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同时，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私有观念的影响，阶级敌人的利诱拉拢，革命阵营里也会出现新资产阶级分子，干着从内部蛀空革命成果的罪恶勾当。重温毛主席关于“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的教导，大家决心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武器，以实际行动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分析李逵等人不能从路线上看清宋江的反革命面目，最后成了宋江搞投降主义的牺牲品的事实，引出在阶级社会中央没有超阶级的友爱和义气的结论，使大家认识到，只有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现实斗争中的一切人和事，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革命警觉。对阶级敌人仁慈就是对革命犯罪。大家联系有的队阶级斗争没人过问，甚至个别干部只认宗族户头，不分阶级阵线，结果资本主义势力抬头的事实，认真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打击了阶级敌人，批判了资本主义势力，从而使全大队干社会主义的热潮蓬勃兴起。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各项工作做好

普及大寨县要抓好基本路线教育

严 群

普及大寨县，根本在路线。学大寨，普及大寨县，首先要解决方向道路问题，也就是说要把思想政治路线搞端正。“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端正了，方向对头了，普及大寨县就有了希望。

讲路线，就是要讲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把社会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则竭力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把历史拉向后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在农村，这种斗争的实质，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抓住这个基本的矛盾，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进行基本路线教育，才能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在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

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大寨的道路，是我国亿万农民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必由之路。学大寨，一定要象大寨那样，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经验说明：抓住基本路线这个根本，革命就前进，面貌就大变，农业就大上；丢掉这个根本，革命就停滞，资本主义就泛滥，农业就上不去。如果把大寨只看成是“生产典型”，把昔阳只理解为“上纲要”的样板，就生产论生产，学枝节，图表面，必然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生产也上不去，即使一时上去了，仍然要掉下来。

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就要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农村，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小生产者思想影响和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农业发展方向、道路问题上，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阶级敌人或者公开跳出来搞破坏活动，或者躲在幕后出谋划策以售其奸，或者借助资产阶级法权玩弄反革命伎俩，或者利用小生产的某些固有特点施展阴谋手段。尽管形式和手法不断变化，但其目的始终不变，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还应该看到，方向、道路问题上的斗争，不仅社会上有，党内也有；后进队有，先进队也有；在这个问题上解决了，在别的问题上又会出现。资本主义道路过去有人走，今后还会有人走；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会走，觉悟不高的人也会走。在这种情况下，不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必须也只能在阶级斗争中前进。对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批三次五次不行，批十次二十次也不行，必须长期批下去。决不可把抓阶级斗争、批资本主义当作权宜之计，抓一抓，停一停，而是要掌握农村资本主义活动的规律，主动地发起进攻，稳、准、狠而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并且充分利用这些反面教员，对干部群众进行具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

毛主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业合作化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制度的巩固，广大农民生活的改善，绝大多数农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真理，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在旧社会深受剥削和压迫，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但同时我们又要看到，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消失，几千年来小生产的传统影响和习惯势力依然存在，并起着不可轻



视的作用，尤其是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比较严重。同城市一样，农村也会继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竭力想把农民拉过去，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则要团结教育农民，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抓紧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向农民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引导他们学马克思主义，批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对于那些受资本主义影响较深的人，更要加强教育。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一项长期的极为艰巨的任务。如果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理解不深，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就会走过场，普及大寨县就失去了思想和政治上的保证。

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应当采取耐心的态度，运用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方法，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比如开展忆苦思甜，讲队史、村史，进行新旧社会对比、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对比，等等，都会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收到好的效果。对于资本主义倾向的批判，要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样一点，即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

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党员和干部，加强基层党组织和社队领导班子的建设，解决带路人带什么路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小生产者思想的影响，会使我们一部分农村党员和干部，在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辨不清方向，削弱党组织的战斗能力。因此，我们要通过基本路线教育，使党员和干部首先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许多同志有这样一条深切的体会：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准备，或者自己的思想跳不出小生产的圈子，就认识不到批判资本主义的必要，看不到革命的前景，就会捆住大干社会主义的手脚；资产阶级思想也就会顺着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渠道，在头脑里滋长和活动起来。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这是很危险的。解决的途径，就是要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使党员、干部自觉地改造世



界观，同资产阶级思想、小生产的影响和习惯势力决裂，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当好干社会主义的带头人。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紧密结合。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党的基本路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也才能掌握锐利的思想武器，更有力地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为什么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过程中，有的同志缺乏自觉性和坚定性，而处于被动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我们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斗争中，必然会提出一些带理论性的问题。例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怎样表现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什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严重的问题仍然是教育农民；怎样充分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如何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看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极端重要性，等等。针对这些问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导下正确地加以解决，就能够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不断引向深入，推动普及大寨县运动蓬勃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掀起了新的热潮，战斗紧张，工作繁忙。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我们抓好理论学习，刻苦读书，持之以恒。要坚决克服那种对理论学习“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亿万农民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向普及大寨县的目标进军。我们要象战争时期打敌人那样，象一九四二年延安大生产那样，拿出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高速度，高标准，进一步把农业搞上去，加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



丰收了也要注意节约

江景宏

今年，全国农业生产在连续十三年丰收的基础上，又获得了丰收。广大干部和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的教导，在丰收之后仍然注意节约，增加储备。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对这项工作不太重视，说什么“再大的瓢舀不干河里的水”，认为粮食连年丰收，储备逐年增加，宽吃宽用一点，关系不大，因而放松了勤俭节约，储粮备荒。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粮食丰收了，宽吃宽用一点，真的关系不大吗？不。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八亿人口出发，从革命全局出发。粮食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又是重要的战备物资。丰年想到歉年，平时想到战时，珍惜粮食，有计划地增加储备，节约更多的粮食，是直接关系到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伟大战略方针的大事。当前，天下大乱，国际形势大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对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在革命的因素增长的同时，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节约、储备更多的粮食，就能更有力地对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突然袭击。还应该看到，我国地域辽阔，地形气候复杂，粮食生产水平还不高，局部地区遭受自然灾害，也是难以避免的。抓紧抓好节约用粮，增加储备，有利于调剂余缺、以丰补歉。所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这样，无论是发生战争，还是遇到灾荒，我们都能掌握主动权，永远立于



不败之地。

节约用粮，增加储备，对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有很大的意义。人是每天都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节约和储备更多的粮食，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我们要实现按照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到一九八〇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就应该在努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注意厉行节约，增加粮食储备。增产与节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增加生产是广积粮的前提，厉行节约是广积粮的重要措施，二者相辅相成。如果认为“再大的瓢舀不干河里的水”，只增产，不节约，宽打宽用，铺张浪费，一个来二个去，即使增产很多，粮食储备也不会增多。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全国人民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抓紧一点，多节约一点，积少成多，一年就是几十亿、上百亿斤的粮食，这对于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是很大的物质力量。我们要抓紧粮食连年丰收的大好时机，努力做好工作，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搞好年终分配，坚持节约用粮，增加粮食储备。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这样，就有利于更快地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

厉行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办一切事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既要努力增加生产，又要注意厉行节约。毛主席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厉行节约，增加粮食储备，是要长期搞好的一项工作。丰收了，思想麻痹不得，节约放松不得，任何时候都要把粮食抓紧。歉收要节约，丰收了也要注意节约。过去厉行节约，现在厉行节约，将来粮食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了，也还要注意节约。有些同志担心，提倡节约储粮，反对宽吃宽用，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节约储粮，备战备荒，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完全符合



群众的长远利益，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的高度社会主义觉悟。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好习惯、好传统。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约闹革命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节约用粮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这是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当做到，粮食丰收了，勤俭节约的思想不变，生活改善了，艰苦奋斗的传统不丢。如果看到生产队里粮满仓，自己家里粮满缸，就不注意节约，挥霍浪费，那不仅会在经济上造成损失，还可能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沾染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走到邪路上去。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不正是从吃吃喝喝、铺张浪费开始，发展到贪污盗窃、蜕化变质的吗？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树立勤俭节约的新风尚，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应当看到，在粮食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粮食丰收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决不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粮食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继续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们鼓吹“分光吃光”、“自由买卖”的反动谬论。在粮食丰收的情况下，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动分光吃尽，怂恿那些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把分得的粮食拿到市场卖高价，进行投机倒把活动。我们一定要抓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发展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

节约粮食，增加储备是每个同志都必须关心的一项工作。各级党委都应当抓紧，一年抓它几次。节约储粮，农村固然要注意，城镇也不能例外，各机关、工厂、学校、商店、街道居民，要人人注意节约，处处注意节约，共同为广积粮作出新的贡献。



小评论一组

(三篇)

比 什 么?

山东泰安县后省庄大队贫下中农评论组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形势很好。但是也有的人思想不跟趟，认为“咱现在比过去强得多，比后进单位好一截”。嘴上不说革命到了头，心里总觉得差不多了。到底应该和谁比，比什么？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家总是要比的。指导思想不同，和谁比，比什么的内容就不一样。有些人所以满足于过去的成绩，和后进比，这是由于他们头脑中的盲目自满、不求进步的保守思想在作怪。我们也主张比。但是，我们认为要和先进比，和大寨比。干革命，就要有不断攀登高峰的志气。

形势在发展，革命在深入。一个任务完成了，又有新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拿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我们所肩负的革命重担比较起来，和革命的远大目标比较起来，相差总是很远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农业学大寨取得了很大成绩，比过去确实是“强得多”了。但是，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比，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比，我们取得的成绩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任务更重，道路更长。拿近一点来说，要在五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就有许多工作要做。已有的成绩，只能是继续革命的起点，而决不是终点。对成绩沾沾自喜，停步不前，成绩就成了妨碍前进的包袱。我们越有成绩，越应该注意和革命的大目标比，要往高处站，往远处看，才能使我们^{在革命道路上}不断前进。

学大寨，就要和大寨比。我们和大寨不仅有差距，而且差距很大。通过比较分析，联系实际，揭露矛盾，找出差距，才能学得更具体，更自觉。如果只比后进，不比大寨，津津有味地欣赏自己比后进“好一截”，看不见比大寨还“差一截”，这样，学大寨岂不成了一句空话？要真学大寨，就应该敢于比大寨，制订切实有力的措施，加快学大寨的步伐。

我们有的同志也和大寨比，但他不比根本比枝节，不比实质比表面的东西，



这样学也学不到根本上。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我们和大寨比，就要比路线，比方向，比思想，比风格。各地的具体情况虽然不一样，但大寨的根本经验都是适用的。差距可以找出好多条，集中到一点，就是差在抓根本上，就是没有象大寨那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解决方向道路问题。如果只比产量，学枝节，不学根本，方向道路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产量低的上不去，产量高的也会掉下来。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才能人变思想地换装，后进变先进，先进更先进。

和先进比，和大寨比，就能比出正确的方向路线，比出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比出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后进比，比来比去，就把路线比歪了，志气比短了，干劲比小了。我们大队有个生产队在这方面有过深刻的教训。这个生产队从粮食平均亩产过千斤以后，有些人以为产量比过去高多了，家底也厚实了，觉得比后进还满不错。因而思想上松了弦，工作上低标准，没有多久，很多生产队都赶上并超过了它。这个例子还说明，不进则退，不争上游，中游也是保不住的。

和谁比、比什么，归根到底，是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那些只和后进比、不和大寨比的人，口头上说学大寨，实际上不愿吃大苦，流大汗。这种人缺少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改造思想，转变世界观。这样才能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战斗中做出新的贡献。

条件是不可改变的吗？

上海金山县枫围公社新华大队理论小组

我们大队位于黄浦江上游的水网地区，地平面低于黄浦江水面。一遇多雨，农作物就长不好，粮食产量很不稳定。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就得在全大队四千七百多亩耕地范围内，修建起总长二万米的地下排水渠。有人听说要修这么长的地下排水渠，吓了一跳。他们扳着手指头数了数：过去搞五百米地下渠就花了三年工夫，现在要搞二万米，那要干到何年何月？再说，搞地下渠得有钢筋和水泥，



我们这里只有稻草和烂泥，难道稻草能变钢筋、烂泥能变水泥？

这种说法表面看似乎有理，其实是错误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者，既承认办什么事都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又认为条件是可以创造或改变的。没有钢筋和水泥，这确实给修建地下渠带来了困难。但在困难面前，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上；另一种态度是消极被动，坐等条件，认为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前者是革命者的世界观，后者是懦夫懒汉的世界观。我们大队开展讨论的结果，许多同志都不赞同坐等条件。坐等条件，条件不会自动跑来，而且可能使人越等越懒，越等越没有志气。大家回顾了 we 大队战天斗地的历史。学大寨十一年来，虽然在治水改土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因为没有彻底破除无所作为的思想，习惯于等、靠、要，结果只能修修补补，土地面貌变化不大，水患没有解除。这说明，必须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积极创造条件，才能改变山河面貌。大变必须大干。想大变不大干，是空想；喊大干怕困难，是空喊；要高产没措施，是放空炮。是等还是上？这是真学还是假学大寨的一个标志。

全国的革命和生产发展的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大干快上，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原来的面貌。大寨的同志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干大变，改天换地，就是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大队的党支部广泛听取了社员的意见，决心带领群众向大寨学习，“想新的，看远的，干大的”，并订出远景规划，提出了今冬明春的具体任务。要求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全大队格田成方，路渠成网，树木成行，粮食亩产上一吨，社员逐步住楼房。这个规划同群众一见面，全大队人心振奋，斗志昂扬，团员、青年们说干就干，第二天晚上就出动了三百零九人，在大片低洼田里摆开了战场。全大队二十三个生产队，为了改变自然条件，队队群众都是早出晚归，白天战“三秋”，晚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毛主席教导我们：“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不利的客观条件固然为我们带来许多困难，但是，遵循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利条件会变为有利条件，这已经是反复为实践所证明了的。修建地下渠，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没有钢筋、水泥，怎么办？穷则思变。困难逼着人们动脑筋：建地下渠，难道非用钢筋、水泥不可么？是不是可以用砖代替？经过试验，完全可以。于是，在短短几天中，群众就自动筹办了三十七万块砖。但是，一条地下渠要用砖四万七千块，三十七万



块砖至多只能砌八条，还差一半，怎么办？人们又研究把渠壁开成斜坡形，不用砖砌，这样一来，用同样数量的砖就可以多砌一倍的地下渠。有了砖以后，拿什么来砌呢？开始我们用泥砌，但地下渠的拱形顶牢度不够，几次试验都失败了。后来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用三分石灰和七分烂泥和在一起的“三七土”代替水泥，使牢度达到了标准。地下渠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最怕淤塞。一尺不通，百尺无用，这又怎么解决？群众从实践中摸索出了办法：每隔一定距离，在地下渠底掘一口小井，使淤泥冲入井里，定期清除。地下渠往往比河面低，涨潮时河水会倒灌，使排水渠失去作用，这也要想办法。通过实践，我们修建了小水闸，退潮时开闸让水自动往河里流，涨潮时关闭用水泵把水往河里抽。由于注意调查研究，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破除无所作为的思想，我们在大战“三秋”的同时，挖好了十七条深一米、宽一米半的排水渠，总长一万多米，其中一部分已建成了地下渠。还在二千七百多亩麦田里，挖好了三十九万米的土暗沟。

毛主席早在二十年前曾经指出：“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这个古代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



修修配配 大有可为

广西灵山县农机修造厂工人评论组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各级农机修造厂越办越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却认为：“厂子大了，设备多了，再搞修修配配就是大材小用了。”这样的思想是不对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县一级的农机修造厂和社、队农机修配网发展很快，使农机具的维护和使用水平大为提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农机修配仍然跟不上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的需要。拿我们厂来说，在人员和设备方面都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两倍，生产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即使是这样，现在我们的修造



水平也还不能满足农村社、队的需要。去年，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并充分发挥社、队的修配能力，才使全县拖拉机和柴油机的完好率保持在百分之八十五的水平。就是说，还有百分之十几的维修工作没有做好。同时，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机具修理所需配件的品种、规格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我们要当好农机修配这个“配角”还真不容易。如果按照在全县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算一算账，到一九八〇年，我们全县农业机械的拥有量将增加十倍。农业机械的迅速增加，也要求修配能力紧紧跟上。可见，农机修配是大有可为的。

厂大了、设备多了，搞修修配配是不是大材小用呢？不是的。作用大小，不在于搞修配还是搞制造，而在于有没有全心全意支援农业的正确态度。态度问题不解决，在经营方针上，就会重制造，轻修配，甚至脱轨转向；在工作中，就会不讲质量，马虎应付，甚至图省事，怕麻烦，能推就推，能拖就拖，造成损失。我们厂一度由于热衷于搞大型农机试制，搁下待修的农机具不予修理，受到了群众的批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农机修造厂规模扩大了，更应当端正支援农业的态度，牢固地树立“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坚持又修又造，以修为主。在以修为主的前提下，根据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下，适当搞一点制造。

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各地区都将因地制宜地有计划地定型制造一批农机具。制造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不制造，修配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只制造不修理行不行？不行！一部农机具造出来交给社队使用，修配工作是不可少的。否则，即使损坏了一个很小的零件，也会使整台机器成为无用之物。制造和修配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有制造就必然要有修配，制造越发展，修配的任务就越重；修配的工作做好了，制造出来的机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只讲制造、不讲修配，那就是瘸着一条腿走路，走不快、也走不远。只有正确处理制造和修配的关系，在修配工作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才能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大显身手。

那种认为“修修配配是大材小用”的思想，实际上是“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反映。有的同志不是说什么“修修配配，赚钱不多，费力不少”吗？这种思想不解决，对我们搞好支援农业妨碍极大。有了这种思想，就不能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就不会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全党的大事。我们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努力做好农机修配工作。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依靠什么？

——陕西榆林地区的调查报告

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榆林地区，最近几年，农业低产落后的面貌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一九七〇年以来，这个地区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大规模地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五年的时间内，共投工二亿七千多万个，移动土石方七亿多立方米，兴建农田水利工程三万多项。全区水地、坝地、水平梯田的总面积增加一点四倍，造林保存面积增加百分之四十，人工种草面积增加一倍。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有了一亩六分基本农田，二亩六分林，一亩草。随着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变，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一九七四年，全区粮食总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的通常年产量增长百分之八十七，今年又比去年增产两成。一个长期吃国家供应粮的地区，从一九七三年起实现了粮食自给。

榆林地区的变化，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抓农村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大干社会主义干出来的。他们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必须依靠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依靠广大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一个很大的社会主义干劲。只有在不断解决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的过程中，大干苦干，下功夫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才能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使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

要把农田基本建设作为一项社会主义事业来办好，没有革命的雄心壮志，没有搞社会主义的干劲是不行的。榆林地区处于毛乌素沙漠的南沿，百分之九十的面积是丘陵沟壑区和风沙区，无霜期短，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是比较差的。如何正确认识 and 对待自然条件，长期以来，在榆林地区一些干部的思想上没有得到解决。在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下，一部分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改变面貌缺乏信心。他们认为，象这样差的自然条件，就是治理一点山水风沙，也不顶事，要想从根本上改变面貌是很难的。在这种思想的束缚下，他们看山愁，望沟怕，认定“榆林难变”，一提大干就摇头，一提治山就伸手。这就阻碍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发展，农田基本建设



的步子也迈不开。

怎样正确认识榆林地区的条件？在比较差的自然条件面前，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应持什么态度？对这个问题，地区领导也曾经在干部中组织过讨论，并批判了“难变”的论调，但是，由于没有自觉地从路线上首先端正领导的思想，因而收效不大。一九七〇年，毛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重新发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的传达，使榆林地区党委领导成员受到了触动。地委常委集中一段时间，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复电》，学习大寨和昔阳的经验，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始认识到所谓“榆林难变”的论调，主要是反映了地、县两级领导的革命精神不振，思想和政治路线不够端正。许多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过去工作没做好，归根到底是没有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存在形而上学的观点，屈服于自然的压力，想变又怕难，缺乏搞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革命干劲。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地区领导遵照毛主席关于“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药方”的教导，在批林整风运动中，组织地、县两级干部有重点地选择各类地区的典型，进行了一次全区性的调查。群众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革命实践，各地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深刻地教育了大家。风沙区的靖边县杨桥畔大队和丘陵沟壑区的米脂县高西沟大队，都是自然条件很差的地方。但是，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几年来，他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抓农村的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带动了农田基本建设大规模开展：一个引水拉沙，造出万亩田，在沙漠腹地开辟了人造绿洲，粮食亩产上了《纲要》；一个治山治水，做到了山山岭岭梯田化、沟沟岔岔都有坝，基本上实现了土不下山，泥不出沟。相反，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和这两个大队连畔种地的九里滩大队和安沟大队，当时的情形却完全不同。这两个大队的干部只是强调困难，没有认真组织群众在改变生产条件上下功夫，而是放弃农业想从副业找出路，造成资本主义倾向泛滥，年复一年面貌得不到改变。

从这些典型事例的对比中，各级领导和干部清楚地看到，能不能改变低产落后的面貌，关键在于路线是否正确，有没有搞社会主义的干劲，是不是发挥了群众的力量，而不在于自然条件的好坏。只强调条件差，而看不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形而上学思想和懦夫懒汉世界观的反映。为了进一步提高大家的觉悟和认识，全区从上到下，从各级领导班子到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学习毛主席的《复电》、忆传统、讲路线、查斗志的热潮。这次学习活动，对大家的教育很大。榆林地区



很多地方曾经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许多同志回忆，当年毛主席率领解放大军转战陕北时，曾在榆林地区的许多地方生活和战斗过。在革命战争年代，榆林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闹革命，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支援革命战争，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榆林有这样的光荣革命传统，有这样有觉悟的人民，今天在无产阶级的条件下，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难道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吗？大家从学习毛主席《复电》中吸取了极大的精神力量，从群众的革命实践中看到了榆林的希望，思想感情变了，对榆林的看法也变了。过去认为“榆林难变”的人，现在看沟沟有用，看山山是宝。大家说：“有沟不算穷，有山不愁富。山大，可以大修梯田；沟多，可以多造坝地；坡广，可以广种林草；石头多，可以垒坝造田。”这一下，就把榆林的山山水水看活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自觉性提高了。黄河畔上的吴堡县，过去一提改变面貌，有人就摇头，说那是“生就的干沟秃山，注定缺吃少穿”。后来县委带头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振奋革命精神，一分为二看吴堡，带领全县人民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全县面貌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全区第一个学大寨的先进县。吴堡的变化，对整个榆林地区震动很大，条件最差的吴堡能变，别的县有什么理由不能变？一个学大寨、赶吴堡，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群众运动迅速在全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搞农田基本建设不仅是改造自然的斗争，而且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重副轻农、重钱轻粮、副业单干、劳力外流是榆林地区两条道路斗争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严重障碍。这些资本主义倾向，前几年比较普遍，而且不少是打着“为集体抓现钱，为社员增收”的旗号，有很大的欺骗性。对于这种现象，各级领导班子中都有一些同志看不清，抓不住，甚至支持纵容，错误地认为生产水平低，有些人出外抓点钱是应该的，致使副业单干、劳力外流的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事实表明，不首先提高各级领导成员的路线觉悟，就不能抓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五年来，结合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地、县委每年都搞一次开门整风，围绕着分析阶级斗争的动向和特点，检查自己对阶级斗争抓了没有？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认真批了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领导班子内部、在自己身上有没有反映？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在抓好地、县委领导班子路线教育的同时，全区每年还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农村进行党的



基本路线教育，一批一批地整顿农村基层组织，解决好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问题。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各县一方面总结一些工作搞得较好，面貌改变较快的先进典型，用这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事例，“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回忆对比，算帐对比，典型对比。通过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警惕走“回头路”；通过算帐对比，算资本主义给集体带来的害，给群众带来的苦，比社会主义给集体和社员带来的好处，体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真理；通过典型对比，摆事实，讲道理，认识发展农业与路线的关系，用群众自己熟悉的材料和切身的经验，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原来副业单干、劳力外流比较严重的佳县，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联系实际，算了三笔帐：一是副业单干对农业生产的危害帐；二是资本主义倾向对人心的腐蚀帐；三是对国家的拖累帐。一批一算，是非大明。不少干部和群众深有感触地说，原来认为放些劳力出外抓现钱对集体有利，现在看来，这是“河里捞了一块板，家里丢了两扇门”，损了集体，害了社员。这样联系实际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批判资本主义，效果显著，普遍提高了大家的觉悟，进一步把人心集中到大干社会主义上来。

群众起来了，领导就坐不住了。群众要认真学大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干苦干，迅速改变山河面貌，领导就必须到第一线去，同群众一起战斗，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地、县委领导越来越感到，过去那种“说在嘴上，写在纸上，喊在会上”的做法，是不可能领导好学大寨运动的。客观形势要求领导的工作作风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吴堡县委狠抓自身的思想革命化，走在了前面。这个县以大寨、昔阳为榜样，坚决执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从一九七三年起，就实现了县级干部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百天，公社干部二百天，大队干部三百天。干部劳动的经常化，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带来了山河面貌的显著变化。吴堡的经验很有说服力，使各级干部认识到，要叫山河面貌变，干部先要带头干。干部带了头，群众争上游。干部不深入基层，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会脱离群众，就不可能正确地领导群众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对照吴堡的经验，各级党组织对广大干部反复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批判“上智下愚”的剥削阶级传统观念，教育干部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地、县



委的许多老干部，回忆起当年提着包包背着枪，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办公、种地的情景，更加激发了带头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他们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基层干部做出了榜样。有了县委干部的一百天，就有了公社和大队干部的二百天、三百天。一九七四年，全区有半数的县、四分之一的公社和四分之三的大队干部，分别实现了“一、二、三”。今年上半年，全区又有三分之二的县级机关和一批社队干部实现了时间过半，参加劳动的天数过半。以劳动为荣，不劳动为耻的风气，在干部中进一步形成。现在，干部开会碰在一起，一见面就比谁手上的茧子厚。群众看到这种情景，高兴地说：“有了这样的好干部，榆林山川不愁变！”

干部和群众结合在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个个的困难就被克服了，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比如，农田基本建设的投资，过去一些地方依赖国家贷款，现在他们主要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多种经营，兴办社、队企业，“治山从山上取来，筑库从水里取来”。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各县还努力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坚持以土代洋，就地取材，做到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他们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尝到了甜头，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涨。隆冬，即使冰雪盖地，气温很低，许多社队的干部和群众仍然顶风冒雪大干。有的地方，山势陡峭，修一亩梯田，要花上百个工；土源奇缺，垫一亩沙地要走上千里路。广大群众有志气、有干劲，花工再大也要搞。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农田基本建设的规模已由一架山、一条沟的治理，发展到大面积的综合治理；由一个队一个队的分散作战，发展到一个公社、几个公社、一个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进一步发挥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今年十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传达到榆林后，广大干部群众受到很大鼓舞，更加坚定了走大寨道路的信心。全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干部下到农村，和群众一起投入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一个新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正在兴起。截止十月底，全区已新修基本农田二十八万多亩，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点三倍，深翻土地五十多万亩，时间比去年提前一个多月，干劲和实效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广大干部群众决心遵照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继续努力作战，去夺取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员会调查组



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

邯郸冶金矿山管理局党委会



在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过程中，我们联系实际，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回顾了党委成立以来的工作，并且着重围绕着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总结经验，提高认识。通过学习和总结，大家深刻体会到，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首先端正领导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是企业中一项经常的重要任务。对这个问题如果缺乏自觉性，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把企业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我们局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在原邯郸冶金矿山公司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有八个生产矿山、五个选矿厂和四个为矿山服务的生产单位，担负着向十几个省、市的钢铁企业供应部分矿石的任务。原来矿山生产比较落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开始，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说，主要是生产设备不足；有的说，问题在群众之间还不够团结；有的则认为采矿由露天转向地下，干部缺乏管理经验，等等。怎样才能把生产迅速搞上去？我们心里也没有数。特别是当时还没有觉悟到从路线上分析问题，调查研究，所以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结果是费劲不小，收效不大。

党的十大的文件，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周恩来同志在十大的报告中强调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的工作方法》等著作，并且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这使我们受到很大震动。我们联系对照自己的情况，觉得问题正是这样。我们局党委建立后，急于改变被动局面，想把生产搞上去，这和群众的愿望是一致的。但是，怎样才能搞上去，认识并没有搞对头。在我们的思想上，只是片面地看物的因素和外部条件，看部分群众中的问题，而



没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没有透过现象，首先从领导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上进行分析，因而只忙于抓具体措施，没有认真去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广大矿工积极行动起来，开展革命大批判，联系矿山实际，揭露和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影响和表现，强烈要求加快矿山革命和生产的步伐。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我们认真分析了矿山内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状况，并联系矿山过去的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大家认识到，原来矿山领导班子内部不够团结，抓阶级斗争不得力，特别是在办企业的路线上，许多修正主义的东西没有得到深刻的批判，影响了群众之间的革命团结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新的党委成立后，这种情况虽然有些变化，但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同志还没有完全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有的同志无产阶级党性不强；有的同志干劲不足，怕艰苦，怕困难。这些问题反映了我们局领导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还不够端正；也是被动局面不能得到迅速改变的主要原因。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以“**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为武器，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大家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端正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决心和群众一起遵照毛主席关于“**开发矿业**”的指示，努力搞好矿山生产，以适应钢铁生产发展的需要。

党委成员提高了抓路线的自觉性，加强了革命团结，就带领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同广大矿工一起上山下井，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我们在群众中继续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分别不同情况，落实党的政策，并且通过讲国内外大好形势，讲大打矿山之仗的意义，使大家把矿山的生产建设同贯彻“**以钢为纲**”的方针和加速发展国民经济的大局联系起来，调动了广大矿工搞好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

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就我们局的情况看，还必须注意帮助厂、矿一级的党委，解决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增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战斗力。厂、矿一级领导处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正确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我们局所属的厂、矿领导班子，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路线觉悟有了提高，工作积极性也是高的，但是，执行党



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的情况又是不平衡的。有的比较自觉一点，有的就差些。原来还有个别单位的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发现一个大型矿山的党委，由于主要领导成员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腐蚀，蜕化变质，不仅在企业中极力推行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黑货，而且包庇纵容坏人，压制群众，使这个矿的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揭开了这个矿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在广大干部、群众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对这个矿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调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个矿经过整顿，迅速改变了面貌。

通过这个事例，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腐蚀我们的队伍，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能不反映到领导班子中来。“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个领导班子如果被资产阶级严重腐蚀，就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这样的班子，必须及时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从斗争中选拔新生力量，充实到领导班子里来。这样做，就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迅速改变那里的面貌。

过去，我们衡量领导班子，往往是较多地看这个单位生产任务完成得怎样，而忽视完成生产任务中执行路线的情况。事实教育我们，这样看问题是片面的。因为生产任务的完成，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但并不能完全反映执行路线的情况。有一个选矿厂，生产任务完成得不错，曾多次受到表扬。但是，我们深入调查以后，发现这个厂的领导存在着埋头抓生产的倾向，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不力，对资本主义倾向不敢展开斗争，对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热情支持。显然，这种情况如果长期存在下去，生产任务也是不可能很好完成的。于是，就帮助他们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着重提高他们抓阶级斗争的自觉性，从而增强了领导班子的战斗力。

还有的厂矿存在着这种情况，即近几年面貌变化比较显著，各方面的工作都有成绩，在路线方面没有发生突出的问题，但领导班子成员中滋长了“过得去”的思想。我们体会到，对这样的领导班子主要是帮助他们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提倡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经常提醒他们从路线上分



析企业中存在的问题。有一个矿山，是我们这里的先进单位。这个党委的一些成员原来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对自己过去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已经认识并得到改正，“管不了一辈子，起码可以管一阵子了”。经过最近一个时期的学习，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照检查，他们发现，就是在办企业路线问题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也还没有肃清，企业的领导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革命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党委本身虽然是团结的，但也存在着某些不团结的因素。这些问题都程度不同地影响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影响着生产大踏步地前进。这样一摆一议，他们就找出了差距和问题，并且认识到，必须在不断端正思想政治路线的过程中加以解决；革命在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抓路线。

要不断地端正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路线，就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革命理论。过去我们存在着忽视理论学习的情况，往往由于企业的日常工作忙而挤掉它。通过批林批孔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我们深深感到，理论上不清楚，就很难自觉地执行正确的路线；不重视抓自身的和群众的理论学习，也就很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大家的思想和行动。在解决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们就有这样的体会。原来有些领导成员，总是没有共同语言，对于某一项工作，一个说成绩，另一个就谈问题；一个表示赞成，另一个就反对。这里有资产阶级派性在作怪，由于只是就事论事，团结问题就一直解决不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罪行，大家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团结，首先是领导班子团结，是革命的大局，是团结群众坚持继续革命的需要；而一切修正主义头子都是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队伍的。大家从路线上划清界限，提高了觉悟，解决具体问题就有了正确的方向，结果党的政策很快得到落实，革命团结迅速得到加强。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提高了我局广大职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也进一步提高了各级领导成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使整个矿山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广大职工认识到，矿山是钢铁的“粮仓”，关系着钢铁生产发展的速度，关系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今年，在老矿山生产能力降低，新矿山接替不上的条件下，大家迎着困难上，下苦功，打硬仗，十一月下旬，采剥总量、铁矿石和精矿粉产量，都先后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国家计划，为钢铁生产作出了新贡献。



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一期到第十二期总目录

(题目后面括弧里前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总页码)

列 宁、毛主席语录 (共四十七条)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3 • 213)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2 • 1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2 • 1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 108)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张春桥 (2 • 117)

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 (2 • 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 • 129)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新闻公报 (2 • 130)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 • 1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2 • 1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2 • 136)

新年献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五年元旦社论 (1 • 5)

转载: 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11 • 917)

学 习 无 产 阶 级 专 政 理 论 反 修 防 修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张春桥 (4 • 297)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元 (3 • 230)

为反修防修建设理论队伍.....袁 育 (1 • 9)

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纪 平 (1 • 26)



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学习《矛盾论》的一点体会	高 黎 (1 · 32)
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池 恒 (2 · 138)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学习《伟大的创举》	周 斯 (2 · 144)
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路 阳 (2 · 151)
加强社会主义教育	庄 立 (2 · 168)
认真读书 抓紧学习	程 越 (3 · 240)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器	
——纪念《哥达纲领批判》写作一百周年	路 明 (3 · 245)
短评：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	(4 · 307)
回顾“三反”“五反”运动	翟 青 (4 · 311)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燕 枫 (4 · 317)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武器	
——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纪 岩 (4 · 324)
战胜资产阶级的思想反抗	庄 宁 (4 · 335)
回到农村 继续革命	北京部队某部八连全体复员战士 (4 · 344)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田 春 (5 · 391)
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袁 青 (5 · 394)
进一步加强农村的无产阶级专政	江渭清 (5 · 400)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作长期努力	李 钧 (6 · 493)
学好理论 执行政策	程 越 (6 · 496)
货币交换和现实的阶级斗争	夏力之 (6 · 504)
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	
——重新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的一点体会	中国共产党衡水地委第一书记 李 铁 (6 · 513)
组织工人认真看书学习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工会委员会 (6 · 517)
提倡调查研究	池 恒 (7 · 565)
正确认识我国的商品制度	郑 凯 (7 · 594)
搞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	
——纪念《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二十周年	齐 彦 (8 · 649)
学一点政治经济学	吴 畅 (8 · 655)
理论联系实际 推动学习深入	池 恒 (8 · 668)
运用理论调查研究农村现状	中国共产党周口地委第一书记 江振华 (8 · 675)
掌握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	燕 枫 (9 · 777)



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学习《国家与革命》第五章·····	钟 实 (9 · 781)
总结经验 促进学习·····	李 扬 (9 · 786)
工人阶级也要不断学习和改造·····	洪 滨 (9 · 788)
深入学习理论必须端正学风·····	中国共产党盘锦地区委员会 (9 · 793)
建设理论队伍 推动群众学习·····	天津市染料厂党委会 (10 · 853)
反对投降主义的重要文献	
——学习《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田志松 (11 · 950)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齐永红 (12 · 1011)
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俞 彤 (12 · 1016)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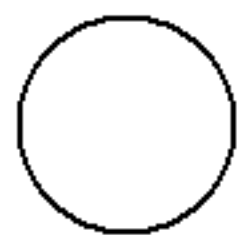
鲁迅论《水浒》·····	(9 · 735)
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9 · 736)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评论·····	方岩梁 (9 · 738)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评《水浒》·····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9 · 743)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	钟 谷 (9 · 748)
叛徒的颂歌·····	山东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 赵安亭 (9 · 756)
评投降派宋江·····	安 群 (10 · 861)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兼驳胡适吹捧金批本《水浒》的谬论·····	闻 钟 (10 · 868)
《水浒》与宋代的阶级斗争·····	杨荣国 (10 · 874)
宣扬投降是对农民革命的歪曲·····	山东梁山县后集大队《水浒》评论组 (10 · 878)
《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	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 陈大康 (10 · 881)
结合评论《水浒》 深入学习理论·····	池 恒 (11 · 919)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余 凡 (11 · 955)
透过现象看本质——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方 荆 (11 · 961)
农民起义有这样的“规律”吗？·····	杨 宽 (11 · 965)
“让贤”与投降·····	北京卫戍区某部一连理论小组 (11 · 970)
我们评论《水浒》的一点体会·····	河北深县护家池大队党支部 (11 · 973)
略论方腊·····	史 文 (12 · 1042)
从宋江看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	袁 青 (12 · 1049)
发动群众 评论《水浒》·····	甘肃庆阳县八里庙大队党支部 (12 · 1052)



批林批孔 继续革命

- 批判林彪的《论短促突击》.....詹立波 (1 · 41)
-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前进.....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党支部 (1 · 47)
- 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柯 木 (2 · 184)
- 批判因循守旧 坚持继续革命.....梁 效 (3 · 253)
- 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林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5 · 406)
- 评林彪的卖国哲学.....梁 效 (8 · 658)
-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前进.....柯 史 (8 · 687)
-
- 揭露“让步政策论”尊儒反法的本质.....上海钟表元件厂三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1 · 37)
- 为什么说荀子是法家?.....唐晓文 (1 · 52)
- 论刘禹锡的政治诗.....闻 军 (2 · 174)
-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动的产物.....梁思源 (6 · 540)
- 法家路线和黄老思想——读帛书《经法》.....康立卫今 (7 · 615)

加 强 党 的 建 设



- 认真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于 冬 (1 · 15)
- 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向 伟 (1 · 19)
- 切实执行民主集中制.....向 晖 (2 · 158)
- 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学习《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平谷县委员会 (2 · 164)
- 增强革命团结 发展大好形势.....呼和浩特铁路局党委会 (2 · 191)
- 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新疆维吾尔族贫农社员 阿衣木汗
新疆哈萨克族牧民 沙马力汗 (2 · 195)
-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革命团结.....俞 彤 (3 · 259)
- 永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严 群 (3 · 263)
- 努力改造世界观.....田志松 (3 · 266)
- 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彻底决裂.....天津市汽车运输六场党委会 (3 · 274)
-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高 洛 (4 · 331)
- 开门整风 团结多数.....河北魏县陈庄大队党支部 (4 · 348)
- 团结战斗 胜利向前.....中国共产党合山矿务局委员会 (5 · 425)
- 警惕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侵蚀.....甘 戈 (5 · 429)



认真实行精兵简政·····	中国共产党大荔县委员会	(5 · 442)
深入学习理论 促进安定团结·····	岳 海	(6 · 489)
做好思想工作·····	梁 华	(7 · 572)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	柏 杉	(7 · 579)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向 晖	(7 · 582)
抓好农村党员的思想教育·····	安徽利辛县柳西大队党支部	(7 · 587)
做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战士 李增锡	(7 · 591)
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	青 岩	(8 · 664)
正确处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昆仑机械厂委员会	(8 · 681)
密切官兵关系的有效措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会	(8 · 695)
自觉地经常地向人民群众学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洛阳”舰党支部	(8 · 698)
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靳志柏	(8 · 702)
破除外因论 自觉拒腐蚀·····	江景宏	(8 · 705)
领导要敢于负责·····	袁 青	(8 · 708)
共产党员要增强党的观念·····	闵 霄	(9 · 769)
坚持精兵简政·····	兰 文	(9 · 773)
翻身农奴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	朱 锋	(9 · 797)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		
——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	赛福鼎	(10 · 842)
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	石 平	(10 · 883)
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巴 山	(10 · 887)
以点带面 推动全般·····	庄 宁	(11 · 926)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齐 彦	(12 · 1020)
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	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党委会	(12 · 1073)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各项工作做好

教 育 革 命

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	大寨大队团支部	(5 · 438)
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朝阳农学院委员会	(5 · 450)
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经验·····	钟 实	(5 · 456)
工院校要为工业生产服务——山东工学院的调查报告·····		(5 · 460)



继续改革大学教育——北京市的调查报告	(5 · 465)
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江 虹	(6 · 499)
青年要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湖南株洲县白关大队农场知识青年	(6 · 521)
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齐 坚	(7 · 568)
用什么标准要求学生?上海市本溪中学党支部	(10 · 890)
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2 · 1003)
坚持青年同工农结合的正确路线——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石 凌	(12 · 1023)
永远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叶 新	(12 · 1029)
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上海市第二中学党支部	(12 · 1034)
开门办学 越办越好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党支部	(12 · 1038)

文 化 战 线

商品交换中两种思想的斗争——从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谈起胡 容	(4 · 361)
按照无产阶级面貌改造文化队伍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杜华章	(6 · 526)
进一步发展农村电影放映网钟 颖	(6 · 536)
为青年出版更多更好的自学读物——评《青年自学丛书》翟 青	(7 · 574)
大海的力量——评影片《第二个春天》的主题思想秦 新	(11 · 976)
让革命诗歌占领阵地——重读鲁迅对新诗形式问题的论述任 棣	(11 · 987)

卫 生 体 育

继续做好医疗队工作韦 革	(6 · 531)
进一步抓好农村卫生工作韦 革	(9 · 766)
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建设郭 育	(9 · 763)

科 学 研 究

认真办好自然科学研究刊物柯 文	(4 · 356)
人类认识和利用能源的历史秦 华	(5 · 469)
努力使主观符合客观		
——我们是怎样逐步做好天气预报的?贵州水城气象站	(7 · 599)
实践是农业科学发展的源泉金 枫	(8 · 711)
同位素年代学与人类对自然发展史的认识朱炳泉 周新华	(10 · 893)
重视科学普及工作项 群	(11 · 982)



农 业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些经验 赵丰年 (1 · 59)
- 制定规划 乘胜前进 河北遵化县沙石峪大队党支部 (1 · 71)
- 党的基本路线指引我们胜利向前 辽宁营口县水源公社党委会 (1 · 80)
- 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建设新农村 江苏邳县丁楼大队党支部 (1 · 85)
- 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新疆英吉沙县包孜洪十五大队党支部 (1 · 90)
- 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 华 云 (3 · 279)
- 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党委会 (3 · 285)
- 批资本主义 干社会主义——山东鱼台县相里大队的调查报告 (4 · 340)
- 宁夏六个国营农场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农林部农垦局调查组 (4 · 366)
- 保持和发扬“穷棒子”精神
- 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指示 王国藩 (5 · 433)
- 照毛主席的思想办农业 葛 静 (7 · 625)
-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北京平谷县许家务大队党支部 (8 · 671)
- 为建设农村贡献我们的力量 湖南新邵县复员军人 刘克清 李解忠 李典庆 (8 · 684)
李维友 李国坚 肖坤书
- 在抗灾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 山东诸城县新河崖大队党支部 (9 · 813)
- 认真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 谭 枫 (10 · 827)
- 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 中国共产党昔阳县委员会 (10 · 838)
- 学大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 华 云 (11 · 922)
- 学大寨要永不停步 中国共产党营口县委员会 (11 · 930)
- 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谭 枫 (11 · 935)
- 穷要长志 富要防修 吉林榆树县小乡生产队党支部 (11 · 940)
- 自力更生就可以大有作为——山东烟台地区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调查报告 (11 · 945)
- 普及大寨县要抓好基本路线教育 严 群 (12 · 1056)
- 丰收了也要注意节约 江景宏 (12 · 1060)
-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依靠什么? ——陕西榆林地区的调查报告 (12 · 1068)

工 业

- 要有一个全面规划 宫效闻 (1 · 24)
- 以路线为纲学大庆 田志松 (1 · 65)
- 依靠工人群众办好企业 上海手表厂党委会 (1 · 76)



坚持正确路线 搞好铁路运输	吉林铁路局党委会	(4 · 371)
自力更生是个路线问题	黎 新	(4 · 376)
坚定不移地走大庆道路	中国共产党胜利油田委员会	(5 · 421)
坚持政治挂帅 批判物质刺激——大连机车车辆厂的调查报告		(5 · 446)
在商品交换中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广西南宁罐头食品厂的调查报告		(6 · 509)
走大庆道路 铺“海上铁路”	中国共产党沪东造船厂委员会	(6 · 548)
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办企业——吉林市油脂厂的调查报告		(6 · 553)
学理论 促生产——天津市电子仪器厂的调查报告		(7 · 611)
搞好钢铁生产的根本问题在路线	章 迪	(7 · 630)
注意发展轻工业	钟 成	(7 · 634)
分工虽不同 都是主人翁	上海第五钢铁厂第一车间理论小组	(8 · 679)
依靠群众赢得了高速度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筹建指挥部	(9 · 804)
努力把基本建设搞得更好	姚 尚	(9 · 808)
积极办好中小工业	江 虹	(10 · 833)
大有希望的新生事物——江苏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的调查报告		(10 · 849)
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上海沪东造船厂的调查报告		(10 · 857)

商 业

十六个青年店员的反腐蚀斗争——上海市中南中心合作食堂的调查报告		(3 · 271)
在反腐蚀的斗争中前进——北京市崇文门第二旅馆的调查报告		(4 · 352)
为革命做好商品供应工作	北京市西单菜市场党支部	(7 · 638)

小评论 · 杂文 · 国际述评

小评论一组(五篇)		(5 · 413)
小评论一组(三篇)		(7 · 605)
小评论一组(三篇)		(12 · 1063)
杂文：“传心术”的妙用	赵 前	(1 · 94)
杂文：苏修鼓吹“三不”主义的目的何在？	秦景池	(8 · 722)
杂文：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	阳 戈	(11 · 990)
国际述评：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新 南	(2 · 198)
国际述评：苏修争霸世界的经济根源	梁 效	(10 · 903)

